

胡

回忆录

风

胡风回忆录

胡 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回忆录/胡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11

(新文学史料丛书)

ISBN 7-02-001705-3

I. 胡…

Ⅱ. 胡…

Ⅲ.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②胡风-传记

IV. I251+K825.6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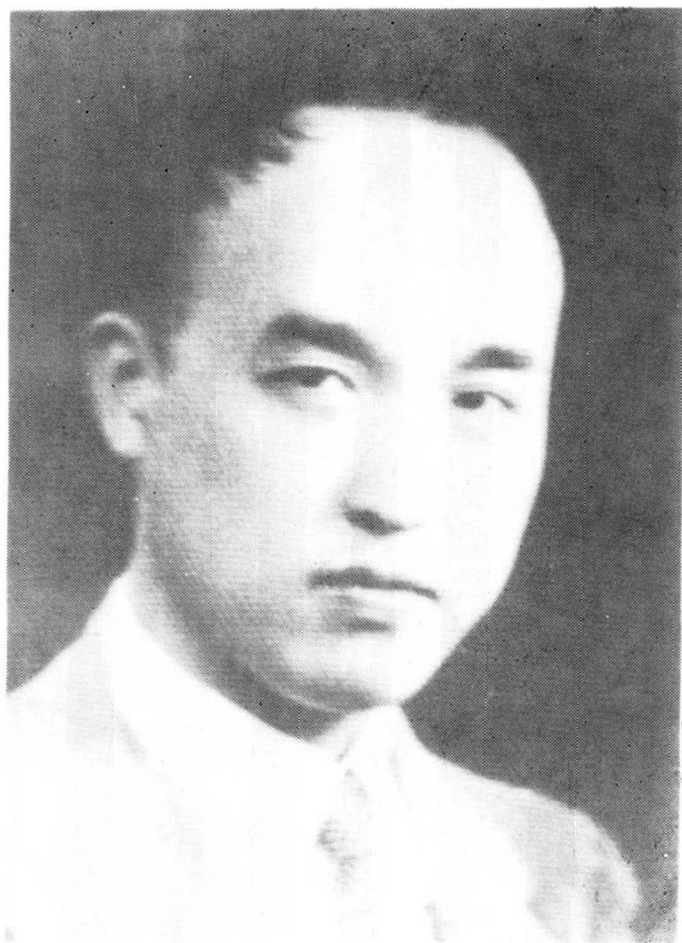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3.5625印张 4插页 311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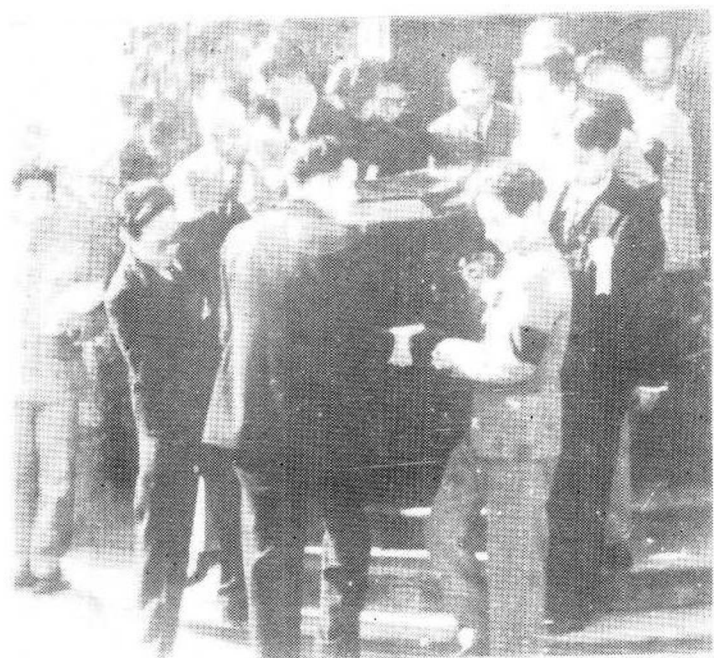
199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50

定价 9.95 元



作者像



1936年在
魯迅葬儀中
抬出疾儀館

魯迅先生

魯迅

魯迅先生！為國為民自由而奮鬥
先生一生對於社會的觀察，被壓迫被
壓迫的人，在先生眼裏，無處不是被壓
迫的。先生對於社會，像出了氣喘的喘
息，對於社會，先生一生都在為社會而
奮鬥。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

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

我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
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先生的一生，是為社會而奮鬥的
一生。

作者手述



1932年3月
初摄于东京



1939年10月19日在重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



1939年秋与梅志、晓谷、
晓风在重庆北碚。



1948年10月在杭州灵隐(自左至右)

前排：贾植芳、任敏、冀汭、胡风

后排：朱谷怀、余明英、路翎、罗洛

目 录

一 东京时期..... 1

偶遇秦德君——结识日本作家——郭沫若
从千叶来——左联东京支部——与上海左翼文
艺界人士接触：冯雪峰、丁玲、周扬——远东反
战会议——我们被捕了

二 在上海

上篇 左联任职期间..... 18

与鲁迅先生见面——周扬通知我做宣传
部长——我对矛盾的看法——宣传部机构组成及
成员介绍——关于《可爱的中国》——找个吃饭
的职业：《时事类编》——冯雪峰常来谈话——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穆木天被
捕之后——与田汉的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辞
去左联职务

下篇 左联离职前后..... 33

补叙一件事——《林语堂论》——评介几
位作家：禾金、欧阳山、艾芜等——《理想主义者
时代的回忆》——译介台湾进步作家作品——
《动向》上的两次论争——评介几位新人：耶林、
田间、端木蕻良等——认识了“二萧”——《木

眉文丛》——《海燕》始末——《半夏小集》之五
与曹聚仁——我和《作家》及孟十还——参加长
征的冯雪峰回来了——“两个口号”论争——鲁
迅与党的负责人的一次谈话——“左联”解散了
——鲁迅逝世了——《七月》创刊

三 在武汉

上篇.....77

见到董老和周副主席——与国民党打交道
——阐述鲁迅思想——筹备《七月》正式出版
——木刻展览会——编辑《星期文艺》——茅盾
来了——鹿地夫妇——国民党对敌宣传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

下篇.....92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姚蓬子与
《抗战文艺》——周作人附敌消息传来——《七
月》新作者：阿垅等——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
东论鲁迅》——我与出版家俞鸿模——撤离武汉

四 重庆前期

上篇.....115

逃难生活——读书、读书——张静庐老板
——大侄张恩——艰难旅程中

下篇.....140

找到老舍——在复旦教书——《七月》复刊
困难重重——欧阳山与草明——周副主席约见
我——周扬带口信来——抗战慰劳团——吴奚

如的恋爱——丁玲的一包稿件——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鲁藜的《延河散歌》——陶行知与育才学校——邻居马宗融、吕振羽——阿垅的《南京》——发现了路翎——高长虹来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编辑《民族形式讨论集》——吕荧《人的花朵》——去延安？去香港？——嘱托聂绀弩编《七月》

五 奔赴香港228

一路颠簸——访何家槐——孙钿来接——廖承志、夏衍来——送走M母子——与我有关的几家进步报刊——我去看望萧红——对夏衍的意见——香港工作总结

六 在东江，在桂林258

住满文化人的山寨——《死人复活的时候》——杨刚向我约稿——李亚群同志——熊子民像长兄——老聂与彭燕郊——骆宾基谈萧红——“保障作家权益会议”——南天出版社——与熊佛西的交往——记邵荃麟——M的童话诗——田汉约我看演出——乡下的祭神节

七 重返重庆

上篇291

遵义访老同学朱企霞——看朋友与“拜客”——潘公展的回访——《七月》的老友新朋——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荆有麟谈到鲁迅——

蒋介石的个别接见——雪峰已到此

下篇 305

陶希圣其人——池田幸子的身世——《讲话》传到重庆——为鲁迅著作讨版税——看望卢鸿基——郭沫若的学术讲演——向林冰去三台——歌乐山见许寿裳——《财主的儿女们》——绿原来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与《约瑟夫的外套》——秦德君来信——捍卫鲁迅——骆剑冰的主意——舒芜《论主观》引起风波——《希望》大受欢迎——日本投降了——毛主席来重庆——老舍、曹禺赴美讲学——周公馆的饯行晚宴

八 重返上海

上篇 355

看望许广平——俞老板的遭遇——贾植芳夫妇——二三故人——文化投资公司与《希望》——谒鲁迅墓——杨潮追悼会——看望内山——办事处、文协都来上海了——闻一多被刺——周扬来访——姚蓬子要印《鲁迅全集》——美国书商——纪念鲁迅——周颖出狱——《七月文丛》

下篇 383

郭家的新年聚会——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营救骆宾基——几个华侨青年——五四文艺节——关于《云雀》——雕塑家刘开渠——贾植芳夫妇被捕——修整鲁迅墓地——电

影《松花江上》——出书之难——香港在发动
批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内山书店的
王宝良——蒋家王朝覆灭前夕

附录 我的小传420

编写后记.....梅 志 426

一 东京时期

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她是我在南京上中学时的教员穆济波的夫人，当时见过。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昌，我在他们夫妇租住的房子里借住过，1927年底到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见到后，知道她已离开了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她告诉我，茅盾看了我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三年》，觉得很好，她就向茅盾介绍了我的情况。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他们坐在甲板上谈话，我上甲板时遇见了，只是彼此望见点了点头，我没有上前去，也就没有谈话。好像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我到了东京，小时同乡同学方翰（何定华）来车站接我到他寄宿的日本人家里。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就和朱企霞在本乡区租了一个姓前田的小职员楼上同住，马上到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日语。当时日本普罗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不久，我就读起普罗文学的刊物来了。作品当然读不懂，但对那里面短小的工农通信（从工厂来，从农村来）感到很大的吸引力。那里写的无论是日常生活或基层斗争，都有真情实感，吸引了我。在国内读到的创造社的作品，几乎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没有普通人民的感情；茅盾的作品有具体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

感的生活。这些通信的吸引力帮助了我学习日语，认识劳动人民。

东亚日语学校第一期是三个月，学完了就到本乡区一个名奥平定世的人和他的一个朋友办的补习学校进日语补习班。这个学校还有为日本人办的“支那语补习班”。和奥平认识了以后，他拉我为那个班教汉语。我就用工农通信作教材，帮助学生译成汉语，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起了沟通感情的作用。奥平中国话说得不错，能读鲁迅的小说。这时他在横滨一个私立商业专门学校每周教两小时的汉语；他没有时间去，就让给了我。我也是用工农通信作教材，学校不过问。很可能，那个学校是日共设的一个据点。交谊继续了一年左右，以后没有时间再到他那里去了，回国后更没有再想到他。这两年，他开始给我写信联系。

在支那语班学习的，有一个帝大的学生，叫武安铁男。当是教材解除了他的顾虑，认识后请我到他的宿舍去玩。他给我看了日共党刊《党建设者》。我手边有华岗著的三卷本《中国大革命史》，就送给他看，并提议帮他译出来，他很高兴地同意了。除了借此他学中文我学日文外，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居然把这本厚书译完了。后来由我交给藤枝丈夫找地方出版，他却诡称被警察抄家时没收去了。现在如能找到原稿出版，那对日本革命运动还是有用的。

这时，得到了友人熊子民等在上海办的心弦书店（后改名昆仑书店）的通知，希望我翻译有日文译本的一本苏联小说。那是红色的幻想作品。内容是写美国革命工人派出一个工作队到苏联去，帮助苏联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破坏苏联革命的间谍活动。内容变化多端，人物能够在墙壁内穿进穿出。方翰认识一个叫做高津正道的日本人，他的夫人叫葵子，在二、三流的妇女刊物上

写点小文章。方翰介绍我从她学日文。我把那本小说当作课本，先自己读，读不懂的地方去问她，她给我解释，学完了以后就译了出来。原名叫《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我简称为《洋鬼》，由昆仑书店出版了。译文当然不好，但读了它的熟人很感兴趣。

（这是假托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但据传说是几个苏联作家合写的，又说是布哈林写的，还有的说是斯大林写的。友人们看了感兴趣，不过是被那离奇的革命情节满足了对革命的向往和好奇心罢了。苏联还拍了电影，观众很欢迎；我的译本就是从电影片取来的几个画面作封面的。后来苏联解散“拉普”，组成作家协会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赤色的浪漫主义”的口号。提出赤色浪漫主义恐怕就是根据这篇小说和电影以及这一类作品的经验。但这种艺术效果对读者和观众只是一种兴奋剂，那还会导致读者和观众不愿正视历史实际以至脱离现实生活的严重副作用，和主观公式主义殊途同归的。所以，经过一两年的筹备，到作家协会成立时，就放弃了“赤色浪漫主义”这个补充口号，在会章上专提“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了。如后来的理论所说明的，文艺里面是一定有浪漫主义的，但浪漫主义是只能从现实主义产生，包含在现实主义里面的。这是批判地从人类文艺实践经验提升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

这本书的日译者是大竹博吉（笔名广尾猛）。因为译本中有些××和不懂的地方，就写信问他，他高兴地约去见了面，以后保持了一些时的交友关系。大竹是所谓“俄国通”，到苏联去过，回来后办了通讯社，并出版了《洋鬼》。后两年办了一个相当大的左翼书店纳乌卡社（科学社），销售苏联书报并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苏联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还出版了日本普

罗作家同盟的刊物《普罗文学》。作为左倾文化人，影响不小。中国抗战初，报载他被捕，在警察署自杀了。据我在两个警察署呆过的情况，被拘留者是没有可能自杀的。很可能和小林一样，是被严刑逼供致死的。^①

当时，高尔基的长篇《四十年》第一部的日译本出版了，昆仑又提议我翻译。我写信给日译者大宅壮一，问他是不是有英译。大宅很快回了信，说愿意替我找英译本，并约我到他家去。他和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委员长江口涣家相邻。我去他家后，他把我引到江口涣家去叙谈。他们很关心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情况。《四十年》太大了，我不敢译，但因此却和江口涣等作家发生了友谊关系。江口涣，我去日本之前就读过鲁迅译的他的短篇小说《峡谷之夜》，人很朴实厚道。

一次，在他家里遇见了秋田雨雀。秋田是名作家，我不知他写了什么作品，只晓得他精通世界语，地位高，有世界文化人之称。谈话时他静坐着，常常闭上眼睛。1933年我回国后，那一年是他的六十岁生日，我写了《秋田雨雀印象记》，发表在当时刚创刊的《文学》上。

另一次，江口在他家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要我介绍中国文学运动情况。出席的，除他和大宅壮一外，有声望极高的《蟹工船》的作者，普罗文联的负责人小林多喜二，和以“支那通”自命的藤枝丈夫等。谈话中，藤枝丈夫极力捧钱杏邨而抹杀鲁迅，我驳斥了他。这引起了在座者，尤其是小林多喜二的热切的共鸣。后来江口告诉我，藤枝是满洲浪人，抽鸦片（他老婆是医生，所以买得到）。散会后，小林和我一道出来，态度很恳切，约我到他家去，同坐了一段电车才分手。不久，他被迫潜入了地

^① 本文发表后，一读者来信指出，大竹博吉当时并没死，后来还访问过新中国。——编者

下。在地下，他还写了中篇小说《地区的人们》，宣传党在地下组织工人的斗争，邮寄到大刊物《改造》上发表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激起了警察动员追踪他。1933年2月，他逮捕受审时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当即受到严刑拷问，夜里就暴亡了。这消息引起了大的震动，普罗文化战线和先进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斗争。领导这个斗争的文联党组负责人池田寿夫避到我的住处借住了一夜。他提议我用中国左翼文总的名义写一个向日本政府抗议，吊唁的电文，我想了一想，同意了他。这电报发表在《普罗文化》上面。池田家离我的住处不远，我也到他家去过；他是靠他的夫人做广告“姑娘”维持生活的。

（关于小林多喜二的牺牲和池田寿夫的斗争情况，我抒写在《时间开始了》的《英雄谱》——原题《安魂曲》里了。）

以上，都是私人的进步的革命友谊联系。

另一方面，我想取得一个学籍的合法身份，弄到一名官费。第一个是东京帝大研究院，但我只有清华大学英文系二年级的资格，学历差得太远。找了他们的英文科主任市河三喜，他允许我到英文文学研究室去借书看，我去看了研究室秘书曾根保，他态度也很好。我又想进私立早稻田大学的俄文科。科主任冈泽秀虎很高兴，说不懂俄文不要紧，进来了再学好了。还把在俄文科毕业的官本显治（当时已是日共干部）的得到《改造》杂志奖金的论文《败北的文学》（评芥川龙之介的）从《改造》杂志上剪下来送给了我。但我参加考试时，被文学部主任拒绝了。我又另想办法，托清华同学高琦找北大的教授钱稻荪写信介绍我去见庆应大学历史教授桥本，桥本转介绍我见英文科老教授畑。畑教授很热心，允许我进英文科当正式生，后来还替我交涉领到了庚子赔款的半费，每月四十五圆。

取得庆应大学学籍是在1931年春。当年暑假回国了一次，想

从湖北教育厅领到一名官费。到了上海，住在友人石民家里。石民是去日本前在上海认识的，他专攻英国文学，在北新书局当编辑。我到日本后曾为他编的《北新》半月刊寄过稿，如《夕阳之歌》和日本作家生田春月自杀的报道（生田是一个进步的名作家，思想倾向共产主义，但觉得在实践上不能贯彻自己的理想，无法克服这个矛盾，因而自杀了）。到武昌后住在友人金宗武家里。他是1927年认识的，当时他写了几篇小说在报上发表，还和一个姓蔡的开一个中央吃茶店。他曾留学过日本，同情共产主义，很可能是隐蔽的共产党员。这时好像是在李书城做厅长的建设厅当职员（李书城是老共产党人李汉俊的弟或兄，同情共产党，解放后当了第一任的农业部长）。我经常到住在汉口的友人熊子民家里去走动。熊是大革命后逃到上海时认识的，开办昆仑书店；这时又回到了汉口。我因大革命时在本县参加革命，做过打倒土豪劣绅的工作，担心他们报复，没有回乡去，但约大哥张名山到武汉来见了面。我去找了教育厅长王世杰联系官费，当然不成功。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到通过李书城这类人事关系去达到目的。住了些时，就离开了武汉。

归途上，路过南京，住在友人韩起家里。韩起是1927年我在南昌编《野火》（后受到恐吓改名《长天》）时认识的，他好像投过稿，因而找来认识了。这时他和夫人董曼尼住在南京，和在什么军事机关做职员的这时已很有文名的张天翼熟悉。这时，他们（还有在上海的欧阳山，当时笔名罗西）共同出一个小刊物《幼稚》。我因他认识了张天翼，有两三个晚上交谈关于文学界的感想到夜深。记得一点：当时有一个新作家穆时英很出风头，有一篇小说写丝厂女工人的手指骨都露了出来。我们都很反感（后来听说这个人投了日本，被国民党的特务暗杀了）。在南京时，还遇见了同学高琦和他的夫人熊力珊，一同游了中山陵，和他

们夫妇照了相。

到上海，好像还是住在石民家。熊力珊夫妇介绍我去看望了刚出狱的老共产党员熊瑾玎^①。

1931年夏末，我回到了东京住处，那是市郊中新井村。是上年中从阿佐谷中川家迁到这里来和方翰同住的。房东是木匠。我们住在一列两座小平房中的一座，隔开一段空地就是房东的平房。在房东家包饭。

我回到东京以后方翰才回国请官费。他请到了全官费（九十圆）。记不得他是否还请到了每月九十圆的庚款。

记不起是谁（可能是在东京认识的骆剑冰），介绍我到千叶去看望郭沫若。我给郭去了信，想不到三四天后他自己从千叶找来了。可见他是很想见到本国学生的。我们谈了些闲天，只记得谈到他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到广东潮汕地区，天冷衣单，只好一面走一面做徒手操御寒，以致冻坏了耳神经。我在住处无法招待他，就引他走过了很长一段村路才到高架电车线，坐车到新宿去看了一场电影。那是一场野兽片。我向他抱歉，他说，这更好，可以使脑筋松弛一下。请他在小馆子吃了便饭。他谈了些日本普罗作家的情况。喝红茶的时候他提到，如果把匙子碰响了茶杯，那在资产阶级看来是不礼貌的；普罗作家林房雄就在小说里讽刺过。意思是，那是写得巧妙的普罗文学作品。送他回去坐在月台上等车的时候，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留学生中不能出现像创造社那样的文学团体？我的回答是，现在和他青年时不同，文学的阶级性被普遍承认了，单纯地以文学志愿为宗旨的文学团体，恐怕是不容易出现的。他也表示了同意。

^① 熊瑾玎是熊力珊的父亲。——编者

(大约一年以后，江口涣等人想去访问郭沫若，我去信问郭，他回信同意了。江口涣和我约定了时间，我通知了郭。但到了那一天，收到了江口一封电报，说因事无法赴约。我感到对郭很抱歉，几天后赶去看了他一次。郭当然不高兴，但还是留我吃了饭，见到了他的夫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我在愤怒里写了诗《仇敌的祭礼》，寄给住到上海参加了左联的韩起。他拿给李剑华办的刊物《真理》上发表了。

这前后，在我的生活里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

入庆应后，认识了同班的泉充。他思想左倾，很快就彼此信任了。1931年底，和泉充同住在四谷一个姓饭田的寡妇大婶家楼上。他介绍我加入了普罗文化联盟下的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我化名中川。每周一次，在神田区一个大楼上租的一个房间(所址)开会，讨论文艺理论问题，也研究各国革命文学运动情况。一，记得姓名的有：研究英国文学的视，研究法国文学的淀野隆三。二，请哲学部门的永田广志来做了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报告。当时苏联开始了清算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日本也曾接受这个影响，所以着重研究辩证法以便进行清算工作。永田广志可能是日共在哲学方面的重要理论家，后来出了一本书《辩证唯物论》。

艺术学研究会出版了《艺术学研究》(季刊)。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在一篇关于国际反战文学的报道里，约我写了关于中国反战文学的情况。只记得介绍了孙席珍的小说，还有谁的揭露国民党轰炸江西中央苏区的小说，署名中村护。记不得是普罗科学研究所还是普罗作家同盟出版了一套普罗文学讲座，约我写了一篇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情况。署名谷非，内容完全记不得了。

因泉充的关系，认识了几个人。一是池田寿夫，普罗文化

联盟党组织的负责人。一是川上，他参加普罗电影同盟，有点流浪者的习气。一是诗人远地，他编选了一本《普罗歌人集》。我后来从那译出两个女工写的诗，京山爱子的《给妹妹》和东园满智子的《妈妈》，都收入了《野花与箭》。一是龟井胜一郎，他曾是日共中央的联络员，负一部分中委间的联络任务，后被捕。释放后，任作家同盟的理论教育部长，后来出了一本评论集《转形期的文学》。我和泉充到他家去过，但并未个别谈话。

这时，方翰接上了日本反战同盟的关系，约我和王承志参加了，成为一个中国人小组，同时也是日共《赤旗报》的读者小组。后来日共领导通知，这个小组被批准为日共党员小组。并没有经过个别申请，上级谈话等手续，都是由方翰和上级领导等联系的。我只见到过一个朝鲜人盟员。

我又参加了左联东京支部。记不起是谁介绍的。开了一次会，参加的共三个人。谢冰莹（大革命时期入武汉中央军校，写过《女兵日记》），我，还有一个姓阮的。会好像是在阮住的宿舍里开的。姓阮的只见过这一面，抗战初，他看到《七月》，知道了我的笔名，给我寄了信来，说他参加了阎锡山的牺盟会。我当时不知道牺盟会是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回信。这是很可惜的。卢森堡（回国后改名任钧），也应该是支部盟员，但那次并没有参加会。后来见过面。我还在早稻田大学和华蒂（以群）碰过一次面，他和卢森堡有密切关系，好像他们还合译了一本什么小书。

我自己和日本普罗文化文学方面的关系，没有告诉过包括方翰、王承志在内的任何人。

我们这个三人小组，虽然有几个组织关系，但具体工作归到三个方面。

一是阅读《赤旗》。

二是组织了“新兴文化研究会”。分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文

学研究会。前者由方翰、王承志负责。后者由我负责，参加者有聂绀弩、周颖、邢桐华等。开了三四次会。后来，我把在会上讲的，对国内刊物上某些作品的批评写成文章，寄回了上海；1932年底我回上海时，已由韩起拿给左联盟员祝秀侠办的刊物上发表了。理论是带着浓厚的机械论色彩的；那刊物还发表了由祝秀侠（还有丘东平）等攻击鲁迅的信。我并不知道，但已经发表了，也就只好算了。

最重要的工作是出版了油印刊物《新兴文化》。但却狂妄地印着“新兴文化研究会书记局出版”，分送给相识的留学生看。第一期出版后就引起了问题。留学生中有一个由漆宪章等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好像左联支部的卢森堡也参加了），自称和上海社联有联系。他们认为《新兴文化》是自命为中国文总在东京支部，站在他们头上了，也马上搞了几页油印，专门攻击《新兴文化》宣传布郎基主义，是托派组织。记不得在第二期是否进行了反驳。总之，这一闹，我们的活动肯定都暴露了。

（《新兴文化》第二期出后，我们三个人到热海温泉住了一晚，第一次洗了温泉。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到过日本名胜地。）

虽然我们的工作有日共的领导作保证，但还得由中国（上海）方面解决问题。通过韩起，我向上海报告了情况。当时的文总是冯雪峰负责。韩起回信说，文总承认我们的工作，叫双方都不要闹。但“社会科学研究会”方面还是不肯罢手，直闹到秋末冬初。

也就在这时，日本反战同盟发起一个远东反战会议，得到了“国际”批准，定期召开。要我们派一个人回上海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同时韩起来信说，文总要我回上海做组织部工作。于是就决定了我回上海一次。

回上海前，在百货公司“白木屋”楼上大众食堂和反战同盟

负责人接头，并一道吃了客饭，由他交下任务。那天还有方翰和王承志，负责人没有说姓名，听口气他也是党的领导人。

到上海后，先住在静安寺路大鵬坊韩起家，三四天后，搬到法租界高福里石民家的后楼。

在东京时，通过韩起我和冯雪峰开始了通信来往。现在，第一次见面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谈话非常亲切，没有一点领导者的官气，赢得了我的信任。

在东京见过的华蒂(以群)引我去参加了左联(书记丁玲)的一次日常性会议。和丁玲也是一见如故。我和丁、冯等有过几次欢聚。也见到了只要可能就非来缠住丁玲不可的冯达。

周起应(周扬)来会面，也像是熟人一样。他在编《文学月报》。当时正在进行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冯、周二人意见不同，都多次向我解释，为自己辩护。我在政治原则上觉得冯对，但在文艺看法上却偏向于周扬的过左倾向。我就第三种人刊物《现代》上的一些作品写了《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

当时，丁玲要我代表左联和要到日本去的丘东平谈过一次话，劝他不要去，受到了他和另外两个朋友的讽刺和反驳。还要我到正风文学院去为蒲风办的文学团体讲过一次话。

我还认识了穆木天等人。他因为鲁迅《三闲集》的序言向我大肆攻击冯雪峰，说他不该让鲁迅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攻击鲁迅。我只好闭口无言了。但他对我出奇地友好，愿意和我谈诗。有一次，我的脚在黄包车上刮去了一块皮，穆木天引他的一个熟人医生来为我医治。

在和冯雪峰交谈中，我向他说明了我没有条件做文总的组织工作。他改变了主意，要我当左联的宣传部长，甚至拟定了鲁迅在宣传部下面主持一个研究会。这更使我惶惑了，我要求

回东京后看看再说，实际上是推掉了。

这一次回国接触的都是左翼文化界的人，心情非常愉快。但同时也觉得，鲁迅和创造社在思想上的对立有很深的根源和社会基础，那明显地反映在冯雪峰和周扬、穆木天的对立上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资历或学力，我都没有条件在左联这种革命团体做领导工作。决定还是回东京去住一两年，弄一弄基本理论问题，免得陷进宗派纠纷里面。

组织上决定派楼适夷到东京去参加远东反战会议。我和适夷是同船，为了避免受检查互相牵连，在船上和车上都装作不认识，由我暗中照顾他。这样一路到了东京。下车，有方翰来接，食宿等就都由方翰照料。

不料，参加会议的代表只到了中国一个。反战同盟只好改变计划，把会议改为预备会。会是在郊外井之头公园开的。那里很僻静，有一个卖甜豆汤的小店。参加会的有反战同盟的负责人、适夷、方翰和我，王承志是否参加了就记不清了。我们一面喝汤一面谈话，时间大约只一小时多点。决定用预备会议的名义向“国际”提议召开一个正式的远东反战会议。这就是后来马莱调查团（有法国左翼作家伐扬·古久里参加）来上海举行的那个会议。那天的会开完后，这项工作就算结束了。

另外，为解决两个团体的纠纷，适夷用文总代表的名义找漆宪章和我们一起谈了一两次话。我拟了解决纠纷的三点决定，由适夷提出，对方同意了。这个决定由我译成日文，交《普罗文化》（普罗文联机关刊）发表了。

（这样一来，使得日本警察更进一步掌握了我们两个团体的情况。这个用中国文总适代表名义发表的决定，使他们知道我们和中国文总及日本文联都有联系，更加强了他们非把我们搞掉不可的决心。）

旧历除夕，我们几个中国同志，加上从北平派来的没有能赶上参加会议的一位姓曹的代表，在方翰那里聚会了一次。谈话时适夷发言，好像批评了曹代表几句。详情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我很为曹代表感到委屈。

我向江口涣介绍了适夷。他在家招待适夷吃晚饭，由适夷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适夷说，我口译，他笔记，他很重视这次会见。

我们很快送适夷回国了。

1933年2月×日，发生了小林多喜二事件。之后约一个月，3月×日，我们被捕了。被捕那天早上的情况和我的感情，我都如实地写在长诗《时间开始了》里了。

我被捕时，先由中条和端保（早就跟踪过我，私自搜查过我的住处）和另外两个刑警押着坐出租汽车（车钱还得由我付）到了四谷警察署。当时还早，办公室里没有人，他们就坐着闲谈。中条模仿周颖的口气说，“几时回家呀？”并轻薄地笑了。我知道，周颖不是头天就是在我之前的半夜里被捕了。

本署警察（便衣）来了，将我送到监房。看守搜查了全身，取走了钱包、水笔等，送进了左手第一间。这第一间都是新进来的犯人，白天三面墙人挨人坐，晚上人挤人睡。每日是三餐米饭，一律是饭盒子。早上是劣等豆汁汤，舀着分食，中午、下午是泡萝卜或一小块鱼。晚上监房长指定人出去取来满是脏灰的毯子，早起叠好送回去。

我被关在警察署（即拘留所）一直没人过问。这是我精神上最不安的阶段。我身上带有许多关系，一定在拷问和我有关的人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暴露？……大约半个月后才提上楼去。在一间办公室内，来的是一向跟踪我的刑警端保；他把我带到了一间日式房里。端保劈头一句就是问：“书记局是什么？”我说，

“不知道。”他马上把我掀倒了，用棍子打我的双腿及后股。我只好弯起小腿由他打去。打累了休息一下，又吼着问我：“书记局是什么？”我闷声不响，于是又打。这样前后经过了近两个小时，就把我送下楼，仍交给了看守。

第二天又被提到了日本间。又是追问书记局，我的回答是“不知道”，于是又是掀倒，又是用棍子打。昨天挨打的地方已经肿了，棍子打去只感到火辣辣的烧痛，但我心情很充实，仍是一言不哼。缠打了近两个小时，又把我送到楼下交给了看守。这时我虽面带笑容，但腿已弯不过来了，好不容易才用手撑着席子坐了下来。这就被旁边的犯人注意到了，又看到我连铺毯子都站不起来，就赶快向看守报告。看守也忙着替我买来了松节油并帮我搽两股的肿处，由别人扶我睡下。

第三天，端保又来将我提到楼上的日本间。这次还有那个参加逮捕我的，蓄有小胡子的头目同来。进去后，他气极了似的，把一叠纸往小几上重重地一拍，吼着：“这是什么，看！”我展开一看，是聂绀弩的口供。看完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供的是文学研究会的开会情况，我的那些重要关系，他当然无从涉及。这样，在聂绀弩的口供的范围内，我作了口供。我说，端保记，他提问，我答。可能他回去还和其他人的口供核对过。小胡子只是当天坐在旁边看着，第二天起没有再来了。记完了，又誊清，大概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大意是：关于《新兴文化》，我写了文章，至于那些油印工具是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关于“文学研究会”，承认了开会次数、地点和讨论内容；关于从我那里搜去的一期《普罗科学》，说明了是在什么书店买的。全部内容如此，只谈事实，不谈思想。誊清后要我盖了手印。

口头谈到的唯一问题是：日本共产党是要打倒天皇的；日本“普罗文联”是受日共领导的，也是主张打倒天皇的；你们和

“普罗文联”有联系，当然也是主张打倒天皇的。我坚决否认，说：我不知道日本“普罗文联”受日共领导，我们和它也没有联系，更不知道谁要打倒天皇；我是中国人，只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关于这些问题，端保说要和我做理论斗争，但后来终于没有。

在记录和核对口供的过程中，休息时端保和我谈了些闲话。他是帝国大学法科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去当站街的警察。他形容了冬夜站在街上的情景，实在苦得要命。前不久才被提升为警部补（政法警察的起码职位）。他说王承志吐血，又说原来认为我是适代表，猜错了。还说我是做学问的，将来回国可以当大学教授，现在沾上了这点关系，很可惜。甚至说，将来他到中国，也许要受到我的审问。……（我上的庆应大学，在日本属于有声望的高等学府，那里的学生也比较受重视）。我就顺着他的意思，向家里写了一封信，用意是给他们看。信里说我很好，打算提前回国当大学教授，望家里代我找一门合意的亲事。

事情看来是完结了，但我心里又有另一种不安：耽心方翰或王承志中途在某一个问题上牵上我，暴露出我的某一个关系，弄到非重审不可。若干天后，端保只是来核实一下我和聂绀弩的口供中某些有出入的地方，没提到别的，这才算真正完结。在四谷署住了两个月，于是把我送到了郊外的中野署。

在对日本警察的斗争中，我只承认了在《新兴文化》上写过文章；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思想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据此，日本法律是无法对我起诉的。其余的——我和大竹博吉的友谊关系；我和普罗作家江口涣等的关系；我和普罗科学研究所的组织以及一些人的关系；我和普罗文联（池田寿夫）的关系；我和方翰、王承志的三人小组（反战同盟、《赤旗》

读者、日共党员)；新兴文化书记局的关系和反战会议的全部活动——这些关系一个都没有暴露。方翰和王承志掩护了我，我和他们一起的几个重要关系没有暴露。除在《新兴文化》上写文章，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外，连书记局都替我开脱了。原因当然是由于一般的革命纪律，能少暴露一个就少暴露一个；既然自己暴露了，就一切都由自己承当起来。第二年他们回上海时(当是通过方翰同文书院关系的日本人取保释放的)，我们彼此见面非常愉快，认为那是对日本警察斗争的一次胜利。他们告诉我，他们被暴露是由于聂绀弩“吊儿郎当”，在他那里搜出了《赤旗》追悼小林多喜二专号的半张副刊(从《赤旗》追党的关系，那仅是一步之隔)。

方翰回国后不久就到社联工作，他风闻到了(我没有向他透露过)左联内部的矛盾，来和我说，他已和社联领导人艾思奇说好了约个时间和我见面谈谈，意思是使我得到艾思奇的支持。我怕那会加大矛盾，没有答应他。只因为彼此工作不同，一次搬家后才没把地址告诉他，断了往来。抗战初在武汉他特来见我，一道回家乡。后来才知道他已改名何定华。“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在的武汉大学曾来人外调，问了我几个关于他的问题，也问到我们参加日共的情况和在警察署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写了。

王承志(他后来改名为王达夫)，抗战初期，他可能参加了救国会，后听说他随章乃器在安徽财政厅工作。解放后(约1952年)，整思想时，他约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便饭，谈了一些工商联和章乃器的情况(他好像是任工商联秘书)。除叙旧外，还对我表示了同情。

据我所知，方翰、王达夫回国后都没有能接上党组织的关系。我在左联时，向阳翰笙或周扬提过这个问题，他们要我写

申请书，我迟疑着没有写。我考虑如恢复了关系，在冯雪峰（包括鲁迅）和周扬等的矛盾中很难处。到冯雪峰进苏区去了，我觉得这个矛盾可以克服了，就再提了一次。但他们这次没有任何表示，我也就不好再提了。但冯雪峰和楼适夷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那时，我们也实在无法找日共组织证明。后来，我在自传中，为了向事实负责，还是写上了参加过日共。

这次逮捕，我因罪证不足免于起诉被释放（周颖是早些时被释放的，聂绀弩大约时间长些，但也比我早被释放）。

释放前一天先被警察押着去理发洗澡，回住所收拾行李。又陪我到庆应大学办退学手续。我向特别关切我的畑老教授告别。当天，被端保押着先到一个不知名的警察署地下室，向我宣布了驱逐出境令。有一个不是我同案的人站在一起。最后，每人由一名刑警监视着坐上火车。连“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人在内，我们一共约有十多个人。除周颖、聂绀弩外，只记得有一个江西人姓胡。开车时，我上身伸出窗外喊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号，虽然同行者没有来得及响应，但我总算是吐了一口闷气。警察想制止也来不及了。

在神户上船后，先把我们关在船头下面的尖舱里。除留了两名监视外，其余的警察都回去了。第二天到长崎，那两名警察也上岸走了，我们才真正地成了旅客。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利用到上海前的宝贵时间，集体商量出一个到上海后如何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政府这次迫害中国留学生的宣传计划。

二 在上海

上篇 左联任职期间

1933年7月上旬^①，我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驱逐回国。我们是因卫护正义、热爱祖国而被无理驱逐的，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斗争，我们是胜利者。

船靠近了汇山码头，我们几个人都站在甲板上，望着周围陈旧而又杂乱的环境。是啊，这里是不如东京整洁而有秩序，但这是我们的母亲——祖国。

站在船边向下望，人群中拿着照相机的新闻记者中有人喊我的名字，并说他是袁殊。我喜出望外，赶忙答应了，使他认出我来。我听说过他，他是韩起夫人董曼尼的表弟，圻春同乡，和适夷共编《文艺新闻》，是有名的左翼人物。船靠岸后，一群包打听（巡捕房暗探）跑了上来，喊着“不要走”。但袁殊跑到我面前，提起我的箱子就走，说：“不要管他们！”就下了船。我们挤出码头，坐汽车到四马路一家旅馆喝了一杯茶就又换了一家旅馆，这才坐下。他摊开纸笔，向我问了被捕和被驱逐的简单经过。他告诉我，他现在社会局当记者，和左翼没有关系，见了他们（指左翼的人们）不要谈起他。说完就走了。

① 此处，作者记忆有误。根据各方面资料核实，作者是1933年6月15日抵达上海的。——编者

第二天，我住到了施高塔路四达里某号三楼韩起家。袁殊来接我，当是冯雪峰叫他来的，后来我果然在文化界没见到过他。

大约两三天后，在四马路中央西餐馆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言人中有周颖。我因为避免公开露面，没有说话。记不得报上是怎样报道的。

我在船上时翻阅了被捕期间上海给我寄去的刊物，看到了丁玲被捕的文坛消息。到上海后知道了详细情况，心情久久不宁。尤其是应修人这个湖畔诗人，我对他的诗有很深的印象，感到十分的惋惜。他的死和丁玲的被捕是左翼文化的一大损失。

周扬来韩起家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诉我：“冯雪峰不管文化了。”我才知道冯雪峰被调出去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了。

几天后，周扬陪鲁迅先生来见了面。先生亲自来韩起住的三楼上。他和我们很随便地谈着，他谈到第三种人戴望舒从巴黎寄回的谬论，谈到上海文坛的复杂性，说到了鸳鸯蝴蝶派。并说，将来你在这些方面可以做些工作。我心里感到很惶恐。他扼要而又具体地触到了左翼文学的主要斗争对象，那样平易和坦率，似出意外又在意中。但我有什么能力担负他提示的斗争呢？

一天下午三时，后门被敲得特响，韩起夫人丢钥匙下去，可又摔断了，只好亲自去开门。上来的是老朋友适夷，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经韩起介绍才知道是屠玳华（梅志）。我32年回沪时已从韩起口中知道她，当时没有见到。这次见面，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穿的是淡蓝布的短旗袍、短发，显得很精神。她来告诉韩起有关钟潜九的情况（钟是她小时候的朋友，早就结了婚

不和她来往了，后来在上海相遇帮助她进步。韩起是钟的朋友，就介绍屠珥华加入了左联）。去年钟因鼓动公共汽车工人罢工被捕判了刑，现在她受钟之托来找朋友们要求支援。我因韩起的关系，认识了钟，也算是朋友，所以当即拿出五元钱要屠寄去。几天后，我把高尔基的《三人》英译本和一本字典托屠珥华寄去。他在狱中译出了，后来提前出狱，找到了我，由我托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陈彬和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仍旧是由周扬来通知我，要我做左联的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和党团书记，书记是茅盾。我再也无法推脱，只好答应了。现据茅盾回忆，当时左联设有常务委员会，鲁迅是常务书记。以前的我不知道，1932年底我回上海时知道的左联情况，1933年8月起我在左联任职时的情况，都没有常务委员会和常务书记。只设有书记处，设书记和组织部、宣传部。

茅盾大约是1931年秋冬间从京都回上海的，那时约在左联成立的两年之后。他能参加左联，据我的看法，大概得力于冯雪峰调解了他和创造社的矛盾。他在盟员间是没有一致的威信的。

〔我在东京时，茅盾通过秦德君和我通信。他约我去京都玩几天，谈谈，交换关于文学运动的意见。我正是为了避免国内的纠纷特别是文艺界的纠纷才到东京去的。我还算不得什么作家。对创造社反对鲁迅的那一种气势颇有反感，对他的引起了创造社的批判的《从牯岭到东京》中的思想和态度，也是格格不入的。我还没有什么定见，能和他谈什么呢？尤其为难的是，我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出我的所感所想吗？在回信中我只好不提去不去京都。后来，他又寄了他的中篇小说《虹》来。我去东京前在上海遇见穆济波时，他告诉我，这小说是根据胡兰畦的经历写的。那当然是秦德君告诉他的（胡和秦同是四川人，老朋友）。

接到书后，读了几页，那风格和作者的感情就使我读不下去。过一两天硬读了几十页，还是无法读下去。胡兰畦是我认识的熟人，书中以她为模特儿（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当然想看看是怎样写她的，但还是无法读下去。我在通信中也就只好避免谈到他的小说了。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停止通信。他和秦德君回上海后不久就决裂了，茅盾曾在信里说她是“暴君”。记不得是他还是她，寄来了他们分手时照的合影（这照片现在还在）。我写到这些是为了说明，以后无论是在左联，还是在那以后，我和他渐渐弄到格格不入以及他在回忆文章中对我的不实之词，那不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原因的。]

冯雪峰转到江苏省委去了以后，要茅盾接任书记。这是可以加强他的左翼地位的，虽然担任书记工作就得开会，做些组织工作，不如坐在家里写小说安全，但他也不好推辞了。他当书记除开会外，不做任何具体工作，也不采取积极态度。做了大约半年以后，也就是我担任左联工作的两个来月后，他坚决地辞去了书记不干。那时，他的情形大不同了：他的名字已经常常被人和鲁迅并提；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已经出版；他认为他在左联的元老地位已经确立了。

我接受左联工作时，冯雪峰已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了，所以我该怎么做这工作都避免向他商讨。我觉得和日本普罗作家同盟比较，左联的工作方式太简单，工作也等于敷衍塞责地过日子。书记只是开会时到一到，组织部也只管和盟员中的几个党员联系联系。左联是思想团体，因而工作应集中在宣传部方面。但一了解内部情况，发现盟员间如一盘散沙，我一无学力，二无声望，两手空空，能做些什么呢？实在有力不从心之苦。

经过了一段工作后，我在宣传部下面设立了三个研究会。①理论研究会。记得成员有韩起、聂绀弩、任白戈等。②诗歌研究

会。记得成员有穆木天、卢森堡、蒲风、柳倩等。他们组织了一个“新诗歌会”，让非左联盟员的对诗有兴趣的人参加，出版了一个小刊物《新诗歌》。③小说研究会。参加的有周文、欧阳山、章明、沙汀等。后来还在书店出了刊物《小说》。为了支持它，我把苏联的一个小说讨论会的记录译出给它连载。共出了两期。……各个研究会每次开会，先得帮助大家拟定题目，对大家的发言还得综合一下，非说点意见不可。

另外，出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登点工作情况，分给盟员看，借以维持一点组织关系。这点油印工作，记得是周文、汪岷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我所知道的情况是：

韩起(华恺)——前面说过，我是在南昌认识他的。1931年夏我回国过南京时，在他家住过几天，在他那里认识了张天翼。他大概是因张天翼而加入了左联，住到了上海。他从英文译了列宁夫人的《列宁回忆录》，后来又译了一本《苏联面面观》。1933年冬，得伤寒病死了。

聂绀弩——在东京由方翰认识的。他原是黄埔军校学生，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后来参加抗日运动，受到国民党的迫害，避到了东京。在日本参加新兴文化研究会，与我一道被驱逐回国。①

任白戈——和沙汀是同乡(四川)和朋友。懂点日文，在他同宗任卓宣(叶青)办的辛垦书店出了一本他译的法国机械唯物论的书。

蒲风和柳倩，我到左联时他们已是盟员了。蒲风是上海正风文学院学生，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1932年底我回上海时

① 此处作者记忆有误。聂绀弩担任的是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编者

曾去讲过一次话。好像还自印过一本诗集。

周文(何谷天)——他到上海前在四川。思想左倾，为人老实诚恳。他的夫人郑育之也是党员，但和我没有工作关系。抗战初1938年，她和姐姐(刘长胜夫人)进延安，过武汉时找我，我介绍她到我认识的傅宛君家里住了几天。

欧阳山——原名罗西，当是因张天翼和韩起而加入了左联的。进左联前，已用罗西为笔名出版了几本小说，像是鸳鸯蝴蝶派的作风。这时他家累很重，夫妇两个，还有孩子，好像他父亲也来上海依他过活。草明以爱人关系同居。

沙汀——他这时已出了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师承苏联同路人作家皮涅克。他和周扬有亲密友谊，在言谈中几乎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书记处更不能请他负什么工作职务。

汪峯——学美术的，画点封面之类。韩起死后，和董曼尼同居了。抗战开始后，他们进了延安。后来又出来了，在重庆北碚区公所做职员，当是党派去的。以后情况不明。1983年到北京来，还来见过。1984年接到了他们从东京寄来的贺年片，原来他们到东京探亲去了。

再就是四个区——法南区、沪西区、沪东区和虹口区。每区有一个区委会，几个区委。只记得法南区有周文、柏山、宋乐天(王尧山)等。虹口区有周钢鸣，他是搞大众化的，就是想法子和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记不得是不是有一个大众化委员会。还有一个区的负责人是电影演员胡萍(周扬在一次看什么演出时介绍我认识了她)的丈夫，姓唐，名字忘记了，是一个大少爷式的人物。几个区也是由宣传部和他们联系，沟通上下关系。为了解决工作上的苦闷，法南区还组织了定期的研究会，但苦的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一次，我好不容易请到了一位作家去参加，但他坐不到半小时就称腹痛走掉了。原

来的拟想是，住在每个区内的盟员都编成小组，定期开小组会，但这完全没有实现。所以，有了名的作家都是挂一个左翼作家的名，并没有任何组织生活。绝大多数盟员的住址，书记处都不知道。

我知道的几个区委的情况是：

柏山(彭冰山)——农民家庭出身。大革命后在鄂西洪湖区打游击，当了师政治部主任。被打散后，流到上海来找党的关系。周扬介绍给我，暂在左联工作。他当政治部主任时接触了一些战士和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想写一部和法捷耶夫的《毁灭》似的小说。生活那样苦，怎么做得到呢？很苦闷。一次去看他，正在饿饭，送了他几角钱，这才买了几个烧饼和几个铜板的酱油，打一壶开水。谈到一家人为了革命都离散了，有的牺牲了，不禁流了泪。后来，他用苏区题材写出了短篇《崖边》。当时，盟员杨骚出一个刊物《作品》，我把这小说拿给他，放在第一篇发表了。这支持了他，又写了几篇。后来被捕，被判刑关在苏州监狱里。一天，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了一张署名陈友生的明信片转给我。我猜到是他，就利用内山书店这个转信地址给他去了信，得回信后寄了点钱和用物给他。我把他的几篇小说集起来，题名《崖边》，请巴金替他出版了，这才使他得到了救济。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从苏州监狱被放出来回上海。

宋乐天(王尧山)——勤恳朴素的组织工作者。好像是店员出身。口号问题发生后，他写了小论文。抗战初期我回武汉后，还保持和他通信。

赵先(华沙)——宋乐天夫人，做妇女工作，朴素敦厚。她写了一篇关于女工生活的报告，我觉得真切动人，介绍到黎烈文的《中流》上发表了。

周钢鸣——他在虹口区搞大众化，这是记得确切的。我参

加过会。1942年在桂林才又见到他。无个人往来。吴奚如在什么地方说他当过大众化委员会书记，我不记得此事，至少，在我任职的时候好像没有。

吴奚如——是在左联认识的，大概是因了聂绀弩的关系。这时候，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两张或三张白纸。鲁迅把它交给了我，我猜想可能是秘密文件，就送给了吴奚如。我知道他是做秘密工作的，他告诉我是军委。他要我用碘酒搽一搽看，可能出现字迹，我用碘酒搽了，果然出现了字迹。是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孙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我给吴奚如看了，他让我送给鲁迅自己看。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只好把信销毁了。前几年，吴奚如写到这个情况时说，方志敏送出来的是给党中央的信，同时附有《可爱的中国》文稿，他把信收去了，把文稿交我托鲁迅保管。我当时记忆模糊，就同意了他的说法。后经仔细回忆，确定吴奚如的记忆有误，还在信中希望他更正。文稿，可以确定不是这一次送出的，至于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可以假定，第二次送出了这文稿，由什么人收下转交给了从陕北回来的冯雪峰，冯又交给了当时的商人朋友谢澹如保存。解放后，冯才取出来出版了。

我参加过一次小组会，是在叶紫家开的，叶住在一个小灶披间里。有叶紫、苏灵扬、陈企霞等。陈和叶当时合编一个刊物《无名文艺》。

再一件事是和鲁迅取得联系。每期《文学生活》由我送给他，在小咖啡店向他谈些工作情况，并取来每月二十元的必要费用。

组织工作决定了以后，我自己需要解决的就是要找个吃饭

的职业，也好从韩起家搬出。我不能为了解决生活问题，随便写些文章去换稿费。这时，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刚成立，陈彬和任出版部主任，出版《时事类编》半月刊，译载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时论（陈当时也是“民权保障大同盟”的活动人物，又是红色记者）。韩起的朋友杨幸之（湖南人）在那里当秘书，陈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杨幸之通过韩起拉我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为《时事类编》翻译文章。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个情况，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这样，我就当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给每期《时事类编》译一至二篇文章。我提出只上半天班，他们也答应了。但我的工资是翻译人员中最少的，只一百元。

《时事类编》登得最多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的文章，其中当然也有革命的和共产党的文章。我尽可能选进步的 and 革命的。记得有一篇不能算作时论，是批判日本法西斯哲学“日本主义”的，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论文（后来才知道是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写的）。还有一篇苏联的小说。陈彬和指定的，提倡在日本组织法西斯党的中野正刚的文章，我就给加上了按语，说明它是反动的。

当时的同事，有许多是后来的知名人士：

张仲实——当时我就估计他是共产党员。曾到他家去过。抗战发生后，他编刊物，曾向我要过稿子。他在生活书店当编辑时，约我写了《文学与生活》。

潘蕙田——当时倒没有想到他是共产党员。曾到他家去过一次。抗战前期，他和夫人进延安过重庆时，特来看过我。

沈兹九——当时已知道她是左倾的。她编《妇女生活》，我对几个读者（其中有胡子婴、吴全衡）讲过话，为了介绍稿子，到她家去过几次。后来知道她是党员。1941年在香港见到过，在

第一次人代会上又见到过。

李万居——台湾人，留法学生。我参加过他的婚礼。抗战前期在重庆，好像在国际宣传处又见到过他，听说他在王芑生的对敌情报机关工作，当是国民党员。日本投降后，从报上知道他回了台湾，成了一个政治头目和资本家，办了一个日报。他现在当还在台湾。

罗又玄——《时事类编》主编，后来是第三党的一个头目。1952年到重庆参加土改时，还在一起过。

陈文路——可能是共产党员，英文翻译。我曾到她家去过。

徐卓英——英文翻译，也许还兼任英文秘书。和他没有来往过。

这几个就是和我有工作关系的主要同事。还有几个青年练习生，有的以后还见到过。

吃饭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从韩起家搬到法租界圣母院路金神父路的一家白俄公寓里。是一间楼梯口的小房间，只一床一桌一柜，租金却要二十多元。

冯雪峰几乎隔一两天晚上就到我这儿来，谈些文艺问题，党的和左联的某些人事情况，例如对《自由谈》上发表的鲁迅杂文的感想，他和瞿秋白的共同工作情况等。那时，我从日本带回来一些日本新出的理论书刊，我向他介绍后，有些被他借去，并用日本式的绸包皮替他包了带回去。

有几次，适夷和他一道来我的住处，商谈迎接马莱反战调查团的事。这是我们过去在日本反战同盟时向“国际”提出的反战会议改换形式的组织。这个工作是冯雪峰领导的。关于会议的一些书面工作，由雪峰和适夷在我那里一道编定付印。

我参加了文化界招待马莱和伐扬·古久里（据说他是法国《人道报》的主编）的一次聚餐会，由田汉主持，有电影明星多

人参加，是交际性质的，闹得很欢。

另一次文化界的聚餐会，原定马莱发表演说，也由田汉主持。但他走到楼下门口，看到有包打听守着，就转身走掉了。会又不能不开，临时要我主持。我致词时，当翻译的洪深尽催我赶快。马莱的演说果然很短，匆匆结束了。

在正式开反战会议前，田汉到苏州拍电影外景去了，冯雪峰只好硬要夏衍带马莱他们进会场（临时租的一间空房子）。鲁迅没有参加会议，但绣了一面他题字的锦旗送给了调查团。这些情况，都是冯雪峰告诉我的。

陈彬和有一次约我到新亚酒店吃饭，招待一位德国女作家柯尔贝。同席的有沈兹九，她是以女作家身份出席的。还有潘蕙田，他当翻译。柯尔贝是什么作家，没有介绍，看情况当是左派或共产党人。她送了一张铅笔画像（印本）给我，上面有她的签名。现在找不到了。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谈话也只是关于文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由我陪她参观了市街，另由一位女同志当翻译。这位女同志，解放后在政协开会或人代会开会时见到过，名字记不确切了。柯尔贝那么远跑到中国来，不会不访问在国际闻名的鲁迅，但这情况我不知道。新亚酒店，是我生平第一次进有冷气的房间。

为左联油印刊物事，我曾约梅志见面谈过话。她原是在沪西区左联小组，后来她失业了（家庭教师），搬回南市家里，想让我给她调区。我想把她编在法南区，韩起提出可以叫她搞油印，她说字写得不好，干不了。我引她到了我的住处，后来她应我的要求有时来看我，暂时就由我领导，帮助她学习，彼此有了感情。1933年12月，我们结了婚（为方便起见，以后的叙述中简称为M）。

结婚后一个月她就怀了孕。我怕生活上拖不起（不仅是经

济上，还有时间和精力上），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就让她去打胎。先用打听来的单方，无效，后到鲁迅介绍的日本人开的医院去动手术，但没有成功，叫休息一天再去。我看到动手术的情况，觉得太残酷，只好不去了。

茅盾辞职后，周扬要我接任。他自己改任宣传，调卢森堡来接他的组织部工作。他对我说，他的主要工作在文委。在左联他管内部工作（党团工作），由我管外部工作（左联工作）。这是党的决定，我不能不接受。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还原封不动，全由我管。卢森堡的组织工作是和区委取得联系。区的研究会我也非到不可。我多了一个书记身份，并把自己的住处提供作开会处。周扬的住所我知道，也去过不止一次，但不好在他那里开会。

记不得过了几个月，法租界某处发生了罢工风潮，卢森堡和有关系的人取联系时被捕了。但他在警察局招供了我们结婚时的住处像“皇宫”。这消息在日本人出的小册子上登载了，鲁迅先生给我看过。趁这个机会，周扬退掉了宣传部的工作，调任白戈来接手，又把周文从区委调来担任组织工作。开会的地点就改在周文那里了。

左联应该把重点放在做文运工作（思想和创作）上面，但作为组织中心的书记处，几乎是无从提起的。举一个例子。

1934年初，鲁迅发表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杨邨人当年在左联时对鲁迅进行过丧失原则的诬蔑性的攻击，鲁迅忍下了。后来他进了苏区，又从苏区逃出，公开发表诬蔑苏区的文章，并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和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对抗。这时候又在小刊物上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要鲁迅把他当作左翼文学家。鲁迅不得已写了这个公开的回答，用事实从革命道德上谴责了他，发生了使人感奋的政治

道德影响。当时孙师毅(记得他还是和夏衍接近的,我并不认识他)办了一个叫做中外图书出版公司的小出版社,出了一个刊物,向鲁迅要稿。鲁迅就把这封大刊物不敢发表的信托我交给孙师毅,发表了。34年夏间吧,周扬送家眷回了湖南一次,由文委的林伯修(杜国庠)和我取联系。林提到了这封信,对鲁迅很不满,说这样一来,他们对杨邨人就很不好了。原来,他是以容忍杨邨人的叛党行为来换取杨邨人的友谊的。杨邨人是太阳社的,林也是太阳社或创造社的,我不能不感到,他们还是以老关系为重。对我这样提,等于批评我不该让鲁迅发表这封信,和当年穆木天攻击冯雪峰不该让鲁迅发表《三闲集》的序一样。这样,怎能取信于人,在盟员和群众中做左联的思想工作呢?

当时还有一种思想,说,许多盟员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是一种作品主义;热心想做作家,这只能是作家主义;这会走上右倾道路。实际情况是,左联青年盟员能写文章的人太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做思想工作的太少。如果反对发表文章,一写文章就会右倾,那左联就等于放下武器,等于不存在,连右倾不右倾都说不上,还能做什么工作呢?……

到1934年秋末吧,穆木天被捕了,在公安局转向后,他们夫妇很快得到释放。他出来后马上向左联党团“告密”谷非是南京派来的内奸。

原来穆木天不是对我表示很亲密么?记不得是33年底还是34年初,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请了一次酒,大半是左翼的人,又每人赠阅一份报。请酒送报都没有穆木天,穆木天把愤恨发到了我头上,以为是我指使聂绀弩的。其实,请酒和送报也没有我。他不知道我的住处,也一定不知道穆的住处。当时,左联盟员做什么工作例如办刊物,是谁也不向书记

报告的，除非向书记处的人要稿子。在一次诗歌研究会上，他愤愤地指斥了我，我当即把实况告诉了他，发生了口角。他被捕后，当是用这种愤恨欺骗自己，好像他的言行不过是对我的“排他”行为的个人报复，因而出来后还有脸向左联党团诬告我。当时左联和文总，没有谁把这一情况向我透露过。

一天，我到中山文化教育馆去上班。原来，孙科已派钟天心来接替陈彬和的出版部主任，同来的有左恭（后来冯雪峰告诉我他是隐蔽的共产党员）和韩侍桁。韩原来和鲁迅在一起，又转进了左联，后来叛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反过来中伤鲁迅。他攻击从日译转译外国作品不可靠，实际上是针对《译文》的。鲁迅驳斥了他。我在评介《译文》时也引了他自己从日译译来的作品，把不错的日译文反而译得不通。他恨极了（后来他对冯雪峰说，我化了十几个假名骂他）。

我到工作室就和他们对面了。韩侍桁马上指斥我：“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警察局，警察局对他什么人都问到了，就是不问你老兄。”原来穆木天和韩侍桁彼此有联系，这才消息灵通得这样快。拿国民党的钱，当然是指我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官职”。显然，他是来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的。我除了马上离职以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想，顶好不到周扬家去，就到沙汀家去找周扬，幸而遇到了。我告诉了我从韩侍桁那儿听到的话，并提出辞去左联工作。他没有否认穆木天的情况，不作任何决定，只告诉我，因为工作关系他要搬家了，也就是，再不和我取联系了。

具体经过记不得了。由田汉来接书记工作，周文（他是党员）也同时离了职。交接会是在杨潮（笔名羊枣）家开的，记不起杨是理论研究会的还是某一个区委。在会上，我提出了穆木天的诬蔑造谣，对周扬默认穆的造谣表示不能接受。田汉当即表

示，要和周扬的这种态度斗争到底。（穆木天曾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粗暴地攻击过田汉。）杨潮大概是和田汉一起接任左联工作。我只好把住址告诉了田汉，静候处理。

大约两三个月以后，田汉约我和周文去见面。洪深要到外地什么大学当教授去，田汉在一个旅馆开了房间，为洪饯行。有人拉胡琴，他们唱京戏，闹得很欢。坐了好一会，他才把我拉到阳台上谈话。他问我，日本是不是到了革命高潮期？我说，我看是没有到。他说，“国际”的指示是，全世界都到了革命高潮，未必日本是例外么？我说，就我所知道的，日本党的组织力量很小，还经常受到破坏，连存在都很困难，说不上革命高潮。他说，难道是“国际”错了么？我说，“国际”是否有这个断定我不知道，但就我所知道的，日本党从没有提到过革命高潮，也许提到过，而我没有见到……。他说，再谈罢。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关于左联的事，他一句都没有提。

我辞去左联职务的当时，就把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鲁迅。他沉默了好一会，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笔……。”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我离职了以后，左联就和鲁迅断了联系。更没有想到，像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穆木天的所言所行，竟至掀起了那大的风波。

这样，我就和所有左联的有了文名的盟员一样，只是挂一个名，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了。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我开始做专业作者。所谓挂名，也是就内部关系说的。至于对外，不但那以后，就是在左联任期间，我也从没有向谁表明，甚至暗示过，我的文字是有左联的组织保证的。

我任职期间是1933年8月到1934年10月上下，约占左联存在期间的五分之一。

那以后，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也和彼此

信任的几个盟员保持着友谊关系，如周文、宋乐天(王尧山)、彭冰山(柏山)、欧阳山和草明、聂绀弩和吴奚如等。

下篇 左联离职前后

补叙一件还是在左联任职时的事情。

鲁迅信(1031号)里说，“那客人好像不明白情形。”那客人名字宫木菊夫(菊夫一写喜久雄，音一样)，他是日共党员。这时日共等于溃散了，他失去了党的关系，就到中国来找我，想找到关系到苏联去找“国际”。他带来两件东西证明他的身份。一是我寄给同学泉充的我和M的合照，一是当时的一本《普罗文学》，上面有一篇署名宫木喜久雄的论文，说作者就是他。他说，只要我们帮他把信寄到在莫斯科当电影导演的佐野硕再转给他的夫人(他没有说佐野夫人的姓名)，她就会替他证明，并接上“国际”关系。我感到这件事有困难。首先，我不能凭这两件东西就肯定他是日共党员，而且是可以到苏联去找“国际”关系的，有相当经历的党员。但好在关系是他自己的，我们不担负任何政治责任。事情如果能够办成，也许会对日本革命发生重大的影响。我只好把这种情况告诉了鲁迅，问他有办法没有。他不假思索地答应可以试办，还答应了每月给他三十元的生活费，在上海住下来等消息。

我帮他在法租界租了一个亭子间，冒充不懂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华侨，住了下来。在等的时间内，他谈了些日本党和普罗文化运动的情况，加强了我对他的信任。我借了一些日译马列主义的书给他看，如《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他认真地读了，不止一次地慨叹：为什么(过去)没有读《资本论》？意思是，过去的工作是盲目干的。又不止一次提到，读了《帝国主

义论》，才多少懂得了现代世界革命的辩证发展。他每星期到日本人集住区的虹口去一次，看一个朋友，吃一餐日本饭回来。他没有说那个朋友是怎样的人。抗战后期在重庆，和池田幸子谈话中提到他，这才晓得是池田（那时鹿地还没有到上海来）。等了半年，当然有些焦躁，提出了些无法做到的希望。鲁迅说他“好像不明白情况”，并说“信寄去了，极妥当的便人，必到无疑”。可见，鲁迅是和驻在上海的“国际”关系的人有联系的。即使佐野夫人是一个被信任的“国际”党员，但和宫木分别了不少年，恐怕也很难替他做这种关系重大的证明。

他要见见鲁迅，鲁迅在约定的晚上特地远道跑来在小馆子里和他一同吃了一餐饭。他要见见M，我就要M带着还在吃奶的孩子和他 在小馆子里吃了一餐饭，这就算是我尽可能招待了他。他终于懂得他的目的是无从达到的，依然回东京去了。他说回去后要进工厂，隐蔽着等待时机。几个月或者年把以后，我在《普罗文学》上看到了一篇署他的名字的工厂通讯。他告诉过我他的本名，但我当时故意不记住。

这个情况也是我对田汉提的日本已到了革命高潮这说法不能作肯定答复的原因之一。

按月拿工资出卖劳力的路子断绝了。只好“多用用笔”，打零工，写些文艺评论。也就是开始做专业作家了。

这时（1934年冬），巴金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我把过去写的一些短诗选成一个小集子，题为《野花与箭》，交给他出版了。自己写的当然浅薄，但收了几首选译的美国黑人和日本女工的诗，他们被压迫民族的和被剥削的工人的，痛苦的或反抗的真挚的感情，使我舍不得丢掉。

写文章一开始就碰到了国民党的审查制度，说法不能不弯曲曲地绕圈子。这以前的几年内，也写过若干篇所谓理论文章，自己都很不满意。现在希望能够从实际出发。用作家论的形式去接触作家，在某一角度上有代表意义的作家；用书评的形式去接触作品，能借它说明新机的创作和较有借鉴意义的翻译。通过这尝试着去迫近社会发展的脉搏和文艺发展的路向。至于理论问题，只就对实践有关的，用短论的形式从某一点上去碰一碰，作为参考再也不去写那一种煞有介事的架空文字了。

当时甚至还抱着一种梦想：这样的工作，对读者也许能有一种参照的用处；对自己，希望能够逐渐求得一点对新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解。

但到了实际着手的时候，强烈地压迫着我的，却是在所谓文化生活里面弥漫着的那一种精神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把文艺现象当作文艺现象，就得从那里面凸现出能够成为革命斗争的血脉的肯定的东西，但现在却不能不把文艺现象当作一般的社会现象，通过它去刺破文化生活里的迷妄的罩子，从这里透露出现实社会的发展要求，政治斗争或社会斗争的具体形态，使政治斗争或社会斗争不致停留在空而无实的假象里面。当然，同时也借此冲一冲罩在革命现实主义头上的庸俗的气氛。我不得不在仅有的条件上走这样一条实践的道路，也就是说，不得不一面探索，一面前进。

当时的大杂志《文学》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茅盾是它的后台。当时写评论的很少，当然愿意发表。对主编傅东华，我不熟，对他的为人和编辑“官”的架子感到不可接近，就只和助编黄源接头。我的投稿很自由，长短和主题不受限制。

编辑不限制，但审查官却有权利删改以至禁发。例如，《林

语堂论》虽然给通过了，但《张天翼论》就从第一个字到最末一个字全部被禁止了。这也难怪，审查官怎么肯让你指出作品中的真和假，也就是生活中的真和假来，帮助读者正视现实呢？后来，我投给了北平的《文学季刊》，好像编辑把署名换成了胡丰，又是杂在考古文字和抒情文字中间，所以审查官懒得细看，就给通过了罢。作家论太招忌，只好停止了。

《林语堂论》发表后，孟十还告诉我，林对他说：鲁迅又化了一个名字批评他。我提到这话时，鲁迅先生平静地说：“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我说：“如果把周先生论到他的几篇合在一起读，我那篇大可不必写。”他“呃”了一声，我马上抢着说：“真的！不过，我那篇对没有全读周先生文章的或者读不大懂的青年，也许还有点用处。”他才不再说什么，释然了。其实，他几篇的思想深度，我是没有达到的。至于那以后在《“题未定”草》中所描画的“西崽相”，从林语堂身上竟至取出了那一种相，那是我的认识水平想象不到的。经他勾画出来后，就恍然大悟了。

写评论，得广读刊物上的作品或专集，这才能选出自己认为值得评介给读者看的优秀的来，或者选出应该批判给读者取得教训的不好的来。但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只能就自己看得到的作品里面找出能做一点分析或发挥的例子。

我看了专集《蜈蚣船》。对署名彭岛的作者，除了从作品内容知道他是北方人以外，其余一无所知，也无从查考。但作者和所谓“京派”作家截然不同；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残害者的同情，使我禁不住肯定了这一份劳动产品，向读者作了评介。这是当时的感受和看法。在收入这篇评介的《文艺笔谈》后记里面，提到“那个作者后来完全没落了，……”，还着重指出了他的非现实主义的思想态度和创作方法，提得相

当严重，和写这篇评介时的感受和看法几乎完全相反。我已经记不得所谓“完全没落了”是从谁那里知道的，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应该说的是，所谓“完全没落”的消息不一定可靠。但无论可靠与否，要确定我前后两种看法中哪一种符合他这些作品的实际，那只有重新细读并分析那些作品才能确定。即使后来“完全没落”（是没落不是反动）了，也不能据以否定这些作品。对这些作品（和写这些作品当时的作者）的肯定和否定，只能根据这些作品本身。但事隔半个世纪，这个集子恐怕不能找到了。因为，这是有关这个具体作家的名誉问题，我不能不作这点声明，无论这个作者健在或不健在。

此外，评介的作家如下。

单篇——当时的《小说》半月刊，不知编者是谁，是一个适应小市民趣味的刊物，说不上什么进步性。但到了第十五期，有了好转的倾向。我指出了两篇杂记，叶紫的《古渡头》和荒煤的《抛包》，是值得读的好作品。另外，还从八个短篇提出三篇来作了评介。

一是禾金的《副型忧郁症》。这位禾金不知道是什么人。这篇，加题目所表示的，可以算得是“现代派”的前驱。内容是极其颓废的现代都市生活，当然是离不开颓废的男女关系的现代生活。形式是利用了现代化的手法：如，利用色彩的感觉；如，尽可能地利用数字；如，借用电影剧本的写法；如，借用宗教颂歌的叠唱。我不能不指出，这个没有内容的故事是由一种所谓“华美”的形象构成的，这种末梢感觉的境界和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的真实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姻缘的。

一是奚如的《两种不同的情感》。写一个坐了五年监牢的革命青年出来以后，受到父亲的驱逐，只好去求友人的帮助。一

个是从前的好友，现在当着科长，一个是从前关系很浅，现在当着开车匠的。前者对他吝啬无情，后者却把他当作兄弟看待。我指出了这个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可惜它的人物形象并不全是从生活实际提升出来的。

一是欧阳山的《新客》。这里主要写的是流氓下等知识分子。据我的理解，这种人物是反动的军、警以至政法的下级干部的预备队。这里写的是这种人物在不得意的时候，和一个甲等警察勾结着，在穷苦的，住在下等宿舍的手车夫们中间进行欺骗。那个甲等警察，就是这类人物暂时找到合法的欺骗职位的例子。和这个有合法职位的骗子伙在一起，那个流浪的骗子对手车夫们尽可能地欺骗了以后，把下等宿舍的老板娘拐着逃走了。这两个骗子在社会学的主题思想上是有代表意义的，但在美学上的生活真实性还是脱离不了概念上的匠心。尤其因为被骗的手车夫们几乎全不是感性形象，这种概念上的匠心就更加明显了。对这两个骗子，也只是理智上觉得他们应该是可恨的人物而已。

再就是评介了两个小说集。

一是艾芜的《南国之夜》。作者曾在云南边境和缅甸流浪过多年，做过几种下等职业，他在作品里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人民的困苦和反抗。但如我们在别的作者身上所看到的，作者虽然经历了这种特殊的生活，但到他把这种生活组成故事的时候，被某些文艺理解所障，以为凭这些看到的生活现象就够了，没有设身处地地和他所要创造的人物重新血肉相连地生活过，搏斗过，痛苦过并追求过，所以他的人物们和他所选来的生活知识，还只是在某种主题思想上捏在一起，并不是在同呼吸共生死的精神状态上凝结在一起的。

一是欧阳山的《七年忌》。如上面在他的短篇《新客》里所看到了的，他总是想找出在社会学上有某种思想意义的主题。现

在，在这里展开的面更广些了。他找出的主题大半是带有悲剧性的，因而，非制造导致这种悲剧的特殊情节不可。如果这种特殊情节不是现实生活里的或能有的，或者，不是作者体验到了或能够体验到的，那么，这种作品所要取得的思想效果，就很难超出概念性而成为血肉形象的美感力量。生活是无边无底的，任何作家都不能完全生活过他的人物们的生活。但是，他的创作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他的人物应该是从实际生活取来种子的。其次，在准备创作过程，尤其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非全心全意地和他的人物共同生活，人们的思想感情非在他自己的思想感情里体验过，检验过，因而提升出来，变形出来，表现出来，成为活的有机体不可。但这些作品，只有经过思想分析，我们才能够看出作者的用意。习惯于直接从人物形象发生感应的读者之所以不能起内心的共鸣，不外乎是作者虽然在创作准备阶段用了力，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自己的心理活动与人物的心理活动相生相赴的精神化合作用的原故。

这些是我后来的理解，在评介这些作者和作品的当时，是还要粗糙得多的。

这些作者，除澎岛和禾金外，我知道他们都是左联盟员。我离开了左联的职务，但我的这一点具体工作还是为了左翼文学的发展。就是对禾金罢，我也还是在肯定了他的动机的前提下否定了作品的具体效果。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左翼的人，也是对积极的肯定，对消极的否定，目的还是为了左翼文学，为了人民。

关于理论问题，我举了介绍张仲实译的苏联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做例子。当时的理论水平还很有限制，这里提的对初学写作者是重要的问题，当时对一般有了地位的作家也

是重要的。

但也有需要补充的问题，那是关于诗的。它还没有从旧的诗论脱出，以为诗和理论文章的区别仅仅在文字上。有节奏，有韵律甚至有韵脚，由一定的规律组成的句子就是诗，否则不是。这完全是形式主义的看法。不错，过去的诗的文字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文字是这样还不能就是诗。其次，到了现代，文字脱出了这样的形式的，也是诗，甚至是更好的诗。形式可以是诗的特点，但不是根本性的特点。诗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差别，在于它是抒情的这一点。即使是叙事诗，也是抒情的。关于诗的任何问题，都是从这个根本问题产生出来的。《信》也肯定了“无韵律的诗”，但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把“自由诗”当作诗的必然的发展。而有韵律，尤其是有严格的韵脚限制的诗是属于保守性的现象。弄清楚了这一点，对自由诗的发展，也就是对诗的发展是大有关系的。但我当时说得很不充分，后来在对具体诗人和具体诗作品的评介上才进而强调阐明了这一点。这和近几年又被承认了的“七月诗派”的出现和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个诗派之所以产生了今天看到的那些影响，就因为它的风格是从历史发展的要求，社会解放的要求和精神解放的要求产生的缘故。

应该简单地提一提，当时，我应约写了《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我在这里犯了一些错误。

首先，我没有提到最初是鲁迅的作品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但从他的作品和杂文受到了重大的影响，也从他译的作品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唯一的原因是担心左翼内部和鲁迅有矛盾的人们加重对我的误解。到收进集子里面时，才在“北京时期”中加了一句，“在中国新文学创作里面发现了真实的赤裸裸的人

生和它的搏战，也是这个时期。”不但把时间移后六、七年，而且还是避免直接提到鲁迅的名字。

其次，提到了冰心和王统照(《一叶》)对我的积极影响。但现在应指出，冰心早期作品中的爱的哲学是对黑暗的残酷的现实人生的一种自我安慰，王统照的伤感情绪也只是在时代狂潮中的一种幼稚的叹息而已。

至于提到的外国作品的影响，更是提得极其片面。托尔斯泰的《复活》使我看到了剥削阶级社会的复杂性及其斗争的严重性，但吸引了我的那一种巨大的感情追求却终于不得不陷入了自欺的宗教皈依。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虽然其中关于创作过程的部分帮助我清除了(抵住了)一些庸俗社会学的理解，但却没有批判他对待作家主观精神世界的形成的唯心论的观点。德国苏德曼的《忧愁夫人》中的农民式的原始毅力和忍受折磨的韧性，也只是给了我一种同病相怜的寄托而已。至于俄国路卜洵的《灰色马》，那一种虚无主义引起我的并不是什么“感激”，而是使我实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残酷。

评介了鲁迅译的苏联作家的《表》，和关于儿童文学的短论配合起来，也许对于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一点促进的作用。儿童文学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不但当时，就是半个世纪以后，通过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更非常重要。在儿童文学里表扬好的，清除不良的以至有害的东西，这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兼寓有悼念的心情，我评介了瞿秋白译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在这个剧本里，作者卢纳恰尔斯基严正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主义和糊涂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在旧社会，吉诃德对抗了统治阶级的残暴，他是革命的。但到了革命取得胜利后，他却提倡“应以新世界的慈爱去抵抗旧世界的残暴”，这就转 化成

了对革命有害的了。但红铁匠德里戈的专政主义则不同，不但在革命过程中，就是到了革命胜利后，也非用严酷的手段对待敌人不可，即使“杀别人比自己受苦的牺牲更加大”，也非忍受不可。这就是德里戈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吉诃德的糊涂的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德里戈主义者也是要人道的，但却更要使人道的世界能够实现的行动。——在发表的当时，不得不隐掉译者瞿秋白的名字。但到解放后1951年新版时，忘记了改正，这是一个极不应该有的错误。

这时候，做了一件好像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作：介绍了台湾和朝鲜作家的小说。都是从日文翻译的。

台湾的第一篇小说是杨逵的《送报伕》。写一个贫农家庭陷于破灭的故事。仅有的一点土地被办农场的日本资本家抢去了，父亲屈死，全家希望所寄的大儿子漂流到了东京。在家乡的三个弟妹死了两个，母亲也上吊死了。他自己在东京受到了派报店老板残酷的等于抢劫的剥削，在几乎无法活命的情况下，得到了日本革命工人的帮助，这才勉强活了下来，有了阶级觉悟，回台湾从事革命活动了。这一篇由当时销数相当大的《世界知识》发表了，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和同情。作者杨逵成了专业作家，对台湾人民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日本投降后，他知道了他的小说被译成祖国文字，甚至译本也传到了台湾，这加强了他对祖国的怀念；通过他，也加强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怀念。近数年，参加国际活动的作家，有的遇见了杨逵，他表示了对祖国的关怀和我个人情况的关注。前些天还收到了一位读者周鸿赓的来信，他在日本投降后去台湾某地中学教书，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诗。他和杨逵有过交往，杨逵当时就很怀念祖国。我从这位读者来信知道了台湾当时的报刊是用

祖国文字出版的，觉得很高兴。

另一篇是吕赫若的《牛车》。日本资本家的运货汽车来了，赶牛车的陷进了无人雇佣的困境。在小工厂卖力的老婆所得不能养活一家，终于被逼得去卖身，但还是不能活命。无可奈何，他自己只好去做小偷了，但一出手就被日本警察抓住了。据传闻，吕赫若还健在，但因为对台湾当局不满，受到了不应该受的压迫。我希望不再发生这样的情况。

再就是朝鲜的四篇小说：

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

李北鸣的《初阵》。

郑遇尚的《声》。

朝鲜是我们比邻的兄弟民族，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朝鲜人民陷进了当亡国奴的地位，我们当然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在日文刊物上发现了这些作品，读了以后，认为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极难得的材料，因而译了出来。日文刊物名字已忘记了。中译是否在刊物上发表过，也不记得。内容都是朝鲜人民受压迫的困苦的故事。例如《山灵》，写的是朝鲜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不能生活，被逼得只好去荒无人烟的山野里去开荒。但荒地开出了，可以种粮食了，地主就来逼着交租。交不出租来，地主就把地夺了去。于是只好到更荒野的山里去开荒，这种荒地叫做火烧地。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农民，除了困苦而死以外，是很难有活路的。至于现代产业工人，当然也是受压迫受剥削，但不同的是，这里过的是集体生活，能够产生阶级觉悟，能够懂得团结的重要，因而也就能够起来斗争。终于发生了血的斗争。李北鸣的《初阵》，就提出了这样的例子。这些都透露了微弱的希望。二十来年以后，朝鲜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相配合，在中国人民斗争的支援之下，终于开始挣脱了

锁链，站了起来。这些作品，对于中朝人民的友谊结合，应该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到1936年初，我把台湾和朝鲜作家的这几篇小说集在一起，题为《山灵》，由巴金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来，交给即将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决死斗争的中国读者了。

这里，应该补说一点情况。我受到批判的时候，有一位朝鲜同志批评我不该译张赫宙的小说，说我应该知道张赫宙是什么人。看他的口气，好像认为张赫宙并不是一个革命作家。实际上，我的确不知道张赫宙是不是革命作家。但不管他是怎样的作家，我只能看他的作品。作品是同情穷苦人民，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我认为那就对斗争有利，应该把那当作难得的教材。在那样的情况下面，能够得到这样的作品，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此外，还译出了日本普罗作家须井一的中篇小说《棉花》。写的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困苦、悲剧、觉醒和顽强地参加了斗争的故事。困苦的一家靠在外地工厂做工的女儿维持生活。但到了年龄的女儿禁不住和人恋爱同居了。走投无路的母亲找了去，忍心地把她揪了回来。可怜的女儿只好发誓再去做工，尽力帮助家里活下去，终于劳苦忧郁，得了不治的肺病，悄然地死去了。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弟弟，带着这种痛苦经验进了工厂，产生了集体主义斗争的觉悟，参加了斗争。被捕坐牢，刑满后回来见到了穷苦的母亲，但依然毫不迟疑地重新出去斗争。连孤苦无依的老母亲也彻底觉悟了，坚强地送别了儿子，向斗争交出了儿子。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这个小中篇具体而微地反映出了日本工人阶级困苦的处境和顽强的斗争。译出后在《译文》上面发表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受日本普

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不小，但日本普罗文学作品被介绍过来的却不多，这一篇多少可以使我们理解到日本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加强了国际主义的友谊联系。这个中篇经过两次审查都通不过，最后才印成了一本书。

回叙几件在左联任职前后的情况。

一是，1934年初，不知道是谁弄到一点钱出版了名叫《春光》的杂志。^①创刊号出了一个专辑：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可以说这是一个为了吸引读者的题目，但却是一个无法提出妥当的回答来的题目。我也只好写了。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卫左翼文学运动的立场，作家应该深入生活，和劳苦人民结合，和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相结合。同时也保卫了左翼文艺批评。但在这里不得不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批评是必要的，但批评中机械论的倾向，违反文艺特殊性的非现实主义以至反现实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却是对创作的发展不利的。我也提到了后一面，但却无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和说明。这刊物共出了三期。

一是，左联盟员蒋弼（本名欧阳弼，光华大学学生）弄到了一点钱，出版了叫做《综合》的杂志。我把《论主题积极性》交给他发表了。虽然我极力想把现实主义的要求和带机械观点的加引号的政治性结合起来，但还是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所以，这篇论文虽然在青年盟员和读者中间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但同时也减轻了对非现实主义倾向的警戒。这个杂志只出了一期。后来，蒋弼被捕，传闻特务把他带出来捕人，但据我所知，并没有谁因他被捕。抗战初期（1938年）在武汉还见过，后来他到战

① 《春光》由庄启东、陈君冶（？）二人合编。——编者

地去了。记不得是传闻还是报上登的，说他在太原城楼上被敌人乱刀刺杀了。可靠与否不知道。知道这消息后，我写了《蒋弼一斑》，表示了悼念的意思。

一是，聂绀弩在《中华日报》上编副刊《动向》（叶紫助编，林默涵校对）。为约稿请了一次客，大半为左翼作家，并赠阅一份报纸。赠报没有我，因为他不知道我的住址。请酒也没有我，因为我的名字太红了，避免的好。后来我也写了稿，但都换了笔名。在这个副刊上，进行了两次论争。一次是关于利用旧形式的。我也赞成利用旧形式，论点还是鲁迅和瞿秋白提到的那样。能够利用的只是简单的旧形式，用比较简单的新内容去占领它。而且，在占领它的时候，也得适合内容的需要有所改变，有所增减。至于比较复杂比较重大的内容，那非根据内容本身创造出新的形式不可。当时和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只能采取这样的看法的。我当时用了顾盼的笔名，但现在查集子，这些短论都没有了，当是收集子时没有了底稿。还有一次是关于大众语的论争。斗争的目标是反对文字上的复古倾向。这种倾向是，主张中小学教育用古文材料不必说了，还主张通用文字也要由语体文改用文言文。所以，反对这种倾向不仅是形式上的文字问题，而是严重的反对复古的思想斗争问题。因为，复古主义者是反对语体文的，回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前去了。但另一方面是，反对文言文，主张大众语，即采用大众的口头语来改革现在脱离大众的语体文，以至采用拼音的拉丁化的新文字来代替方块汉字。甚至过左到也否定通用的语体文，主张采用和大众口头语完全一致的大众语。这就左到帮了复古主义的忙了。持后一种主张的人们是非常努力的，甚至出版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教材，用新文字翻译了作品，我译的台湾作家杨逵的《送报伕》就是一种。我也写了文章，所提的也只能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办法。

在国民党支配下的那样的历史环境下面，革命的办法是绝对没有条件的。中国文字要走拼音化的道路，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上，是肯定无疑的。但就我们使用了几千年方块汉字的具体条件下，即使是革命胜利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什么时候能够实用，都是很难说的。首先，非进行长期的深入的研究，包括对使用汉字的民族（朝鲜、越南、日本）的文字改革经验的研究不可。我当时写下的那些所谓意见，不过表示了反对复古和希望文字改革的愿望而已。为了避免《动向》编者更招忌，这些文字用的笔名是高荒。

以1935年所写为主的这些文字，1936年春应文学社之约，编为一集，题为《文艺笔谈》，他们作为文学社丛书之一出版了。他们同时出版了一本《作家论》，只好让他们把《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都收了进去。

另外，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同事张仲实到生活书店当编辑，编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约我写了《文学与生活》。

这时候，还评介了几个作者。

一是耶林。对他毫无所知。我评介了他，因为，他有一篇小说是写东北的善良的老农民怎样受日本人的欺骗，相信了日本人，终于受到了日本人的戏弄和作践。又一篇是写上海一二八战争中上海工人支援战争参加战争的故事。前些时候读到丁玲关于他的回忆，才知道他和丁玲通过信，后来进了苏区，被诬为AB团，屈死了。

一是田间。他是我知道的第一个歌颂民族战争的诗人。左联盟员，大学生，年龄未超过二十，但却歌颂了在农村开始出现的民族战争。他追求穷苦农民的生活内容和斗争意志，他把他所追求到的表现在跳跃的节奏和旋律的语言里面，创造出了

从生活产生的新的形式。我应约在他的《中国牧歌》前面写下了我的感想。文坛对他置之不理，但看到在读者里面引起了反响，于是投来了嘲笑以至打击，讨厌他扰乱了诗国里的安宁。这种打击一直继续到了四十年代中期。那时大学教授闻一多站出来说话了，称田间为“擂鼓的诗人”。田间本人也终于向批评屈服了，把火热的生活内容改装到了批评家所指定的，僵化的形式里面去。这就使批评家得到满足，相安无事了。

评介了端木蕻良的一个短篇《鹭鹭湖的忧郁》。那反映了东北农民的生活困苦和求生的愿望。

评介了罗淑的一个短篇《生人妻》。那反映了相依为命的穷苦农民夫妇不能活命，丈夫只好把妻子卖了，让她去逃生。女的只好忍受着灵魂被撕裂的痛苦走到另一个男人那里去劳动讨活。

他们都是新人。除田间外，我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我不能不在实践里面寻求真实的东西；寻求到了这些，我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属于人民的，直接地或间接地为了民族解放，有助于民族解放的。谁能够因为它们里面不是“国防”这个“最中心之主题”，就判定它们的作者不是在“汉奸以外”呢？

1935年初，认识了萧军和萧红。

鲁迅告诉我，有一个东北青年叫刘军，从敌人压迫下逃到了青岛，又从青岛漂流到了上海，寄信和小说稿给他，要求介绍发表。并问我有没有办法多了解些他的具体情况。

不久，鲁迅请了一次饭，介绍他们和几个可信任的人见面认识，使他们生活里有朋友。记得有聂绀弩和叶紫。通知我的信因为转信处M家里没有在约期前送来，所以我和M没有赴约。过后，鲁迅把他们的住址告诉了我，要我直接去认识他们。

和他们见面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已经付印了，和叶紫的小说集《丰收》合在一起，取名《奴隶丛书》。《丰收》中有一篇《电网外》是以苏区的斗争为题材。萧红有个中篇小说由鲁迅介绍到《文学》，希望能连载，那时还没有消息。见面时，他们都使我觉得可亲。

萧红的小说被退回来了，鲁迅交给我看。读着原稿，面前展开了东北穷苦人民受侵略受压榨的悲惨的生活实际，顽强地挣扎着的求生意志和悲壮不屈的反抗斗争。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我受到了感动。还没有确定书名，他们要我提，我就从书中的小标题取出了“生死场”为名。他们还要我写篇序，我毫不迟疑地写了点感想。但因为有了鲁迅的序，我坚决要他们放在后面，当作后记。

读到了《八月的乡村》。这是有领导的战斗，生活内容和战斗规模和《生死场》有所不同，生活和斗争的人民性实感，以及求真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不及《生死场》。但它有一个特点，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当时国民党欺骗宣传什么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他们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两本小说则完全不同，《八月的乡村》里的人物还特地声明了他们是“人民军”，也就是这两个作者的笔名合起来的“红军”。看了这两部作品，我们这才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好像自己也参加在里面似的，体验到了卑微的受苦受难的东北人民的，英勇不屈的抗日民族战争。这两本小说，向我们提供了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运动实际。而且还使我们确信，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得到反映，而且已经得到了反映。这才使处在民族危机下心怀仇恨但在实际上苦闷着要求前进的我们大大地吐了一口闷气。仇恨就是力量。大书店不敢销售这样的书，我们就用布包着送给接近的人们，辗转地推销出去。实践产生认识。

后来在拟定口号时，我毫不迟疑地同意采用了“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定义。这两本小说在文学实践上对这个口号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一次，我们从鲁迅家出来后已经夜深了，电车已停，只好步行回法租界。总有十多里远吧，我们走着一路谈笑，毫无倦意。终于，萧红和我赛起跑来了，萧军在后面鼓掌助兴。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危险的，万一巡捕拦住讯问身份和住址，那很可能惹出祸来。两三天后，鲁迅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不要在马路上赛跑，就是指的这事。我们在兴奋中一点没有想到危险。

但竟至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张春桥以“革命领导者”的架势站出来，在国民党的《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执行“自我批判”了。他指斥萧军不该那么早地从东北回来写出这种“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有许多问题”的小说。在张春桥看来，这种作品是不应该有的。鲁迅当即在《三月的租界》里驳斥了他，说他是向敌人献媚，替敌人缴械。原来，张春桥当时就歌颂了日本侵略者在他的故乡济南做“文明建设”的“功绩”，难怪他不准《八月的乡村》出版了。这样的张春桥，直到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多年，竟至结成了以他为中心（狗头军师）的，篡夺了党政大权的“四人帮”。而粉碎这个凶恶黑帮的大斗争，还是用鲁迅的《三月的租界》在群众中间打开了缺口的。我是在1976年10月20日在监狱的院里听到广播“狄克何许人也”这样揭了张春桥的老底。

左联时期和那以后，出过几种和我有联系的小刊物。照例是，谁弄到了一点钱，也不过一、两百元的数目，想出刊物，发表他们自己的，不能或不愿在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于是来联系，要为他写点文章，还介绍点名作家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没有要求鲁迅写过文章。我以为，鲁迅的文章应该尽可能

在合法的商业杂志上发表，那才能和广大读者见面，不应该局限在小圈子里面。这种刊物总是出过一两期，钱完了，刊物也被禁止了。

应该提提《木屑文丛》。记不得是谁弄到钱，要我编的。这刊物我已没有了，无从查考。只记得，有吴奚如写的以苏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署名“环”译的一篇论文。这“环”当是为了使国民党特务怀疑是译俄文的孟十还（环），不猜到真的译者身上去。真的译者可能是瞿秋白，也可能是我向鲁迅要来的，以后收进《海上述林》中的一篇。还有我从日文转译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篇。

鲁迅在给我的信中提到《木屑》已算帐，就是的。虽然编印出来了，但无法出售（大书店不肯代售），只好凭私人关系推销一点，再就是凭内山书店代售一点。“算帐”，就是由鲁迅代我和内山书店算帐。他是愿意为这类事用去他的精力和时间的。

一两年吧，欧阳山在文章里提到，是他“和鲁迅以及胡风”编了《木屑文丛》。这是和事实不符的。

由于书店不同意黄源任《译文》编辑，要撤换他，鲁迅对这种资本家的态度不能忍受，愤而退出《文学》，停止向《文学》写稿。这时就发生了出版《海燕》的事。

一天，鲁迅告诉我，萧军和聂绀弩都写信给他，要出刊物，他觉得这样会分散力量，办不好；不如以我为中心合出一个。我告诉了萧和聂，他们也同意了。

拟刊名的时候，鲁迅提出了《闹钟》，我提出了《海燕》，他马上同意用《海燕》。下一次我去时，他把写好了的《海燕》两个字交给了我。

由我约稿集稿，作总决定。第一期，鲁迅就给了小说《出关》

和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还有两则小杂感《文人比较学》和《大小奇迹》。还给了我陈节(瞿秋白)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文。他是全力支持了这个工作的。

我决定了稿子后就交给聂绀弩。交印刷厂排印，校对，托书店代售等，全由他去办理或找人帮他料理。形式上与别的刊物有两点不同：一是，因为刊名《海燕》是横写的，所以正文采用了横排。这是鲁迅编《奔流》开始采用的，但没有能够推行，因为工人不习惯，要多费力费时，排字费得增加百分之二十。《海燕》是自己筹印的小刊物，但还是决然采取了这项革新。一是，全部采用小字号，新五号和六号，同样的篇幅可以多容三分之一的内容。后者是想多给读者一点东西，但其实是不宜采用的。特别是六号字，不是眼力特别好的人就很难看清楚。

印了两千册，出版当天就在上海本埠被抢买光了。鲁迅也很高兴，当即约有关的人们在馆子里吃了一顿饭。

《海燕》是当作合法刊物出版的。照国民党规定，得印上编辑人和发行人(出版人)的名字负责。前者用了一个史青文的假名字，后者只印了一个空头的“海燕文艺社”。总代售印了“群众图书公司”，那是曹聚仁教授办的，当是聂绀弩事先和他讲好了的。出版后，国民党就向书店找编辑人和出版人了。聂找了曹聚仁，曹愿意当出版人负法律责任。

高兴地决定了第二期的稿子。鲁迅又给了《“题未定”草》两篇，为日本读者写的重要文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还有一篇在别处被上海和南京中央两级审查机关禁登的漫谈《阿金》。杂文痛斥了变节者的丑恶嘴脸，对人民力量寄予了深挚的信心。文论对这位伟大天才的精神世界的病态作了不得已的揭发。至于《阿金》，为什么弄得那样严重，他口头对我说，他怀疑审查官认定他是讽刺宋美龄的。他说时笑了笑，其实正是随手画了

几笔宋美龄的尊容。另外，还写了小杂感，(1121号)信后说：“附上‘补白’两则，可用否？乞酌。”现在看刊物，“短评”有六则，他写的也许不止两则。那这里说的两则，当是后加的。《难答的问题》，解放后对武训思想的大斗争，就是引用了他的这一斥责开始的。和向少年儿童斥责宣传文臣武将道德的《登错的文章》一起，还是五四开始时喊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的继续。

第二期出版后，国民党马上找发行人了。看现在的上海影印本，编辑人印了真名耳耶（聂绀弩），但发行人依然印的是假名张仲名。这只能是，虽然第一期出后曹聚仁向国民党承认了他是发行人，但还是不把名字印在刊物上面。（绀弩在1981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上谈《海燕》始末时说，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这是没有的。我在写《鲁迅书信注释》时，也记错了。）虽然如此，国民党还是要找他的。他不得不去，见到国民党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说了，并声明不做《海燕》的发行人。他安然无恙，照旧当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了唱歌和呼吸。

鲁迅呢？他也有了收获，那就是《半夏小集》之五。B向A表白他同情革命，要为革命帮点忙，A相信了他。到敌人向他问到A时，他就把A的情况都告密了。A责问他，他理直气壮地说，他一生是老实人，不能说谎，他不是那种靠不住的人。一百多字，画出了一个典型。曹聚仁呢？他写信给鲁迅为自己辩解。鲁迅不得不写回信说明，他了解曹的“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这“苦心孤诣”的意思并不简单。把这当作“安抚”也可以，当作不得已的讽刺话看也可以。

《海燕》第一期出后，生活书店就传出话来，只要不经过黄源的手，他们愿意接受出版。这很容易，只要告诉他《海燕》与黄源无关就行了。但直到第二期被禁后，我都没有理他，也没有告诉鲁迅。资本家有他的生意经和统治者的面子，而劳力出

卖者也有自己的伦理学。

但是，原系林语堂派，后由聂绀弩介绍给鲁迅，在《译文》上译俄文作品，在《海燕》上也译了点短文的孟十还，看准了风向，竟冒充《海燕》同人，还可能冒充是《海燕》以至鲁迅的代表，向上海杂志公司交涉好了出版一个大杂志《作家》。不难想见，上海杂志公司老板是一个精明的出版家，如果不是孟十还冒充代表《海燕》以至鲁迅，他是决不肯冒这个险的。第一期约了我和萧军、萧红开了一次编委会。出版后，当然在销数上取得了大胜利。但从第二期起，就再也不开什么编委会了。至少，是把我关在编委会以外了。和《海燕》比，《作家》已减少了那些战斗性的内容。现在又由孟十还自己向鲁迅要稿。鲁迅当然马上察觉到了这种情况。《海燕》两期封面上，各印了巴比塞和纪德的照片，那是因为登了他们的战斗的文论。孟十还在《作家》占两面的目录上登了十几个世界大作家的照片，其中有鲁迅的。鲁迅在发现孟十还把它办成了妥协的纯商业杂志，还排斥了我以后，对我说，他两次要求孟十还把他的面孔取消掉，但孟十还置之不理。现在看信(1213号)，他还发过这样的感叹：

……新作家的刊物，一出锋头，就显病态，例如《作家》，已在开始排斥首先一同进军者，而自立于安全地位，真令人痛心。我看这种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

这就是我和《作家》及孟十还的始终。抗战初1938年在武汉，国民党康泽打算出钱要孟十还编一个《大时代》杂志；孟同萧军来见我，恰好我不在家。鲁迅只是指出他的“自私心太重”，而且还希望有“整顿一下”的机会和可能，不能不是从一种不愿把人设想得太坏的忠厚存心出发的。后来在重庆，中苏文协张西曼请客，看见康泽，知道他是特务，避免了认识他。

1936年四月底或五月初（这个日期我无从确定），参加了长征的冯雪峰从陕北被党中央派回了上海。五月六日下午我去看鲁迅，从内山书店过时内山告诉我，冯雪峰回来了，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了。我当即赶去，许广平开门时我问是不是雪峰回来了。她没有回答，叫我在楼下等一等，她上楼去问了才下来把我引上楼去。走进去，雪峰正和鲁迅平静地谈话，招呼我坐下以后，他们还在继续说下去。这前两天，吴奚如要我替军委^①向鲁迅要了三十元钱，吴把一个卷成寸把长的小纸卷给了我，说是收条。我这时就把它交给了鲁迅，鲁迅接去没有打开看就放进烟灰缸里去了。我把此事告诉了雪峰，他说：现在好了。意思是，他来了，不必这样捐钱了。大概我来以前他和鲁迅谈到过党的政策，这时候他用谈闲话的口气谈长征情况，谈毛泽东做的党内斗争和毛泽东的坚强性格。他说，“周先生的韧性战斗精神，后继有人了……”

一道辞出后，坐出租汽车到他住的小旅馆去。他在车上对我说：“从今天起，你是共产党员了。现在入党不容易，这是特准的。环境困难，不开会，不发生横的关系，直接和我单线联系。”这样解决了组织问题，出乎意外。我不能说什么，默认了。

（这是第一次通知我是党员。到他离开党的工作前，共三次通知我是党员。说法之一是，把我一个人丢在党外，更危险。但又两次告诉我，党内更难搞，还是留在党外好些。第三次通知我是党员后，还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王任叔家开的。王任叔、夏衍、雪峰自己和我，共四个人。会议内容完全忘了，只记得并不是开诚相见的。雪峰回忆说，成立了一个有非党员参加的

^① 作者认为的军委，即后来大家提到的特科。——编者

领导小组，开了两次会。实际上，他告诉我是党员组成的领导小组，只开了一次会。以后再也不提了。今天我在这儿提起这些事，只是为了说明当时雪峰工作上确有困难。)

七日上午，如约去看他。他已于头天晚上住进鲁迅家三楼后楼了。他提到“国防文学”口号，觉得不大好，并说，汉年也觉得不妥当。后来知道，潘汉年是从苏联回来的，可见，他到鲁迅家之前是见过潘汉年的。他要我提一个口号试试看。我想了想，提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他说，不如用“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党中央早已提出了的口号；“人民文学”不如用“大众文学”。我想到，“大众文学”在日本是指类似中国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的。但他说，我们在正确的意义上用惯了，群众不会误解的。

我辞出，去找他要我找的一个人，我以为大概是党中央留在上海的一个关系。找到了，出来见面的是一个中年女人，说要找的人到外埠做生意去了，最近不会回来。

八日上午我去时，他告诉我，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周先生也同意了，要我写文章反映出去。我当晚翻阅了手头有的有关材料，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九日上午，我送给了雪峰。十日上午我再去，他交还了我，一字未改。说周先生也看过了，认为可以，要我找个地方发表出去。我交给了聂绀弩，拿给光华大学学生，左联盟员马子华，在他们编的《文学丛报》第三期上发表了。

发表以后，徐懋庸在《光明》上发动了攻击。这是完全出乎意外的。怎么会想到提一个抗日的文学运动的口号竟会遭到反对以至仇视呢？尤其因为，这是由党中央派到上海负责工作的冯雪峰考虑以后要提出的。当时只从“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着

想，完全没有想到还有一个这个口号制定者(们)的个人威信问题。还以为，个人威信是附属于党的威信的，为了党的威信而在具体问题上放弃自己的错误，那只有增加自己的个人威信。我感到有责任再作一些解释，并着手写了。但冯雪峰制止了我，说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调整处理。我只好服从了。

我当时另外还写了《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和《演剧运动短话》，是从当时仅有的条件设想，文学运动应该怎样设法渗进能够接近的群众中间去，扩大影响，而不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攻击者们对这些意见却提也不提了。

国防文学派的攻势愈来愈猛，闹了相当长的时间，雪峰不但不能调整处理，反而有些惶然了。

恰好托派利用了不负责任的流言，好像鲁迅是反对统一战线的。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给鲁迅送来了“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雪峰觉得应该重视这一点，就代鲁迅拟了一封回信。他约我夜里一道去见鲁迅。鲁迅当时病危，躺在床上不能动，听雪峰念了以后，没有说什么，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鲁迅的同意鼓励了雪峰，回去后觉得在理论上也应该提出根据来。又用鲁迅答问的形式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第二夜又约我一道去见鲁迅，念给鲁迅听了。鲁迅依然没有说什么，略略点了点头。

这两篇，都在左联盟员尹庚弄点钱办的《现实文学》上发表了。两篇都署名O.V.笔录，这O.V.会使人猜想是我的笔名(谷非)的头字，免得怀疑到是雪峰自己。

雪峰还把这两篇笔录托茅盾交给国防文学派的《文学界》发表。《文学界》拒绝发表答托派的信。后一篇是发表了，但加了一千多字批驳的后记。这等于说，他们在文学观点上完全采取了

拒绝鲁迅的态度。(这是四十多年后的1980年看到雪峰的回忆录才知道的。)

这两篇笔录发表以后，对国防文学派当然发生了影响。

一天，我去看鲁迅，他已能够起床走动，能写写字处理事务了。他盘着腿坐在床上拆阅信件，我坐在旁边。当拆看了一封信以后，他低声地但却是沉重地，好像是自己对自己说：“哼！打上门来啦！……”

四、五天后，雪峰给我看了一篇稿子，我才知道那天我看见鲁迅拆阅的是徐懋庸的信，穆木天的诬蔑掀起了怎样大的风波。这是雪峰拟的鲁迅回答的公开信。鲁迅看了拟稿以后，平静地说：可以的，但我要重新写过。鲁迅写成了定稿以后，雪峰又约我去同看。拟稿只占定稿的约三分之一，而且是经过了修改的。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打了旁圈的)，都是雪峰的拟稿。可以想见，关于这种需要作一些引证和分析才能说明白，但对对方的论点又不能不采取折中态度的理论问题，他只好由雪峰代表党提的意见负责，留待在实践工作过程中去解决。

二、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经过茅盾在内的几个人商议才决定的。这是雪峰在这个拟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这个事实。先前，茅盾表示过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拥护，这时候不能不知道那个口号是不能服人的，雪峰又是以党和他自己的名义要求他，当然乐于借此转弯，同意了。前几年，陈荒煤同志在讲话里说，关于两个口号的情况，茅盾三次写的都不一样。因为有的不是事实，在记忆里不能固定，当然不会一样了。雪峰这样迁就茅盾，因为他觉得依靠原则解决问题是远水不救近火，只好靠人事关系来减轻“国防文学”派的攻势。

三、把国防文学派的理论总结成“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的公式，这是符合他们的实际的。但质问《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是国防文学还是汉奸文学，这是雪峰的一个牵强的提法。《红楼梦》是两百多年以前的作品，不能作为例子；《阿Q正传》是五四时期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穷苦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反映了那个国家机器对劳苦人民的残酷迫害，当然无法算是防卫那个国家机器的“国防文学”。至于《子夜》，那是当时的作品，算得是一个作为反问的合用的例子。所以，提《红楼梦》、《阿Q正传》，只能是为了陪《子夜》，为了取得茅盾的好感，为了换得茅盾承认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决定。这是脱离原则，专从调整人事关系着眼的。鲁迅也只好当作抵制对方错误的一个例证，让它留着了。

四、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他提的。这也是接受了雪峰的要求，想借鲁迅的威信，停止、至少是缓和国防文学派无原则的攻击。至于鲁迅说那篇文章是他请我写的，这是事实。是鲁迅和雪峰要我写的。

至于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鲁迅这样说了就推卸自己的责任，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而赞成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责任。但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口号是我自己独立提出的；虽然我一直相信它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学本身上都是没有错误的。我只是依照雪峰的意思和他转达的鲁迅的意思写了文章，只是由文章本身说话，事先事后没有向谁说过口号的经过情况。文章发表以后，被认为是我提的，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到了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我就更不能表示什么了。

但从我看来，并不是没有不认真阐明就无法放心的原则性的观点。

国防，当然是防卫国家的意思。国家是统治机器。当时是怎样性质的国家呢？它是屈服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广大人民的机器。它的主机是军队，所以有一个国防部。这个主机还是掌握在亲日派手里的。现在的抗日运动，抗日战争，是要这个国家机器在原则立场上根本改变过来：从对日屈服改变为对日抗战。在这一点上的意义，只能是改变这个国家机器的性质。全面否定这个国家机器，那是过去的政治路线，只能放弃，但也决不能把抗日民族统战政策限定为防卫这个国家机器。这个政策是要迫使这个国家机器参加以至全力进行抗日战争，但它是在这个国家机器的根本性质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进行的，它一开始就要求这个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减弱，以至被克服。统战政策一开始就是在一面合作一面斗争中求得发展，以这为根本任务的。它决不能以防卫这个国家机器为前提。所以，国防，从人民方面说，是一个阶级投降主义的概念，而阶级投降主义非走到民族投降主义不止。党中央一开始就要求国民党适应战争需要改变它的政策，改造它的机构。整个抗战过程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的。

那么，在思想意义上不能不是以防卫这个国家机器为任务的国防文学口号，它只能是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理论上的“国防是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创作的最中心之主题”，它只能是在文学领域上完全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实践上的被称赞为国防文学的代表杰作《赛金花》，那直接地就是民族投降主义。向破坏大清帝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卖身投靠，做他的帮凶的赛金花，能够成为防卫当时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国防“模范”吗？理论家说，《赛金花》是有“缺点”的，但同一作者还写出了成功的作品；有不好的作品，也有好的作品，这种情况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把那样向敌人卖身做帮凶的妓女

奉为国防英雄，那也只是“缺点”，可以“毫不奇怪”么？

还有一种理论，说“国防”的“国”是指国土。但这也不能解释“国防文学”口号是正确的。东北三省那大的国土，已挂上了“满洲国”的招牌，实际上成为日本帝国一部分了；内蒙那大的国土，已挂上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实际上也成为日本帝国一部分了；华北五省那大的国土，已成为华北什么委员会，实际上也已被日本侵略者所统治；华中的上海，有日本侵略者自立的特区，有驻军，九江和汉口有日本人的租界。这些都是国中之国。长江和整个海岸线上，日本的军舰横行无阻。这是一个“防”的问题么？整个历史情况早已不是防止日本侵略者进来，早已不是什么“防”的问题，而是要把他们从我们国土赶出去，是“抗”的问题。

已经出现的实际斗争怎样呢？红军早已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袭击，掀起了“北上抗日”的大旗，到达了陕北，正在争取开赴日寇占领区，直接作战。在被日本侵略者直接统治的东北，已经发生了劳苦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游击战，正在向东北抗日联军发展。这些都是“抗”，“国防”这个概念不但容纳不下，而且是矛盾的。其中，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在《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里面得到了一定的真实反映，对推进抗日运动抗日战争起了巨大的影响。它们的内容是历史运动的现实生活，经过作者们的现实主义的真诚的努力，现实生活里受压迫受苦难但却坚贞不屈的人们被创造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以他们的真实的爱恨悲欢，以他们和民族共存亡的情操感动了读者，发生了推进抗日运动的精神力量。

但有的论者不但把这样的作品当作不存在，而且还进一步采取了否定的敌视态度。张春桥站出来执行“自我批判”了，指

斥作者不该过早地从东北回来写出这样“在内容上形式上有许多问题”的作品。也就是，宁可不要这样的作品。宗派主义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不但令人“奇怪”，而且是令人震惊的。

国防文学派把“国防”的希望完全放在现存政府统帅的力量和行动上面，不认为没有卑微的劳苦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战争作前驱，就不可能使现存政府接受抗日的主张，不认为只有这样卑微的劳动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壮大，才能取得终极的胜利。站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不但不能从文学上的反现实主义脱出，而且非进一步陷入反现实主义不止。把做敌人帮凶的汉奸妓女颂为“国防”模范，这样的作品不是反现实主义的，还有什么反现实主义的？对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劳苦人民抗日的英勇斗争和战争的作品，认为不应该存在，这不是反现实主义的理论，还有什么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呢？

还有一种论点：党中央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所以“国防文学”口号是合理的。“国防政府”是一种政治机构的主张，而且是并未实现的主张，直到抗战结束止都没有实现。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肯定并歌颂现实生活中新生的前进的力量（人物），把他们提到能有的高度，以此教育读者，推动历史前进。怎么能是反映一种政治机构，而且是并未实现的政治机构呢？这种反现实主义的理论非使文学完全解除武装不止。

当时我也约摸知道，这个口号是从苏联红军中文学组织的口号取来的。1978年第三期《文学评论》上说它是苏联“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的口号。我不懂原文，但用“国防文学”译“全民抵抗文学”也许可以通。因为，它所防卫的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但就是这样，这个口号在苏联也不见得是必要的或妥当的。因为，它

会把军队生活和整个苏联人民的生活割开，把军队的文学创作对象和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对象割开，那是很容易滑到非现实主义的倾向里面去的。好像那以后，苏联并没有提到这个口号和关于它的实践情况。至于把这个口号移到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来，那正是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的一种火红的思想癖性。

“国防是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创作的最中心之主题”；一切作家要“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描写这个主题。这“现实主义的方法”只能是反现实主义的方法；因为，这个“最中心之主题”就规定了它只能如此，除非能够证明写《赛金花》的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在发表了鲁迅（驳斥张春桥）的《三月的租界》的《夜莺》同一期，还发表了鲁迅的《写于深夜里》。那里面痛烈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怎样压迫进步的文化活动，怎样虐杀革命者和善良无辜的劳苦人民。如果看了《三月的租界》里所揭露的张春桥敌视人民抗日的作品并不觉得是性质严重的立场问题，那么，看了这一篇，应该不能不想一想，“国防”的国家机器是怎样的性质，抗日运动抗日战争是为了防卫这个国家机器呢还是为了和这个国家机器处在严重的矛盾关系里面的民族解放呢？如果是为了后者，那么，对防卫这个国家机器的“国防文学”口号，这个关系整个文艺战线的思想动向，尤其是非从发展观点看不可的思想动向问题，非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不可。更何况，这个措施还是由党中央派来领导工作的负责人提出的。

徐懋庸责问我在文章里为什么不提到“国防文学”口号。现在茅盾在《回忆》里也同样这样问。我怎样提到它呢？它提出的时候，我就思想不通。党的负责人向我指明了它不妥当，才要再提一个。我能够说出拥护它的理由么？或者，我能够说出

批判它的意思么？不提到它，留待在实践中去求得解决，或者不解决（不用权力地位作出硬性结论），为了尊重口号制定者的权威地位，这是在思想问题上可采取的唯一办法。现在看茅盾回忆中引用的，冯雪峰一再说批评了我，这也不是事实。如果批评我，他非同时批评他自己不可。因为，口号是他要提的（具体文字还是采用了他的），文章是他一字未改地同意了。他对我说的唯一的话是，沉默有时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调理处置。我唯一能做的，是服从，不说话。

口号问题之后，是组织问题。

时间记不确切了，王尧山告诉我，有一位党的负责人想和鲁迅见面谈一次话。我不好问是怎样的负责人，要谈什么，只简单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鲁迅。鲁迅同意了。照约定的晚上，我引鲁迅摸黑上到王尧山夫妇住的三层楼小阁楼，那位负责人已经来了。谈话的内容只记得一点。那位负责人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鲁迅不假思索地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那位负责人当即放低了声音，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鲁迅独立的创作和思想斗争是原始武器，如果把他的工作归纳到组织领导和组织运用里面，那就成为现代武器了。鲁迅的意思是，如果这个组织（现代武器）是掌握在宗派主义者或阶级投降主义者手里，那他是无法不坚持独立作战的；虽是原始武器，但到底还是在作战而不是投降。那位负责人当是马上省悟到了：他不能用党的名义保证当时的文委是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解放初，王尧山夫人赵先告诉我，那位同志也回到了上海，在某单位负责工作，名邓洁。当时我没有想到，应该见他谈一谈，问实一下那时的实际情况。

左联溃散了，没有日期，也没有向盟员和群众宣布原因。据茅盾回忆，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了。这就是用适合当前战斗要求的现代武器（文协）代替不适合战斗要求的现代武器（左联）了。

一、到会七、八十人，他“大致估量了一下，多数是中年持重者，少壮派不多，也就放下了一颗心”。那大的中国，文艺家只有七、八十人（他没有说是代表），而且以“少壮派不多”为幸。这是不是符合广泛地组织一切文艺家来共同抗日的统战政策呢？

二、有会章，照章选出了九位理事。四位是《文学》的主编和全力支持者茅盾自己，还有两位是原文学研究会的。鲁迅说组织这个会是为了救《文学》，终于证明了。另两位是《光明》的主编，还有徐懋庸是文委的。全是国防文学派。茅盾是常务理事会的召集人，即领导人，下设五个部，但并未组织起来。徐懋庸负责的《文学界》算是会刊，但连他这位常务理事会召集人也不能顾问。这算得符合了他自己引用的成语“关起门来做皇帝”了。

三、茅盾起草的六、七百字的宣言中提出了“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把“国防文学”口号写进宣言里的主张通不过，那么，“国防文学是作家间关系的标志”的意义都被否定了。“也有人在发言中提到胡风以及他提出的新口号，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反响”。可见这七、八十个文艺家也大多数不赞成在思想问题上采用权力做出硬性决定的办法了。

四、这个“中国文艺家协会”其实是上海一部分文艺家协会。它成立以后，并没有在上海再征求人入会，当然更不会要“少壮派”入会。鲁迅指出它是作家阀式的组织，他能否认么？它不向各大城市的文艺家发出邀请入会的通知，或派人去发动协助组织分会，连有近百数文艺家和左联分盟的北平都不要。协

会一成立，就算完成了任务。连花了那么大的力组成了它，又当上了领导人的茅盾自己，也说不出还做过什么工作。“关起门来做皇帝”，也只是开成立会的半天以内的事而已。这是清算了左联宗派主义的全国性的广泛的统战组织。说它是“吓成的战线”也不对，因为它根本没有形成线，一成立就消失了。

五、由没有参加这个会的鲁迅为首发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是赞成联合抗日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有些作家也签了名，连茅盾自己在内，表示他们也允许别人抗日。他们自己由此取得了双重的抗日资格，是站在没有抗日资格的，例如“少壮派”之上的。

茅盾还说，“胡风他们还准备另外成立一个团体”。这也是没有的事。胡风没有任何条件做这样的事，也决不会蠢到起意要做这样的事。看下去，原来还是冯雪峰告诉他的；冯雪峰的意思是，两个团体可以并存，两边的会员可以互相加入。原来又是冯雪峰自己有这个主张，而且又是由茅盾宣布的。

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了，“少壮派”大多数被关在门外，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再也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休息到十月十四日，四个月之久都平静无事，可见这个统一战线完全“巩固”了。于是，这个协会的常务理事召集人茅盾就带着几箱子书回到安静的家乡去，着手长期写辛亥革命的长篇小说，连书名都有了，叫做《先驱者》。这都是茅盾自己回忆出来的事实。到这里，连为什么要组成文艺领域统一战线，组成了要干什么的问题都完全消失了。这个现代武器掌握者（领导人）丢开这个武器不管了。

终于临到了鲁迅逝世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1936年10月19日）。在全国文化领域和先进群众中间引起了震动，产生了群情

悲愤的伟大影响。我在《鲁迅先生》^①中最后记下了这一重大事故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所引起的悲恸。在《关于鲁迅的丧事情况》（西北大学鲁研室1981年《鲁迅研究年刊》）中，虽然粗略地记下了些我办理丧事的经过，但当时我在重病中，是M代记的，很不充分，我当重新写过。

鲁迅的逝世在实际工作中也引起了一个大变动。日本改造社把出版鲁迅杂文选集的计划改为出版《大鲁迅全集》了。请几个人出面当顾问，其中有内山完造、伊藤春夫、许广平和我。我代鹿地选的杂文扩大了许多篇幅，好像把《野草》也包括在内了。从那时到七七事变发生的大半年时间，几乎全用在替他解释并口译的工作上面，还替每一本杂文写了简要的解题。在七七事变时我回乡的十来天中，他把我还没有写的最后一个解题请夏衍写了。在这个工作中，我是完全白尽义务，没有收一文编译费。

鲁迅的逝世在日本更加大了他的影响，吸引了先进文艺评论家矢崎弹1937年到中国来访问。我应约会见了。他独力办了一个杂志《星座》，我应邀为他写了一篇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逮捕了他。他的被捕，他在上海和我见过面是原因之一。我在《七月》上发表了《忆矢崎弹》，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

我在东京时见过普罗评论家龟井胜一郎。龟井原为日共中央联络员，即在中委间传达中央指示，送交文件。被捕释出后，在普罗作家同盟任教育部长，从事理论批评工作，出版了论文集《转形期的文学》。后来，他读了增田涉译的《鲁迅选集》，在《作品》上写了《鲁迅短想》。只记得一点：他称《故乡》是东洋所产生

① 见《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一期。——编者

的最美的抒情诗。不能不说是独具只眼。鲁迅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的有些主张，是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在我们里面却似乎无人注意……”，可见他一定还提出了别的重要看法。

1936年底，冯雪峰要我搬到他租住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颖村一栋三层楼。我一家住三楼，周建人一家住二楼，他夫人何爱玉和孩子住楼下，他自己另在白俄公寓里租一间房子单住；后来也引我去过。

鲁迅逝世后，他更深感到鲁迅精神影响的伟大，非尽力接受这个传统，团结鲁迅直接影响下的力量，进行工作不可。他自己单独住开，除为了行动上的安全着想以外，还想便于读书和写文章。读鲁迅读过的书，写鲁迅式的散文诗；他认为鲁迅的散文诗是鲁迅创作中的最高成就。要我住在那里是为了便于联系。每写成一首，就打电话约我到小馆子去，给我看，要我提意见。有几次，还约了胡愈之在一起。

还要我在他的安排下编一个刊物。这是因鲁迅留有两篇遗作引起的。他要我用这个刊物和鲁迅的老朋友以及他晚年接近的新作者联系，取得他们的合作，在思想上和创作上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精神。

登记出杂志一定得不到批准，只好用出丛刊的方式，取名《工作与学习》丛刊。他交给有党的关系的生活书店出版，但不取得茅盾的支持就做不到，因而非请茅盾为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之一不可。

当时我的理解是，鲁迅精神是全民族全体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继承并发扬鲁迅精神只能把希望放在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上面，也就是，把希望放在和劳动人民的斗争结合着的，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真实和斗争意志的作者，尤其是成长中的青

年作者身上。现在把目光放在鲁迅的少数老朋友身上，这是不能适应历史实际发展动向的。

其次，为了刊物能够出版，不能不取得茅盾的合作，而茅盾的自然主义倾向和鲁迅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的斗争道路并不是同一性质的。鲁迅逝世前一两年间，他那种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的言行，以致产生了他对鲁迅的对立感情。现在要邀请茅盾来同做保卫并发扬鲁迅精神的工作，不能不是一个我的能力无法克服的矛盾。

我把我的所感向雪峰表示过，但他不置可否。他是党的负责人，我不能不服从。

他要我和生活书店主持人徐伯昕直接接头出版这个刊物。

第一本《二三事》，三月出版。是用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取名的。这大概是适应了读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鲁迅的深挚怀念，尤其因为有鲁迅自己的遗作。

第二本《原野》，四月出版。是用艾青译的凡尔哈仑自由诗的一首命名的。

第三本《收获》，五月出版。是用力群的一幅木刻命名的。

第四本《黎明》，六月出版。是用艾青诗里的一首命名的。

关于内容。现在只能看到上海影印的目录，除鲁迅的两篇遗作外，无从具体检查。人民生活中的抗日要求和抗日斗争，当然是有反映的，但数量大约没有占多数。我的看法是，如果在这样的主题下所写的生活内容和作者的感情是虚伪的，那对读者反而要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只好就收到的稿子中发表一些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和杂感评论，希望能够由此诱发出抗日斗争内容的作品来。关于鲁迅研究，只有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景宋的《母亲》和武定河（冯雪峰）的《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苦力的《鲁迅的美术活动》。这些，只是初步的看法，片断的

经历，有的还有明显的不足，如《鲁迅的美术活动》。但也只好希望能由这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作者。有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李霁野等，这都是雪峰约来的。茅盾是积极写稿的。第一本写了小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和两篇杂文，第二本写了一篇书评，第三本写了一篇杂文和一篇书评，第四本写了两篇杂文。从数量上说，他是最多的。如果是像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关于我的情况和他对我的态度是真的，他能够这样积极支持我编的刊物吗？

其次是艾青。上年底，茅盾约我为他支持的《文学》新诗专号写一篇新诗人总论。就是对两三年来已经有了文坛地位的诗人每人给一个概括的评价。我觉得这样对作者不好，对读者更没有什么用处，但又不好拒绝他，于是写了《吹芦笛的诗人》。用写给他个人的信的形式，就是为了说明，我的投稿不是为了支持《文学》而是回答他的好意。那是介绍艾青的诗集《大堰河》。艾青是一个初见的名字，又是这样一个毫无诗意的书名。现在据李又然的回忆，是自费印的，寄售的书店没有卖出一本。但我读了受到吸引，有所感动，认为感情内容和表现风格都为新诗的传统争得了开展，诗人的健旺的心将为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我这一点评介大概促使读者接受了艾青，我自己和他也就认识了，在友好的接触中更认识了诗人的气质。我编这个丛刊的时候，尽可能地鼓励他。给他发表了一组译诗，两组创作。创作里面，我记得有一首《龙华的桃花开了》，那是深情地悼念在龙华牺牲了的烈士的。

我发表了端木蕻良的一篇小说一篇散文。即使内容不都是抗日斗争，但也可能是没有离开东北人民的生活和愿望的。这说明了，抗日作品的产生并不容易，不能用命令的威吓的态度，只能用诱发的鼓励的态度。我评介了这个作者的《鹭鹭湖的忧

郁》，现在又发表了这一篇，就是希望能起一点诱发和鼓励的作用。这个作者曾把他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寄给了鲁迅，鲁迅交给我看。鲁迅逝世后，他给我信打听下落，我忍住悲哀的重压替他看了，提了意见，并且见面认识了。

发表了贾植芳的小说《人的悲哀》和曹白的散文《殇音》，当是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困苦和求生渴望。都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但他们当时业余写的作品，到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能对读者有益。

有两篇文章应该说明一下。

冬青的《关于思想方法论》。这是还在中学读书的青年，这篇文章批评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某几点。我认为他的理解力是敏锐的，至少是值得参考的，就高兴地发表了，并在后记里说明，这是一个中学生，中学生里面能够出现这样思想敏锐的作者，说明我们的思想工作一定能够得到伟大的发展，艾思奇本人也一定会感到高兴。

还有我的《思想活动的民主性问题》。当时，有大学教授提出了思想活动或思想运动中的危机，那含义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运动麻醉了青年，使青年在思想活动上失去了创造性，陷于僵化。但他们完全不提国民党政府用“国家”的命令进行思想统制，那非使思想活动陷入窒息不止。他们没有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连提一提这个政策的口头让步都不肯做的，反而是利用统战政策所造成的气氛对唯物主义思想运动、民主主义的思想活动发动了进一步攻击。唯物主义思想运动者自己早已指出了运动本身所包含的主观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不但不反对别人提出，甚至还欢迎别人一道进行清除工作。但是，要做这样的清除工作，唯一的道路是展开民主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活动。在这一点上，也非反对政府用“国家”的名义施行的文化

统制政策不可。我们欢迎教授们和我们一道要求政府放弃文化统制政策，反对使文化活动陷入危机的这个政策。这是决定一切的大前提，我们完全承认教授们提的“自由研究与自由讨论”这个要求，把这个要求作为衡量一切文化活动方式的对与错、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在为实现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过程中，进行文化领域上的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和发展。我只是从个人的愿望发出的感想，顶多只是表示对教授们的攻击不能默认而已。

作为领导人的冯雪峰，每期的稿子都得经他看过才发排。他没有提出过任何意见和批评。

第二本《原野》出版后，马上被禁止了。两三天后，发禁令的机关给书店来了公事，说看广告有《原野》出版，不知内容反动与否，着即缴呈若干本，云。我根据这样的怪事写了《反“沙漠化”的愿望》，指出这是极其恶劣的文化统制政策的例证，希望文化界对于这种反动政策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到第四本排成后，书店通知我，前三本都被禁止，这一本不能付印，只好拆版。也就是，这个丛刊的生命终止了。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4年，看到影印目录，才知道这第四本还是出了，形式不变。原来书名《街景》，是用了美共刊物《新群众》上一幅石版画的题名。现在用《黎明》代替了它，石版画也被取掉了。因此，当时我和丛刊有关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本也出版了。

刊物停出后(六月)，冯雪峰通知我，原住的房子要退掉。还是用周建人的名义租下了法租界雷米路(抗战后改为永康路)平民住宅文安坊六号，仍由我们三家住。但他们两家并没有去，只我家搬去了。楼下由雪峰一个姓孟的同乡住进了，二楼三楼由我支配，房钱由我们住的人分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形势

紧张，M就把住在租界外南市的她母亲和妹妹搬来合住了。

当年春天，我大哥张名山把他的儿子张恩送到了上海。张恩中学还没有毕业，只好先送他上一个私立中学，打算住满得到毕业证后再去进医专。

这时候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急于想见一面。离家十年多了，因为担心国民党和土豪报复惹麻烦，一直没有回去过。在上海几年，尤其是近两年，弄得疲劳不堪，就决定回乡一次，松弛一下。到买好船票后，七七事变发生了。预感到大的变化就要到来，想先把M和儿子晓谷送到乡下住些时再看。

在船上，为罗烽从日译转译出了苏联评论家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文。到家后，先邮寄给他了，成为他编的小丛书的一本，后来印出来了。

担心通过县城会被人认出，由张名山驾一只小船到县城河边等着，下江轮后就坐小船回家了。

到家后，父亲的病并不怎样重，我只对接触到的乡邻说了说日本侵略的形势。中间还到所谓谱堂去了一次，了解了一点“修家谱”这种封建制度的情况，还和M去看了看劳苦一辈子的母亲的坟。大约住了七、八天，就把M母子留在乡下，单身赶回了上海。

上海沉浸在抗战热潮中，我所接触到的人都是兴奋的。文化文艺界当然有组织活动，但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有关的人们，除了党员外，好像都没有被吸收参加。我自己，在兴奋中写起诗来了。只记得，张仲实在编一个文化组织的刊物，来信向我要稿，我寄给了他一首。

8月12日夜，我去看正在演出的话剧《原野》。人心被战争所吸引，几乎没有买票的观众。到了十多个文艺界的人，我只记得有

欧阳予倩。戏还是照演。换幕中间，化着装的演员走到看客友人里面来闲谈。欧阳予倩告诉大家，他来之前还去看了上海市长，记不得市长是怎样答复他的了。散戏后，有谁同我一道到靠近闸北的某条街上看了看情况，只见一片寂静，好像居民都避走了似的。

8月13日下午，大炮响了起来，感到十分兴奋。夜，周建人来看我，闲谈了好一会。谈话的中心是，上海会不会真正打下去。都认为，打响了，决不会中止。

当晚，听着炮声，我拿出本子来开始记第一天的日记。在地下、半地下生活中，当然不能记日记。现在，大炮响了，中国人民一定要在战争中昂起头来，国民党再也不敢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残害人民了。不妨记点日记好查考。后来，到离开上海租界投入工作中，马上感到了，不得不用隐语记下以至省掉和党领导以及著名领导人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48年冬我离开上海进解放区为止。

14日，到外滩看空战，人群流动，在飞机声和炸弹声中毫无慌乱表现。我离开英租界大马路口不几分钟，那里落下了一枚炸弹。到大世界前十来分钟，那里也落下了一枚炸弹，马路当中炸出了一个坑。一定死伤不少。

那以后，虽然还隐隐怀有会不会真正全面打起来的疑虑，但却是沉浸在兴奋和激动里面。在家里坐不住，每天，到朋友处交换快乐的心情和看法。夜里，站在晒台上以至爬到屋顶上看空战。

文学刊物都停了。茅盾代表《文学》邀《中流》、《作家》、《译文》(?)等四个刊物，自己筹钱合办一个小周刊，取名为《呐喊》。把五四时代鲁迅的书名作为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中的刊名，但到底和时代的感情不大相应，到了第三期，改名《烽火》了。后

三个刊物和《文学》原来是各行其是的，现在都由茅盾统一起来了，甚至还要去了我的一首诗。

大家激动着，时间空空地度过了。这时候，听到有人发起了“投笔从戎”运动，某某作家签了名的消息。但这个活动并没有扩大到我和与我接近的这些人里面来。因而想到，应该把大家的激动感情转移到实际工作里面，写些东西。《呐喊》篇幅太小，而且，无论在人事关系上或它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宣传作风上，这些人也都是不愿为它提起笔的。我也打算自费弄个小刊物，接近的人都表示高兴。鲁迅曾帮助北新书局的店员费慎祥办了个联华书店，这时候他也无事可做，愿意负责印刷和发行。于是，确定了《七月》这个小周刊的出版。刊名是复印了鲁迅的笔迹的，唯一的表示纪念的意思。

共出了三期：第一期(9月11日)；第二期(9月18日)；第三期(9月25日)。

内容完全集中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一点上。当然，希望是和群众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斗争和战争的反映，如曹白、柏山、萧军、萧红、胡兰畦等的散文。希望是从这个斗争，这个战争触发起来的感情表现，如艾青和我的诗，如李桦、力群等人的木刻。至于和这个斗争，这个战争相关的具体人物，只要最后是站在抗日战线内，尤其是为抗日而牺牲的，不管他从前的经历如何，都不惜暂时给以肯定，如萧军和端木蕻良所记的两个人，我毫无所知，只好由作者们负责了。我们的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是互相联系的，如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欢呼，关于国际作家大会的报导，就是这个历史大潮的反映。至于抗议日本政府迫害致力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进步作家，那意义就更直接了。

由于内容基本上是反映了实际生活和斗争，而不是捏造的

胜利故事，这个小周刊得到了饥渴中的读者的欢迎。

人的流动加快了。有的流亡到上海来，如彭柏山，从苏州监狱放出，到了上海。但这是个别情况。绝大多数是从上海流出去。特殊的例子是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他们正要回日本去，战争爆发后就从日本人区逃到了法租界来，暂住在萧军他们那里，要我去见了一面。后来又住到许广平家三楼，又要我去见了面。再后来，萧军来约我去外国人公寓里和他们见了一面。他们说经济困难，我给了他们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后来大概是许广平替他们找到了党的关系，由上海避到香港去了。

商业联系和邮路受到阻碍，上海刊物很难发到外地去，作者又纷纷离开上海。我决定把《七月》移到武汉去出版。友人们觉得在上海停掉很可惜，希望在上海也同时出下去。但人力财力都照顾不过来，只好停掉了。同时函托老朋友熊子民在武汉办理登记手续。他是大革命后避到上海时认识的，这时在武汉以同情者身份帮助八路军工作。

端木蕻良临时没有住处，让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和我同时离开了上海。

九月底，带着因战事不能在上海考学校的侄儿张恩离开了上海。这时，由黄浦江口转长江口是战区，只好坐火车去南京，从南京坐船去武汉。在南京下关等船的时候，敌机每天来轰炸。张恩在圻春下船回家，我直接去了武汉。

三 在 武 汉

上 篇

从南京到武汉的船上，载有五、六十名伤兵，是自己能够走动的轻伤。旅客中有人发起募捐慰劳他们。除分送他们每人三元外，还有一点多的，就交给了厨房改善他们的伙食。

在船上三楼开了一个简单的慰劳会。上海戏剧界组织的一个话剧团，也在这条船上，他们是要到遥远的成都去做演剧宣传工作的，其中有陈白尘和白杨，我只认识陈白尘。他们一部分人参加了慰劳会，白杨还讲了话。有一位伤兵讲了话，是北方人，态度豪爽，使这个小小的慰劳会表现了抗敌的情绪和气氛。

10月1日(1937年)，船到汉口，熊子民来接到了他家中(汉口汉润里)。他正为八路军设立办事处做工作，通过他，就等于和党取得了直接联系。当时，党中央还只有董老(必武)在武汉，领导工作。几天后，熊子民请董老吃饭，见到了。我向董老报告了在上海和冯雪峰的组织联系、工作情况以及现在的工作打算。董老勉励我，说，现在好了，随时都在直接联系中，只要注意和总的统战任务灵活结合起来，就好了。不久，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到武汉了。由博古组织了一个调整文艺领域工作的小组。博古以外，有何伟、冯乃超和我。这个四人小组，每周开会一次，报告文艺界的情况，交换工作意见。何伟同志还

参加文艺以外的文化界的组织联系工作。这个小组一直继续到抗敌文协成立。

周恩来副主席到武汉来了。有一个个别的恳切的谈话。关于近几年上海文艺领域的情况，他作了扼要的分析。要点之一是，关于统战局势，是要争取大发展的，但如果做得不好，也可能出现某种停滞甚至倒退。原则是，一要工作面广阔，二要坚持原则立场。没有前者，就会陷于宗派关门主义，脱离广大人民的要求；没有后者，就会陷于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两者都会招致抗战的失败，即革命的失败。那以来，凡有他或其他领导人和文化界的集会或谈话，都是约我参加了的。不久，进延安去了的左联盟员吴奚如回到了武汉。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也用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对外发生工作联系。他热心于《七月》的工作，通过他，我和党的联系更密切了。

到汉口的两三天后，老朋友金宗武到熊家来见了面。他是1927年在武汉认识的。曾到日本留学过，思想左倾，现在在湖北省通志馆工作。馆长李书城是老共产党员李汉俊的哥哥，思想左倾。李汉俊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后，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态度更坚决了。后来，他做过湖北省建设厅长，现在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都是国民党安抚他的。冯乃超离开上海到湖北，隐蔽在他建设厅里，和他的女儿李声韵结了婚。金宗武和他是连襟（他夫人薛文淑和金宗武夫人金文仙是姐妹），在他下面任职多年。金宗武和蔡某合住在一座二层小洋房里（在武昌小朝街），房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园，花园外面就是紫阳湖，开向湖的门两边各有一间小房。见面后，他看到熊子民家没有余房，我暂住在前后厢房之间的过道里，就恳切地邀我住到他家花园左边的小房里去。这样，我就解决了在武汉大约一年间的食住问题。

随 感

十载飘零日，归来似梦回。
大空飞敌鸟，宽路走穷黎；
故支灾余蚁，新人雨后薈。
行囊姑卸下，濯足浣征衣。

到武汉以后，有两种和在上海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是，不断地遇到敌机的空袭，有时一天来两三次。这是离开上海过南京时就遇到了的。在武昌并没有防空壕，汉口熊家楼下用粗木料架成一个洞。敌机来了，在武昌时几乎都是站在花园里兴奋地观空战。有一次，白天来了三十六架敌机，被我机几乎全部打中。望着空中燃烧着的敌机，更是兴奋得不感到任何危险了。这种情况，继续到离开武汉为止。到重庆后，敌机还是来袭，只是次数少了，每次来袭的规模大多了。总之，整个抗战期间，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在空袭的间隙中进行的。在武昌的住房旁边，落了炸弹，把围墙都炸倒了。在重庆乡下住房旁边，也落了炸弹，弹片穿过窗门钻进了房里。

其次是，不得不和国民党人以及遇到的各方面的人见面接触。为了争取合法地位，为了扩大统战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到武汉后几天，国民党省市党部开了一个招待来汉文化人的会，到会者百人以上。主人姓名，当时就没有听清。客人中只记得熟的名字金山和王莹。主人致辞中，一次提到了“蒋委员长”，旁边有一个穿军便服的人马上跳了起来笔直地立正，但看到没有别人照做，只好狼狈地坐下了。原来，国民党规定有这样一个礼节。没有把他们这个“家规”推广到要客人照做，可见他们的蠢还是有限度的。整个招待会，只有这点礼节留在记忆里并没有退去。客人中被提名请讲话的有王莹。我也被提了名，只

好随口讲了十来分钟。只记得一点具体意思：抗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武汉人民所负的责任很重，希望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建设成一个新武汉。第二天见到报上简讯后，熊子民忍着讥讽的微笑提到了这一点。意思是，国民党现在只想保存现状，最忌讳别人提到改革；我这样讲是不懂做统战工作技术的书生之见。我只好苦笑。

国民党招待“文化人”只是为了在报上发个消息，向他们的上级报个帐，没有意思也决无能力做什么“抗敌文化”工作。会开过了，再也不来提了。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做的抗战文化工作不进行压迫和妨害。董老的朋友，老共产党员潘怡如先生担心回武汉工作的左翼文化人的处境。他和湖北省主席何雪竹有亲戚关系，特别约我们去和何雪竹见一次面。我记得，其中有马哲民（研究政治经济的，也和熊子民熟识）。见面时，何雪竹侃侃而谈，痛骂平汉路上的军人和湖北的政客。从他的口中知道，北方很危险，湖北的民众运动非赶快提起不可；现在的兵力很成问题，湖南云南不肯出兵，湖北的兵出光了；他不赞成征兵，现在的征兵只是压迫老百姓，而征来的兵又不能用……。总之，他说的情况比我们看到的知道的还要严重得多，这就使得想提改革意见的马哲民开口不得了。他何以那样直爽呢？这正是国民党的老官僚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官僚的本事。他不这样直爽地提出来，不是要听这些访问者的控诉么？他自己首先这样说了，反而显得他是“高明”的执政者，至于后事怎么办，那就不管了，他的目的只是使这些客人无法开口地离开他。我从他的谈话得到的看法是，国民党并不是不知道他的统治情况的腐败，但知道是一回事，应该怎样办又是一回事。对敌投降的危险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文艺工作绝不能以爱国主义的空洞叫喊为满

足，应该正视现实，相信人民群众，反映出现实生活的真实来，以此教育人民，团结人民，使人民大众中的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充实统一战线向前发展。我们应该珍惜国民党内任何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但绝不可以依靠国民党，主要的是要依靠人民，依靠人民大众中进步的力量，新生的力量。

1938年秋，日军逼近武汉时，潘怡如先生没有向西边的后方撤退，而是回到他的故乡（黄安？），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去了。

到武汉后，除积极筹备《七月》出版外，同时还有一个急迫的工作，就是筹备举行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并在《七月》上出一个特辑。在抗战终于实现了的高潮中纪念先生，那应该阐发的意义是说不完的。但大家都处在激动的状态中，只能写一点从自己点滴理解出发的短文。共得六篇。其中，柏山从上海寄来的一篇，题目用了蔡特金哀悼列宁的话《活的依旧在斗争》，收到后在马路上走着拆看着，禁不住流了激动的眼泪。我写了《即使尸骨被炸成了灰烬》，担心炮火下的先生基地的安全，寄寓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和全中国人民的斗志。

另外，应《大公报》之约写了《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其中第一点说鲁迅的思想发展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是采用了过去的观点，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鲁迅在本世纪之初开始思想革命的道路时，就提出了建立“人国”的目标。但他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目标，是建立在空想主义上面的，他找不到实现的道路。他沉默了十年，终于出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对这个革命马上发出了由衷的欢呼，称之为“有主义的人民的胜利”，是“新世纪的曙光”。他后来还进一步解释，先前只是毫不可惜本阶级的毁灭，但后来由于十月革命这个“事实的教训”，他相信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不错，他是相信进化论的，但他的

进化论在社会观上是包含有阶级矛盾和新陈代谢的革命观点(突变)的。到了十月革命,他的阶级观点发展成了历史发展规律性的阶级斗争和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他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论后来明确地写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社会思想论文里面。所以,十月革命一出现,他就号召中国人民向这个“新世纪的曙光”抬起头来。其次,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并不抽象地宣传进化论或阶级论的思想概念,而是把这些思想精华溶化在他血液里面,用它们作武器,向旧社会作白刃战的,刀刀见血的斗争。当时我认为,这对抗战初期不正视现实的,在空洞的爱国主义叫喊里虚浮起来了的严重思想情况,是有深刻意义的。由这引出了他的“心”“力”深刻地溶合在一起的劳动态度或工作精神。他的对事物的感情态度里面无不贯串着锐敏的理性力量;而在他的看似冷酷的理智分析里面,又无不燃烧着爱憎的火焰。他的这种伟大的思想品德,对于抗战起来以后更加发展了的,专靠题材的斗争性的客观主义态度,是有极深刻的意义的;对那些不深刻地正视现实的,专作抽象的“战斗表态”,也是有极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他的全部战绩里,总是在“解放”这个目标旁边同时放着叫做“进步”的目标;在他,没有为“进步”的斗争,“解放”是一定要落空的。抗战起来后,就是从国民党人何雪竹的谈话看,这个战略原则已经呈现得非常明显,不正视它承认它,那是要使统一战线的任务落空的。

10月19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纪念会。当时,党中央还只有董老到武汉,他必须和各方面接触,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不可能有时间具体管这个工作。更重要的是,当时武汉情况相当复杂,我们没有条件控制局面,不应该要他在一般的群众聚会上露面。至于其他的社会上头面人物,我们也试探地接

治过。有的怕因此把自己弄“红”了，有的则对这个纪念的重要性没有重视，都采取了消极的以至回避的态度。所以，这个纪念会是群众自发性的，规模很小，大概有三四百人，都是自动聚合来的，时间是下午三时，地点是青年会前面的小广场。我被推为主席，致了词。讲话者有六、七人，只记得有邹获帆，他是师范学生，是自动参加，自动走上来讲话的。其他具体情况记不得了。不用说，纪念会的内容是远远不足以表现鲁迅的伟大精神和这个终于实现了的神圣的民族战争的深刻联系的。

在上海就写信给熊子民，让他试用《战火文艺》的名字在国民党市政府登记。但到武汉后，这个登记已被国民党市党部批驳了。现在，来武汉的文化人多了，政治空气有了变化，国民党本身也不得不适应时势表表态。我就正面用《七月》的名字再登记，发行人用熊子民的名字，一面筹备出版，不管它批准不批准。

这时候，我和《七月》有联系的友人们有些陆续到武汉来了。我把在上海出的小周刊上发表了的文章选出一些，再加上新写的，编成了第一期。除纪念特辑外，内容突出三个方面。一是战时生活的散文（如个人遭遇和群众生活）和报告（如事件记录和人物特写）。当时，战时生活还来不及被作家消化，概括成为小说、剧本中的典型形象；而急激变动中的现实生活事件和人物，又是各各具有某一思想意义的。应该提一提人物记，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抗敌教育的急迫性，只好把当前的抗敌言行这一点当作标准。也就是，不管他以前的言行如何，只要他现在参加抗敌活动，就予以肯定；把以前的言行放开，以后的有待事实证明。作为编者，是不可能确知作者所写的人物的实况的（如萧军和端木所写的），只好采取文责由作者自负的方

针。这个体裁(报告)，形成了《七月》的主要个性之一，特别是在前期。可惜的是，后来的评论工作没有跟上，没有要求作者对具体人物的情况不断注意，有变化时继续提出报告，给以必要的肯定或否定。

一是诗。从数量上看，诗占的篇幅并不大，但我尽可能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例如，列在第一篇。这是别的刊物很少这样做的。和反映客观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特性的“报告”相对，诗是抒发诗人自己对客观生活的感情反应的。即使诗人对客观事物在理性认识上还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但凭着他锐敏而诚挚的爱憎感情，诗人是能够通过自己的真情实感抒发出激动着的广大人民的精神动向的。这个劳动愿望后来通过时间取得了发展。

具体内容之一是，重登了对日本反战普罗作家矢崎弹的回忆和关于国际革命作家大会的报道。这是为了表现我们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的思想要求的。

在致致辞的《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提出了编辑愿望：

……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喊，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跃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的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热情里面跃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实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从实际战斗里长成的新的同道伙友。……我们愿意在工作中和读者一同得到成长。

这里提出的是起码的或首要的生活观点和实践观点，希望把工作进程放在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实际里面。这样，

才能够坚持并推进文艺上的现实主义道路，警戒着脱离人民生活实际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漂浮在生活表面而失去了思想斗争立场的客观主义。这样，作家在工作过程中才能在能有的条件下和人民和读者群众深相结合，接受人民的教育和监督，这才能在推动读者前进中自己得到改造和成长。

这个单纯的愿望，是建立在对读者群众的诚意，和一定能够得到读者群众的关心和支持的信心上面。这不过是一个发端，以后《七月》的发展，一直是以争取实现这个愿望为主导精神的。

第一期出版的上午，总代售生活书店两小时内被抢买去了四百多份。

原来，当发行人的熊子民担心会赔本，只肯印两千份，而且不肯留纸型。我只好瞒着他打了纸型。知道这个销数后，他跑到印刷厂去问，经理告诉他我打了纸型，他这才赶印了三千份。他热心起来，亲自和书店打交涉。不知道是否再印过。

虽然如此，单就在武汉的时期说，《七月》和书店的发行关系，遭到了不少困难，在合法性上，还受到了国民党几次的压迫和妨碍。

开了木刻展览会。

离上海之前，搜集了些木刻。为了在《七月》上选登，供读者欣赏，也算是介绍和提倡。起意在武汉展览一次，主要是江丰、力群等同志帮了忙。到武汉后，艾青等帮忙，继续搜集，超过了三百幅。

1938年1月初，着手筹备展览会。会场是请通志馆帮忙解决的。我审查了一次展品，作了画名编目，还写了《抗敌木刻展览会小解》，但不记得在报上登了启事没有。

布置会场(共布置上下两室),除金宗武请来的湖北通志馆的职员外,帮助照料的有江丰、艾青、田间、李又然、萧军、萧红、马达等。因会场限制,只展览了三天(1月8、9、10日),观众相当踊跃。没有卖票,没有签到,估计约有万把人。参观的人都十分高兴。这是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

党报《新华日报》在武汉筹备出版,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日报。我在报上编了四期《星期文艺》。

1937年12月初,华岗(西园)到武汉来了。他是我在南京东大附中时的共青团领导人。当时可能还是江苏团委书记。现在他从山东的国民党监狱出来,到武汉来接上了组织关系。党派他筹备《新华日报》出版,担任总编辑。报纸出一个副刊,取名《团结》,但星期天出文艺版一次,代替《团结》,取名《星期文艺》。《团结》由也是新出狱的楼适夷编;约我编《星期文艺》。报馆的希望是,《团结》发表一般文艺性的小作品,《星期文艺》则注重文艺评论,特别是批评文艺上的不良倾向。这个用意虽然好,但做起来有很大困难。抗战刚起,一般作者读者感情激动,很难深思熟虑地写文章,现在当务之急是引导他们用力多写点文章,由编辑慎重地选择发表,现在还很少经得起当作倾向评论的作品,性急地做反而不利于创作的发展。尤其是,在党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使作者产生顾忌,暂时间对团结的方针不利。再一个困难是,还很少人能写出这种不带副作用的评论来。《七月》是群众刊物,篇幅较大,都很难组织这样的稿子。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华岗和报馆,谈了几次,但报馆还不愿放弃这个工作。我只好接受编几期看。

从1938年1月中旬起,一共编了四期。果然,我找不到评

倾向的文章，我自己也不能轻率地写。只好把给《七月》的稿子中较短较有生活内容的转给它发表。记得的有曹白的散文和东平写的，讽刺他自己和他的好友辛人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短文。我认为，这种有生活实感的文章是可以促使读者对生活发生感应，进一步向生活深入，和抗战中的人民加强结合的。出了四期，报馆看到它的内容和《团结》并没有显著的性质上的区别，也就同意了我的意见，把它停止了，以加强《团结》的内容。

1938年10月底，茅盾从上海到武汉来了。一见面就宣称，他将编一个大杂志，这是在上海就谈好了的，云云。

见了几次，他对文艺运动提出了三点意见：

1. 过去的左翼作家现在散居各地，需要彼此联系，各地由一个专人负责。2. 需要一个共同纲领。3. 彼此交换稿件。

这几点意见，是完全脱离了当前的文艺发展实际的。左联解散时，他唯恐左翼作家放弃立场放弃得不彻底，终于由他一手组成了一个空名的“文艺家协会”，一成立就消失了。现在，正在酝酿组成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敌组织，他视而不见，反而想恢复由左翼成员组成的全国性的似组织又非组织的左翼作家网。由谁做中心呢？当然由他做中心。各地负责的专人由谁指定呢？当然由他指定。现在，原左翼作家散布在全国各地，各个和当地的党和群众发生某种联系，本人在发生变化，新人又在不断出现。他所设想的脱离当地实际，把文艺实践抽象出来，和一个全国性的左翼作家中心人物取联系的作家群是不可能存在的。提一个“共同纲领”，这又是回到提出口号的当时的思想情况了。抗战发生后几个月来，政治发展情况和文艺实践情况已经表明，作家和先进读者都要求在现实主义的精神上安排自己

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抗战文艺”这个通俗的口号，它包含了对各种倾向作家的思想要求，同时又给左翼作家提供了在实践上发挥领导作用的条件。是“抗”，不是“防”，这就在思想上争取到了主动。茅盾仅仅提出需要一个共同纲领，但他提不出具体概念来；他不能不知道，“国防文学”是被当前全民族的伟大斗争动向所否定了的。其实，前两点意见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的真正意思是第三点：彼此交换稿件。也就是，散布各地的老左翼作家都向他即将主编的大杂志投稿。

他说，他已把这三点意见向C.P.（他是喜欢这样称党的）提出了，C.P.表示了同意。我遇见吴奚如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吴奚如说，茅盾是要求和周副主席见面谈谈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但周副主席实在没有时间，就由吴奚如听他谈了谈。他提出了这几点大同小异的想法，吴奚如只是表示了尊重他的意见，不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确定态度。

他所设想的组织性地运用老左翼作家力量的计划虽然不能实现，但他出版杂志的愿望是实现了。他和生活书店订立了出版合同，也是半月刊，他取名《文艺前哨》。《前哨》是左联在五个作家牺牲后出版的秘密机关刊，它代表了左联的英勇的战斗精神。茅盾用它做刊名，寄寓了这个刊物要继承左联这个传统的意思。我想了想，向他建议，不如用《文艺阵地》。我说，由你打阵地战罢，《七月》只能打打游击战。我的想法是，他和有地位的作家的关系广，能够联系他们，鼓励他们写文章参加抗战，也从上层扩大统战力量（这点意思，后来在重庆，周副主席开文艺座谈会时，我还特地提到过）。他当即欣然同意了。提醒他重视有地位的老作家，这个意见他是愿意听的。

订了出版合同以后，他就到香港去了。他住在香港编稿子，编好了交给生活书店广州分店印刷出版。好像每期还得亲自

回广州校对一次。

但这样一来，尽可能地动员老作家参加抗战这个目的就不易达到了。住在香港，和他们不容易取得联系。再则，老作家们本来就不容易动，现在看到他住在安全的香港，就更不容易发生感应了。

记不得隔了好久，他又到遥远的新疆去了，在军阀盛世才办的新疆学院教书。把用力筹办起来的《文艺阵地》交给了别人去编，但他依然负着主编的名义。

到武汉以后，由于客观的情况，不可能不和对敌宣传工作发生一些直接间接的关系。

在上海认识的崔万秋，这时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对敌宣传科负责。他这个对敌宣传工作无法做，几次拉我去帮忙。我虽然有从职业取得生活补助费的必要，但一则时间不允许，再则，我也没有方法没有能力做这个宣传工作。只好拒绝了。

二月上旬，接到了鹿地亘从广州寄来的信和一点诗稿。原来，他从上海逃到香港后得到了什么关系的帮助，到了广州。他希望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上海，我曾帮助他译了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和鲁迅的杂文，以维持他们的生活。现在他的情形这样，我反复考虑了以后，还是决定了帮助他。中国抗日战争有知名的日本文人来参加，不管他能做多少工作，那对我们总是有利的。诗，不过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表态，但我还是发表了它。另外，写了短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他。介绍他，是为了使他能够参加抗战工作，所以不能不采取基本上肯定他的态度。但我指明了，他到中国来时就向鲁迅先生和我谈过，他在日本警察局里曾答应了放弃文化工作中的共产主义立场。其次，出狱后，为了生活，他被人雇佣，参加暴力团打了人，因

而，在政治道德上，他是犯有错误的。所以，我在他的名字上标明“日本革命作家”，仅仅是指他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个身份说的。我介绍了他，并尽量做到对中国读者负责。

我把他的情况向崔万秋说了，崔万秋答应马上向上面交涉把他弄到武汉来。但这时，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已经和他接上了关系，由政治部的关系把他们夫妇约到武汉来了。

来了以后，政治部给他们夫妇设计委员的名义，给他们一座小房子和两个警卫员。虽然有第三厅管他们的工作(冯乃超是对敌宣传科长)，但并没有给他们业务性的工作，只是要他们公开表态，向外国来宾和记者谈话，这就算是做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工作。我和他们并没有工作关系，但因为住得很近(1938年下半年，他还搬到我住的金宗武家楼上住过)，他的注意力又是放在文学上面，许多事(例如文章翻译和口头翻译，向《七月》投稿，要求参加《七月》座谈会等)还是非由我替他帮忙不可。

1938年7月初，日本人青山和夫到武汉来了，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同事李万居从越南(或香港)找来的。这时，李万居在王芃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搜集敌伪情报的机关)工作，由那个机关派去把这个日本人找来。我在东京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只知道“和夫”这个名字的发音)，问鹿地，他在东京也不知道这个人。到武汉，说是日本革命团体的代表，但他自己只承认是“日本无神论者同盟”(“日本普罗文化联盟”下面的反宗教组织)的盟员。他到鹿地这里来，我因而认识了他。难解的是，鹿地竟称他为列宁型的人物，好像他能够领导日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似的。鹿地还特地告诉我，青山希望能见一见周副主席，我当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了，并得到了同意。约定了时间(8月4

日)在我住的地方和他见面。奇怪的是,他没有提什么意见,也没有提什么要求,反而说这次见面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鹿地的意思。谈话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我感到对周副主席非常抱歉。

只记得,有一次,他说当时的日本内阁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看法,受到了一些政论家的反对。日本对中国进行着这么大的侵略战争,竟说是小资产阶级掌权,未免太违反实际了。

鹿地对青山的看法,夸张到了近于荒谬的地步。但过不好久,他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露出了看不起青山的口气。

这个青山,后来在重庆还是因鹿地的关系见过面。重庆以后到抗战胜利,不知道他的情况,当是被国民党遣送回去了。

我所知道的他的反战活动,是初到武汉后对日本作了一次广播。

国民党在日本横滨当领事的邵毓麟回到武汉来了。记不得是报载还是听到的,抗战发生后他在领事馆为了升国旗和日本发生了斗争。日本人干涉不准他升,但他非升不可,结果日本人屈服了。是真是假,无从知道。

他回来以后,为了酬劳他罢,就让他组织一个对敌工作的机构:对敌宣传委员会。比崔万秋的对敌宣传科更有面子,地位更高。《大公报》张季鸾请客时,我和他认识了。通过张季鸾和崔万秋,他再三再四地拉我参加他的工作。我的情况是,如不从做职业取得生活补助费,连《七月》都无法坚持下去。他说要借我的名义争取对敌工作的影响,也实在不好拒绝。哪知接了聘书一看,是要在编译室做具体业务工作,只好凑合下去再说了。金宗武的朋友,留日画家蔡任达,失业,生活困难,我介

绍到编译室画宣传画。他基本功夫好，虽然没有创造性，但出题目给他画画宣传画，是能称职的。

虽然不是每天上下午必到，但至少也得隔天去一次，这就弄得很紧张了。拟了些日语传单，还编了个对敌宣传手册。内容全忘了。这种闭门造车的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用处，那是很难说的。记得报载中国飞机飞到大坂撒传单，抢看传单的群众被捕了三百多人，云云。我很怀疑这是事实。撒传单的小飞机能够飞越敌人封锁的重洋，这是不可想象的。

用着极大的忍耐力敷衍到七月下旬(三月上旬起)，这个机构在筹备搬家，这才简单地把我们解雇了。邵毓麟后来在重庆当了外交部的司长(对敌司?)，我为了找日文材料还去找过他一次，当然无所获。

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的军委会政治部，任副部长，领导郭沫若组织了第三厅。这个厅设几个处，每处下面有科，对敌宣传科由冯乃超任科长。设有艺术宣传处，重要的有戏剧科，组织了十几个演剧宣传队到某些重要地区或城市公演宣传。第三厅提请政治部聘任了一批设计委员，有利于这些委员进行他们自己经营的工作。周副主席也提了我的名字，但被王明用我没有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作理由否决了。否则，我就用不着浪费那大的时间敷衍邵毓麟了。

以上，是为了一点本位工作而不得不忍受或应付的一些社会人情况和关系，特别是在统战的前提条件之下。

下 篇

我由上海直接到武汉，让M母子一直留在乡下。到1937年11

月间，二哥张名水才把M母子送来武汉。到1月底，家里希望我们回去“过年”，并看望病中的父亲。但我不能让《七月》中间停出一两期，只好又让M母子搭上小轮船回去了。到了春间，我才抽出时间回乡一次，这次是和小时的同乡同学方翰一道回去的。在上海因工作关系和他停止了往来后，一直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现在在武汉又来到我。他这时并没有在武汉工作，他叔父方觉慧在河南办党(国民党)，他说他在跑统战关系。现在和我一道回家，经过我家湖上他并没有上来，直接坐船回去了。几天后，他来邀我一道回武汉。船抵汉口时正值大风雨，大半年来面临国民党的军政腐败情况，人民的困苦和抗战的艰辛，一时间不禁吐出了自己的悲愤：

剩有悲怀对夜空，一天冷雨一船风；

夹江灯火明于烛，碧血华筵照不同。

一边是人民的困苦和斗争(碧血)，一边是统治者的淫威和享受(华筵)，一直到抗战胜利，在国统区，这种情况是根本上没有改变的。

几天后，我回住处时看到他留下的一个条子，把我剪存下来备用的报纸材料全部借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碧血华筵照不同”。虽然如此，但人民的抗日大斗争总是要在各个方面艰苦曲折地坚持前进的。

大约在2月下旬，开始酝酿组织文艺界的抗日团体。记得最初是由阳翰笙请客时提出的。战前，他在南京住了一个时期，和国民党的文化方面的人认识。抗战起后，党就运用他这个关系，劝说国民党文艺和宣传方面的头面人物发起组织统一战线的文艺界抗日团体。我是由周恩来副主席给了指示的。记得第一次出席的有王平陵。他是国民党的文艺头目，思想平庸而反

动，曾和鲁迅先生捣乱，被鲁迅先生耻笑驳斥过。但他是国民党的中国文艺社的头子，出版《中国文艺》，所以必得联系他，取得他的合作。这次请客有他，但记不得是不是他和阳翰笙联名请的。和他打交道有一个省力处，他糊涂，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不是明显地反对国民党的，一说服他就会表示同意和敬佩；国民党有什么不利于团结的企图，我们一批驳他也就马上撤销了。有老舍，他是有正义感的中间作家。这次在武汉才认识，还是他首先来看我的。组织文协，他是动机单纯的最热心的一个。他这时客居在冯玉祥公馆（小说家吴组缃也住在那里），通过他更便于动员冯玉祥参加工作。第一次会有两桌，二十多人，其余的是谁记不确切了。一定有适夷。

以后，至少还开了六次筹委会，有时在饭馆，有时在中国文艺社。人数多到五、六十人的一次是在普海春，由邵力子主持，好像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

在筹委会上，彼此认识，表示友谊，对问题交换了意见。拟成了会章，确定了会的旨趣，一致同意了发动作家，团结抗战，完成中华民族自由解放，建立中华民族革命的文艺。不涉及容易发生意见分歧的文艺本身上的具体问题，不设置任何框框，留给作家们在实践中去解决，这对人民（左翼）是有利的。我们依靠的是实践，而不是会招人反对的教条。

登记会员。采取了广收的方针，只要是拥护抗战的文艺工作者，不问政治派别和文艺见解如何，都欢迎他加入。政治部第三厅会集了一批左翼文艺工作者，差不多全都加入了，所以，左翼人物是占优势的。

拟定组织机构。大会选出理事会，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会，下分设四个股：总务股，组织股，研究股，出版股；每股由两位常务理事任正副主任。总务股主任对内主持会议，总理会务，

对外代表本会。原则性问题都由常务会议决定，不用会长或主席等名义。是一个民主性的组织机构，借以防止国民党的控制或利用。

1938年3月27日上午，在汉口总商会开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现在我找不到可查证的具体材料，只凭记忆记下重要情况。

邵力子当主席，主持会议。

一定有冯玉祥、郭沫若的讲话。周恩来以名誉主席的身份，作了郑重的讲话。

老舍讲了话。

鹿地亘和池田幸子由我带他们来参加了会。鹿地讲了话，我给他当翻译。

宣读并通过了会章，等。

推举出了组成理事会的理事。

会开到一半，就转移到普海春，一面吃饭一面继续开。这中间，警报响了，会议继续到下午四时警报解除时止。这是向这个抗敌组织敲起的警钟，要我们全力地负起应负的，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求得解放的神圣任务。

一周后，冯玉祥请吃饭，开了第一次理事会，推举出了常务理事和分工。

总务股——老舍(主任)、华林(副主任)

组织股——王平陵(主任)、××(副主任)

研究股——郁达夫(主任)、胡风(副主任)

出版股——姚蓬子(主任)、楼适夷(副主任)

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

是符合众望的。他当场坚决推辞过，但群众不让他辞。抗敌文协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维持着存在，成了国民党统治下唯一继续活动的全国性群众文化团体，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外，和老舍的态度和地位是有关系的。华林是国民党人，但他平庸，不足以妨碍老舍的。

问题是姚蓬子。他是共产党的叛徒，发表过宣言，还可能出卖了人。33年7月我回到上海时他已经被捕叛变了，没有见到他。后来他一直在南京。现在被选成了理事，在理事会上他第一次出面了。由国民党王平陵提出，说姚蓬子愿意负出版股的责任，编文协会刊。左翼没有提出反对，他当选了。可以设想，他叛变后一定又向共产党表示了悔罪，保证再不敢有反共言行。现在他可能又保证，如果他能在文协工作，他要利用社会关系在秘密工作中尽可能地向共产党立功赎罪。另一面，国民党又利用统战关系全力保举他。为了争取统战工作面扩大，共产党也就不好急于反对他了。把知道他底细的，被捕经过了考验的适夷放在他一起，这就更不怕他玩诡了。

由郁达夫和我担任研究股，这是正面代表左派的。左派人虽然多，如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冯乃超等，但都在第三厅担任了公职，没有时间来做法协的群众工作。郁达夫是没有实职的设计委员，所以由他和我担任研究股。加上总负责的中间派老舍，由于我们对统战政策的掌握与群众的支持，虽然在常委会数量上较少，但却是对国民党取得了优势的。郁达夫是老作家，不惯于做实际事务工作，虽然负了研究股主任的名义，但他并没有管事。我只好请他对工作出主意。他很洒脱，说他实在没有耐心做组织性的工作，要我完全作主，连告诉他都不必。我想，他肯担负研究股主任的名义，没有提出辞职，这就算是顾全大局了。武汉失守前他就走了，后来听说他到新加坡去

了，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投降占领印尼后，他失踪了。所以，研究股实际上由我单独负责。1939年迁到重庆起，到抗战胜利止，一直由我任主任。其余三股的主任也都照原，只副主任有变动。

机构成立后，向国民党交涉给会址，它给了汉口某处一间或两间房子。总务股聘一个秘书（名萧伯青）住在那里。只能开小会，人数较多的会还非得另外找地方不可。

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当时，邹韬奋出了《抗战三日刊》，姚蓬子就把《抗战文艺》也出三日刊。他雄心的大，但只是妄想。哪来这多稿子，读者哪来兴趣三天看一次文艺刊物？事实上，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也出不下去，和沈钧儒办的（柳湜主编）《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周刊了。《抗战文艺》三日刊不记得出了几期也出不下去，只好改为周刊，后又改为半月刊了。

这个刊物，实际工作由适夷负责。由姚蓬子出面，是不容易约来稿子的。再则，适夷有责任在内容上把握住大方向。它的文章虽然有些不免空一点，但却是尽可能把握住了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的。

我从统战立场上拥护这个刊物，尤其因为在用独立自主的原则编辑《七月》，就更应采取拥护这个统战刊物的态度。我在《七月》上为它登广告，还应约介绍了稿子。但其中的一篇，东平写的，一个潜伏在游击区的红军战士，被收进抗战的新四军的时候，思想上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勉强戴上了国民党军的帽子。这篇意义恳挚的报告，被姚蓬子声称稿子遗失了。这使我对他不得不采取特别警戒的态度，但还没有想到他是敢于积极作恶的特务。

至于研究股，我一个人，忙于本位工作和做职业维持生活，是无法做出什么来的。连用一个专任干事收集材料都做不到。

只能开开小会，各人说说自己的意见，说不上理论上的成果。

我在《七月》十一期上编了一个祝文协成立的专辑。有王明（陈绍禹）和博古各一篇，非正式地表示了党对文艺界统战组织的希望。有吴奚如、陈辛人、魏猛克各一篇，初步对文艺工作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要求：应批判社会生活中病态的或反动的东西，发扬健康的积极的东西。战争打了半年以上，这个中心要求现在是极明显地突现出来了。作为统战组织的文协，“团结”这个任务是初步实现了，但团结是为了进步，现在非得为“进步”的任务奋斗不可。至少至少，也要对反抗战反进步的势力进行遏制或反对。一直到最后，在另一意义上的任务，文协是勉强负起了的。

5月上旬，传来了周作人附敌的消息，马上引起了全国文化界的公愤。这时，有些大城市以至延安，都成立了文协分会。以武汉文艺界为首，对他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警告和声讨。

文协发了通电以外，还由在武汉的老舍、郁达夫等十几个作家联名发出了公开信，警告他要“幡然悔悟”。在这些人里面，我个人对周作人还是有一点认识上的准备的。在《林语堂论》里面，我指出了他的所谓“寄沉痛于幽闲”是一种自欺欺人之空谈。沉痛，怎样能寄于“幽闲”呢？但他却用葛理斯的叛徒和隐士的合一说回答了我。当时我还无法想到，他竟能够把“沉痛”寄寓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幽闲”里去了，他这个“隐士”竟能够在日本人统治下面找到了符合他的“叛徒”愿望的位置，这个位置后来竟高升到那个伪政权的教育督办了。

（抗敌文协，有相当广泛的内容，我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它的全面叙述。我只是说明我个人和它的关系，每一个工作都和相当数目的人发生联系，我只提到记得确切的人和事作例子，记

不确切的就不提了。)

《七月》，37年10月6日出第一期，38年1月1日出第六期，后来合为第一集。这期间，国民党党部两次命令书店街所属的第三区禁止发行，都由熊子民托人抗议才取消了。这六期，都是熊子民筹钱印的。出版后，代售的生活书店汉口分店严经理高兴地告诉我，他很愿意接受出版，总店负责人来了就可以订约。这时，上海杂志公司张鸿飞也有意出版，但我相信了生活书店经理的话，没有和张商谈。到茅盾来武汉决定出《文艺阵地》，他们当然不出《七月》了。我只好又和上海杂志公司接洽，老板张静庐接受了，但每期编稿费只肯出一百二十元。每期七万多字，每千字两元都不到，编辑费更不用说了。我也只好同意了。生活书店又提出要求，希望以六折(普通是七折)计算，由他们包销三千份。我转告张静庐，他也同意了。还没有实行，《文艺阵地》出版了，生活书店就把三千份改为三百份。

从第七期起，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到十二期止为第二集，到十八期止为第三集。十八期7月16日出版。武汉形势紧张，和书店的合约已满，停刊了。这十八期，是在敌人的不断轰炸声中出版的，是在国民党的种种压迫下出版的，是在恶劣的经济条件下出版的。

在这十八期里，表现出了一个总的情况，那就是，作者一部分是三十年代出现的新人，更多的是第一次或不久前才出现的名字。也就是，刊物主要是依靠读者中的，想通过文学实践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如致辞中所说的，“愿和读者一同成长”。

因此，作品内容是从现实生活取来的，是战时生活和战斗行为的反映，这使得散文和报告这种形式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

重。战争刚在开始，作者还不能对生活实际作深入的概括，创造出如对小说和剧本所要求的带典型性的形象来。但是，战时生活是在急激变化和发展中的，在生活中的作者比较容易感受到在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具体事实和具体人物的性格内容如果通过作者的真情实感反映出来，是能够产生一种急效的思想影响的。

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作者。

东平。他是在大革命时参加过海陆丰土地革命战争的。他对生活敏感，富于吸收力，特别着重战斗的道德情操。他写了：

《第七连》(第六期)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第七期)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第九期)

《向敌人的腹背进军》(第十五期)

这几篇，表现了战斗的艰苦和战士们悲壮的英雄主义，也表现了沉痛的失败和正视失败、汲取教训的大勇精神。它们在读者中间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曹白。他是遭受过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青年美术家。战争开始后，他马上投入了战斗。开始做的是难民收容和救济工作。他的报告式的散文都写的是具体的日常生活，战争灾难下的日常生活。在作者笔下出现的，这些穷苦人民忍受灾难的，朴实的韧性精神，和在灾难中决不熄灭的仇恨敌人的民族感情，也是惻惻动人的。上海失陷后，他投入了党领导的，正在兴起的，江南地区新四军的游击战争。在他笔下出现的依然是具体的日常生活，主要的是以农民为主的半脱产或不脱产的战士，他们在战斗准备、战斗行动以及战斗间隙中的休养、学习和生产的日常生活。他们克服艰险和困难的，友友仇仇的精神活动也是使人读了不胜向往的。

S.M.(陈守梅、陈亦门)另一个主要笔名是阿垅。他写了《陕北打了起来》(第十五、十六期)。他当学生时就写诗。在民族危机下面，凭着坚决的信念，进了军官学校，为祖国的前途献命。抗战发生时他是一个排长，被派到上海抗击敌人，这个长篇报告就写的是他这个排的抗战行动。他的目光放在整个抗战的战略和战术要求上面，他的感情放在对每一个士兵的关心和爱护上面。他笔下的兵，每一个都是抱着某种单纯朴素的感情来参加战争的，差不多每一个兵都对战争抱着单纯的信心，用纯朴的感情来依赖他这个排长。在国民党的不合理的军事制度和轻视以至压迫群众的部队中，他把这个排带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他这个排参加了艰苦的作业和铁血的战争。到负伤下来大半年后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他沉痛地追悼了那些牺牲者，也不得不万分遗憾地提到，那些原来是具有一定战斗意念的兵，后来由于受到不合理的打击，终于变成了逃亡者……。他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使读者一同受到严酷的考验。在续篇《从攻击到防御》里，他从这样的严重教训里对国民党的错误的战略和战术提出了含蓄的，但却是痛烈的批判。这两篇，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由于亲身参加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血的战斗，又深切地体会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他开始追求一种能为广大人民谋生存谋幸福的崭新生活。

我发表了他的作品，通过几次信，他到武汉来看我，向我吐露了他的这种心情。我看到他身材不高但显得很坚定，是一个经过刻苦锻炼的好军官，尤其是他那真诚坦白、言语不多的性格，使我感到信任。他提出希望我帮助他到陕北打游击去，我立即允诺了，并介绍他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奚如和他谈过话，对他印象也极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进

抗大。这当中对他还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和要求，我就不知道了。

他回到衡阳，1939年单身一人由衡阳步行到西安才进了延安。进抗大后有过来信，抗大的军事学习，尤其是政治学习，更增加了他的斗志，并说就将开赴前线。但由于在一次野战演习中眼球受伤，同时下颏的旧伤又复发，经组织同意到西安治疗。伤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便被封锁了。他在西安等待回延安时，写了大型报告文学《南京》，揭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投给了当时抗敌文协主办的“文学奖”。可又被好事者拆了密封口，结果只好不评奖，而付给他一等的稿酬。他用这钱做路费，来到了重庆。

经同学介绍到军令部工作，后又考入陆军大学，因为知道自己在国民党内已被看做异己分子，绝无可能再上前线参加抗日，心想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总有一日能用上的。这时他只好有机会时就向共产党提供一点军事情报来寄托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在重庆有多次深谈的机会，才发觉他在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他不仅写小说、报告，还能写理论文章，尤其是诗论方面。关于诗的各种美学观点，他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当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他作了从实际出发的恳切的分析，其中，对于某些和人民性无缘以至敌对的东西，他作了不调和但也决不夸大的批判。他就从这一条道路上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不倦的追求。

解放后印出了他的诗论集《诗与现实》，约七、八十万字，但遭到了等于禁止的命运，报上无法登出广告。现在以及将来的诗论应该而且一定能够从他的劳动成果中汲取到从别人汲取不到的经验和教训。

1955年因我的案件被牵连逮捕入狱。十年后，因病瘐死狱中。他一生真诚追求革命，用生命殉了他的理想。至1980年，才得到了平反。

其他的，由知名的作者尤其是不知名的作者所写的报告散文涉及到了后方前方各个地区和各种群众活动。其中，特别注意发表了有关延安生活的报告：关于延安和八路军本身的点滴生活，例如，延安印刷工人集体写的《我们怎样生活的》（第五期）；全国追求革命的青年投奔延安的英雄行动，例如，骆方写的《走向战斗着的黄土层上》（第二期）；在延安受到革命洗礼后再向各个战线奔去，例如，丁玲的《到前线去》。

至于对各种落后的，对抗战不利以至有害的势力和社会现象，从统一战线的要求出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例如，抗战爆发后不到半年，发表了六篇关于对待伤兵情况的《他们战斗了以后》（第四期），努力从人民的立场，从士兵的立场，对违反抗战利益的势力提出了控诉。虽然投稿者们写得含蓄而又含蓄，但有心的读者们是能够从这些实感到严重的政治意义的。

报告（包括战斗性的散文），是帝国主义和战争时代所产生的，适宜于及时地反映历史发展实际的战斗内容的形式。它的特点，及时性和大众性，是富于生命力的。把半年来的群众实践经验综合一下，我写了《论战争期间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第五、六期），希望作者能够吸收这些可珍贵的经验，在创作实践里争取前进。

其次是诗。报告，是通过作者的真情实感把急激变化着的战时具体生活的实际，其中所蕴含的真实性和思想性反映出来，使读者受到教育；加强实践的理性力量，推动历史前进。而诗，是急激变化着的客观生活在诗人感情上引起的反应，升华成友

友仇的感情反应，反转来激发读者，使读者的感情受到哺育和锻炼，加强自己的实践力量，推动历史前进。

诗，是抒情的。当然有叙事诗，但它也必然渗透着诗人自己的感情因素。

也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艾青。他是抗战前就引起了读者注意的诗人。抗战一开始，他是最快地唱出了战歌的诗人之一。

《他起来了》(第三期)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七期)

《北方》(第十期)

《乞丐》(第十三期)

《向太阳》(第十四期)

诗人是土地的儿子，对古国的黑暗和冷酷有深刻的感受，他唱的挽歌是非常深沉的。他对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他描述的穷苦人的形象，使人禁不住感到伤痛。因此，他迎接抗战的感情是热忱的；《向太阳》，抗战在诗人的感情上展开了一个扫除一切阴影的阳光普照的世界，她发扬了伟大的人民气魄。

田间。抗战前，第一个唱起了民族战争的战歌。抗战起后，虽然经过了暂时的沉默，但还是唱出了人民的战歌。

《战争的抒情小诗》(第三期)

《给战斗者》(第六期)

《晚会》(第十期)

《给V.M.》(第十二期)

田间企图唱出人民对生活对战争的清新的感受和敏锐的斗志。迎着战争，他唱，“自由向我们来了”；他唱，“在战斗里，胜利或者死……”。他的歌声嫩一点，但却带着明确的政治性。他是为胜利而歌的。

从读者中出现的诗人，举侯唯动为例。他写了《斗争就是胜利》(第十期)，这是献给东北抗日联军兄弟们的。诗人运用他刚刚从生活学来的人民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的执着和坚贞，对古老习俗的留恋和舍弃，老一代的沉痛的斗争经验和殷切的愿望，这一代的赤忱的斗争意志和火热的斗争行动……。这是生死与共的带血的歌声，但却是响彻山河的雄壮的歌声。当时，听说音乐家冼星海开始为这首诗谱曲。前几年，又听说当年在延安曾展览了他的乐谱，当然，在延安是没有演奏的条件。

侯唯动是从读者中出现的当时比较突出的一个。

另一个突出的是天蓝，他写了《G.F.木刻工作者》(第十八期)。他用诗画出了一个工人木刻家的肖像，“人不能让挣钱的心思弄坏了工作！”一个“清高”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原型是江丰。天蓝和江丰，当年都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

和报告不同，小说的产生需要作者对现实生活素材的进一步消化和综合升华过程。

也是东平，《七月》在武汉出版后马上寄来了短篇小说《暴风雨的一天》(第二期)。我给他的信里说，抗战刚在开始，还不可能出现这样熟悉游击战的战士和行动；他这还是从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取来的。他同意了。不久，新四军成立，他马上参加到皖南去，在路上寄来了《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第十四期)。连长高峰，高大而壮健的青年，他民族感情充沛，思想坚定。他对敌人作了艰苦的战斗，当然是力量悬殊的战斗，壮烈地牺牲了。残存的负伤的战士们迎着他的尸体艰难地站了起来，向他立正，出现了一片沉重的肃穆气氛，谁都压迫着自己忍住出声，生怕扰乱了他的安息。在他的感召下，英俊的青年排长，也作了艰苦的战斗，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被战友们称赞为从旧

军人中成长的新军人。通过了浴血的战斗以后，来到营部去报到，不替自己作任何辩解，让营长把他枪决了。从高峰和林青史这两个名字也可以感到，作者怎样对这两个战士的精神高度表示了敬佩。

（后来，他还寄来了四万多字的小说，记得题目是《一个农民家庭的毁灭》，写一家贫农在敌伪统治下怎样陷入了毁灭的悲剧。这是需要极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持自己创作出来的。1941年我因皖南事变撤退到香港后，托友人从重庆寄到了香港。同时寄到香港的还有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的初稿《财主的儿子》和日共宫本显治评论芥川龙之介的论文，从杂志上剪下的《败北的文学》。日军占香港后，我把它放在三楼过道顶棚上，到第三天就不见了。）

另一位是黄既（黄树则）。他寄来了《严玉邦》（第七期），写的是一条“中国必亡”的昏虫和懦虫，以及和他联系着的几条昏虫和懦虫，作者冷酷地给了鞭斥。又寄来了《银地上》（第十四期），反映了又一种灰色的斗争。记得确切的还有一篇《岳王镇没有好风景》，内容我记不清了。作者是医生，具有正视黑暗的勇气和与受苦难的人民共命运的胸怀，他的笔是锐利无畏的。终于，他感到为苦难的人民服务的心愿要用到最有效的地方去。他从鄂西来到了武汉，我把他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进革命首都延安去了。大约一年以后，寄来了《到安塞去看病》（第四集第二期）。在他笔下出现的完全是不同的人物，经过长期战斗锻炼的农民领袖。他们朴实无华，朴素到没有一点虚饰，说的话没有多余的字，使你无从感到是英雄人物，却又不禁感到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他们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休养，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几乎使你感觉不到他们是伤病员。用作者的话说，他们组织了一个和睦的小家庭。作者带着深挚的感情，不使有一个和自己

的内心感觉不符的字在笔下出现；是用那样深挚的感情表现了他们的。那以后断了消息，似乎是参加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看来他已回到他的本行，用他的精湛的医术，在解放区发挥一个医生所能发挥的作用。解放后在北京见到时，他已是党在医务战线上的权威和领导者了。

当时，向往革命的青年要我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的，记得还有王天基。他是刻木刻的，只发表过他的一篇短文《流亡之前》（第八期）。和他一起的有两个朋友，可惜名字忘记了。党办事处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们送到新四军去了。后来寄来了木刻鲁迅头像。

也发表了空虚的所谓爱国主义的作品。这空虚，是指作者的感情并不是对人民性的生活内容感受到的内在的要求，而是一种浮在生活表面上的兴奋。或者，作品中的形象并不是从他所深知的现实人物的性格溶化成的或生发起来的，而是为了表演某种概念而制造出来的。

例如庄涌的诗。当时正在徐州大会战，他寄来了《颂徐州》。作者是一个中学生，很容易地被一种激情所征服，但他的激情是被战争概念或政治概念所刺激起的兴奋，并不是从和人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的内在要求出发的，所以，这里面的英雄主义不能不是一种表面的形象。他继续写了下去，有的气概更雄壮，但基调没有大变化。1939年在重庆，我把他的诗编成一本《突围令》，寄到上海出版了。我认为这种空虚的声音可以结束了，1942年在桂林编印《七月诗丛》时把它删去了，但他自己还是用《七月诗丛》的名义重印过。抗战后期，他化名写了极辛辣的讽刺诗《朗诵给重庆听》，但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1954年他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忽然听说他是还乡团,还有血债,被当地派来的人抓回去了。直至1979年才又听说,这是冤假错案,但他服刑二十年身体已瘫痪,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去为他平反,恢复了工资。)

例如剧本。剧本是为了上演的,为了用立体形象直接和观众见面的,它能够取得较直接的速效宣传作用。《七月》没有条件做这个工作,但也应作者的要求发表了几种。有独幕的,也有一个多幕的,但没有一个成功。其一是洗群的《反正》(第三期)。剧本写的是当时所谓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反正的故事。但出场的人物都是围绕着“反正”这个总题目做文章的道理话,好像这么一场严重的斗争的有关者和参加者们并不需要通过彼此间激烈的意识冲突或意识吸引似的;好像武装斗争这种严重的行动可以不是由于迫不得已的生活动力,而是由于一种单纯的理智引导似的。这是一个道地的所谓“宣传剧本”,表演政治道理但不反映生活真实的剧本。作者自己组织了一个小剧团,上演了,也许引起过观众的兴奋罢。后来董老(必武)用“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字批评了这个时期的文化工作。他所指的当然是大范围的总的情况,但《反正》这个剧本也可以作为一个小例子。这警惕了我,后来,我就少发表以至不发表剧本了。

由于过去的教训,对理论批评尽可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转载了:

罗曼·罗兰:《艺术与行动:论列宁》(第十四期)

G·季米特洛夫:《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文学》(第十八期)

我认为,革命导师们向文艺提出的庄严任务,一定能激励我们的作者和读者,严肃地对待文艺事业,正视我们人民在战争进程中的沉重负担和艰苦的斗争。和我们的民族战争包含着

国际主义的发展倾向一样，我们的文艺斗争也一定是曲折地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导的。

（还有美国作者的《最近的革命文学问题》，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译载的。）

发表了：

辛人：《谈公式化》（第六期）

辛人：《关于公式化的二三理解》（第十三期）

公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以至相反，是用主观代替客观，是把现实歪曲了以至伪化了的一种创作方法。用这种方法，不但不能反映出深厚的历史内容，甚至不能写出现实生活某种突出表现或一端表现真实的短小作品。在热情勃发的抗战初期，这种倾向尤其普遍。辛人及时地加重提出了这个警告，应该是对读者和作者都可供参考的。

发表了三个座谈会记录：

《抗战以来文艺活动和发展》（第七期）

《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第十三期）

《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第十五期）

约集几个愿意谈谈感想的人谈谈。不设具体的理论项目，自由地交换意见，促进对问题的关心，互相吸取经验，正确地对待具体生活问题和创作实践问题，认真地正视生活和读者的要求，检查自己，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不作结论，就是留给作者和读者主动地对待问题。但由于没有足够准备，分析不能深入，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

发表了大漠笔录的《毛泽东论鲁迅》（第十期）。

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党领袖对鲁迅的评价，提出了在伟大的战争中更应该学习宝贵的鲁迅精神的要求，开拓了正确地研究鲁迅的道路。是针对着抗战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要求而提出

这个极重大的问题的。这位大漠同志是路过武汉投给《七月》的，没有写地址，可惜无从和他见面。

（其他的，别人的和我写的还有几篇，也都是即于现实、针对现实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提供作者和读者参考。没有能力解决原则性的大问题，退而求其次，对具体的实践问题进行追求，只要能顺应被党的政治路线所照明的历史发展动向，这种追求是可以在解决实践问题中通向原则要求的。至于主观上能够做得怎样，当然因各人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大约6月初，在日本留过学，爱好文学的俞鸿模，从延安出来到了武汉。他带来了艾思奇的介绍信，要开书店，取名海燕书店。我把《文艺笔谈》以后到抗战发生时的评论集成《密云期风习小纪》，交给他，八月份出版了。书印得很快也还不坏，可见他对工作的严肃认真。这样我们就取得了共同合作的基础。后来欧阳凡海来到了武汉，从他那里我得知，他们在日本时是同学，并且知道他本人喜欢文学，写过小说和诗，立志办一个纯文艺的书店，这在当时的书商们是不肯干的。凡海向他提议出版《七月》，他很愿意，可惜那时他的钱已快用完，并且决定到上海去。但要我为他编一套丛书，于是我交给他《七月诗丛》三本，有艾育的《向太阳》，我的《为祖国而歌》、庄涌的《突围令》。这些都很快地在上海排印出版寄给我了。我又为他编《七月文丛》，有东平的《第七连》、S.M.的《闸北七十三天》、陶雄的《0404号机》和以后曹白的《呼吸》、萧军的《侧面》，也都交给他了。

我到重庆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为抗议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一家三口撤退到香港。后来，M带孩子去上海，才知道那几本文丛早已在上海出版了，他本人当时是地下党办的书店的经理，仍有兴趣个人出版文艺书籍，来

信要我继续为他编文丛。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我想他大约到解放区去了。

抗战胜利后他给我来信，才知道他一直留在上海，生活十分艰苦，但仍想重振旧业，海燕书店要再出书。我将我在重庆编的《希望》四期的纸型寄他，请他代印。第一、二期很快就在上海发行了。

我们的真正交往，应该是在我回上海后。因为我们住得很近，他常来看我，我有事就夜晚去找他。这时我才看到，他并不是我过去开玩笑称他为“老板”式的资本家。他过得很清苦，一家五口住一间客堂间，由于喜欢出版事业，他把同父异母的哥哥从海外寄来的生活补助全用来出版书籍了，并且又不赶时髦出热门书，所以能维持不赔本就很不错了。由于兴趣不同和生活清苦，夫妻不和，以至演成家庭悲剧，妻子和他离了婚。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他仍要我为他编了一套《七月文丛》。

解放后在北京我介绍他出版了孔厥和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这书算是让他赚了一笔钱。他出了我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的第一、二乐篇《欢乐颂》及《光荣赞》。他还想我为他再编一套丛书，我说现在大家都自由了，用不着我来组稿，我来编辑了。

就是这种编辑、作家和出版家的关系，55年我的案件还是将他牵连上了。听说他曾因想不通，自杀过一次，后来救活了，也查清了他不是什么“分子”，就释放了。谁知文化大革命时，他又被别人的问题挂上了，并且揪斗时打了他。他终于不能忍辱偷生，用生命回答了暴行。

这样一位由于热爱文艺而为文艺尽了力的出版家，受迫害而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他平了反，开了追悼会。

武汉已越来越接近前线了。只好让M带着孩子随同金宗武

夫人先到宜都去，我仍在此忙于编辑和翻译。早在3月下旬，鹿地亘夫妇到了武汉，我常被拉去为他当翻译，所以忙得不可开交。到8月份，房主人也到宜都去了。鹿地因池田已疏散去了衡阳，他就住到我这小楼来了。敌机差不多天天来轰炸，一来就是四、五十架，像一片黑鸦成群集队地飞临上空。有一天断续地飞来四次，其中一次还听见了炸弹在空气中坠落的声音。这四次，我都在墙脚边躺下，为开战以来最紧张的一次轰炸体验。这天被炸死炸伤达八百人以上。我在轰炸间隙中写成了《民族战争中的国际主义》。

第二天(12日)我早起过江，去杂志公司和子民家，在他那儿躲警报。等我过江回来时，小朝街已被炸，左邻落一弹，这边厨房三间被炸坏，书房飞进了一屋的土，我的卧房门锁都被震坏，围墙也坍了。看情形是不能在这儿再住了。

13日晨四时，敌机又来袭，在湖边丝瓜棚下伏坐了一小时，警报解除已天亮了，即过江去。今天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周年，一定还会再有空袭。到三教街，乃超夫妇及萧红在，才知道萧红至今还未走成，端木将她一人留下自顾自先走了。她身体已显笨重了，一个孕妇无人照管，怎么行呢？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说将随乃超夫人一道撤退，我才放了心。

我自己也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先随鹿地住在三井洋行，住了一天就不让住了。幸好在中苏友协认识的张西曼，为人热情，对我很好，留我住在他家里。但他家客人太多，只能陪着玩玩谈谈闲天，是无法做事的。回到武昌住处收拾东西，真是满目荒凉，人去楼空。拿出二十元请留在那里看守房子的老周将围墙修好，至少还它一幢完整的花园小楼！

这时，我还忙于照顾乡下来的父兄和其他亲人。我本着一片爱国心，不愿将他们留在即将成为沦陷区的家乡，希望他们

撤退到M住的鄂西去。当时我以为抗战顶多一两年就可以胜利结束，我曾受过父兄们的抚育，尤其是他们用辛勤的劳动所得供我上学，现在我不能眼看着他们被杀害当亡国奴。我决心肩负起全家的重责，所以一再劝他们弃家逃难！谁知这二十一口之家可不是我能承担得起的，结果造成父亲一两年后病死他乡，全家只好再做难民逃回家乡。现在想来都是我考虑欠周，没有想到农民离开家乡在外无法生活，生活也不习惯，更没有想到国民党是不抗战的。

我将老父、继母及侄辈们送到M那里，我自己也就忙着做撤离武汉的打算。

回小朝街去看了一下，围墙是砌好了。走进我住过将近一年的小房里，将桌上的杂物清理了一下。艾青送我的白磁胆瓶仍在，擦干净后显得那么白洁透亮，但我将过逃难的生活，只好将它留下。到院里采了一朵仍在盛开的花，插在里面，和笔砚等一起，照样放好，看去我仍将在这里写文章看稿件。我怅怅地望着，好像平常出门一样，慢慢地走了！

敌机经常来市空飞旋，如入无人之境，有时投下几枚炸弹，即扬长而去。大家也已习惯了，九·一八，各报还照样出特刊，坚持抗战，抗战到底！

等大哥们不来，我决定先走，在这里已无法做事了。将一些来稿做了处理，来信一一回复了，就托子民买船票。

9月27日才买到船票，是水手位的底舱，明天开。到商店为孩子买了点东西，尤其是为金宗武的孩子们买了些毛线等，为金宗武买了几瓶“咳利舒开”药水，这是他经常吃的治咳嗽气喘的药，另外带着吴奚如送给孩子的玩具，好像我是去过太平的乡居生活似的。

28日下午六时船启航。虽是九月秋风起，天该凉快了，但

在底舱却闷热得很。走上甲板眼望灯火中的大武汉，从去年10月1日到此，今天是一年还欠几日。我感觉不到它将遭被杀被辱的命运，市声和往来的人群仍在急促地活动着，我似乎能够信赖这些人们会保护它，它将永远不会屈服，不会失陷！

四 重庆前期*

上 篇

1938年9月28日匆匆地离开了武汉，但我总感到很快就会回来的。还会在这生活了近一年的武汉匆匆地由住处奔下蛇山，跳上轮渡到汉口，去印刷厂，去出版社，去找许多作家朋友，为了抗敌文协的工作，为了《七月》的出版，焦急地在马路上奔跑着，常常是满头大汗地跑着。这些火热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回来的，还要继续为大武汉，为全国人民工作。

现在我却安静地坐在小江轮上，驰向人们认为是安全的宜都。

宜都离宜昌水路大约只有一、二百里路程，现在成了一些走不远的逃难者的避难的乐土了。从上海从南京来的有办法的人们是不会到这种地方去的。记得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作家的哥哥的订婚筵会。当时听到那些绅士淑女们在宴席上互相对答：“你准备去哪儿？”“我去四季如春的昆明。”“那你呢？”“我想去那没有冬天的香港。”“哈哈哈哈哈……”一片欢乐的笑声。这是一群新贵，不是难民。

七十多岁的、由家乡逃出来的老父亲和我一起坐在底舱里。我十多年没回家，这次算是回家乡了，他老人家正高兴着我在

* 自本章起，系作者家属根据作者生前的手稿、日记、书信等材料整理。

——编者

武汉离他近了，谁知现在连他也要逃离家乡了。这是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来劝他逃难的，我不愿我的一家遭杀虐遭欺凌做亡国奴，他们也就听从了我的意见弃家出走了。继母、大侄媳和几个侄辈已先去了宜都M那里。现在是我护送父亲走^①。

我看着他不停地吸着水烟，沉默着不和我说话，我知道他内心中该有多复杂的感情啊！我动员他离开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家乡可能是错了，我太不理解他了，我只看到他刚强的一面，但叫一个白手成家的老人，丢了辛苦盖上的房子和一切家业出来逃难，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六时许，船到城陵矶，这里是湖南界了。望去不过几十家最多百来家的古老的房子。高处有一幢西式楼房，在广场上挂着中国国旗，可能是什么政府机关。

江面上有漆着英国米字旗的小炮轮。这个小据点，将成为敌人的目标，从咸宁穿过来切断武汉的水路。

在船上无事便看书。读完了八月号《改造》上的《麦と军队》，为一伍长玉井胜则之日记，笔名火野苇平。因被鹿地誉为“真正的战争文学”，所以设法借了来看。然而极无聊的作品，除了有一两处暗示了兵士的痛苦，中国兵的勇敢外，给读者的还是法西斯式的麻醉。最后以中国兵被俘后不屈的场面作结，作者自己倒还能以“自己还没有变成恶魔”来自慰。

30日，读了几十页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作者自己兴奋地抒起情来了，恐怕不是真的托尔斯泰罢。

读了《改造》上的《孤雁》，作者芹泽光治良。依然是无聊之作，不晓得鹿地为什么要说好。

在石首过夜。

① 此处作者所记有误。根据各方面资料核实，作者父亲系提前从武汉去宜都的，并没有和作者同行。——编者

第二天，看了几十页《托尔斯泰传》，译得太坏，看不下去了。

下午七时到沙市，有码头，船在这里过夜。上岸走了一会，似乎离市街还有一段路，没有去。什么也没看到，从马路边的洋楼里传出了打麻将牌的声音。看本地报纸，英、法、德、意四强会议开成了，捷克被英国送给了希特勒。中国的官僚们白喜了。

又看了一百多页 André Malraux 的《征服者》，到现在为止，还是用对话来展开，觉得沉闷。晚八时停船，离宜昌约有二十里。

在小轮上坐了五天，3日上午八时左右到宜昌，叫小轮上岸，岸上嘈杂不堪。找了一个小客栈的污旧的房间住下，安置好了父亲，就到街上去转了一圈。宜昌和中国各地的中小城市都是一个灵魂。夜晚，在路上遇见了抗敌文协开会时认识的《武汉日报》编辑段公爽，一路到报馆去坐了一会，又到另一旅馆去会见了《新民报》的记者陈理源，谈了一通闲天。

晨二时即起来上小轮，挤得简直没有插足之地。五时半船开，不到八时就到了宜都。上小轮后，碰着了金宗武派到宜昌来接的工友，在宜昌未能接着，他也搭今天的小轮回宜都。十时左右到宗武家。吃了两碗稀饭，身上感到不舒服，让M先陪父亲到预先租下的房子去了。

下午终于躺倒了，热度高达华氏103度，我就留在金家过夜。吃了阿司匹灵，出汗甚多，热度渐退。

第二天早起，热度退到九十九度多。这下可忙坏了M，她要照料一家老小，又匆匆地跑来看我，幸亏我的病好得快。

我拿出了在汉口临时时为宗武买的专治气管炎哮喘的德国拜耳厂出的“咳利舒开”。他身体很坏，还有肺病，这是他常吃的药。这两天他正在犯喘病，看到这药他夫人高兴得很，发了几

句牢骚，说你这么多朋友，还只有张先生想到你的病。说来惭愧，我哪来这么细心，都是M来信要我买的。这次我还带来了吴奚如送给晓谷的日本人留下的秋千架和小三轮车等玩具，晓谷太小不会玩，我拿来送给宗武的孩子们，还有几斤毛线也是给孩子们。看到孩子们好奇的、雪亮的眼睛，我感到十分地愉快。这一年来我们一家多亏他们照应，这是二十年代时就结下的友情！

下午到租好的住处去。是富农的住宅，空气光线都不够，但最讨厌的是苍蝇一片黑，一拍子下去能够打死十多个。奇怪的是房东家对此毫不以为奇，说这是饭蚊子，不但无毒，好像还可以和饭一起吃！真是愚昧得可怕！

我们租的是偏厢房，一共三间，另外还有一间厨房。我就住在过厅的那间。有一扇三尺来长二尺来宽的窗，借了房东一张方桌，在窗下勉强可以看书写字。

总算暂时安定下来了。我和侄儿侄孙们坐在偏厅里听父亲的训话，那两个大点的侄儿侄女只是搭拉着眼皮低着头，一声不响，小点的就在一旁嘻笑，谁也没在听爷爷的话。气得父亲吹胡子瞪眼，大骂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白给你们饭吃了。

过后我也同他们谈过，可真让我泄气。二哥的儿子十七、八了，说是小学毕了业，一问他的功课，可什么也回答不上。老四的八、九岁的男孩，读了两年书了，字都认不了几个，说是老师常不来上课等。真是饱暖的小康之家，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孩子们也就不想上进了。

附近的陈家祠堂，附设有短期小学。新添了两个流亡教员，是一对夫妇，从上海逃到安徽，又逃到了汉口，这次又逃到了这里，据说每月只能领到五元的生活费。我把老四的儿子送去上学，但教员说今天没有课。在这里算是还记得有双十节。

得熊子民信，他在8日去桂林了。

坐在窗下的方桌旁复了几封信，内有给沈钧儒等四参议员的回信（因为他们曾寄给我征求意见的信），要求他们在参议会上提出废止原稿检查制度。我想这是每一个作家和编辑都迫切要求的。

这一年来我为杂务奔波，很难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好看书了。看了契诃夫的《活动产》，作者的观念流得出得太显了。又看他的《决斗》，这篇使我喜欢。继续读《征服者》。

收到曹白、艾青和费慎祥的来信。另复艾青、欧阳凡海、萧军和张仲实信。

我和金宗武夫妇一道去马××家看做油墨，马是武昌×中的化学教员。他看到战争打起来了，文化方面显得十分活跃，但是国外进口的油墨没有了，上海货贵得要命还难买到，他就想用土法来制造油墨。他是金宗武的朋友，和他一谈，就得到了金的支持。小规模地试制过几次，虽没有成功，倒也没有绝望，后来还招股成立了××油墨公司，我也由于金宗武的缘故，出了五十元入了一股。这次，马老师说当地老百姓烧松柴，油烟子多，松烟是最好的做墨的原料，一定能将油墨配好。所以约我们去看他试验。

他在天井里用一口大锅在熬着油，一面不停地加进煤烟，一面不停地搅拌。只见黑气冲天，马老师满脸流着汗。油起先不凝固，不知他又加了什么药，总算慢慢地成了稠稠的液体，有点像油墨了。他大大地吐了口气，我们也都盼望着这次能成功。但是拿到油印机上一试，仍是走油散花，看不清字，不能用。马老师感到很失望很惭愧，他太太说这几次试验几乎快把股金花光了。我们鼓励了他几句就走了。

我继续在家看书。宗武给了我一张剪报，才知道薪春已失

守。中央社发出了动人的消息：

惊天地泣鬼神——姚子青第二

蕲春守将谭灿华将军全营与孤城同殉

我国守蕲春之谭营长灿华，与由田家镇方面西侵之一联队并附海空联合之敌，自八日拂晓起发生激战。我谭营处三面环水之绝地，四围受敌之孤城，浴血苦斗增援无路。经两昼夜，该营长卒能再接再厉，以姚子青死守宝山之精神，率领官兵歼敌无数。然终以众寡悬殊，装备劣势，全营殉国。该营长临终犹呼委座万岁不已，其忠勇之烈，洵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云。

家乡沦陷于敌人之手了。一直没收到大哥的信，不知道他出来了没有。我心里很不安，不敢将这消息告诉父亲。

看完了《征服者》，开始看杰克·伦敦的小说集。很快就看完了。这人精力蓬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虚伪、残酷、黑暗及金钱欲抱有了最大的憎恶。但也因为这，作品里的人生相大半过度地被作者自己的立意支配住了。

看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集，再看果戈里的《魏》和《旧式的地主》，还看了《塔拉斯·布尔巴》及《伊凡·伊凡诺维奇同伊凡·尼基佛诺维奇是怎样争吵的》，就把剩下的《密尔格拉得》全部看完了。

这天是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但我什么也没写。前几天也是想写点什么的，但心情凝聚不起来，又不愿随便写点什么应应景，只是心里甚感惆怅悲痛！

拿出《小约翰》来看了几章。

看完后，感到作者的艺术手腕很高，但这里所有的其实是

反科学的精神，虽然部分地反映了对于现实社会的反抗。译者声明对于此书如劝别人也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我看，这喜欢正是在时代重压下的译者底彷徨的心境。

报载，中国军队昨夜开始由武汉撤退，三镇燃起了焦土抗战的大火。几天以来，宛如守候一个垂死的人似地守候武汉的消息，这算是得到最后的结果了。

得大哥从武汉来信，说家里其他人将乘江新轮逃来。我这才放了心。

看完高尔基的《福玛·高蒂耶夫》，上下两卷。较之福玛本人，倒是那些商人们写得更好。用福玛，这反抗意识的反映，作者对商人社会提出了无情的控诉。译得坏极了。

另外看了一本《高尔基回忆琐记》，写得很亲切有趣。

在家里住了一些时，发现晓谷也传染到了大家庭里的孩子的毛病。由于爷爷喜欢他，他显得很任性不听话，还跟着大孩子去地里拔萝卜、红薯吃。刚刚给他治好了蛔虫病，看来又要得病了。有一次我实在气急了，就一把将他拎进了房里，准备打他一顿。他大声地哭着，外面继母直劝，别吓着了娃娃，不要打啰。我没有打他，只把他放在椅子上，替他擦干了眼泪就耐心地同他讲道理。从那天起，我每天总带他去田坎边上走走，教他认几个字。

冒雨进城，到河边去等大哥他们，不见来。在代传信的小店里收到老舍和伍蠡甫打来的电报，约我到复旦大学去教书，月薪约有百元。看来只有同意去那儿教书了。

第二天发了电报，仍去江边接大哥，不见来。听江边有人说看见江新轮今天下午三时左右开上去了，那么明天一定会到了。

上午在家看《冰岛渔夫》。

下午又到码头去等大哥他们。在江边城垣上走了一圈，那下面有许多后方医院草率埋掉的坟堆。有两个穿灰军装的在掘一个新的坟坑。

在码头遇见启黄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彭年，他是从沙市逃来的。他是黄安人，记得在学校会踢足球。我是什么运动都不会的，只好在一旁看着羡慕他们。隔了二十来年，大家见面都很高兴，站在江边谈了一会闲话，不知怎么地扯到电影；我对那些反动的国产片表示不满，他却很赞赏《火烧红莲寺》。再没什么可谈的了。他没有问我的经历，我也没问他的，就这么分手了。

10月31日，同宗武进城到码头，坐不久，大哥等乘小轮到来了。这一整天就料理他们的事情。十来口老弱病残，有的是从来没出过门的妇女。二哥是从来没离开过土地的农民，只有大哥在外面做过小生意，老四虽然能干可又不务正业。看到这一群缺少生活能力的家人，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沉重得很！

全家二十一口人，得分两拨吃饭。两嫂子各人身上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大嫂的小女儿长得胖乎乎的，二嫂的骨瘦如柴可是个小男孩，一问，说痼痢已一两个月了。

早晨，M在厨房里，看见二嫂在喂孩子吃猪油拌饭。她年青沉不住气，急得大叫了起来，赶快制止二嫂。这一来，我二嫂以为要饿死她孩子了，哭了起来。M也向我诉苦，说这么一个大家她管不了，别人又谁都不愿意管。

我想，先让M带有病的孩子们去医院看病吧。一问呢，侄女要看耳朵，四弟妹要看眼睛，又一侄儿要看疮。四弟妹的眼睛，由于重砂眼，已快双目失明了，没法带去看。别人就都带到城里新迁来的省医院去了。

二哥抱孩子回来，算是知道了拉痢不能吃油荤和不易消化的食物。M为孩子买了藕粉和白糖。侄女是慢性中耳炎，由于

没早治，耳鼓已烂了。总之一句话，孩子们的病是由于营养不良和不讲卫生。

听了这些道理，家里人简直不能相信，都说，我们家又没饿着他们，我们家还不干净？西医总是这么说的……

在这乱轰轰的家里，我只好躲在屋里看书，看完了《冰岛渔夫》，又看安德列夫的《往星中》，后来就开始看《静静的顿河》。

得老舍信，又收到伍蠡甫拍来的催电，看来我得作离开这里的打算了。到金宗武家，托通志馆去宜昌的人打听船票。据说宜昌都已经动摇了，金家想从这里迁移。

几天后，去宜昌的人回来了，我托的史枚（在《新华日报》认识的）说船票有办法。

与家人商量去向的问题。大哥主张不动，看来也真难再动。往哪儿去呢？跟金家往川西北走，交通更不便，又怎样生活呢？

给伍蠡甫复电，决定同M、晓谷去重庆。复老舍信。给张定夫信，他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任教，希望能先为我们找个住处。

第二天，再和家里人讨论去向问题，引起了一些不快的谈话。主要是二哥，他们以为是出来走人家，连棉衣都不带，要M替二嫂买布做棉衣，父亲又不答应，可能为此他夫妇不高兴。我说我可以将孩子们带出去，二哥的儿子送他上中学，两个小的可以送到保育院去，让他们住在那里读书。可是谁都不作声。父亲只不停地抽着水烟，也一声不响。最后才说，走吧，你们走吧，我们以后再说。老四有办法最好也把一家带走，他简直不回家，在外面搞啥名堂？

这都怪我，对这刚刚兴起的封建大家庭知道得太少了，现在才感到，要他们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家乡离开土地，是考虑得太简单了。

晚上买了几斤肉，由大嫂做了一笼粉蒸肉，算是为我们钱

行吧！大嫂做得最好的是鱼丸子，我离开家后，吃过许多地方的鱼丸子，但都没有大嫂做的好：又白又亮又鲜。粉蒸肉也是她的拿手菜。但是今天谁也没有心思品尝了。

我给父亲斟上了一杯酒，说：

“我到重庆住定了，就来接你老人家。”

父亲一面饮酒，一面用手抚摸着坐在他旁边的晓谷的头。看得出在这些孙儿中，他是较喜欢这孩子的。

我向家里人表示一定尽力帮助他们。M当场取下了手上的金戒指，交了出来，这是我在她离武汉时花了二十余元买给她的。我是怕我万一和她离开了，不能照顾她，可以做她的生活用度。她又将保留的几块银元也交了出来。父亲收了银元，不肯要那金戒指，说留给晓谷订婚用。

整理行李。将一些带不了的书，包扎好，托大哥将来寄给我。内中有《译文》全套，可惜他没有寄都丢失了。

下午进城等船，大哥送我们。在污秽的小客栈里住下。

第二天11月10日，十二时多挤上了一只上水船。大哥挨了一个兵士一巴掌，我自己几乎被一位军政部的皮带先生所打。看着大哥一人匆匆下船，只说了一声“到重庆即来信”，就低着头赶快走了。我们如果有时间再说什么话，一定会抱头痛哭的。我从此就再也没能见到大哥！

六时过到宜昌。但码头管理员不在，不能靠岸，在江面游了两小时左右，才在离市街四、五里的下游靠了岸。

我从武汉撤退后，在宜都和家人在一起住了一个来月，总算在大后方的陪都重庆找到了一个职业，在复旦大学教几个钟头的课。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从宜都挤船挤到了宜昌，准备再乘船溯江而上。

船靠在江心，挂了划子才上到岸上。我急忙去找史枚，然后搬行李，住进了附近一家叫凤台的旅馆——其实是一座又破又脏的小木楼，我们在楼上找了一间房。一看，四壁通风，楼板裂着大缝，一走动就晃晃悠悠，要是人多点，走起来就像打鼓似的，人简直无法休息。无奈只好暂时安下身来说。

第二天上午去河西，想找一个好点的住处。跑了几处，看情况是办不到了。好点的太贵，不知哪天才走得了，不敢住。稍次的，又早已住满了客人。只好作罢了。

来了两次警报，敌机都到了上空。我们找不到躲避的地方，幸好没投弹，可能是侦察机。

再去找史枚，他说，直航没办法，只有到万县的船，还得四、五天后才开船。既然如此，只好先到万县再说了。

晚上到上海杂志公司去看张静庐。本以为他是浙江帮，可能和轮船上人有来往，托托他看能不能买到直航的票。他住在分店，过的仍是老板的生活，很舒服神气，一点不像是从武汉逃出来的。随便说了几句客套话，聊了点生活方面的情况。他显得很冷淡，我也就不开口说什么了。

他在出版业方面是个老行家。在上海时他曾很有气派地出了黎烈文的《中流》，当时由于有鲁迅先生的文章，成了销数最大的文学刊物。后来又出版《作家》和《译文》。表现最突出的是，敢花钱包整版的广告，用上方头、黑头、大标题、大人名等来招揽顾客，在出版界竞争方面他是很有办法的。这一来他的书刊也就打开了市场，在新书业方面可以和生活书店一比高低了。可惜他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一切都是以赚钱为目的，没有想到为文化事业多做点事，他和编者作者也仅是资本家和雇佣者的关系，所以不可能团结人和他合作。照说现在是继续创业的紧要关头，他应该早早到重庆去占领地盘布置新阵地，而他却安住

在宜昌抽他的鸦片烟，看来连上海时代那点冲劲都没有了。

我在他的出版公司出了十几期《七月》，有人告诉我，他每期都要拿来躺在鸦片烟灯旁细细地研究，据说他对《七月》的编辑和排版方式都很欣赏。但是在许多小地方他可做得使你很不愉快，所以我和他除了编辑和老板的关系外，没有任何可谈的话。

可笑的是，居然有某诗人在事隔四十年后，大约以为我早已不在人世，就编了一个奇闻，说我因嫉妒某作家同在上海杂志公司出文艺刊物，一天堵在门市部的门口用言语讽刺了那作家，使他一怒之下，停办了那销数上万的有影响的刊物。我不知他是捧那编者气性大有骨气，还是嘲笑那编者软弱？居然停办这样有影响的刊物，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者，这不是有点可笑吗？而只想赚钱的张老板又怎肯随便地让它停刊呢？仅仅是为了耸人听闻而编了这段插曲，倒是实情。

回到旅馆赶快给金宗武去信，希望他送文仙他们来，和我们一道去万县。他家留在宜都是不适宜的，而迁到鄂西山区去，老老小小也很不便。不知他会不会同意我的意见。

陈理源和段公爽来看我。陈理源是南京《新民报》的记者，雪苇介绍认识的，是雪苇的小同乡。为人热情能干，作为年青的记者，应该说是有一定水平的。段公爽是宜昌《武汉日报》的编辑，是在抗敌文协开会时认识的。听他们两人谈些此间军政要人的笑话，才舒散了一下胸中的郁闷。

一等就等了四天，船票了无消息。上午响起了警报，赶快拉着M和晓谷去找躲藏的地方。这旅馆不要说是挨炸弹，就连飞机扫射下来的子弹它也经受不住的。我们跑到《武汉日报》段公爽那里。他们都在门市部的楼下，看来也在躲炸弹，因为这报馆总算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小洋房，只要不命中，还是可以挡挡炸弹片的。

回去时向报馆借了十月份的《大公报》，翻阅了一通。看来我们前方作战很是不利，老是“有计划地撤退”这类好名词。要想保卫住这长江下游，恐怕很不易，下一步就是宜昌了。只要敌人一直逼进，我们这种江防工事是无法保住它的。

史枚来了，还是说没有直航船，只能先到万县。当即决定托他设法买两张去万县的票。

看当天的《武汉日报》，上面有战时工作总队到了宜昌的消息，我想去打问一下大哥的儿子张恩的下落。大哥对这个独子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之所以支持我读书，说服父亲筹钱让我去日本，有一个私心就是希望我将来帮助他的儿子。对这孩子，我从他小时就注意他的学习，常寄书给他。谁知他在读高中时交了坏朋友，最后由他父亲花了一笔钱，才将他领回来。从此他在家里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成了挨骂受气的对象。结了婚有了儿子，才决定让他到上海在我身边继续上学。十年没见，成了一个低眉顺眼、说话木讷的年青人，看得出他这几年是在重压下生活的。今年高中毕了业，我本来安排他去杭州考医专，偏遇着八·一三炮响，铁路中断，不能去投考了，只好同我一道回到湖北。

随着抗战的发展，激起了他年青人的热情，挣脱了个人的苦恼和家庭的束缚，跑到武汉来找我。我介绍他去民族革命大学，希望他能有机会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实际工作。可惜到那儿没几天，临汾吃紧，他随学校撤退，又走散了，挤上一辆军车仍回到了武汉。我还没来得及再为他安排地方，一天，他穿着军服找我来了。说是，已和几个同学参加了政府办的干训团，训练三个月后派往前线去做宣传工作，云。看他那份兴高采烈的样子，我不好当面泼凉水，只好说你学习后再说吧。后来我和吴奚如商量，他说等学习三个月后看分到哪儿，我们再想办法。

看到报上消息的第二天，他自己找来了。原来他经过宜都时，回家去看了看，知道我已到宜昌。他告诉我，他们撤退时，收容了一百多名难童，后来在路上又丢光了。在路上还遇到土匪打劫，而那些土匪据说就是他们队长的旧部。

我的大侄女婿(二哥的女婿)也找来了，他是从新沟步行逃出来的。他得知岳母和妻子都在宜都，放心了，说明天一早就去看她们，接她们去重庆。他在居正的最高法院里当名小职员。家里只要见到他，我二哥二嫂可以安心了，家里也可以减轻一份担子。

船票仍无着落。路上遇见罗又玄，他是我在《时事类编》时的主编。晚上他来看我，才知道是陈诚派他来料理联合中学的事情。这学校收容战时流离失所和家里没法供给继续读书的中学生，主要是学一门本事，职业中学的性质。我觉得，能让这批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有一个安心读书的地方，倒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说，准备建校在鄂西北山区，这样保险点，不致再逃难迁移。因此我想到托他保送二哥的儿子到那里去读书，他一口答应了。

几天来都有警报，有时一连来两三次，使人躲不胜躲，连吃饭都打乱了。奔走船票还是没有头绪，一家人都心绪不宁，坐卧不安。前一天夜里隔壁一对年青夫妇吵架，最后那女的又哭又诉地搅得我没法睡觉。M更是犯愁，说不出地苦恼，她怀孕已八个月，再不快点到目的地住定下来，就不好办了。

18日终于得到通知书，七时起卖票，得票后立即收拾行李上船。幸得张恩和陈理源二人相送。船停在江心，想上船的人多得很，划子在江心乱得一团糟，天又下着小雨。划子好不容易才靠到船边，由划子上去翻过船栏杆才挤上了大船。M和孩子也是这样上去的，真是危险得很。张恩和陈理源没上船，在江

心与我们告别后，坐原划子回去了。

船上挤得要命，两边走廊上都坐满了人，简直无法走路。好不容易领着妻儿挤上了三层上的官舱，才算安下了心，真正成了这船的乘“客”。

这船名叫“民本”，据说是民生公司最大的船。民生公司是以服务周到，没有一般轮船的积习而出名的。一般的轮船，如英商的怡和、太古公司用的是不付工资的茶房（甚至有的花了钱才能进来），这样他们就得在旅客身上讨酒钱，卖铺位，敲诈欺骗旅客。

一个穿白制服的年青服务员领我们到舱里。一看，里面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这里很安静，另外两个铺位的客人还没有来，走廊上也很少行人。我为了让M和孩子能好好休息，多花了十来元钱，看来是值得的。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但我们坐在雪白的床铺上，除孩子外，我和M的心里并不好受。

这仅仅是去重庆的第一步，到了万县又怎么样呢？……我尤其是想到张恩，眼看他乘划子走了，而我对他的前途是一点帮助也不能有了。他虽是二十多岁的人，但太老实，一向又被家庭压得没有半点反抗性。现在落在这种畸形的队伍里，我真怕他上人的当，受人的欺。只好到重庆后想法把他弄出来，弄到我身边来，将来再上学或到革命阵营去。

（到重庆后知道他被分到鄂西某中学教书，我才感到安心。谁知他父亲在决定全家仍回家乡时，跑去要他一同回家。他不敢反对，就这么地回到沦陷的家乡去了。

解放初期曾收到他来信，我才知道多次给他们的帮助，他连知道都不知道，全被经手的人吞没了。他的父亲被恶霸杀害

后，他没有为此事来找过我，只是他两个叔叔在奔忙，我当时骂他太软弱无能，并不知道他是不愿纠缠在那里面。这时他在本县的简易师范任教务工作，要我寄毛主席选集给他。但那以后就没来过信。55年我的问题被扣了那三个大字以后，我想他这么个老实人该不会受株连吧。后来才知道，不但是他，我们县里所有教语文的老师都被停职反省一年，交代和我的关系。而我除了张恩外，一个都不认识，都不知道名字。一年后只好放他们出来，并补发工资。不过将张恩调离到邻县任教去了。57年反右时，他在农村工作，并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他本来就不爱说话，55年以后更少开口。但是第二批名单里可有了他，后来知道是为了凑数，他当然难逃这劫运了。从此被开除公职，一家人都被遣散回家劳动。但家里早已片瓦无存，老小七、八口就靠分给的一点贫瘠的土地自耕自食。不久又遇上特大自然灾害，他饿着肚子还得去修路。后来又让他去代卖饭票。一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先吃了一个馒头，被同族的××看见了，硬说他贪污吃了大家的粮，拿起一根铁棍就向他打去。他一边逃，一边解释自己没有贪污没有多吃，可又说不清。就这样，被那人追着，还口口声声说非打死他不可，吓得他只好落荒而走。在外县流浪了几天，腰无分文，也无半两粮票，讨了几天饭，实在过不下去，只好到县政府去投案；县里不收容，要他自己回去。他又怕回去后被那不讲理的强人打死，就逃到邻县的一个劳改机关，请求收监劳动。但劳改机关是不能随便把未判刑的人关起来劳改的，就又行文要县里领他回去，而县里仍是要他自己回去，这样，在他的恳求下，才成了劳改机关的编外劳改犯，派在重体力劳动队，要他拉上千斤重的板车。大约一年多后，体力实在不支，得了劳损病，又得不到治疗，不久就瘐死在劳改队了。死后才通知家属，等家属赶到时已埋葬了，所以

家人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1978年县里文教机关为他平了反，家属想给他迁葬，可是原坟地上已盖起了房子，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想到他一生老实懦弱，终于被逼致死，真是心里难过得很。谁知这在宜昌的一别竟成了同他的永别！)

傍晚时，另外两个铺位的客人上来了，他们的皮箱、行李是由服务员帮忙拎进来的，当然他们也不会像我们似地爬船栏杆上来了。这是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男的西装革履，女的虽穿的是旗袍，但看得出是高级裁缝做的，很合体，上等料子。从那份气派看去，大概是什么地方的中高级官员。

他们对我们十分冷淡，连普通的客气招呼都没有，真可谓目中无人了。这也好，我们正好清静地看看书，说我们自己的话。

在那男的准备换下他的漂亮的笔挺的西装，打开皮箱时，我看到了那里面放着高级的草绿色的呢军服。呵！原来是这么一位新贵。不像是从前方回来的高级将领，可能是哪个军事机关的高级文官。而那位太太，从她的仪表看去，可能是哪个教会学校的学生。现在有一种风气，高级官员爱娶有教养有学问的大学生或教会学校的学生，他们已懂得用贤内助来从事太太外交了，这可能是从蒋介石那儿得来的启示。

一觉醒来，船已在走了。后来听说是有了警报的原故。

早餐后特去拜访这船的经理冉庆之，希望他能介绍从万县到重庆的船票。听他说，昨夜赶快开船并不是由于警报，而是因为上船的人一直在继续拥来，船怕吃水太深过不了滩，就赶快拔锚起航了。

轮船航行在四川境内，江面越走越窄。快到巫山时，只见高峰耸立在两侧，船航行在狭小的江中，简直看不见峰顶，而

那青灰色的大块大块的石壁像巨人似地站在那里，它们只要愿意，一抬脚就可以压碎我们这条大轮船。晓谷和我们一起望着那一片大山，忽然高声地叫了起来，“爸爸，你看，这里蛮好上天的。”惹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船在巫山过夜，说是再往前走江面更窄，还有险滩。远远望见巫山城，没有船进城去，也不见有划子过来，可能是由于水太急太险吧。

第二天船越走越慢，真成了老牛漫步了。江中、江边都是突出的、嶙峋的、像匍匐着的怪兽似的大石滩，像在伺机扑上来吞噬我们，十分可怖，这里就是有名的险滩“滪滩”。据说，看得见的石滩还好躲，而藏在江中心的暗礁就不好躲避了。船停在这里等候绞滩。

在远处的高山上安置了绞滩机，将长长的铁索羁在船头的铁桩上，用人工绞着铁索，拉着船慢慢地指挥着向安全的河道前进。绞索工人在上面喊着号子，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指挥令吧。船小心谨慎地慢慢行进，两边的石滩上有时出现破木船的残骸，有的地方还挂着几片布条，不知是死者的还是纤夫的。看去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伏在栏杆上看它怎样绕过大石，有时可以看到水底暗礁张牙咧嘴的可怕模样，有时还能听见船底同暗礁碰击的声音，真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感。

我们现在是向着白帝城驶去，想到李白的诗，朝辞白帝，暮宿江陵，两岸猿声相伴，写得多么形象，多么美。而现在正是枯水期，我们这大轮船渡一重山都难上难，不要说听猿声，连一个人影子也看不见。不亲自经历这一番生活，就无法和李白的诗相比而羡慕他乘轻舟一泻千里下江陵的气势。

船上传来一个消息，说广州、岳阳、九江、田家镇、信阳

都克服了，而且是得于官电，云。那么，这几处是早失守过了。

20日六时过到万县。天又下着小雨。服务员来帮忙那一对夫妇收拾行李送走，之后又进来了一个很年青的小服务员帮我捆行李。这时我正拿它没办法呢，因为我在铺盖里还得放上换洗衣服等杂物，很难捆好。而在他手里，用棉被将它们一包，用绳一捆，一个四四方方、有棱有角的铺盖卷就打好了。他们是经过训练的，学了一些本领。他很有礼貌地送我们下到划子上，还不肯收小费。我亲身体验到了民生轮船公司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经营方针，如果不是战争，他一定能够击败外商的轮船公司。

下船即找脚夫挑行李，随着他爬了好些台阶才算进了城。先到中正街想找李书城家暂息，到那儿一问，才知他们已搬到天生城寨去了。幸好脚夫帮忙，冒着毛毛细雨，在街上为我们找着一家客棧(三元商棧)。房子又小又脏，临街是店房，往里走有几间小屋，可是没有窗户，只有几片亮瓦射进来点光。看来今夜只好在这里住下了。

这里的客棧是包饭的，一日三餐每天六角钱，在过去可能只要三、四角钱。这客棧多半是住的来万县办货的客商，现在可住的是我们这些难民。

晚饭吃的是煮挂面。这也是四川的吃法，七、八个人一桌(大概就是这客棧的全部客人了)，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坐了主位，他是这客棧的小老板。老板娘在厨房里忙着煮面条。桌子中间放了一碗泡菜，红红绿绿的很好看。一会儿，端上来两大瓦钵面条，各人就自己动手盛着吃。面条上飘着葱花和香油花，吃起来挺可口。我热呼呼地吃着，M却吃得很困难，因为她一向不喜欢吃面。拣了一个辣椒吃，又辣得她几乎叫了出来。那个小老板倒很懂事，赶快说，你用点醋沾着面条吃，就好吃了。

M就学他的样将面条一筷子一筷子地沾醋吃，果然吃下了一碗，晓谷可能是饿了，没有要妈妈喂就自己吃了半碗。老板娘来吃面条时，直夸他真乖。

热呼呼的两碗面条吃下肚，被雨淋得又冷又潮的感觉算是没有了。这家庭式的晚餐使我们感到了温暖，也就不嫌这地方脏了，暖暖和和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拿着“民本”船经理的介绍信去找民生公司的经理。没在。通过他是没办法了。想要买到船票真是渺茫。

路遇《新华日报》的徐迈进同志，问他昨天船上传的消息，果然是假的，不过这万县也大放了一通鞭炮。和他一同到书店去看看，只见宪兵正在那里没收书籍。我们两人只好相对苦笑了。

下午去天生城寨找李书城。那寨子在山顶上，只好坐箢子。上去的路悬陡得很，等于“上天”。这地方就是万县失守了，日本人想上来也很难，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

我这次上山，主要是告诉他们金宗武一家的情况和他们的打算，别的没有什么事。他和杨景煜住在一起，杨也是我的熟人。在杨家吃了晚饭，再在黑暗中乘箢子下了山。

看来想很快地买到去重庆的船票是不可能了，好在这旅馆还便宜，住十天半月我还住得起。这里的生活也便宜，M简直不相信她手中铜板的价值了。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三个大桔子，老板娘还说，到河边去买，一角钱能买一秤呢。挑担卖的青菜萝卜，一个铜板就能买一斤。就是房间太暗，我无法看书工作。

听说这儿的公园很好，下午就和M、晓谷去逛西山公园。这里的天气，早晨不是下毛毛细雨，就是细雾濛濛，得到下午才能见到太阳。这公园倒真不错。依着天然的山势建成，所以显得很宽敞。你愿爬山可以往上走，你愿散步，就可在低处徘

徊。有坐椅和小茶馆，比上海武汉的几处公园好多了。我想第二天带书来在这里看。

谁知第二天就下了一天的雨，没有雨具不能出门。酱在客栈里真无聊。幸好晓谷叽叽喳喳地问长问短，还能给我们解解闷。晚饭后和他们一起去看四川戏，它和京剧、汉剧都不同，用的全是四川方言，后面还有帮腔的。可惜内容低级得很，无欣赏的价值。

还得跑民生公司，看是不是能购到票。幸好遇见了史枚，他是昨天到的，也来接洽船票。他告诉我说，明天的“民联”可以想办法，不过只有活动统舱。没办法，活动统舱就活动统舱吧，在这儿闲住实在令人焦急，好在船上也不过三、五天。就决定下来了。立即给关伯庸去了一信，他是和陈理源一起在重庆《新民报》工作的，也是雪苇的同乡。希望船到时他能来码头照料一下，当然还希望他给我们找个住处。

第二天一早赶到民生公司买船票，可是挂出牌子说票已卖完了。又找史枚，他的友人李君有一封给船上无线电员的介绍信，明早可以先搬行李上船，上了船再给我们补票。无奈只好这样了。

回来路上遇到姚楚琦，同到客栈。她说住在郊区某处。想起来了，她的丈夫张止戈好像是四川万县人，她大约是住在他老家。

她是我在东京周颖夫妇家认识的，读早稻田大学，是周颖的同学。我们都讨厌她的丈夫，他进的是日本的士官学校，想出来当军官的。最使我们反感的是，张止戈读书靠姚楚琦供给，可是他用的是欺骗手段，家里另有老婆孩子，他从姚楚琦那里拿了钱寄回去养家。姚是浙江某地茶商的独女，似乎很有钱。现在姚的家乡沦陷了，而张止戈已学成回国，当了团长。在武

汉时他们来找过我，张参加了上海、南京对日的战争，似乎他那一团打得还好，报上见过他的名字。他来找我，是想让《七月》上给他吹嘘一下，他对我说：“老大哥，小弟这次是决心牺牲头颅保家卫国和日本人打到底。一定要打几个漂亮仗，学了这多年的军事，是用的时候了。”但我对他的人品实在没好感，终于没有写他。

果然，现在姚楚琦向我大骂起张止戈来了。他不肯寄钱接济姚逃难在外的家人，姚说要和他算帐，追回她为他花的钱。这个人完全是旧社会的那种升官发财的武夫，没有什么道义可讲的。姚当晚没有走，留住在这里了。

第二天早晨送走了姚楚琦，立即送行李上船，先存放在无线电报务员那里。回来后，和M、晓谷在万县街上走了走。为了等船这偶然的机会有在这里住了一周。M对这城颇有好感，她说如果能选躲难的地方她愿留在这里，这里生活便宜，民风也很古朴。这可能是从老板娘那里得来的印象，老板娘很喜欢我们的孩子，常在吃饭时给他留点好吃的。她对我们这些从下江逃难来的总是表示特别地同情，希望这城永远不来日本人。

下午，买了点饼干之类的食物，就同M、晓谷上船了。这次上船比宜昌上船更是惊险，幸好有朋友帮忙，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怎样使M、晓谷爬上这高高的三层甲板呢。

船仍停在江心，坐划子靠到船边，我先从船舷栏杆上翻爬上去，然后将晓谷拉了上去。但是要拉M我就不行了，因为她大着肚子，我实在怕船舷碰伤她。这时，史枚的朋友李君翻上船舷，一人一只手将她拉了上来。但是要上列三层可没法穿过那满是人的通道，我只好再爬上三层轮船栏杆。无线电报务员来接我们，由他拉了我一把。孩子是下面有人托着，拉了上来的。M怎么办？要她自己用力攀是不行的，也只好由下面的人

托着，我们俯身下去拉住她的手，她还用得肚子靠着船舷才翻了上来。当时我真担心伤着肚里的孩子，后来她自己回忆起来，也不由得胆战心惊。她说：“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气力，顺着你们拉我的劲，自己用身子按在船舷上，一用劲就扑到了三层楼栏杆上了。这样，你再拉我一把，我自己再用一下劲就翻上来了。当时我就怕你们没劲了，一松手我就会落到江心的。别的我什么也没想。”这可能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吧！进川在我们是这样难，当然我还不能预想到往后我所处的更难更险的处境。

把他们安排在三层船头甲板上就地坐下，但是，我们在哪儿安身、睡觉呢？还得去经理室交涉。到晚上了，才决定就让我们在船头甲板上。将行李拿来打开铺盖，找了一个避风的靠里面墙的地方。这个活动统舱上面只用帆布盖了一下，三面无遮拦。已是初冬了，刮起风来可够冷的。公司说明天十二时开船，那么在船上顶多三天，只要到了重庆就好了。

半夜里还不停地有人上船，早起醒来一看，我的前面左右都打上地铺住了人。

人越来越多，吃饭成了问题。早晨，吃了路上买的点心，可是午饭呢？轮船不起锚是不开饭的，想上岸去买饭吃，可是周围江水涛涛，没法子上岸，人又越来越多，要想挤到下面船边去都不可能，何况上岸！还剩下几块饼干和蛋糕，M给晓谷吃了。我真失悔早晨吃得太多，没有想到孩子。

饿到傍晚了，有人说下面有划子在卖烧饼。赶快走到船舷边去看，是有几个划子在卖烧饼，但是都给底层和二层的买去了，我们在三层买不到。却有一个聪明的船家，他用竹竿挂上一个篮子向我们伸来，里面有烧饼，他要二个铜板一个（岸上只一个铜板）。这不管他，我想买十个，钱付了可是只给了我八个。真狡猾！M说再买几个吧，贵就贵点。再去时他已卖完划着船

走了。

人还在陆续地上，挤得已经无法走路了。为了争位子，我们这里发生了几起打架事件。我们旁边一直留着的位子，住上了一个老女人带着七、八岁的女孩。听声音是武汉人，她们是由船上的人送来的，因此中午有人为她们送来了两碗蛋炒饭。这人大约是船上的伙夫，也是武汉人。我马上和他商量是不是能卖两碗给我们，他说饭倒容易，但是没法子送上来，只好作罢。我们刚才每人吃了一个烧饼，这时M又拿出一个烧饼来给晓谷吃。问我要不要，我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好意思再吃了，何况也口干得不得了。

这里又来了一个穿军服的下级军官，可能是干后勤的，走江湖的兵油子。他不但带了许多行李和大包食物，还带来了行军床。这个轮船的甲板上，就他一人高高地睡在床上。后来有人请他把行李放在床下，旁边可以再睡一个人，他就跳了起来，做出要打架的架势，哇哇大叫，“老子本来该坐官舱的。让我睡到这里，还要让你地方？”经我们好说歹说，他总算是将几个小包塞在床下，让出了二尺多地盘。

他床头的小皮箱正好成了一张小餐桌。他打开了食物包，又拿出一瓶酒来，就着那卤菜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还不时地向我们说：“这是四川的大曲酒，真是好酒。你们来点吧？”当然没有谁去端他的杯子。

那伙夫又给他亲戚送来了蛋炒饭。那老女人看着晓谷在艰难地啃烧饼，就用碗拨了一点饭给晓谷吃。我们不肯接受，她就说：“这伢多乖！已经一天了没吃饭，看到别人吃也不闹。可是，怎么能饿坏了孩子？吃吧！大家都在逃难，谁知道我们明天是不是也要人帮助呀！”我们只好道了谢，让晓谷吃了。我们请那工友帮忙给我们弄点水来喝；现在想弄到点盥洗间的生水

都不容易，里面总是关着门。这要求办到了，他拎了一壶水来，大家分喝。M倒来了一磁缸，我俩才下决心把剩下的两个烧饼一人一个吃掉了。

到我们上船的第四天早上，11月29日，船终于开航了！

吃饭问题总该可以解决了吧！可是为了吃饭，好几处都打起架来了。为活动统舱的客人送饭，刚端出来，就被底层的人一挤抢走了，没抢到的就打架，到二层还是又抢又打架，三层就无法送上来，常被底层、二层没抢到饭的人抢去。好不容易到了十一、二点钟，才送来了第一餐饭。我们总算是抢到了两份，吃了在船上四天后的第一餐饭。

饭吃完了，整个船头甲板安静下来了。我开始看手头有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原书第一卷的上半部是周先生题的书名，神州国光社版）。

当夜在忠州抛锚过夜。

第二天看完了这一本《静静的顿河》，觉得写得很平凡，不知后面将如何？向旁边的军人借来了《描金凤》。他大概是军队里的司务长一类的人，常常出门的，对自己的生活想得真周到。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生活得很好。这几天，我们都受了各式各样的苦，而他可一直自得其乐，不是喝酒就是找人打纸牌，高兴时还天南海北地用带着各种方言的声音聊天。他成了这里的活跃分子，开始别人不喜欢他，怕他三分，过后他一随和，大家也就乐意同他说话了。

当夜在涪陵下游抛锚。

又向军人借来了《走马春秋》。这些都是无聊的旧小说，在我看来连消遣都不够格的。无怪乎鲁迅先生曾向我说过，他为了编《中国小说史略》，到图书馆去读了许多中国的旧小说。他慨叹地说：“每看完一本，我把它向旁边一放，心里就说少活阳寿一

年！”而鲁迅先生为了完整正确地写成《中国小说史略》，只好花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为了吃饭又打了起来。那一天已经到下午五点了，第二餐饭还没有影子。这时过道里传来了打架声，还夹杂着女人的哭声。M去看了看才知道是为了争厕所。厕所里老关着门，三层上有几百人只有两个厕所，本来就够紧张的了。一个官舱的女客人，在外等不及了，气得用手打破了玻璃，原来里面已经成了住人的地方，怪不得不肯开门。这样就互相对骂了起来，后来弄到动手。不过睡在那里的人终于出来了。

可能船上已开不出饭来了(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轮船终于停在一个小镇(属江北县)旁边，让乘客上岸去买东西吃。我上岸去吃了一顿热饭，又买了一包肉包子和蛋糕等食物，给留在船上的M和晓谷也饱餐了一顿。

12月2日一时许，船到重庆。望着这从未见过的山城，那数不清的高台阶使我们望而生畏。总算到了可以安身的地方了，今后会怎样？能如愿地工作吗？……艰难啊！

下 篇

清晨，整个江面被大雾笼罩着，远远望去只见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分辨不出。船离重庆只数十里之遥，但是不敢开近，就在江心等着。我们这些旅客也只好焦急地等着。快到十一点钟了，雾慢慢地散了开来，船才慢慢地开动。一直到站在船头瞭望的旅客叫了起来：“重庆，重庆！”大家才舒了口气，总算可以结束这多天的困境了，真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12月2日一时过，船靠岸，到达重庆朝天门。幸好关伯蓉(庸)跳上船来接我们了。费了好大力才把行李取了出来，这儿

和所有的水码头一样，脚夫已一窝蜂地拥了上来。关君用本地话同他们讨价还价，一下子就办妥了。于是我牵着儿子，扶着妻子，慢慢地一级一级台阶向上爬。到了顶上了大街，我们才算是真正踏上了重庆城的土地。

坐车到关君早为我们找好的磁器街永华旅馆。这是一个处于闹市的小旅馆。重庆住宿紧张，如果没有关伯蓉的帮助，我们是很难找到住处的。连这间小小的七、八平米的住房还是他的同乡也是雪苇的朋友孙君让出来的。这小屋内有两张小床，靠门口有一张小桌，中间就只剩两人能行走的空地了。这旅馆和万县的一样，每人每日七角钱，连伙食在内。

收拾好行李，吃了旅馆的第一餐晚饭。虽然有荤有素，但量很少，又很辣。旁边放了一大桶米汤。我们倒还能对付，可苦了孩子啦，硬硬的米饭、辣椒菜，叫一个四岁多的孩子怎么吞咽得下！他妈妈发愁，我也发愁，看来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找房子安家。

第二天到青年会找到了老舍，他交给我复旦大学的聘书和时间表，大学教书的事算是完全定下来了。和他一道去抗敌文协，文协在临江门找到几间房子，把牌子挂了出来。老舍告诉我，幸好他们早来了，现在要找这几间房就困难了。在那儿见到了魏猛克及宋之的夫妇，一道去吃了饭，然后又陪他们到旅馆来坐了一会儿。

M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刘仁和长谷川照子（即绿川英子）来这里找房子，并且说国际宣传处也迁到重庆来了。

老舍告诉我，明天《新华日报》社将为十六名殉难者举行追悼会，我上街去买了一段红绸，写上“民族英灵”四个大字作为挽词送去。他们是从武汉护送报馆的器材等撤退到鄂西某地时，小江轮被敌机轰炸扫射而牺牲的，是我所知的第一批为抗日救

国的文化事业献身的民族英雄！

第二天下午和老舍一起去参加追悼会。我的挽词放在十六位烈士的遗像下，显得很夺目，就是我的字太坏了。我是用这样一个行动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和对敌人的愤恨的。

会场中遇到的熟人很多，有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华西园、绿川英子夫妇等。绿川讲了话，临时请我为她作了翻译。

从华西园那里知道了董老的地址，特去拜访了他。听他谈国内外形势，并且了解到今后的工作方针仍是以“团结、进步、抗战”为主。《新华日报》已开始登载毛泽东的《论新阶段》。

陈理源和关伯蓉两位都是在《新民报》工作的。由于他们的好意，《新民报》登了我到重庆的消息，女经理还招待我吃饭，召开座谈会，请我为他们的报纸写文章，表示对我的好感。

柳湜编的《全民抗战》请客，我也被邀参加，他要我帮忙，写文章。那天，法国记者李蒙夫妇出席讲了话。

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第二届全会，被推为候补理事。我想这大约是张西曼这老先生为我提名的。参加了中苏文协的研究工作委员会，这样，也就得参加他们的一些工作。后来，出席了中苏文协举办的诗歌座谈会，我作了关于诗的报告，贺绿汀作了关于歌的报告。

抗敌文协也有许多事要做。开过一次理事会；关于研究股的工作，开了一次诗歌座谈会；和老舍谈过多次怎样推动文协的工作。

这种种都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现在这小旅馆，交通倒很方便，是市中心闹市区，买东西、看戏、看电影都很方便，就是吵得很。这里住的多半是小行商，是各县来这里坐庄的，来采购的，所以都是长住户，白天出去，晚上看戏，总得

十二点后才没了人声。就是白天，提篮的小贩也川流不息地来往，我的住房又在走廊的角上，走过的人就更多了。有卖瓜子花生香烟的，吃饭时有卖炸鱼炸虾的，还有拿着一个铁叉一震、一敲的，M好奇地问他，才知道是剃头的，这里叫“来诏儿”。倒真是古老的名字，可能是清兵进关时对那些不剃发的人特奉诏命来剃头吧！这旅馆生活方便，房钱便宜，M倒还满意，路过这里和常住这里的朋友们来找我也很方便，就是太嘈杂没法工作。

我每周还得起个大早在四、五点钟时赶到千厮门候小轮到北碚去上六节课。第二天下午或第三天一早再赶回重庆来。在嘉陵江上来回的小船很难坐，有时去了船刚开走，就得等第二班，有时大雾濛濛船不能开，又得等。常常是赶到那儿已是下午，上了两节课，第二天再上三、四节。复旦大学在北碚的对岸黄桷镇，伍蠡甫是文学院院长，陈子展是中文系主任。伍领我去见了校长吴南轩，教务主任孙寒冰据说在香港还没回来。到他们各家去坐了坐，被请吃过晚饭。他们多半租住小镇的民房，还算舒服宽敞。我问是不是还能找到房子，都说现在比较困难，愿意住乡下的人越来越多了。伍蠡甫决定为我开一门“创作论”，另外教日语三小时，只三、四个学生，一个是日裔华人，算高级生。选“创作论”的学生很多，来听课的更多，经常有四十来人。他们有一个“抗战文艺习作会”的组织，邀我去为他们讲话，我讲了《抗战后的文艺动向》。后来也常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每次都到学生四、五十人，是一些爱好文艺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些青年都是从各地逃亡来的，本省人几乎没有，他们或多或少地经历过苦难的考验，所以生活经验很丰富，但又充满了自信，非常活泼大胆，不同于过去上海的那些少爷学生。座谈会开得不拘形式，活泼生动，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内中有一

个学生陈绪宗，是我在武汉时有过通信来往的读者，对我就更加亲热，常常帮我一些忙，甚至帮我买船票。他似乎是这习作会的中心人物（后来他去了延安。解放初在东北重见，那时他已是团的重要干部。多次和我恳切地谈话。到我出事时，他被牵连上了，搞得很惨，连他妻子都受了株连。“四人帮”时他被迫害死了）。

在这样一种忙碌奔波的情况下，我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写些短文：为《新华日报》写成《从义卖献金想起的》，为柳湜编的《全民抗战》写了《关于风气》，为《新民报》写了一篇短文，还为《国民日报》的征文写了一百多字的答案。……《大公报》的陈纪滢也多次约稿，我实在写不出来，只好拖着了。

我最中心的最急着要办的事，是继续编《七月》杂志。在武汉时，胡愈之曾向我提议和《文艺阵地》合并出版，由我和茅盾合编，茅盾去新疆了主要由我编，云云。我没有同意，因为这两个刊物的性质和读者都不同，我无法合起来。胡愈之还是一再地向我表示对《七月》很有好感要设法说服生活书店出版。这次我去找生活书店，给我的答复是“不出”。这倒干脆，但我可感到受了侮辱似地气愤！

张静庐也到了重庆。我去找他谈，没有回绝。几天后再去，答复是“不够成本”。

柳湜对继续出版《七月》的事很表同情。一天，特来告诉我，胡愈之到重庆了。第二天，胡就亲自到旅馆来看我，告诉我鹿地、池田来了，希望我去看看。以后我多次见到他，都和他谈到文艺方面的问题和出刊物的问题，他一再说要为我想办法。他创办“文化供应社”请客时，不但请了我，连那打印好的社员名单中也居然有了我的名字。可是不久他离开重庆到别处去了，我们就没再联系。

这个刊物，沈钧儒老先生也很关心。我去拜访过他，他还向柳湜说，要到旅馆来回看我，我赶紧请柳湜向他表示谢意阻止他。一次，在柳湜家遇见他，和他谈起刊物事，我当然发了一通牢骚。后来，他说只有由他筹钱自办等，这当然是为了安慰我的。

使我感到负担很重的是，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稿，都亲切地关心这刊物。曹白从江南游击队寄来《半个十月》，殷殷以《七月》为念。还有青年诗人孙钊，每次来看我，都给我带来诗稿，听我谈他的诗。最后一次来告别，说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恐怕以后连通信都难了，留下了一卷诗稿。这些，我都应该让它们与读者见面。

刚到重庆不久，从绿川英子夫妇口中得知国际宣传处已迁到重庆。几天后崔万秋来看我，还约我们到他家，然后和他们夫妇一道出去吃饭，这些都是表示好感的意。最后，他来商量说，国际宣传处给我一个特派员的名义要我去，月薪一百六十元。这笔钱对我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宜都的一家老小需要我资助，但一月48元的教书钱连我们自己都很难维持生活。我提出只能做半天工，一周还得去复旦两天，当然，交下的工作我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补上。他们都答应了。到那里去还有个好处是，可以看到日本新出的报刊，了解日本的进步文化活动，同时工作也并不多，只要为对敌宣传广播写写稿，或看看别人的稿，译点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这样，我就同意了担任这个“特派员”工作。同样情况的还有高麟度。

在重庆有了工作，我就更积极找房子了。托了好些个朋友，都还没有回话。M到刚迁渝的江苏省医院检查身体，说是预产期可能在1月底。这更使我着急了，总不能让她在旅馆里坐月子

吧。她倒很沉得住气，忙着做小衣服。这些东西，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只在离开武汉时，宗武夫人金文仙送了M一包小衣服，现在还得添几件。

和她一起去看上海来的中医生祝味菊。他曾是四川名医，我是由胡兰畦介绍认识的，我想他人头熟总能想点办法。第一次去，他不在家，招待我们的是他的女学生，过去在他家见过，那时在帮助他夫人料理家务并教他女儿功课。这次没见到他的夫人，而那个女学生似乎已是新夫人了。不敢造次，只留下话就辞别了。第二次去，正好晓谷生病发烧，也算是请他看病。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但看去老多了，有点凄凉感，果然是夫人到此后不久去世了。现在的生活虽然住着几间大房子，但和他在上海江湾郊区的洋房比是差得太多了。说起找房子的事，他说，现在人来得多，房子可俏呢，一时恐怕难找。在他那里吃了一顿很精致可口的家常饭。

又去找陈理源，以为他是报馆记者总该能有路子。回答也是“没得”！我认识的能同本地人有关系的就这两位。鹿地夫妇在城里找到了房子，是在学田湾山顶上一幢洋房的第二层。那里倒有余房，可是我出不起这么高的房租，进出上山下山，他们两个设计委员有高薪，可以坐滑竿，我们得天天爬上爬下，太辛苦了，同时我们也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

看来只有在复旦想办法了。托了陈子展，还有湖北同乡张定夫。张现在复旦法律系任教授，他一家三、四口人就住在镇上，租了偏厢房四、五间。我希望他能通过房东介绍我两间房。他带我去北碚一个也是复旦教授家看房，那教授说可惜刚收了定钱，如果那家不来愿意免费请我住，云。

1938年除夕，我从北碚赶回城里。想到孩子真可怜，病在旅馆里，就低头拾了几粒圆的小石子，算是给他的新年礼物了。

到家知道他咳嗽还未全好。为了庆祝除夕夜，为了让孩子吃点好的，我带母子俩到小馆去吃晚饭，用去一元一角，但是晓谷并没有吃什么。使我们难过的是他平时爱吃的圆子汤，这时都不感兴趣了。

为上班，为上课，为开会，为找房子到处奔走，有时 M 和孩子也跟着我奔走，想找到一间房子。可能是活动太多了吧，她提前半个月生产了。

15 日晨二时开始腹痛，她一直坚持到早晨五时。我看她越痛越紧，心想这不比在上海生第一个孩子时，半夜有出租汽车可叫，一会儿就能到医院。所以我决定马上送医院。坐上滑竿到了江苏医院，谁知回答却是没有床位。我一再请求，他们告诉我连走道上都摆了床，实在没办法，要我们到重庆的宽仁医院去看看。一个女医生可能是出于对同乡的同情心吧，为 M 做了检查，说是已开了二指，要赶快去。并且还教给她一个办法，说痛得紧的时候，赶快张开口，可以拖延些时间。等我们上坡下坡赶到宽仁医院，一问又是没床位，怎么说也不行，根本就不让你进大门。后来看门的告诉我，刚才一个，孩子生在滑竿里，才放进去的。收拾了一下就叫产妇走了。你们还是到别处看看吧。他告诉了我一家私人医院。到那里一看，倒有一间宽大的房子，放有四张床，一个产妇都没有，医生是刚从外地来的，可能是新开张的医院。产妇住的房子在门内院子旁，孤零零地离医生住的正厅还很远呢。再一问，一天要二元钱，还不管伙食。这样，M 坚决不肯住，我也有点不放心。就又由滑竿抬回到了江苏医院。M 说，还是再去求求他们，看能不能看在同乡的面上，让我们自己买一张帆布床，在那里住两三天就回旅馆。我想也只有这办法了。交涉的结果，主任不答应，说这样可能出事故，他们负不了资。最后，还是那个女医生自告奋

勇地说：“你们快回旅馆去，我立刻就来，在‘家’生吧。”无奈只好如此了。

早晨出门时满天大雾，回来时雾已散了，扶她回到房里，一看晓谷不在，吓了我一跳，跑到孙君那里，原来他们从会计那里知道我送M上医院，就把孩子接到他们房里去了。这样就索性托他替我照看一下孩子。

旅馆里隔音不好，我们住的又是人来人往的楼道，看得出M是怎样忍着疼痛不愿呼叫啊，她只是在疼得无法忍受时，用劲地抓着我的手，但我一面还得做医生的助手。十二时生下一女孩。刚将脐带等弄好孩子包扎好，我去为医生打热水洗手时，忽然警报大响，医生吓得连手都不洗拔脚就走，还是我劝住了她，要她洗手，为她收拾了药箱，交给了她五元的接生费。她说明天再来看看，M希望她多来几次，她答应了。

这时，整个旅馆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没有了叫卖声，没有了人来人往的吆喝声。看来这次敌机是打算轰炸重庆了。我不能离开刚生下孩子的产妇，她可能是刚才使了太大的劲，现在是那么地平静，简直好像没有听到飞机的轰鸣似的，完全沉浸在做母亲的幸福中了。我坐在她身旁，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想着，要是被炸中了，就死在一起吧。

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可能我打了一个盹。忽然听到M问我：“晓谷哪去了，怎么还不回来？”我才发觉这旅馆又恢复原样，响着一片嘈杂声了。时间已经三时，从来往的人口中，知道今天敌机不但侵入了市空，还投了炸弹，伤了数百人。赶快到孙君房里去看，说他还没回来，又说可能到南岸去了。这倒使我感到有点不妙，因为听说今天临江门挨了炸弹。就怕他们从临江门过江去。M很是不安，甚至说：“我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女儿丢了一个儿子呀！”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这时忽然听到门外有晓谷叫妈妈的声音，我高兴得赶快打开房门。看来他玩得很高兴，孙君在他后面站着。我谢过了孙君，才知道他们是从海棠溪到南岸去的。总算是一场虚惊！

晚上七时，陈铭德请吃饭。多是新闻界的人，《武汉日报》的段公爽也到重庆了。饭后赶到池田处，她很挂念M，我是去向她借钱的，借得七十元。

有人告诉我，周璧光在探问我的住处，我就问了周的地址，我应该先去看他的。

出来时大店铺都关门了，本来答应给M买面包的，现在买不上了。可总不能让她挨饿呀，只好在一家小杂货店里买了一包饼干，当她的晚餐了。

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是经过了一场生与死的大搏斗，终于胜利了。但也都疲倦不堪了。我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时才起来，赶快去冠生园买了奶油圆面包，算是给她这产妇的唯一食物。旅馆的饭她是无法吃的。我去找会计先生，希望他和旅馆洗衣服的女工说说，帮我们洗洗尿布等等。他一口答应了。这人对我们很好，曾上来看我，对我们说，有什么贵重物品顶好交柜上保管，说这里人来人往地乱得很，进出一定要关门，最好是锁门。这次他还说有什么事要他帮忙尽管言语一声。我说，吃饭叫伙房另开，送到屋里行吗？他面有难色，我只好算了。

王苹知道M生了小孩，特来看望，还送来几十个鸡蛋和一盒点心，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正在发愁不知道怎样安排产妇的饮食，对这些家务事我是从来不过问的，所以该干什么能吃什么我都不知道，M也从来不向我提出什么要求。

后来M告诉我，王苹自己也经历过一个人睡在产科医院的情景。她由于反封建从家里出走到上海参加了左翼剧联，同宋之的结了婚。生第一个孩子时，没能得到家人的照顾。M曾去

看她，给她送去了小衣服和吃的东西。现在她和家人团聚了，老父母不但原谅了她，还一直在失悔自己没去找她没能把外孙带在身边。现在孩子留在沦陷了的苏州乡下，音信全无，大家都很难过。她们这种女人之间的关心和体贴，很使我感动。

赶快按地址去找周璧光，他正好在家。见到我很高兴，他说：“你胖多了，路上见着，那是认不出来的。”他没大变样，也胖了些，精神不减当年，谈锋甚健。问起来才知道他迁回泸州老家了，他夫人高香祖在家乡办了一个农场，种葡萄酿酒，还真搞得不错。谈起一些过去的熟人，也多不通音讯了。我在南昌避难时，他的同乡我的老师穆济波拉我去在他手下当了二十八天的宣传科长，当时他是滇军第九军的政治部主任。

他谈起我两次被捕他保释我的情形，说：“我们那时哪管什么共产党呵，只要不闹得太猛，就装不知道。我和朱德、朱培德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在×地的亭子柱子上，还刻有我和朱德到此一游的字呢，现在都还在。”说着大笑了起来。

谈到找房子的事，他一口答应了，说他本人就有一处房子在上清寺附近，可惜已经让给王军长家了，不过还可以想想法子。我说过几天来听回音，就告别了。

第三天他亲自跑到旅馆来看我们。看到这么一小间房，M躺在床上，身旁是小女儿，大儿子在地中间站着。我只好请他坐在另一张床上。他知道M刚生产三天，一面称赞她身体好看不出是月母子(产妇)，一面又摇摇头，“这太不方便了，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坐月子”！很是同情。我送他出门时，他悄悄地对我说：“那房子王军长已让给别人了，不过你别着急嘛，我再去同他商量商量，一定想个办法。”

三天后M就下床了，亲自洗尿布。因为那位女工嫌脏不肯洗，说洗了吃不下饭，告诉她会给她钱的，她仍是不乐意。M身

体恢复得很快，连医生都很吃惊。婴孩的脐带也脱了，那女医生来帮忙洗了个澡，还直夸说这孩子长得健康漂亮。做母亲的奶水很多，可她吃的只是米汤冲鸡蛋花泡面包，有时我忙得忘了买面包，她不得不吞吃旅馆的硬饭和带辣椒的菜。后来她常发胃病，医生就说是因为吃了不易消化的饭菜。她自己感叹地说：“我比一头母牛更不如呀！好东西吃不着，有时还得挨饿，但是每天的奶水，孩子还吃不完。”我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是你做母亲的伟大嘛！”其实说这话我是有愧的，我实在关心她们母子不够呵！

谁知就在女孩出生的第十天，半夜四时左右M喊醒了我：“快开电灯！怎么孩子满脸都是血？”

跳起一看，孩子满头满脸连头下面包的被子都是血，却还在熟睡着。M仔细一察看，才发现是被老鼠咬了，鼻子上、嘴唇上、左耳朵上都被咬伤了，在不停地流血，脸颊上还被鼠爪子划破了不少的伤痕。

我吓得几乎全身发抖，不知怎么办。倒是她还沉得住气，叫我快找出红药水和棉花来，她轻轻地擦干了血就用蘸着药水的棉花擦了伤口，这时孩子才哭个没完。她将满是血的包被换了，叫我赶快抱去江苏医院看看。老鼠是有毒的动物，如果孩子中毒感染了，那就危险了。

赶到医院挂了急诊，我说孩子被老鼠咬了，请快点看看吧。他们可一点也不着急，只用药水洗了洗伤口，仍是擦的红药水。我希望他们擦些药膏，以免孩子感染受苦，他们说没药膏可擦，又不能包扎，只要不化脓感染就没什么问题。我只好抱回来了。

孩子沉睡着，做母亲的放心不下，一会儿看看一会儿听听，最后说，这地方太脏，到处都是灰尘，快去买块纱布来，为孩子遮住尘土吧。

很快，旅馆里的人都知道我的孩子被耗子咬了。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显得奇怪，那个洗衣女工还告诉M，她们乡下有的孩子的鼻子或耳朵都被咬掉呢，因为老鼠闻到了奶香味嘛！大人也有的被咬了手指头或脚趾头。四川的耗子可真厉害呀！今后我们要与这些暗藏的小动物生活在一起，想想都有点不舒服。

M本来已经够苦的了，现在更是每晚都睡不好，听到老鼠跳动就胆战心惊的，只好把婴儿搂在怀里睡。我又去找周璧光，他陪我去重庆邨想办法要回三楼让我住。但那位是贵州的军界政客现任政治部的设计委员，虽然还没搬来，他们也不好让我住进去。最后，周璧光叫打开旁边那间他堆放杂物的矮阁楼式的房间。面积有十几平米，有个朝西的窗户，是过去主人家的佣人间。不过这对我也就很满意了。

说定了让我住，我就去国际宣传处叫了一个勤杂人员来，将杂物归理到一边，有一些家具还可以利用。然后赶快回去准备搬家。

2月2日晨八时搬到重庆邨阁楼。在小旅馆一住就是两个月，今天总算结束了这旅居的生活。

我在这里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写在昏倦里》。现在摘引几个片段，以见我当时的心情。

……当我用了二十二天的时光走完了原来只要四天的路程，从小划子踏上重庆江边的沙土，心头也禁不住惘惘地跳动。那原因是说不出的，但不会是欢喜，因为那以前有些朋友已给了我诚恳的表白。现在想一想，恐怕也并非由于对于土地的渴望，而是好容易又回到为战争而工作着的人群里面来了罢。

……但这“美丽的山城”（这描写是我从谁的文章里面记来的）底第一击给予我的昏倦，一直拖着我不曾散去，

有时甚至还要加厚。在昏倦里，我有的只是，无为。望着许多工作焦急，但自己却拿不出可以叫做力量的力量。……

……除了寻觅口粮以外，有时每天开一个会，有时整天地谈话，讨论。只是，这些会，这些谈话，这些讨论，到底有什么结果呢？不但事后，连事中都觉得有些渺渺茫茫的事情，人是不会兴奋或沉醉的，于是就更加昏倦了。

……就在这样的心境下面，我挣扎了无数次，和拖着我的昏倦奋斗，但说来惭愧，每次都是全军覆灭地败北了。……

……为了求救，有时试向和我一样地也有点像“文艺政客”的朋友探问：

——怎么样？工作得很好罢？

——哪里呵，倦得很，手都抬不起来呢！

或者：

——工作？闷得吐不出气来呀！

我收到各地朋友们的来信，都对我寄以希望和鼓励，都在不停地唤醒或打破我的昏倦。如，丁玲、雪苇从延安的来信；曹白、柏山从江南游击区的来信；还有寄来的许多诗篇和小说……。读了它们都像有股力量在帮助我走出昏倦！

我那篇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

如果真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我们的精神战士就不该也没有权利在昏倦里面渐渐地僵死。

……我们非从这昏倦中间突出，把这个昏倦的罩子一锤一锤地敲碎不可！

M产后刚半个月，就开始上坡下坡地忙家务。先布置这十几平米的房间。我们尽量利用周壁光堆放在那儿的家具，从中

找出一张大床和一张坏行军床，其余杂物归在一角用布帘遮住。我们又去买了一张竹方桌、四张竹凳和一些锅盘碗盏之类。这里东西便宜，尤其是竹制品，这一切还没花到十元。我借的几十元蛮够用了。

我这天要坐长途汽车赶到复旦去上下午的两节课，第二天下午再坐车回来。M和我一起上面馆吃完面后，就抱着婴儿牵着儿子，在两路口车站为我站队买票，而我还得抽这点空赶办别的事。看着她瘦骨伶仃拖儿带女地站在那里，心里实在有点酸楚。

从北碚回到家，M告诉我，她的腿关节疼得几乎打不过弯来，好容易才出去买了早点。在买早点时，她遇见一个湖北妇女介绍一个小姑娘可以帮我们做家务。她问我怎样，工资要好几元呢。我一口答应，“多花点钱吧，你一个人是弄不过来的，病倒了更糟糕。”

这小姑娘就住在我们邨后面的小平房里，也是武汉逃出来的同乡人。她随兄嫂过活，兄嫂一大堆孩子，现在吃用都贵，他们就很有点嫌弃她。是她自己托人找工作的。我们把她当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孩子也和她侄儿一样叫她三姑。

6日，参加抗敌文协的诗歌座谈会。到的人真不少，谈话主要是围绕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问题，谈得很杂乱。最后，我作了综合性的总结发言。

8日下午到文协开研究部部务会议，一直开到五时余。提出来需要做的工作真不少，但是很难实行。目前看来只有加强对《抗战文艺》的工作领导，不能由姚蓬子一人把持。

12日参加塔斯社主办的茶会。罗果夫主任要我供给他有关中国作家参加抗战的情况。几天后，我给他写了封信，谈中国

作家与民族革命战争。

18日，是我们到四川后除旧迎新的第一个除夕夜。正好这天下午欧阳山和草明也到四川了。他们来看我，我就留下他们一起过年。他乡遇故人，大家都十分高兴。他们走过很长一段艰苦的旅程才从广州来到重庆。

我们没有准备丰盛的鸡鸭鱼肉，酒倒是足够喝个痛快的。我们已经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这次重逢，看上去他们都有不小的变化，尤其是草明，显得开朗活泼多了。后来M告诉我，草明把孩子托给了别人，离开了那复杂的家庭。这当然使草明在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了。

我们经过这一段艰苦的逃难，虽然住定了，但是，过年的心情是提不起来的，连一点新气象都没有：孩子没有新衣服，没给买玩具，甚至都没给他买点糖果。他最高兴的事就是跟着三姑上街了。

我们的邻居却是热热闹闹过年的。爆竹放了一夜，清早就开始拜年，长袍马褂的客人川流不息。好在我们躲在这阁楼上，自成一统与他们无关。

但这些对孩子总是有影响的。一早，他就出去看热闹了，我们在家陪客人，是我的侄女侄女婿，我们也就没去找他。等午饭快好了，还不见他回来，做母亲的开始着急了，要我下去看看。我们屋里只有一个小小的西窗，向下面看什么也望不到，所以孩子在下面干了什么，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四岁多的男孩爱活动需要照顾。他妈妈得在楼上看护婴儿，平日只好让他一个人在下面玩。我常常在下班回来时看到他在这依山而建的一幢幢房子的坡路上跑，有时看到他飞快地跑下坡，去迎接住在这里的苏联专家。他们向他问好，居然还能说上几句“塔瓦里希”、“兹拉司伏依杰”及“司派希帕”等话，使得专家

们很高兴，常常抱抱他。这大约是因为他们也很寂寞的原故吧。

我正准备下楼去找他，这时，房门开了，孩子活蹦乱跳地进来了，喜气洋洋地站在我们面前，手里举着两个大桔子。再一看，后面还跟着一个青年，他笑眯眯地和我们说，“这孩子真乖真好玩，专家们都喜欢他呢。今天，我们带他坐汽车去城里兜了一圈才回来，外国先生要我向你们道歉。”说完他将手里的一包桔子放在桌上，“这是外国先生给孩子的礼物。”连茶也不肯喝就走了。

孩子一副得意相，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元，“这是他们送我的，叫我买爆竹放。”

M严厉地批评了他，“怎么可以跟别人跑？你怎么可以要人家的东西！……”

他惊讶地望着妈妈，“刚才那叔叔给了我几个铜板，我不要，他们硬往我口袋里塞嘛。”说着就爬上椅子去拿桔子。纸包一打开，那通红的桔子映着孩子红红的脸庞，我不能责备他，只暗自感到惭愧。

下午，华西园、袁勃和王春江来看我们。他们都在《新华日报》工作。袁是北方人，性情开朗，爱写诗；而王则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逃亡到了这大后方。这人有诗人气质，外文很好，但显得软弱些。我们在一起很谈得来，谈得也很尽兴。

留他们在这里吃晚饭。菜不多，M买了一只熏兔，倒是很好的下酒菜，所以大家吃得也很高兴。这一九三九年春节的晚餐，我至今也还没忘记。

第二天，我带M和晓谷到池田家去玩了两小时。她快生孩子了，而鹿地却在广西桂林。她一个人先到重庆，生活很不方便也很寂寞。她一向又喜欢晓谷，今天不好不去看她。果然，她

一个人正在家里发愁呢。她向M询问了许多关于生孩子的事，尤其是在重庆生孩子的情況。她很害怕，说女人到了三十岁以上，生孩子就困难了。但M的经验对她不一定有用，因为M还只二十多岁。不过，M还是尽量地安慰她，说等她生了孩子后一定去帮助她。

我仍忙于从重庆到北碚一周一次去上课，平时上午去国际宣传处上班，好在它离家近，十分钟就能走到。下午，不是来朋友就是进城去开会。一次，为介绍中国文学到国外去的问题在青年会聚餐，一谈就到了晚十点钟。一次，在冠生园吃饭，同王礼锡、戈宝权商谈国际联络事，又是好几个小时。还有，开诗歌座谈会，小说座谈会等，这都是属研究部的工作，不能不出席，剩下自己看书的时间就很少了。有时起得早，就看几页《唯物辩证法》。又抽空看了高尔基的《与列宁相处的日子》，写得太好了，只是译得很坏。

一次，孔罗荪来谈到汉语拉丁化工作者预备给反拉丁化者来一答复，要我也写一篇。我答应了，花了几天的时间写成了题为《理论与理论》的短文。恐怕会闯祸的。果然，十多天后，罗荪来告诉我，这篇短文被检查删改得不能发表了。

3月12日去参加东大附中的同学会成立会。再到文协时，得知陈白尘闹了“情杀”案，被打了三枪。我赶到医院去看视，伤在颈部，说有生命危险，云。

原来，开枪的也是我们东大附中的同学，和闻亦博、崔祥其部很熟，是某部的职员，陈是他们的邻居。他妻子长得很漂亮，也有点卖弄风情，丈夫因妒才动了枪。好在他这人是文官，枪法不准，才没有击中要害。这事，文协想尽量不闹大，医药费可能由文协出，免得国民党以此做宣传，攻击左翼作家。几天后，我再去医院看陈时，正遇到法院来侦查。他还未脱离危

险期。

这时，我家里也有了麻烦事。女工三姑被她婆婆硬叫走了，说是让她出来帮人太丢他们的脸了，但三姑却说是她嫂子因为想打牌不愿做饭带孩子才硬要她回去的。当然，我们不能强留她。幸好，楼下的大师傅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合川来的小姑娘，很能干，又和这里的人熟，我们就用下了。

另外，还有一件不痛快的事。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忽然给我来了个传讯的条子，还是由文协转来的。这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有什么违法的事要弄到被传讯呢？有人说我最好不去，但又有人说还是得去，不去他们还会以为你害怕呢！我和华西园商量，他说还是去好，不过得先找和卫戍司令部有关的人，万一出什么事好想办法。这样，我奔走了一下，还是去了。

找到那个科，我理直气壮地问他们，为什么传讯我？起先，那科长（可能是科长）表示不知道有这事，后来又说，可能是下面的人搞错了，是一个误会，等。最后，收回了传讯条，客客气气地送我走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件事并不是没有来头的。他们是想恐吓我，让我少说话少写文章。

这期间最使我苦恼的是《七月》复刊的事。先是求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他犹犹疑疑地，想出又怕麻烦，老是拖着说找不到印刷厂。又去找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谈出版事，他一人却不敢做主。后来经人介绍说华中图书公司的唐性天有出《七月》的意思。唐性天也是浙江帮，一向在武汉开书店，他出的书和杂志格调都不太高，是接近国民党的出版商。这倒有一个好处，能得到他的庇护，比在左翼书店出版可能更少点麻烦。和他谈过两次，就送来了合同，但条件苛刻得很，等于我白帮他编了。整个刊物一期只百元，除了稿费，我所得无几。他的

意思是，稿费可以看情况，有的可以少给点。而我的意见是，稿费决不能少，不管新老作家，都应一视同仁。最后，为了《七月》的复活，无奈我只能同意了他的条件。这时，它已搁浅快半年了！

重庆的天气热得真早，刚过清明，我的西晒小楼到下午热得就有点难以忍受了。孩子更是在家里憋不住，一早就出去像野马似地到处乱跑。我下班回来看到就说他几句，有时叫他一同回家。他妈妈也没时间管他，只好让他自由行动了。

谁知他几乎闯下了大祸。一天，我刚到家，就见二楼带孩子的大娘（保姆）气势汹汹地正在向M告状，说我们孩子用石头打了他家的小少爷，打在眼睛上了。这还了得！可把我们吓了一跳。后来她才说，幸好没有打中，只擦了一下。不过，她仍不依不饶地说，“你们不管孩子可不行。打了我家少爷，你们脱不了手的呵！”我们只好答应一定要管他，不会让他再打人的。

她的主人是兵工厂厂长，据说是德国留学生，还很年青，他太太是冯玉祥部下某阵亡师长的女儿，M说她看上去很有教养的。当然，自己的孩子打了人总是不好的，M准备下去道歉。

这时，我们的闯将回来了。他一面唱着歌，一手挥着树枝，好像是用它当马骑着上楼来的。我一把揪住他，把他的树枝夺了丢在一边，问他，为什么打人。他闪着大眼睛，说不出话来。

他妈妈在一旁帮着说：“你用石头打了王家的孩子吗？”

“是他先打我。那大哥哥抢我的东西，我不给就打我，我打不过，才拣了块石头丢他的。根本就没打着。”

这使我更有气了，“你还犟嘴！”一把将他按在腿上，拿起树枝就打了下去，孩子大哭大叫……

有人在敲门，我只好放下他。来的是吴组缃，他看到这场

面就笑了。我还在生气，孩子却拣起树枝，跑到窗口将它扔掉了，一面气鼓鼓地说，“看你，再拿什么来打我？”我们不由得都笑了。M很心疼孩子，说这实在不能怪他，一个四岁多的孩子在外面玩又没有大人保护，受了欺负能不反抗吗？不能这样打孩子的。我说，那叫我怎么办！

吴组缃语重心长地说：“打孩子不是好办法。我的第一个女孩也是用打来教育她，结果使她丧失了自尊心，这时再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就来不及了。现在我只好送她到育才学校去，看在集体生活里能不能增强她的自尊心，重新求上进用功读书。”

他的这席经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以后我尽量不打孩子了。效果还真不错。

进到4月时，我的工作忙起来了：为《战斗美术》写了《关于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一感》，写成一篇纪念文协年会的短文，拿给《新华日报》了；还为文协年会拟就了《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作家电》。每次开年会前，在党召集的会上（这种会多半由冯乃超出面）总要讨论文协的工作方针。我是按照这来布置工作的。

4月9日在陕西街留春榭开年会。到百余人，邵力子主席。我念了电文。六时左右聚餐，闹酒闹得一塌糊涂。

选举的结果，我得票最多，仍被选为常务理事继续当研究部主任。看来，文协的工作是摆脱不掉的，将继续花去我不少的时间。

开始着手为《七月》选稿、编排。我将绿川英子的诗《失去了的两个苹果》译成中文，还为它写了八百余字的后记。全部编好送审后，写了复刊词《愿再和读者一同成长》。我在后面这样写道：

战争前进了，文艺运动前进了，我们当然希望《七月》能够更健康，更有力量，但同时也明白地知道，它不过是整个文艺战线上的堡垒之一，无论它的影响如何，在关联的形式上它只能是一个小岗位。这样说，并不是我们没有取得广大的作家底合作的愿望——事实恰恰相反，《七月》正是在许多作家底协力和读者底参加下面产生，成长的，——而是表示了我们对于文艺界团结的尊重，对于各派作家底创作方法的重视，对于作为友军的许多文艺堡垒的尊敬，而且表示了我们对于文艺将在民族战争底前进里面会有万花灿烂的发展的预想。

又到华中图书公司去填了刊物登记表。不久，第一批送审的稿子发还了，老爷们指出了多处应删改的地方。原来，他们是只准恭喜自己发财的，而我却要添点不让他们恭喜发财的东西。

5月1日凌晨四时，写完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文艺》。这是根据我到重庆后，几次在大学里讲话的记录稿改写的，就算是我从抗战以来，参加文艺工作和编务工作的一点心得体会和祝愿吧！

1939年5月是重庆多难的日子。日机开始了凶猛的连番的轰炸，我们这些人，应该就自己的身受和耳闻目睹，做一详细的回忆。所以我在这里想尽可能写得详尽些，连日期也写明白。

2日上午，白危来了。他是《七月》即将发表的《毛泽东断片》的作者，在上海时搞木刻，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到延安后曾来过信。这次到重庆，他夫妇两人都来看过我。我又到华中图书公司去交稿子，然后到池田处。她在三月十五日生了一个女儿，我和M都去看过她。现在她已回到学田湾家里去住了，但是还常找我去为她办一些杂事，因为鹿地至今还没有回来。夜里，为文协拟定征文通告和办法。

3日。这几天都是晴空如洗，已结束了雾重庆的天气，完全是夏天的气候了。上午去办公。一时，我们才吃完午饭，彭大娘在厨房里收拾碗盏。（这彭大娘是那合川小姑娘的妈妈，她从乡下赶来叫小彭回去。我才知道小彭是因不堪婆婆丈夫虐待而逃出来的。这大娘硬把她打发了回去，自己代替女儿在我这里工作。她有五十来岁，曾带过周璧光的小女儿，所以同这里的大师傅们都很熟，带孩子做饭也有经验，我们对她很满意。）一会儿，警报大鸣。呜呜呜的声音，在武汉已听惯了（但在这山城听来还是特别刺耳），所以开始并不紧张。M还安排给婴儿洗澡，强迫大儿子睡午觉。后来紧急警报响起来了，那尖利的吼叫声不但刺耳，还简直使人神经受不了。我想，这大意不得。就做进防空洞的准备，将彭大娘叫来，她起先还说要洗尿布，不走。等看到别人都在走时，就挟着一个小白袱催我们快点逃，拉着我大儿子就往外走。M也沉不住气了，抱起婴儿准备走，后来才想到要带尿布，又拿了几块饼干。我拎着那只装来稿来信的小皮箱走在最后。

川东师范的防空洞离我们家不远。等我们进得洞来，才发现里面几乎都坐满了人，就只好在靠洞口的地方坐下。洞里像电车车厢一样，面对面的两排木板架的凳子，中间空有二尺来宽的走道。幸好有电灯，认识的人还可以互相打招呼聊天，比武汉的防空洞好多了，坚固多了，因为它是在山底部开洞的，上面还有文把厚的石头呢。后来知道，来得早的人昨夜就听到日本广播中扬言要炸重庆。

时间久了，有的孩子开始在哭叫打闹。M怀里的婴儿进洞来就睡着了。晓谷倚在我身边一声也不响，妈妈问他想吃饼干吗，他摇摇头，却转去问彭大娘，“这洞长吗？可以走进去吗？……”又问彭大娘飞机怎样下蛋。彭大娘吓得不得了，“可不能

说：菩萨保佑，飞机千万不要来下蛋。合川那次炸得多惨呵！我幸好到女儿家去了，才拣到这条命的。家里的屋子都炸塌了啊！快不要说了。”

忽然电灯熄灭，一片漆黑。这时能听到外面有轰轰的声音，这是飞机已临上空了。不久，高射炮的声音就响了起来。随之“哄咚咚”的一下，我只感到外面有一种力向我一推，我的身体就随着倒在了M身上，而她也倒在了别人身上。跟着又是几声“哄咚咚”，等我们都坐好时，恐怕总共只有几分钟吧。

大家虽然坐定了，心里却惴惴然。有的在猜炸弹可能就丢在附近，有的甚至认为落到了自己的家里，在担心自己的财物，就急急地想出去。可是洞口的警卫不让走，说还没有解除警报，不准出洞。但他叫大家安心，炸弹没有落在附近。

很快就解除警报了。回到家里只三时余，共躲了两个钟头。我进城到文协去看看。市区被炸的地方很多，过体育场时还看到三具尸体。

4日。上午去办公，下午郑伯奇和任钧来谈天，后来华中图书公司的谢君来了，《七月》第一期总算是发下审查证了。他们走后我们正准备做晚饭，突然警报大鸣，大家赶快进防空洞。这次空袭的时间很讨厌，差不多的人都在家里准备做饭，如果为此不想进洞，真不知会死伤多少人呢。

七时多解除警报。出洞一看，市区火焰甚高，天上的月亮都被遮没了。不知炸了烧了多少房屋。赶回家做饭吃，饭还没做好，又来了警报。这次，谁都毫不拖沓地赶快进洞，连孩子都吓得不敢吵闹了。一小时后解除警报，等吃完饭已快十时了。

老舍陪周文来了。他们住处周围都落了弹，一路辛苦地穿过火场才到我这里。留下来休息、喝水、吃饭。老舍回家去了，周文留住在我这儿。他是来重庆找全国文协谈成都文协的工作

的，正在老舍那里谈话，就来了警报。这晚，我和周文谈到了一点过。

5日。上午去上班，几乎无法工作。大家都在谈轰炸，人心惶惶。街上挤满了下乡的人，车、船都成问题。下午，我去看池田，她和孩子都很好。又去看华西园，他这一向因病住在妹妹家。听他们说，这次轰炸的死伤者可能近万人，云。夜，又陪周文去访老舍。

6日。一大早周文就回成都去了。这次来得不巧，正赶大轰炸。他买了几双草鞋，准备坐不上车就步行回成都。十一时过警报响了，但很快就解除了，敌机没有进来。

7日。上午看了些稿子，回了几封读者来信。下午和夜里，编好了我的《为祖国而歌》和庄涌的《突围令》。今天收到了卢鸿基和王春江的慰问信。

8日。下午一时警报。在洞里坐了好久。里面好多孩子都受不了，在哭闹着。我的两个孩子还好。婴儿只是睡觉、吃奶，醒来又吃奶。儿子有点不耐烦，亏得彭大娘哄着他说故事给他听。到五点多钟才解除警报。这次似乎丢弹不多，没看到起火。晚上，到华中图书公司去见到唐老板。这人对工作一点热情都没有，只一心想赚钱。他告诉我，城内印刷厂都不接生意，找不到印刷的地方。这样，《七月》虽然审查通过了，但一时还出不了。我看到街上很萧条而慌乱，七星岗还停得有几口棺木。

10日。上午办公。下午，给卢鸿基、萧军、阿垅回信。欧阳山来了信，我立即回信。晚上，去访周恩来副主席。他刚视察回来，就约见我。过去在武汉时常有机会见到他，他通过吴奚如向我传达工作方面的指示。

我听周副主席谈国内外形势和这次在外地的一些见闻，听得简直入迷了。我和他谈《七月》的出版经过，不由得在他面前

诉起苦来了。又和他谈起，聂绀弩愿意在江浙一带发行《七月》江南版，我则提出要办成《七月》的大众版。他十分赞成，答应为《七月》帮忙，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12日。早晨就赶船到复旦去上课。城里轰炸频繁，我们决定搬乡下去住，昨天已交了四件行李托复旦商学院代运到黄槐镇。我们希望能在镇上或学校附近找到房子。这天下午我看了几处房子，都不好，路又远。七时警报响了，听得见炸弹声，担心家里不晓得怎样了，决定第二天早晨就回去。

13日。中午到家，知道昨天炸的是江北。听说鹿地亘已到重庆，就去看他，谈了近三个小时。晚上到华中图书公司，印刷仍毫无办法。

从13日起，有十多天飞机没来轰炸，大概是因为天气昏暗老下雨的原故吧。于是，市面上又显得有了生气，行人多起来了。我为《七月》的印刷问题，同店员走了几个地方，但还是无头绪。只好趁这个时候清理出几篇稿子，复了一些积信。就是写文章一字不成，最后才算是校对了艾青的《向太阳》，并写成了《为祖国而歌》的题记。

值得一书的是24日。那天中午天放晴了，热得很。董老来看我，他穿的天蓝色纺绸长衫都给汗水浸湿了。M请他宽衣，还打来一盆水请他洗脸。他坐下后同我谈到他这次从延安来，周扬托他带个口信，说是请我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中文系主任，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并且说那里有好些年青人呢。我听了这话有点吃惊：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我应该答应吗？……这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只好回答说，“能让我考虑一下吗？再说，延安人材济济，何必请我去呢？”他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我说，“那倒也对。等我考虑好了再说吧。”

四五点钟时，收到周副主席的来信，是他的警卫员送来的，

约我夜里去会他。这次，我把我的工作和自己的看法都同他详谈了。最后我说，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戳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周副主席同意我的决定，还说，“国民党地区需要能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这事我同你向他们说明一下，你留下吧。”同时，他又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搞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又不同意和吴离婚，叶以群也不会愿意的。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还是由你向他们多做做工作。”我只好答应了下来。

他们的情况我稍为知道点，但想不到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怪不得吴奚如给我信上说到，他写文章时脸上有一个圣洁的面容出现，并对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也表示出特别重视和充满了信心，但我看后觉得并不是什么力作，甚至不打算用它。

25日。上午办公，下午欧阳山来了，后来徐盈、子冈也来了。五时过，我们正在准备晚饭，忽然听到警报，看来是准备来夜袭了。我们赶快进了防空洞，后来洞里就熄了灯，听到“哄隆隆”的爆炸声，就是听不到解除警报的声音。这样过了三个小时，孩子们都饿得哭了。彭大娘真有办法，她将做好的饭用帕子包着带来了。她捏了一个饭团给晓谷，还问我要不要。我也实在是饿了，就要了一个吃，倒挺香的。她说，这里下煤窑的矿工就是带一个大饭团爬下洞的，她老汉儿（丈夫）挖过煤，所以她会捏饭团。

一直到九点过才解除警报。出洞一看，城里又起了大火，红了半边天。欧阳山就留在这儿过夜了。

26日。早晨赶车去北碚，但直到中午才坐上车，下午四时到北碚。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都上课，同时看了几处房子，就赶着回重庆了。到家不久梁文若来了。我告诉她组织上不同意她和吴奚

如的关系再深化，应该冷静下来，但她执意不听。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表示希望她慎重地考虑一下。

每次到复旦去上课，都要在乡下物色房子。现在搬到乡下来的人家越来越多，就更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了。

华中图书公司在北碚有个分店，还有一间不小的门面，老板早就回这儿躲警报了。我去看他时，才知道《七月》总算有了印刷的地方，是在郊区的什么小厂。不管怎样，能早日出版总是一件大好事。

我和M商议，想先在朋友家住下再找房子。就收拾了行李准备上船去北碚，但到早上天下大雨，找不着车或轿，就只好再等一天了。这已是五月的最后一天了。

这个五月，重庆是在大轰炸的灾难中度过的。被炸死的在万人以上，被炸烧毁的房屋那是无法计算的。幸好我的朋友们除了有的家屋被炸坏以外，还没有听说有死伤的。而我在这个五月所经历的种种事情，都是很值得纪念的：《七月》的复刊不但有了出版的地方，还得到了周副主席的赞助，并且他决定要我仍旧留在重庆，我在重庆的工作也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这使我感到欣慰。可惜，他给我的信没能保存下来。那信虽只寥寥数语，但充分表现了他的亲切和信任，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1939年6月2日，江水虽然上涨，总算还有船。清晨，一家人上了船，午后二时到北碚。暂时借住在黄桷镇张定夫家。张家人不算多，有一间客房，但是他的大女儿有一个生病的同学住在他家，所以家里也住有五、六口人，我们一家去了就平添了四口，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尤其是带着孩子更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一到就急于要找房子，但去看了几处都不合适。晚上，晓谷牙痛，这就使我们更感不便，急于要早日安家。

第二天一早又出去看了几处，终于找到一处，离镇约走十几分钟，走捷径就得爬过一个坡，过一条干溪沟。还只是两间厅后小屋，一年倒要我九十元。无奈也只好订下了。

当天下午到了通俗读物编刊社，那是在东阳镇背后的小山坳里。他们要我讲讲典型问题。讲完了还得赶回重庆去上班，加之《七月》已付印刷厂，要亲自去料理。过江到北碚，赶船赶车却都没有赶上，只好再回黄桷镇。第二天起了个早算是赶上了船，中午在华中图书公司吃的午饭，然后一道去印刷厂。这是一个城内的小印刷厂，只能排新五号字和老五号字各一半。我计划了一下并画了大样。

重庆各界将派出两个全国性的慰问抗战将士的代表团。文协出四名代表，我是一个，还有姚蓬子（南团）、老舍（北团），再一个是谁记不起了。当时我以为，也许一两年之内我会投身到北方去，所以就选了参加南团，想先看一看南方各战区的情况。

由于已决定参加慰劳团，一切工作就都要安排好。可能会出去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里的工作就得搁下了。我赶着编好了这一期《七月》复刊号，写了《编完小记》，又订了个约稿《简约》：

一、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在创作态度上和我们共鸣的作家和读者底合作。不计字数，几百字到几千字的短篇，两三万字的中篇，都可以，长篇的作品则收进《七月丛书》里面；也不拘体裁，诗、小说、剧本、杂感、随笔、评论、翻译的作品或论文、通讯、报告、特写、木刻、漫画……，都需要。

二、特别希望前方的或后方的，在实际工作里面的作家和读者把身受的事件即时写成通讯或报告赐寄，就是几百字的短篇也好。

三、现筹备另编印大众版，供前方和后方民众底阅读，

希望赐寄故事、民歌、短剧、报告、笑话、通讯等等千字上下的，文字平易而又生动的稿件。

四、为了内容底调和，我们保留选择底自由。

.....

在《编完小记》里，我不无惋惜地提到它停刊了十一个月，也就是说，有一百二、三十万字没能和读者见面：

好心的友人给过了忠告：《七月》在挣扎的时候，文艺活动还很消沉，现在不同了，阵势堂堂的刊物继续出现，没有再为一个小刊物费尽力气的必要。这好心曾经使我们在困难中动摇过，然而，每当一看到敌国底文艺杂志或综合杂志底文艺栏被鼓励侵略战争的“作品”所泛滥了的现象的时候，总不免有一种不安之感。而且，就杂志说，有的能够凡名家都兼收并纳，组成一望惊人的阵线，也有的只愿用微力在读者里面开辟一条小路；就作者说，有的看到全天下的杂志里面如果有一种没有自己的名字就觉得难过，也有的只愿意向自己所偏爱的杂志投稿；就文艺活动和现实内容底丰富的对照上说，不是还没有达到万花缭乱，多一朵少一朵都毫无关系的地步上？

所以我们还是复刊了。.....

这一期的内容，因为编得匆忙，不能算精致，但还是显示了它的特色的。今后想多登些有关陕北根据地和江南游击队的各式文章。

这期最突出的是白危的《毛泽东断片》，这是继《毛泽东论鲁迅》后的一篇关于这位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人物的文章。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凶残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我组织了三篇特写，都是有血有肉的亲身感受。曹白的《在敌后穿行》和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是生活在斗争中的最感人的作品，

我想，一定会得到读者们的欢迎。绿川英子的诗《失去了的两个苹果》里面所体现的她这颗爱祖国爱正义的心，女儿的心和战士的心，如果能传到日本，也一定能得到共鸣的。

我把这刊物编好了，也就放下了这几个月来的一个重担。不管怎样，它总算能复刊了，又能和喜爱它的读者们见面了。它如能鼓舞起一些作者在战斗之余拿起笔来写上几首诗或几篇散文，为抗战文艺增添一份财富，我就感到宽慰了。

在这期的《明信片》里，我登了个寻人启事——有知道聂绀弩夫人周颖（之芹）母女底消息者，请火速示知为祷。

我已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办《七月》大众版并请聂绀弩负责，周副主席同意并且表示支持。我去信告诉了绀弩。现在，我不但希望他能来，还希望能找到他的妻女，让他们在重庆团聚。

回到黄桷镇后，第二天下午就搬到了帅家坝。两小间破房，过去，一间是厨房，一间是羊栏，现在隔壁还是另一家的猪圈。夜晚，只听见猪叫声，并传过来一阵阵的猪粪泔水和猪屎尿的臭味。M和孩子们住在这里，真太可怜了。但我不但不能给她们什么帮助，甚至还未能将她们安置好又赶船回重庆去了。

现在，我除了去国际宣传处应卯外，最忙和最关心的是排印《七月》。到华中一问，排字工作还在拖延中，说是因为有一个国民党中宣部的人说，《七月》是共产党的刊物。不管怎么样，还得催他们快排。

后来又赶到马超俊家去开南方慰劳团代表谈话会，又到生生花园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出发仪式聚餐会。会上周副主席做了即席报告，鼓励作家们多看看多了解战士生活。我和老舍一道回到住所，商谈我们走后文协的工作。

我向国际宣传处提出请假，没有得到允许。后来我提出停薪请假，他们答应了。说来也可笑，我由于不能按时上班，崔

万秋这科长无法交代，只好找一人模仿我的笔迹代签到，这才将上面骗过。

国际宣传处对敌宣传科的经常工作只有两项：收听并记录敌方广播和选译敌方报刊中可供参考研究的时论。我和高麟度等做翻译工作，每人每月译一至三篇，材料由自己选或由崔万秋指定。和我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时是同样的工作，不同的是，那是在刊物上发表，而这是油印发到国民党有关部门供参考的密件。

我在国际宣传处卖工，是为了糊口，因为光靠复旦大学的四十余元是无法养活四口之家的。但我从来没有向周副主席提起过。一天，周副主席在谈话中提到，日本政论家都估计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会破裂，敌人都比国民党某些人要高明得多。我报告周副主席，那篇文章是我译的，他这才知道。

既然我将要离开重庆几个月，就找了一个机会向周副主席汇报了我找梁文若谈话的情况。他听后沉吟了一下就问我，那么叶以群呢？我说以群态度没这么坚决。周副主席就说，那么你找个时间约他来见我。我约了一个日子带了以群去见周副主席。以群表现得很冷静，很爽快地答应了和文若分手，并且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到战区前线访问。这给了周副主席很好的印象，后来以群回到重庆后，周副主席就在一次会上提出让以群在文协工作，要我和老舍商量安排。这样，他就一直住在文协的宿舍里了。

相反的，吴奚如从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留在桂林，后来到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和文若分散了，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结束了。这次恋爱成了奚如一生中的转折点，不知该算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慰劳团决定于6月23日出发。19日，我将第二期的稿子大致

编就，清理了积稿和一些事务，到一、二时才睡下。第二天又去华中，还找到张梅林托他代我在我不在重庆时校对一下《七月》的稿子。回家时已是晚上九时了，又将未了的事清理了一下。

天未亮赶到黄棉镇，又忙于结束学校的考试，出练习题及考试题。午睡醒来发觉肛门口不舒服，连行走都觉痛。原来肛门口有了蚕豆大的一粒肉瘤，是犯了痔疮？但是23日要出发，现在已是22日了。天虽然下大雨，我还是赶船去重庆。到了慰劳会，知道南团第二天一早一定出发。又到国际宣传处支来二十二天的薪水，准备留给M做生活费。华中图书公司的人说，清样要晚上才能有。痔疮痛得越来越厉害，华西园和知道这情况的朋友都说，到路上可能会更坏起来，劝阻我不能去。我只好给慰劳会去信，声明明晨也许不能出发了。

23日早晨应该是出发的时候，痔疮依然剧痛，实在不能出发了。校好了清样，买了一盒兜安氏痔疮膏，但越搽越痛。

第二天到市民医院去诊视，说是非开刀不可。我给慰劳团的带队团长马超俊去了封信说明情况，希望病愈后仍能赶去参加。傍晚，华中叫店员送来了一本《七月》。总算出版了！看到复刊的《七月》，我这几天的病痛和懊丧得到了最大的慰藉。封面上的那个青年高举着战斗的“红旗”，在向我们召唤，参加战斗，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用了从市民医院带来的白药，似颇有效。就又到南岸市民医院分院去求诊，但他们说不能动手术，因为没有设备和药品。只好回家休息几天。

在家休息不到两天，听说校医也能看病，我就去找他们。他们说可以做手术，但要诊察一下内部。检查了内部后说没有痔疮，外面的他们可以做手术，云。这两天休息下来，已不怎么痛了，我就决定不动手术了，并且给慰劳团去信，说痔疮将愈，

问能否还有法子赶去。

住在家里，才发现M她们真是受罪。这屋潮湿得很，屋顶还掉一种叫瓦虱子的毛虫，所以连午睡时都不敢把小女儿放在小床上，夜晚就更不敢了，M害怕耗子和蛇来咬她。大儿子虽然一个人睡在帆布床上，挂上了帐子，但M每天晚上都要起来摸摸他看看他，生怕被什么咬了。这样提心吊胆的生活，我怎么能安心呢！这几天我在家就想尽力为她们干点事。我去买来竹席，用它将屋顶钉了起来，这样，不落虫子，可以挡太阳，冬天还可以不透风。又在外屋隔了一小间让彭大娘睡。那四分之三就算是我的书房和会客室了。花了四、五元钱这么一弄，比较可以住了。

7月1日，痔疮好多了，就和M带着孩子们一道去北碚，在树林里请照相馆的人照了一张相。

这次在家共住了五天，看完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七月》的广告。痔疮基本上好了，就急忙赶到重庆。在那儿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一包稿子，其中有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的旧诗词，一看内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战乱生活中将主席给她亲笔书写的诗词遗失掉，特地托我为她保存。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上“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

到了慰劳总会，他们好像并不热心设法使我赶上去。慰劳团的电报是说我一周内赶到桂林就可以和他们会合。因此，我又去医院作一次检查，医生看后毫不在乎地说声可以旅行。但是鹿地却直吓唬我说，路上汽车颠簸，去不得的。

重庆又有警报，敌机分小批袭来，城内起火了。我准备第二天早晨回北碚。晚上，宿于华中。刚睡下来警报就响了，赶

快回重庆邨，拿了装重要稿件的那只小箱子进了防空洞。凌晨二时始解除警报。

我收到马彬和的信，甚赞《七月》，来信告诉我，他特地为介绍《七月》作了一次英语的广播。马彬和过去在上海曾替林语堂的刊物当发行人。听说是英国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因为爱慕中国，自愿到中国来吃苦。抗战时他参加了国际宣传处工作，可能是搞对外宣传。他平常穿一身黑色的长袍，像个传教士，中国话也说得很好。在国际宣传处有时见到他，想不到竟寄来了这么一封热情赞赏的信。我回信约他见面，我们在办公室外面的树林里站着说了会儿话。他早就看过在武汉时出的《七月》，对这一期他也很喜欢。后来，只在路上见着时点点头，没有再谈过话了。

重庆接连地轰炸，我又赶不到慰劳团的地方，就决定回到黄桷镇家里，一面休息，一面准备下期的稿件。住了一个星期，7月17日，赶船回重庆。到重庆邨住处不久，子民找来了。在汉口时，他是《七月》最早的赞助者和发行人，知道《七月》最近复刊了，十分高兴。甚至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别的事要干，真想和你合作办个出版社呢。他有重要工作我是知道的。我很感谢他的好意。请他在生生花园吃了晚饭，他回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宿舍去了。

一天早上他来看我，说了一些琐事。一道吃饭后到50号去看叶剑英参谋长。闲谈了一会儿，叶忽然提出，要我送他点番茄（西红柿），我愕然了。他说，你们复旦大学农场不是有好番茄吗？我才恍然大悟。大家哈哈一笑，我答应回去一定去找来送他。他总是那么随和，使人感到亲切。

回家路上被当地居民“捉”住，非要我写副土地祠的对联。只好拟了一对“庙小神通大，威灵显四方”，横批为“一方之主”。

24日下午，我到化龙桥报馆宿舍去访子民，在那里吃晚饭后来了警报。我们躲进报馆的防空洞，这里简直像在举行晚会。一位广东客家朋友唱起了客家山歌，虽然听不懂词但也觉得很淳朴很好听，还有人唱起了陕北民歌。这都是一些在外面听不到的音乐。一点也没有躲警报的感觉，反倒感到愉快得很。回家时才知道，敌机侵入市空投了弹，我住所附近就被投弹不少。

在26日晨，我到了曾家岩，和邓大姐等坐汽车到化龙桥，会了子民后同到北碚。我和子民先到家，午饭后去到张定夫家，直到晚上。

这一段时期正是子民空闲的时候。我就选了一天早晨邀子民还有湖北的赵晓华女士（我知道，她在大革命时期就和董老很友好，现在虽然四、五十岁了，但还是显得很豪爽。不过，似乎已不干什么工作了，我也不好细问。）一道步行到大渡口，过江步行到北温泉。在吴玉章同志处休息后，再洗温泉澡。下午，下起了大雨，雨后我们依然步行回来。水流甚急，正所谓发大水时期。江水混浊，波涛汹涌，眼见江中有一死尸漂浮。

第二期《七月》早交了稿，可是至今还未找到印刷厂。我问北碚的华中支店，说是已决定在离此三十里路的夏溪口印厂印了。马上由华中的刘君陪同到夏溪口印厂交涉印刷事，他们答应月中可以出来。这期本来是想为纪念高尔基出一特辑的，文章是有了，可是纪念日却早过了。当前重庆的印刷情况就是这样，不脱期是不可能的，看来第二期八月份能否出版都很成问题。

8月9日，子民来访，闲谈甚久。他要回桂林去了。他这次在重庆呆了二十来天，一直住在报社。为什么事来我不好问，他也没说。对于我的事他也没问，但是大家都心里有数。他一向是支持我办刊物的，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这些天，我们在一起闲谈多次，要分手了，很有点依依惜别之意。他说，可能过

些时还会再来。我们一路到曾家岩，在那里吃了晚饭。

收到了聂绀弩的信和东平的信。原来绀弩被东平他们留住，同到前线去了，不能来重庆了。这当然是好事。打算写信给他们，希望他们从前线回来后，写些在前线所见所闻的报告。这类亲身体验前线战斗生活的报告还真太少。

第二期已校好了三分之二的稿子，想赶回去做最后的突击。回到家洗过澡，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到华中约了刘君一道去夏溪口印厂，到时天已黑了。校对到十一时，在群蚊的围攻中睡去。第二天又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校阅，就等着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印出来了。

9月初，《七月》第二期总算出来了。这期内阿垅的《从攻击到防御》和曹白的《半个十月》，我很满意。这些都是有血有肉写出了真情实感的战地生活报告，读者是会高兴看到的。

现在，该忙于编第三期了。刚整理出十多篇，还不够。接受了这期脱期的经验，我想，索性第三期就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编特辑，等它印出来也就差不多该是十月十九日前后了吧！

《七月》还缺一些篇幅，想自己写一篇纪念文，但精神不佳，写不成。忽然看到前院李安的老太太在给孙儿分月饼，晓谷在一旁看着，才想起今天已是中秋节。立即携晓谷一道过北碚为他买了几个月饼，还买了他爱吃的鸡蛋糕。他虽然还只五岁，但已经去镇上读书了。背着他妈妈亲手缝制的书包，俨然像个小学生。李安的孙子也在那里上学，校长似乎就是他妈妈，他上学有人接送，天下雨或不高兴就不来这儿了。相比之下，晓谷最多只能由妈妈接送，有时还只能一个人去上学，或者是，妈妈在河沟边看着他爬上坡向镇上走去。路很难走，有时得打赤脚在烂泥地上艰难地爬坡。这孩子倒喜欢上学，到现在为止，一天都没有想到逃学，好像书读得也还不错。

就是小女儿的事使我心烦。我每次回来都看见彭大娘将她背在背上。做事背着，同人谈话也背着。我说，“这样可不好，孩子的脚不活动……。”她回答我，我们乡里的小孩都是这样背大的，没来头（没关系的意思）。和M商量，她说：“实在没办法。孩子连处爬的地方都没有，满地都是鸡屎。只有我自己带的时候可以让她在堂屋的桌上爬爬，要不就在床上爬。这里老乡的孩子就一天背到黑，睡觉在背上，尿尿也在背上，等放下来时，两个脚杆都青紫了。我们的孩子还不至于这样可怜。你想我要去赶场买菜买日用的东西，一走两三个钟头，就只能由彭大娘去背了！要没有她帮忙，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连饭都吃不成。”说来也是无可奈何，战争时期嘛！我听了只好摇头叹气。唯一能使我稍为安心的办法，就是趁我在家时，尽可能地多抱抱她。

我一心想让第三期《七月》能在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时出版，大部分稿子已交付去排了。一面，去华中支店请他们催排。另一面，我赶写了一篇，只得千余字，只好题名为《断章》。看来，我想写出一篇一直想写的文章，目前还没这条件。天天忙乱打杂，看书的时间很少，想再通读一遍鲁迅先生的书，一时都无法做到。

为开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事，到重庆去了一趟，访问邵力子。他答应帮助。几天后，又出席了纪念会的筹备会。之后，就是为开纪念会的事到处奔走。除了交涉开会地址的事可以由文协派人去办外，其他如约什么人到会，请谁发言等都是我的事。我还请了某剧团排演《过客》，预备在纪念会上演出，为此，我事先写了《〈过客〉小释》。

这些天真够紧张的。赶着写了《排印前小记》，算是第三期已完全编好只等出版了。又为《新华日报》写了《鲁迅先生·日本·汪精卫》，约两千字。我在从家里到重庆路过化龙桥时，将稿子

交给了报馆。

10月19日早晨六时，就进城到纪念会场。好像是国泰影院，我记不太清了。九时开会，到了有数百人，也许有上千人。邵力子为大会主席。演说者有塔斯社的罗果夫，以及潘公展、陈绍禹(王明)等。潘公展借题污蔑，骂“封建割据”，等于公开宣传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王明讲话时针锋相对地说了好几条“什么人配纪念鲁迅先生”，每一条都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潘公展本人。我报告了鲁迅先生生平，具体内容忘记了，只记得是怀着对国民党反动路线和反动措施的愤怒心情讲的。

应该说，王明的讲话很好，他尖锐、有力地打退了潘公展的猖狂进攻，大快人心。

但是，《过客》的排演却没有搞好，无法演出。这不但暴露了我没有真正理解鲁迅先生，也说明我没有把这次纪念会的工作做好。《过客》虽然是鲁迅作品里面仅有的戏剧形式，但并非能代表鲁迅精神的作品，更非能适应当前斗争要求的作品。如果我认真严肃地考虑过思索过，我也并非不能从鲁迅的杂文和其他文章里选出一些战斗性强适时的章节来加以编排，在纪念会上朗诵或者表演的。这次是我没有尽心尽力而遭到的失败。

为了《七月》第三期的排版校对等事，我又奔忙了些日子，它终于在11月10日出版了。

这期的第一篇是一个青年寄自新四军的长诗。这诗，饱含着青春的斗争气息，我很喜欢。虽然还有点幼稚，但它是多么真诚多么可爱，在那“寒冷的中国底冬天”，歌颂着“今天的艰难的战斗”。这个青年就是彭燕郊。第二篇是来自延安的小说《开荒篇》，作者是我早在上海就认识的《文学丛报》同人之一周而复。不知他是什么时候到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去的。这篇作品写出了根据地的人民为了支持抗日，生产自救的热火朝天的情景。

对于开荒这份额外工作，那个伙夫同志从不理解到一下子明白了，“俺说他们为什么要开荒呢，原来是打日本啊，我以前还不相信……”，最后热情高涨地开荒，得到了“劳动英雄，伙夫同志！”“伙夫同志坐了飞机了……”这样的荣誉。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热情，通过这个纯朴的伙夫，便跃然纸上了。

使我遗憾的是，这期鲁迅先生逝世纪念特辑没有编好。因为赶时间，没有能多方面约稿，实在显得单薄了些。不过，几幅墨画和木刻还是不错的。

我一直在忙于办公、教书、文协的工作和编刊物，忙得连休息的日子都没有。我收入的一部分要寄给逃难出来的父亲一家大小，我们自己生活得也很困难。大哥来信说已有逃难出来的人在陆续回去了，他们也想回去。本来，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家乡，是很难生活也生活不惯的。我没有阻止他们，只预支了二、三百元钱寄给他们，说如果回去就拿它当路费，如不回去就算是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吧。

11月17日，我搭船回家，因大雾，下午二时才到。到家看到大哥来信，家人们走到蔡甸，父亲病倒了，终于在旧历九月初四日去世。不幸的忧虑果然中了，不胜悲恸！劝家人出来逃难，而铸成此一大错，这个伤痛是无法弥补的。父亲刚强一生，终于客死旅途，这是我的没有果断和对国民党抗日救国的轻信，牺牲了这老人！接着，继母也在十天后死去了。只有老四一家随逃难出来的同乡一路先回去，大哥、二哥两家还阻在那里，冒着时疫、兵、匪等极大的威胁。父亲的病似乎是霍乱或痢疾。

夜里拟成了挽联两副。这与其说是哀悼死者，还不如说是安慰生者。十年以来，父亲和大哥经常提到要把挽联和祭文做好，好像这就是老人一生中对我最后的希望！

国际宣传处另外编了一本对外宣传用的英文月刊。我去后不久曾参加过他们的一次讨论会，里面几个翻译很热心宣传抗日（名字都忘记了）。一次，他们要我介绍小说，我介绍了在《七月》上发表的《开荒篇》。英文名字改译为《他们打仗，我们开荒》。作者是共产党员，作品内容是歌颂陕甘宁边区的抗日自救。刊物的编者和译者当时没有察觉到，可能向国外发行后还得到了好评。他们很高兴，后来又向我要作品，但我将第二篇给了他们后就没下文了。可能被国民党人发觉了以致提出了问题。

我自抗战初期就介绍陕甘宁边区的作品向国外发表，但从未向周副主席报告过，甚至都没有告诉过作者。（八四年某日，周而复同志来看望我，我才和他提及这件事。）

当然还因为其他一些情况，我成了崔万秋包袱。他起先是想拉拢我以壮声势，后来一看我不被收买，又不按时上班，还常常给他捅漏子，我找的材料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样，崔万秋就说出了牢骚话：“谁不知你胡风是什么人！”对我，逐渐地冷淡起来了。

大概在1939年底，趁大家调整薪资的机会，加了高麟度的工资而不加我的。这当然是向我表示态度，我也就趁此辞职离开了。

风雨之夜，我一个人在重庆邨那间荒凉简陋的斗室中吟成了两首旧诗，其中有四句是：

案头烂纸苍生哭，寨里堆金大盗在，
莫向临安寻往事，党碑残迹太凄凉。

交出了辞职信，我就乘车回北碚了。当时虽然很不愉快，但也感到了轻松。这样，我以后只要顾一头，专门教书编刊就可以了，不必为这百来块钱去点卯上班了。能挤出点时间来写文章，那对我比什么都好。现在是连为自己的刊物都无法写上

篇我想写的东西，时间都七零八碎地被挤走了！

已经是39年12月下旬，回乡后第一件事是复来信。给 绀弩、艾青、阿垅、萧军、周文、力群等都回了信，刚收到金宗武从恩施的来信，就先不管了。最使我高兴的是收到了上海费慎祥的来信并寄来了《七月丛书》六本：《为祖国而歌》、《突围令》和《第七连》各二本。

大哥来信说，乡里游击队甚多，城里只住得有五、六十名日本兵，不敢下乡。我只希望他们能平安地在乡下过日子。我最不放心的老四，只要他不惹事，就是不劳动也无所谓。不过，从大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内部是有矛盾的，四代同堂破灭了，兄弟同居恐怕也很难吧！大哥在信中对二哥也很有意见，这些事我管不着。现在我总算放下负担了，他们又回到了生养他们的家乡。看来农民是不能离开土地的，我当时错就错在以为大哥那么能干，在外面总可以做点小买卖求得生活的。我马上给他们写了封回信，并附上了给父亲的祭文，寄给上海M的妹妹转寄乡下，听说敌占区能通信，这样更可靠些。

在乡下住着太闭塞，除了学生之外几乎无可谈的人。但最近吕振羽夫妇搬来了，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后来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和别的教授们就只是一般的应酬关系。

在家里住了四、五天，实在忍不住了，就又回重庆看看。过华中，到文协，正好《大公报》副刊编辑陈纪滢请吃晚饭，很晚才回到寓所。但不久崔万秋又来看我，向我解释误会，说是会计弄错了，这次是大家都调工资的。并说，“今后对敌工作还是很重要的，为了抗日嘛，希望老兄不要辞职。……”我无奈只好答应了。其实他们不想要我那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一辞职倒不好意思了。这也得怪我不会应酬，有一天崔万秋引王家桢来看我，崔万秋说，家桢兄是写小说的，是同行，等等，后来还特

意告诉我，王家桢在国际宣传处的秘书处工作。不言而喻，是曾虚白甚至董显光的亲信了，而我看不起这类国民党小文人，也不去回拜他。这样地对待人事关系，他们能照顾我吗？现在也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暂时留用罢了。

抽空去50号找了趟陈家康。他是上次熊子民来时介绍认识的，原先在武汉办事处吴奚如那里只见过一面没有打招呼。现在我常去找他，由于他在文艺方面的渊博知识，我们成了很谈得来的朋友。同时，徐冰负责和我的联系，所以，我每月都去看他们两、三次。快开文协理事会了，这次顺便去看看有什么需要提出的问题。

靠了这几个月的奔波操劳，《七月》总算出到第四期了。这期的第一篇我用了鲁藜从延安寄来的组诗《延河散歌》。纯真的感受和清新的语言，表现了革命生活的愉快和奋发，以及把延安当作抗战和革命的灯塔的宏大的时代精神。它对我来说，也极大地满足了我追随革命的信念，所以放在第一篇发表了。这使唐性天老板觉得奇怪，特地亲自看了，看后说，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时我仅仅只好笑他不懂诗，过后一想，恐怕不是这么简单。他可能是以为那里面会有什么激烈的共产党宣传而不放心，或者是有人警告他提醒他了，但他看过以后，觉得并没有宣传什么。他当然不懂，这些不宣传什么的诗情，那移人的力量比某些空洞的道理要有力得多，更能吸引读者。

与此相反，我还发表了两篇很惹目的小说，《巢》和《马泊头》。这里所展开的是阴惨惨的世界，有如憧憧的鬼影，给讴歌或祝告“旧中国的死亡”的战斗者们以明白的示例。作家朋友中也许有人要抗议，它们太不能使读者向高的境界前进。我想，天堂是好的，但它大概还得在地狱底废墟上建起，至少它的由打基到落成是得和地狱的被破坏到全毁同时进行的。能有但丁

底伟力，把我们由地狱一直引进天堂，当然是最可感激的，否则，倒不如让游过地狱者先唱出他底诅咒的歌罢。

但我也太满意《巢》里的两个去当兵的人物和《马泊头》里面的去当了游击队的“猪总统”，他们底前进并没有经过内部的发展过程，作者们并没有和对象作过搏斗，所以，要从这两篇小说所给与的阴影下脱出，还得去看其他的作家所写的别样的生活样相。这期里的两个诗集、两篇通讯及散文里的《晚会》，就各各显示了，至少是表白了对于健康的或英勇的人生的礼赞。

在今天所处的各种情况下，能编出这么一本刊物，实在也不容易，而老板又要加《七月》的定价了。对稿费他可小气得很，从来不说加钱的话。我把一九三九年出的这四期合为一集，那就是第四集。明年就算第五集，也是四期。看能出到第几集？同这种老板合作，真够不愉快的，完全的商人加市侩。好在糊涂，对稿子没有提过什么意见，不曾有过留难。

快要到元旦了，借这个机会回乡下一趟。虽然不是旧历年，但也该让M母子们高兴高兴。

元旦在这镇上是没有什么热闹的。我陪M和晓谷过江去参观火焰山文艺社举办的木刻及演剧文物展览会。引晓谷参观，一面向他讲解，他非常愿意听，问这问那的，表现了旺盛的求知欲。可惜我没有时间多和他谈谈，多带他参加一些活动，他已经满五岁了，该注意他的教育问题了。

晚上，想写一篇文章用在第五集第一期的开头。但文思不进，枯涩得很。眼疾又复发了。在重庆瞧病时，医生就说我砂眼很厉害，非搽四个月的眼药不可。但我哪来的时间管它。现在，眼睛又发炎刺痛，无法在桐油灯下看书，写字就更困难了。好容易将这一期的版式画好了，算是一九四〇年的开始。

这几天，除了上课外，复旦的同事来谈谈闲天，没法做事。

华中图书公司送来校样，由M和我一同熬夜校对，才算看完了。终于写成了《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之一，没有能发挥下去，只好等着以后再补充了。

冬季是重庆最好的季节，敌机不来轰炸，雾重庆又显出了一片繁荣景象。各地来的商人政客多了起来，文艺界的朋友也来了好些，至少，轰炸时疏散到各地去的人又都往这大城市跑了。文协由于外地来人，开欢迎会、座谈会、晚会之类的事也多了起来。我因为是负责研究部的，所以主持召开了“诗歌晚会”、“戏剧晚会”和“战地文艺工作座谈会”等，讨论对推行诗歌运动和当前戏剧工作的意见和想法等。这类会一向都开得很热闹，时间也比较长。

由于是好季节，来往旅客多，我在重庆和北碚间来往就很感困难。一早去赶船，常遇到大雾盖天，白茫茫的一片，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开船，而坐汽车，票难买，车也很难挤上去。所以每次来回都要冲锋陷阵，斗争一场，很少有顺利的时候。这就是我这一段生活的特色。

2月4日，已接近旧历年关了。我在抢挤中搭上了一时开的车回北碚，在车上遇见了章靳以、姚蓬子等，他们都是和我一样赶回去过年的。

想到我在重庆过了一年多繁忙紧张的生活，工作效果（更谈不上成绩了）实在是不理想，和在武汉的一年简直不能比。虽说是出了四期刊物，但我自己写的文章太少，又要被M讽刺为“可怜的收获”了。这里有主观的原因：精神散漫，无法集思。客观的原因是杂事太多，时间都被割裂掉了。唯一使我比较满意的是，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被读者欢迎和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带着它们的新鲜气息在祖国大地传播。

回家后第三天，我应陶行知校长的邀请去育才学校参观访

问。从早晨出发，步行约三十余里，十一时到了草街子，学校就在这里。见到了陶行知、魏东明、陈烟桥、白危、章泯等人。下午对全体儿童讲了话，内容都记不得了。晚上，和白危、陈烟桥、魏东明等到镇上吃饭。草街子是一个不小的镇，据说赶场时从各乡来的人很多，很热闹。现在从重庆疏散到这里的工厂和机关就不少，不过都散在各地，平日在街上很少见着人。

第二天上午参观学校各部分，还对文学组儿童们讲了话。这个学校是陶行知这位生活教育倡导者的实验园地。他和某些民主人士不同，是身体力行的学者，在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对他很敬佩，对他的事业我一直是表示支持的。他主张教育从生活出发，劳动与教育合一，对儿童教育的全面发展，以使学生的个性特征能得到最高的发展。学校里设有艺术各科的初学课，想从小培养学生们的艺术才能，请的教师也都是在这些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我想是会有成绩的。

下午，辞别了魏东明夫妇、白危、陈烟桥等人，到家时已四点多了。

这天是旧历除夕，M和彭大娘正在忙着筹备过年，小女儿就交给我带了。这个在苦难中出生的孩子已经一岁多，正在牙牙学语。听着她叫爸爸，看到她的可爱，感到自己实在是对她关心得太少了。

这次过年虽然只我们一家四口，倒弄得很像一回事的。有腊肉、香肠可以下酒，还有鸡和肉，就是没有鱼。鱼在四川是稀罕物，冬季天冷连小鱼都买不着。彭大娘的四川菜做得挺好吃，比去年时她女儿做的强多了。这个年过得好当然也因为我加了工资的缘故，不然也是不行的。据M告诉我，这里的生活费一天比一天高，加之对我们下江人，买什么东西都要比本地人出的钱多。现在，“打回老家去”这句话已不大说了。因为对国

民党的抗战力量和抗战实际大都失望了，只好做长期安居的打算。复旦大学虽然不是阔衙门，但使教授们温饱暂时还是做得到的，所以大家都在为过年忙碌，真是一派和平景象。

过年嘛，总应该去同事家看望看望拜个年。初一上午，我带着晓谷先到了马宗融家。他家和我们这师家坝平行，有一条路，走过去不算太远。他的夫人很贤惠，是美专的学生，罗淑病危时托她照管这两位孤儿，后来她就和马宗融结婚了。她对这两个孩子真好，不像一般的后母，我曾看见她画的画像，告诉孩子们这是她们的妈妈，她一直希望罗淑的孩子们不要忘了她们的生母。马宗融能有这么一个和睦的家庭，仍能过着他那懒散的生活，这位新夫人可以说是做了最大的牺牲。

从他那里出来，走过一座桥，有大路直到黄桷镇街上，我们就去看望陈子展，给他拜年。他家是一幢楼上楼下的小木楼，在这里算是相当好的住处。可惜他夫人常生病，孩子又小，家里就显得很杂乱。他夫人抱病在忙着安排过年的一切事务，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下午，我们又去镇上张定夫家。晓谷最愿意去他家，可以和小姐姐玩，其实小姐姐也有十多岁了，不过她很喜欢晓谷。我就把他留在那里，自己去靳以家了。靳以住在镇上的背街，一幢新盖的楼房，在这里属高级住宅，里面住了好几家教授。萧红曾在这里住过，和靳以家是邻居，不过我没来看过萧红。靳以和他的新夫人住了一大间敞亮的房子，过着很幸福的小家庭生活。我没坐多久，就赶回去接晓谷回家了。晚上，请了陈子展、潘震亚来吃晚饭。

年初二，上午和M带晓谷一道过北碚去看唐性天。他留下我们吃午饭，这餐饭吃得可不一般，因为我还没交过这种朋友。唐的夫人完全是浙江的商人太太的派头，四十多岁，胖胖的，

打扮得很考究，一点也不像是逃难来的。家里还保留着一些古俗，摆设得像过年的样子。他们的孩子很多，有四、五个吧，大的差不多有十七、八岁。他们叽叽喳喳地用很难听的乡音向爸爸妈妈说着话，好像是在要钱。唐性天似乎毫无办法，只好取出钱包，一人给了几元钱，他们才一哄而散。饭菜很丰盛，是他夫人亲手做的浙江家乡菜，唐性天家长式地当中一坐，子女们围了一圈，我们三个客人虽然也占了一边，但除了他的敬酒之外，就只见他的孩子们狼吞虎咽地一边吃一边还说着话，他夫人连喊都喊不住，有时还吵了起来。热闹是真够热闹的了，但也显出他们对孩子太放纵太无教养了。

吃完这餐饭，我们就带着孩子赶快走了。我们一起到动物园去看豹子和白熊，这才定下心来嘘一口气，似乎这动物园比唐性天家还有趣，还安静自在得多。M对我说了句中肯的话：“也亏你，常和这种人打交道！”

年初三，看来是别人回拜的日子了。上午，定夫来，下午是靳以夫妇和马宗融夫妇，还来了几个学生。侄女梅芬和侄女婿居俊明从歇马场来，就留宿在这里了。现在，我的亲属只她和她的兄弟望隆留在外面，其余的都回了乡下。最使我失望的是，大哥在回乡前，特意亲自去把大侄子张恩带走了。让张恩在沦陷区能干什么呢？我相信他不会做坏事，但也不会有什么出息，顶多就是照料家人，当个家务总管跑跑腿。想不到我的大哥眼光竟这样狭小！当初支持我出去闯，可能因为我是老三吧，而他的是独子。封建旧意识就是这么厉害！

初四那天，我们请吕振羽夫妇来吃午饭。他虽然是搞历史的，但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却有独到的见解。同他谈天很是愉快，我们常常谈得忘了时间。

到了12日，回家过年已八天了，再不去点卯上班，崔万秋

又要叫苦了。一早我就准备过江去搭船。天正下着雨，小女儿现在懂事了，见我要走，拉着不放。我不愿使她难受，只好抱着她放下东西，不走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孩子们还在睡梦中，我就过江去了。但汽船已搭不上，只好坐木船下去，到二时左右才到沙坪坝下船。去看访了在那儿工作的高警寒和吴朗西。高是我早年在东大附中时的同学，对我很好，我进日本庆应大学他帮了我不少的忙。他是熊瑾玎同志的女婿，他夫人力珊在上海、南京时都见过面，这次也想看看她。

除了办公外，最近还在忙着文协的征文评奖。这是《扫荡报》和《××报》委托文协举办的抗战以来长篇小说征文奖，大约有一千元，分三等评选。已收到一些稿子了，作者都按照当时评委会的决定，将人名及简历密封着。稿件存放在孔罗荪处，他是评选委员之一，负责登记并保管稿件。我后来陆续看了几部，其中，内容和艺术水平最有当选条件的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它描写了南京失守的情况，斥责了国民党军的混乱失职，控诉了敌人的残暴。我觉得这篇写得不错，再一问别的评选委员，也都认为这部作品写得好。谁知这一来，孔罗荪就私下拆开看了人名，并且传播出去了。梅林告诉我，作者是曾在《七月》上发表过作品的阿垅（S.M.自己遵守条例，没有在信里把他投稿应征事向我提过或暗示过）。这下，征文条例被破坏了，评奖发生了意外，使得我很为难。最后只好不评定当选作品，只给两部较优作品“笔润”。第一名《南京》四百元，第二名陈瘦竹的剧本《郁雷》（？），×百元。一场严肃的征文评奖工作，由于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只好草草结束了。奖金分掉了，却没能起到一点征文评奖的作用。至于《南京》，虽然大家一致说好，但也没能得到发表或出书的机会。因为出钱的报纸本来是想和他

们有关的作者得奖的，现在跑出来的是《七月》的作者，他们感到很失望，不提在报上发表的话了。我后来见到阿垅时，和他具体地谈到这作品，希望他能花点时间精心修改一下，使它更加完善，可他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做这工作。他当初写它时是从延安出来由于在上海作战受伤打掉了的牙齿溃瘍需要在西安治疗，就利用这段时间写了这篇近二十万字的报告小说。在他，虽然没有得到获奖的荣誉，但有这四百元钱对他看病是大有帮助的，所以他不但没有向文协提出抗议，相反，还表示了谢意。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容易得到被损害者的谅解。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部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影响。

这次在城里除上班和文协的事外，还画好了《七月》第五集第二期的版式，想尽量争取能按月出版。一天晚上没有出去，学生杨敏来谈他的学生生活，他是上海人，在经济系学会计，此人很能谈，一谈就谈到了十一时。他走后，我忽然听到各处有爆竹声，这才想起今天是旧历元宵节。偶得诗一首：

几人欢笑几人悲，莽莽河山半劫灰。

酒醋值钱高价卖，文章招骂臭名垂。

侏儒眼媚翩翩舞，市侩油多得得肥。

知否丛峰平野上，月华如海铁花飞。

（此句亦作：等到更深人静后，四川耗子满街飞）。

“酒醋”句指陪都重庆的社会生活；“文章”句指国民党对我的不满；“侏儒”句指官僚们；“市侩”句指投机者们；最后两句指在北中国的山区和平原上，共产党正在领导着英勇的浴血游击战争。

为这期《七月》，我写了《关于诗与田间的诗》。这是回答一个读者的来信，并且也就算是回答了许多对田间的诗有异议或有

好感的读者。可惜我手头没有他更多的诗，同时时间也太仓促，所以没有能发挥开去，还是用的我过去的看法并加以一些解说和肯定。我看，对田间的诗可能今后还会有争论的，等以后有机会再好好写一篇评论吧。

我到曾家岩50号去，想找陈家康、徐冰随便谈谈，同时也向他们说说最近的文协工作。我每次去50号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可以不受拘束地随便聊天，抒发自己的感情。周副主席没有时间也就不去打扰他了。这次徐冰领我去见新从延安来的凯丰同志，好像他现在也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他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对我表示很友好，很亲切，使我十分感动。

这学期的日语选修课没有人选，复旦大学就要我讲“文艺思潮”。这对我就没有日语课那样容易应付了，每次都得花去好几个小时备课，有时为了找材料还得看好多书。但听课的学生很多，他们听得很认真，有时还提出问题甚至找到家里来继续谈。这都是好现象，可惜我当时没编讲义，也没留底稿，要不然整理一下，以后还是很有用的。

三月底，萧军从成都来，有时住在我这里，谈到很晚才睡。他是和夫人一起来的，他们想到延安去，我完全赞成他这主意。我们一起谈到一些过去的情况，又谈到他的作品。他写作倒很勤奋，不过出版有困难，我曾为他在《七月》上登过一则启事，希望能有人帮他出版，但没有找到这种出版家。这次，我陪他去生活书店，他们似乎也没有意思接受。只好另找机会了。我又陪他去50号找到凯丰部长，萧军提出愿去延安，凯丰部长表示得很热情，答应一定想办法找便车送他们去。

在《七月》五集三期中，我选了两位新作家的小说：何剑薰的《肉搏》和路翎的《要塞退出以后》。他俩都在重庆，来看过我。何已快三十岁了，四川某地人。说他是新人其实是委屈了他，

他在上海时就已经发表过作品。曾为黎烈文的《中流》做校对，后来和黎闹翻了。这人很健谈，知识很丰富，尤其是谈起四川的一些人物，如绅士，地主，教员等，简直可以使你喷饭，而他又不笑，很有幽默感。不过，情绪也就因此阴暗了些，但他笑起来又很天真，绝不是那种老于世故的玩世不恭者。他本来在教中学的国文，觉得没意思就写小说，还辞去了教书想换换生活，我答应为他找工作。我用了他的小说，可是很不顺利，我不得不在《校完小记》里这样提到他：

……作者何剑薰，战前就发表过小说。题作“新人”，不过是因为读者不大熟悉的原故，其实是并不适当的。何先生拿来的原来不是这一篇，而是写内地某一角落的中学教育现状的，讽刺的然而沉痛的作品，不幸，主要的部分被认为“不妥”，不能印出了。作者的讽刺才能，在那一篇里才有了生动的发挥。……

在国民党统治下，尽管举目都是尔虞我诈的黑暗景象，但是暴露它是不被允许的，哪怕是用讽刺的笔法，也都会遭到审查官的杀伐，用“不妥”二字决定了作品的命运，甚至没收它们。何剑薰后来还写了不少这类的讽刺小说，我都准备用，但都被扣了，连我为他编的一本《七月文丛》在桂林送审时也被扣了。这是他在创作上的不幸，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学史上讽刺小说这一栏里缺少了一名有特色的作者！

为了帮他找工作，我介绍他与高麟度见面谈过。高想要一个合作者帮他修改译稿并找资料，结果没有谈妥。最后只好介绍何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去当“学友”了，我是希望他能系统地学点文艺知识的。（育才学校有一个学友制度，即，带领学生学习，也向学生讲点课，但名义叫“学友”，自己也是一道学习的意思。）

路翎寄稿来时用的是流烽的名字。我觉得作者很能写，并且有自己的特色，回信对一些不足之处提了些批评意见，他改了以后，名字也改成了“路翎”。约来见面以后，简直有点吃惊：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很腼腆地站在我面前。我赶快请他坐下，很随便地和他谈着。慢慢地，他习惯了，就和我谈了许多他的经历和一些看法，想不到小小年纪已有这多的经历。他年青，淳朴，对生活极敏感，能深入地理解生活中的人物，所以谈起来很生动。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好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当时他也正在失业，我也将他介绍到育才学校去当“学友”。我心想，他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艺术知识，对他将来深入创作小说是有用的，还可以从何剑薰学到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可惜他们两个没在那里呆好久就出来了。我和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尤其是路翎，就更为深厚了。路翎后来专心写小说，我后期的《七月》上几乎期期都有他的作品。他常常来找我谈天，问我对作品的意见，我就很不客气地诚恳地将我的看法告诉他。可喜的是他的理解力那么的敏锐，他加以修改后的作品都是将我的意见真正通过自己大脑的思索后再创作的，是日臻完善的整体，并没有修改得支离破碎。我对他的作品一直都很满意。

萧军来告诉我，他得到50号的通知，一有车就要去延安了。这使我高兴，也放下了心。要不，重庆一来轰炸，他一家三口陷在这里是很不安全的。他带我去南岸看望他的新夫人和女孩。夫人是一位还未脱学生气的青年主妇，怀里抱着孩子。萧军很得意地向我介绍，我当然表示高兴，还夸奖了孩子几句，也开了一句脱口而出的玩笑话，要她多管着点萧军。大家哈哈一笑。出门后我很严肃地向萧军说：“到那儿你可不能像在上海一样啊，尤其是不能做出伤害你年青妻子的事。”萧军说：“你放心，

我们是经过了考验的。我不会伤害她，我将尽力保护她。你尽管放心好了。”

后来他来看过我两次，还是尝到了重庆轰炸的滋味，直到五月中旬才离开重庆。过些天收到了他平安到达西安的来信，我才算是真正放下了心。

大概是由于第四集合订本的销路好，老板就将印刷改在重庆的大印刷厂了。这样，可以打纸型，好销时可以添印。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大印刷厂可不来给你赶时间印，何况老板又总是打小算盘，舍不得多花钱。有一次，在他那里吃饭，和他谈起《七月》的事。他喝醉了，和我顶了起来，意思是，赚得并不多，还要担风险，万一全部没收不就全赔了？他不能为我蚀本，等等很难听的话。双方口角了一番，不欢而散。在他那里出刊物，我心里总感觉不痛快，别扭，很想另找家比较懂得《七月》的价值的书店。曾和新知书店联系过，他们很诚恳坦率地回答我，实在是资金不足无力接受。几天后，唐性天来信道歉，这事也就算过去了。

重庆的雾季过去了，现在是一清早就阳光普照，一片晴朗天气。敌机的轰炸也开始了。我常常被警报叫醒，或者是夜晚来警报使你一夜不得安睡。我只好两边跑，飞机常来就回乡下，看看能有几天不来飞机就赶快进城。这样，弄得很紧张，工作也做不好。教书得备课，编杂志得看稿，至于上班就只好不管它，反正一拉警报大家也就不上班了。

5月27日，晨九时警报响了。张定夫避到我这里来，因为这儿可能比镇上更保险些。午饭后我和他正在下棋，忽然敌机临空，似乎站着不动了，只听到有“嗦嗦嗦”的声音。我一看不好，可能是投弹了，就下意识地拉着张定夫把上半个身子躺到方桌下面去。堂屋里的M也在叫孩子进屋。一会儿，“轰轰”的几响，全

屋震动，积尘雨下，眼前几乎一片朦胧。彭大娘把女孩蒙着头躺在后屋她的床上，孩子大哭，彭大娘一个劲地叫菩萨保佑。没有等飞机声全消，我就跑过去把孩子抱出后门去透气，但已经望不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时才听到人声。张定夫惊魂未定地说，“好险呀，好险呀！”拍拍身上的尘土就赶回家去了。

这次轰炸造成了相当的伤亡。我出来到各处去看了看，只见在我窗对面的那一片有手臂粗的竹林，被弹片拦腰打断了好些根，可能还是它们挡住了弹片，救了我们的命呢。再往前走，我们前面那一户人家，一个老农妇被炸死了，旁边还炸死了一头猪，可能她是来喂猪食的。走到包谷地里，有一个农民在锄草时被弹片削去了半个脑袋，死在那里。我在附近拣到一大块飞机的翼翅残骸，至于地上的弹片就太多了。在树林里有一个学生呆呆地在那里站着，走近一看，是熟识的学生牛述祖（原名崔宗玮，是我在东大附中的同学崔宗祺的弟弟），赶快叫他。他几乎到了失神落魄的地步，身体只是在抖着。我怕他伤着了哪儿，就扶他回家，给他喝了点水使他安定下来。他脸上有血痕，细看只是跌破了点皮，问他是这么一回事，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只是说，听到炸弹声就往前跑，也不知怎地就跑到这儿来了。正好M的学医的表弟来看我们，就请他再仔细地检查一下这学生。检查结果没有受任何伤，只是牙痛，表弟便向M要了片加当给他吃。一会儿牙不痛了，就穿着M给他找出的我的一件夹袍赶紧回学校去了。

我的住宅周围落下了三个炸弹，两个杀伤弹。我的住房窗子的木条被弹片削断了一根，幸亏没来削去我的脑袋！卧房也飞进了弹片，它打穿了竹篱墙，到了隔壁人家的衣柜里，才停了下来，如果屋里有人，那又该倒霉了。

北碚、黄桷镇落弹甚多。复旦新校舍周围落了弹，文摘社

的一位负责人贾开基被炸断了一只手臂。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被炸死。他今春刚从香港回来，我见过几面，是名教授之一，岁数不大，很有风度，又和气，也有思想。他创办的《文摘月刊》(?)和文摘社在学术界很有好评，他在学生中威信很高。这次回来似乎是想把学校搞得更有起色，大家也正是这样寄希望于他的。他的被炸死，实在令人惋惜。

这里已经不是安全的地方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全家人到石子山吕振羽、向林冰那儿去避难。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是砖瓦房。据说过去是某地主家，后来他升任保长住到更好的住处去了，就将这房租给了通俗读物编刊社。现在这社迁到别处去了，留下的房子由过去的社长段绳武的遗孀住，向林冰和吕振羽各分住了一间。吕振羽说，这里离东阳镇近，也不安全，昨天东阳镇上落下好几个炸弹，炸死了一些正在树下吃茶的抬滑竿的和过路的人。所以，来警报时，吕振羽夫妇就领我们到前面那片山的么店子廖庶谦家去躲。警报过后我们再回家。

就这样跑了几天警报后，终于由向林冰他们帮助，于6月3日住进了他们院子旁边的三间土房里，再一次安下家来。

东阳镇石子山通俗读物编刊社旁边有三间小土房，原是地主家的佃户住的，现在地主把大住宅租给编刊社，这三间房也一道租出做了带家属的职员宿舍。编刊社正在陆续迁移去成都，这房也将空出来。向林冰很热心，商请小屋的住户暂时搬到大院去住，把三间土房让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由刚挨过轰炸的帅家坝搬到石子山麓了。

我们的日用物品并不多，但有两藤包书和一木箱的来稿和来信，这是无论如何不能丢掉的，就只好请了两个老乡来帮忙搬家。

这三间房，左间当卧房，右间算是书房，中间只好当厨房，还隔了走道和半间房让彭大娘住。编刊社借给了我们桌子和床，一布置倒还不错，不需要添什么东西就可以安身了。把屋子整理安排好，我们也精疲力竭了。晚上一躺下，大家就都香甜地睡死了。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独门独院也应该有所防备，只有彭大娘在门上了大门后还加了一张椅子顶着门。

天亮时，听到彭大娘大声喊叫：“不好了，先生，太太，不好了啊！进了贼娃子了……”这突然来的惊叫，使我们全都醒了。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出去了。只见门大开着，门都没有动，是从门脚柱那里把门往上端开的。书房里晾的衣服都没了，再回到卧房一检查，M也惊叫了，靠床边的椅子上放的衣服一件也没留下，都被偷走了。一看，窗子边上还放有一根竹竿，原来是用它来挑走衣服的。后来听晓谷说，他曾听到竹竿敲椅子的声音，他吓得不得了，反而用被子将头包住，不敢做声。好在这还只是撬门的小偷，不敢进屋来，所以椅子旁的皮箱没有被拎走，不然我们可就要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了。现在，偷走了我唯一的一件出门穿的旧西服上衣和乡下家里给我缝的一件线呢绒里夹袍，再加上竹竿上晾的衬衫等，总共值三、四百元呢。那夹袍还是前几天牛述祖才还给我的。M心痛得很，不住地说，这多钱的衣服，我们什么时候才做得起呀！三、四百元钱在我们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正在劝解M，忽然外面彭大娘拉着哭声叫着：“鬼贼娃子，砍脑壳的，死贼娃子，你挨炮子的，把老娘才做的一件新褂子都偷了，我才下水呀，崭新的呀，我几时才做得起啊！……”M同我说：“看来我送彭大娘的褂子，昨晚也被偷了，难怪她伤心了。”M走出去安慰彭大娘，叫她不要咒骂贼娃子了，而彭大娘仍是一个劲儿地左一个“砍脑壳的贼娃子”右一个“砍脑壳的贼娃子”地骂个不停。后来还是

M说了：“你别骂了，他又听不见。我再给你做一件吧。”

隔壁住的吕振羽夫妇，他们的窗子开在我们的左边，这时听到声音就赶来问是什么事。知道是被撬门贼偷走了衣服，感到很气愤。吕振羽还提出应该去找房东江保长，他是袍哥，这一定是他手下的小兄弟干的，应该要他负责追查。向林冰和编刊社的人都说，过去没有过这种事，一定要追查，不然以后安全就更没保障了。最后，吕振羽陪我去找了警卫区和袍哥头子，算是报了案。当然是没有结果的，只好自认倒霉！

最令人气恼的是，地上遭贼偷，天上还得挨轰炸。接连几天都有飞机来，根本不能做事，只写成了悼念孙寒冰的短文。这时又收到了崔万秋的信，催我上班。《中苏文化》也来电报催我的稿子。

我们住的石子山屋后就是荒山义地，上次在东阳镇被炸死的在茶馆喝茶的小商人和抬滑竿的，大多被草草地埋在了山上。这几天，我们这里可以闻到臭气，连水井里的水都有气味，使得我们生活上很不舒服。我如果回到重庆去，这儿留下老幼妇孺，真使我不放心。但是为了工作，我只得收拾文稿准备回重庆。

6月10日，来了警报，有敌机五十三架飞过。

第二天还是过江想搭车去重庆，路上遇到唐性天，说重庆乱得很，根本没人上班。我就又折回了家里。还没坐定，警报又响了，我们由向林冰和吕振羽夫妇陪同到去东阳镇中途的一处山洞里躲警报。这洞是上面一座小山上的气象站挖来放仪器的，这气象站的主人是一对年青夫妇，有一个一两岁的孩子和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向林冰同他们似乎很熟，所以在那儿躲着还能抽烟聊天。好几个小时后才解除警报，后来知道有九十架飞机飞过。

12日晨，再一次过江乘船回重庆。船到磁器口上游二十里

左右处遇到了警报，就避到了竹林内。到了城里看到住房还没被炸，只是屋上的瓦被掀去甚多，开了几处天窗。去华中看看见武库街有几家书店被炸。又到文协见到留在重庆的朋友们，晚上就宿在葛一虹处。

报上登宜昌失陷了，第二天德军又进驻了巴黎。我去上班，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大家都精神紧张忙着躲警报，哪来心思上班。几天后我就又回到北碚石子山家中。

想写准备用在《七月》上的文章，但简直无法安下心来，只开了一个头，就写不下去了。来访的客人倒不少。还和靳以等一起赴北温泉参加了文协在北碚的会员大会，会后聚餐。

6月24日，我正在清理稿件，午饭后忽然来了警报，我和M都不想去躲，只彭大娘带着两个孩子跑出去找地方躲。忽然，“咚咚咚”像地雷爆炸似地几声闷响，我们的小土屋受到震动，头上的瓦哗哗乱响。这次虽然没有尘土满屋飞，但那“轰轰”的响声可比上次持久。M急坏了，一推门就往坡下跑，嘴里叫着彭大娘和晓谷。那茫茫一大片桑树林，上哪里去找他们啊！我安慰她拉她回屋去，她就是不肯，一个劲地用哭声叫着。幸好这时飞机走远了，彭大娘听到了她的叫声，才领着两个孩子回来。

彭大娘他们是躲在桑树林那儿的一座生基里（已完全空了的古墓穴）的。头天彭大娘就说过，有的老乡躲在生基里，她就去选了一个，一听到警报就领了两个孩子带两张小板凳去了。后来，我去看了看那古墓，它是厚麻石砌的，原来的门已破，人可以钻进去，黑古隆冬地倒还阴凉。上面的大石板没破，板上有厚厚的土，还种得有苞谷呢。不命中炸弹，倒很保险的。我在洞里拣出几根骨头，可能是过去的死人骨头吧。心里很不舒服，就悄悄地把它埋了。

这次的敌机轰炸目标，似乎就是北碚。投了不少的炸弹，

北碚几乎被烧去一半。

25日去参加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民族形式”座谈会。这里可以说是向林冰的基本队伍，他们的看法当然有偏向，我只说了很少的话，基本上是听他们的。会开到半当中，又来了警报，直到下午四时余才解除。这天夜里，写完了《民族战争与我们》。

26日上午十时就响起了警报，这次是M带着孩子一同去生基里，带着水和孩子吃的饼干，没有飞机来时孩子就可以在洞外面玩。直到下午二时余才解除警报。我一直在外面抽烟，看到有两批敌机从头顶上飞过，大概是去炸别的地方了。得到崔万秋的信，意思是非要我回城“办公”不可。

27日又是上午十时警报，下午一时余解除。听说敌人在重庆投了毒气弹。

28日又是上午十时警报，下午二时左右解除。我到北碚去访唐老板，他说重庆住的人不多了。这种情况我当然不必马上回去“办公”。但崔万秋又来信，终于暗示要我辞职了。

我在30日冒着大雨过江搭车回了重庆。7月1日上午去国际宣传处交了辞职信。

饭碗终于打破了。对我来说，除了少了一笔主要收入外，却不必再为“办公”去赶车赶船，轻松多了。

这几天重庆没来敌机，我趁此机会去访了几个朋友，并且购物和买书。临回乡前一天早晨，特地去看了周副主席，听他谈国内外形势，向他请示我今后工作的方式方法。话还没谈完，就来了警报。躲到了化龙桥，就去访李克农，主要是问他熊子民的近况，并听他谈西南的局势。后来又同新华社记者陆诒到新华日报馆，晚上是范长江请吃晚饭。这晚宿于葛一虹处，他和我谈了些同向林冰论战民族形式的情况。

第二天早晨，搭船回北碚。在土沱遇到了警报，下午四时

才到家。洗了澡吃完晚饭，就和吕振羽、向林冰一起闲谈重庆情况。

根据这几天所了解到的情况，日寇是想效法德国希特勒用狂轰滥炸来逼使蒋介石投降（他们想攻下重庆是太困难了），再加上亲日派的压力，所以蒋介石不像武汉时期那么坚决抗日，他的军队也没有过去的那份同仇敌忾的士气了。上面贪赃枉法搞投机倒把，使得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难。我们这些人中有几个吃得起烟（机制香烟）的？我和吕振羽多半是吃土烟，又名小雪茄，一两角钱能买一包。国民党现在这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势必对文化教育方面加上更多的禁锢，以至党伐异己，老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不过，从大原则讲，只要老蒋抗日，我们就要支持他。

虽然这几天没来敌机，但复旦大学早已无形中停了课。学生有家的回家，没家的就住在学校。上次轰炸，据说是敌机以为复旦在东阳镇新盖的宿舍是军营，所以扔下了好些炸弹。幸好学生们还没住进去，所以只有在北碚和镇上的几个学生伤亡。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也就不必上课了。有的已住到远处的山上。章靳以、梁宗岱等就住在我家上面的么店子山上新盖的楼房里，很多教授要去看他们就会先来我这儿，有时我也陪同着一起上去。我还同吕振羽到慈幼新村伍蠡甫那儿去过。所以，大家来来往往地，倒也颇热闹。

高长虹从重庆来了，他原来住在张家花园文协里，这次来是想在这儿开文协谈话会，晚上住在我这儿。我陪他过江去找姚蓬子，商定27日召开文协谈话会，借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地方，还请他们准备一餐午饭。北碚和在北碚附近的会员，能邀请的都请了，共到了二十人左右。大家情绪很好，吃的是北方大馒头和四季豆、茄子、粉条炖肉，倒也简便，也没有闹酒。

高长虹——二十年代利用和侮辱过鲁迅，我对他没有好印象，但这次见到他原来是个貌不惊人、言语木讷、矮小干枯的小老头，并且听他说，他当年出国是当猪仔躲在底舱里，发现了就被赶上岸，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流浪，倒走了不少国家，可一事无成，现在都五十多岁了，仍孑然一身。我对他产生了同情。他还不失过去狂飚时期的狂妄，忽然异想天开，要文协作家签名发起募款，捐献三十架或更多的飞机。他居然以为作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这只能是最后说了一次狂飚式的梦话。更重要的是，他这等于说，敌人能够轰炸重庆，是因为中国没有飞机，客观上也就是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和压制人民的国民党开脱罪责。后来，听说他到延安去了。一九四九年初我在沈阳，听说这个墨索里尼的崇拜者到延安后无所事事，时不时向中央写信提意见提要求，打扰中央，还提过对斯大林的意见。中央对他的一些狂妄之言，并没认真对待，只是置之不理。这时他住在什么地方的高级招待所里，不与任何人讲话，双眼望着地下，在食堂吃了饭就回到房里不出来了。我没去看他，后来听说他病故了。

八月份整整一个月没有进城都在石子山度过了。除了访友和与来访者谈话外，还编成了萧军的《侧面》，又重编了《七月》五集四期（早编好的被炸散了）。另外，在着手看有关“民族形式”讨论的文章。

北碚有一处林语堂回国后购买的小洋房，由于重庆和北碚都遭轰炸，他们一家不愿在此居住，在屋外照了几张相，又回美国去了。这房子就送给了抗敌文协，现在是北碚分会会址。文协既有了房子，重庆就常有人来，我有时也过江去那儿坐坐。

晓谷快满六岁了，从黄桷镇搬到这儿，在家里玩了几个月，现在我们决定送他去东阳镇小学升入二年级。从我家到东阳镇，

要走完整个石子山，大约有四、五里路吧。幸好这时彭大娘从合川老家回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小儿子，就由这孩子每天送晓谷上学。这孩子刚十一、二岁，不但没能上学，还得在瓦窑学徒做瓦。他母亲这次回去看到他长得又矮又瘦，心痛得很，但还要二年才能满师，而小脚由于日夜踩泥，已经又肿又烂了，她实在不忍心，就把他带了出来。

路翎来我家看我。在重庆时他常来看我的，到乡下这还是第一次。这天他穿了一套新制服，显得成熟多了，不再像个孩子样。我本来把他和何剑薰都介绍到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当学友，谁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呆多久就离开了那儿。原因是作为教师的每个人都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同别人接近，所以他们不但学不到什么，还感到很寂寞。

他这次来是找我谈他的小说。上次的一篇我已看过并提了意见，这次是修改稿，并且还带了一篇新写的一、两万字的小小说《何绍德被捕了》。他已在我住处附近的白庙子天府煤矿公司做了一名小职员，闲时就写小说，写他生活中所看到所体会到的，所以这篇比第一篇成熟多了。他的感觉十分敏锐，不但能在作品里将人物内在的东西写出来，就是我和他谈时对有的地方认为可以发展可以更深入的，只要一指出来，他很快就能理解，并且修改后的稿子基本上都将缺陷弥补了，成了一篇有血有肉的比较完善的小说。他既有着对自己的创作事业的热情，又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人民的深情。以他的素质再用功多读点书，将是我们这一代不可多得的天才作家。同他谈话是很愉快的，我们之间并没有年龄上的鸿沟。我留他在家里吃了晚饭，还喝了酒。

复旦大学将这一年度的聘约送来了，仍是六节课，但规定兼任教授上课要签到，不到者扣薪。这简直是侮辱和刁难。我

立即写了一信给陈子展，表示不接受聘约。在这之前，复旦专任教授、托派分子郑学稼就放出了流言，说我加入了国民党，我觉得好笑。但有一次张定夫却直率地对我说，入一入国民党有什么关系，入了就可以当专任教授，何必在外面奔波辛苦呢。我马上把话支开了。所以，问题的实质很明白，是想用复旦大学的专任教授这职位来拉我压我。我不能为这五斗米来和学阀党棍们打交道，我辞职不干了。当然，他们又来向我表示挽留并解释“误会”，但我没有接受。这样，我就完全失业了。

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来了。决定由陶行知出名邀请一些客人，记得我也附了一个名的。由我请复旦诸人到北碚聚餐一次，到了有二、三十人，都是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的教授们。陶行知主持，并请周副主席讲话。现在能记起的只是由于当时正是蒋介石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前，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鼓励团结、进步、坚持抗战的信心，反对分裂、倒退、投降的危机。

在政治上麻木无知的我，并没有认真地记住周副主席指示的内容，加以思索和体会，事后也没去访问到会的人尤其是有代表性的人，征求他们的感想综合起来向副主席报告。我只是高兴地和重庆来的几个人跟着他到北温泉住了一夜。我想，如果别人都和我一样，那他到北碚一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在群众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无从知道了。我在第二天送他上车时汇报了一点估计：国民党在文协的代理人，已经不是王平陵而是姚蓬子了。

几天后，卢鸿基陪同他的同学王朝闻来访，说是王即将去延安，想在行前为我画一张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并留他们在家里住了一夜，谈得很投机。王大约是刚从外地的抗战团体出来，所以当我们因为帐子是破旧的可能有蚊子咬他，对他表示抱歉时，他却说，在野外住常常没有帐子，只要有被单就能

裹着头睡的。第二天，他和卢鸿基两人各为我速写了一张像。王是用竹篾片敲碎蘸着墨画的，很有特征，我认为表现出了我的性格，很是喜欢。卢画的一般，但他给晓谷画的一张倒很不错。可惜王朝闻这张速写在我被捕后家里搬迁时被孩子搞丢了。

九月底，写成了“民族形式”上篇共六节。十数天后，将它全部写完了，题为《论民族形式问题底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后又写了篇《后记》，将M为我抄好的稿校对了一遍。这才收拾衣物准备去重庆。

这次赶去重庆，是为了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会的事。这次开会由于国民党正在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所以政治空气更为阴暗，临时有被迫停开的消息。我们经过了一番交涉，后来在主席团里又添了几位要人，特地请了中宣部部长梁寒操，这样才能被批准开会。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和《新华日报》通气，《新华日报》只听到了纪念会被禁止的谣传，当天就登了一条带抗议意味的报道，这影响了群众到会。

1940年10月19日下午三时，在巴蜀小学广场召开了纪念会。周恩来、冯玉祥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等在主席台就了座。冯玉祥到会一会儿就说有约会要走，只好请老舍设法留住他，并请他担任主席。冯玉祥讲了话，好像梁寒操也讲了话，内容都无记忆，连我自己的讲话内容也记不起来了。记得郭沫若和田汉都发了言，但内容都忘了。

我的目的是想请周副主席讲话，催了主持会议的司仪范长江几次，但他直到会终都没有报周恩来同志讲话。我想一定会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想听周副主席讲话的。这次纪念会就这样虽然没有出事，但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影响。

（我当时只希望副主席讲话，他讲话就会产生政治影响，因而心里很责怪范长江胆小。其实当时局势严重，在那种场合他

不能随便在一般群众面前讲话，范长江定是早已得到了党的指示的。而我呢？这样一项重要工作，事先竟不向党请示报告。如果事先报告了，一定会得到指示，会能开得好一些，《新华日报》上也不会登那条消息。）

晚上文协的聚餐会上，周副主席和沈钧儒先生都来了，周副主席并且讲了话。他从思想上鼓励并教育文协会员们，我的心情也为之振奋。沈钧儒作了关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内容我记不起了。

第二天上午应中华职业教育社之请，到实验剧院讲演。但过了预定时间（九时）已四十分钟，剧院还被卫戍司令部占住作纪念周，说是还得用一个多小时。于是冒雨随听众到巴蜀小学去讲。同行的一个青年告诉我，他是早上走了二十几里泥泞的路赶来听讲的。但是，我却只能从文艺现象上抒发一点对现状的愤懑情绪，无能涉及具体的政治问题。

讲毕同张西曼到江北的“国际新闻社”，参加他们成立二周年的纪念会。晚上，又主持鲁迅纪念晚会。我讲了话，大意是从鲁迅先生的几篇杂文谈到目前的情况，抨击了当时的一些反动措施。

现在我是无职一身轻，不必因为上班而浪费大量的时间了，时间完全由我支配。这次在城里主要的工作是：看完了《七月》清样；在文协开了理事会；看欧阳山的《抗战三年以来的小说》稿和沙汀的《敌后的文艺活动》稿；主持诗歌晚会等。

我还去访了费君（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费德林，是张西曼介绍认识的）。过去他曾请我介绍抗日革命文学的情况，这次是与他商量搜集苏联方面关于鲁迅的材料。

重庆的事基本办完了，就搭船回到北碚。我和华中图书公司签订了八期的《七月》合同。又为学生们补了学期大考，算是对

学生尽了职，也就完全结束了教书工作。

剩下来的工作就是清理稿子和回信。由于这一向经常在轰炸中度过，家里和重庆住处收到的稿件都来不及看，更不要说回信了。现在就抓紧时间做了一些答复，并准备编《七月》第六集的稿。说是月刊，其实已延期一个多月了，五集第四期都还未出，本来早该出的，排好版正要印时，敌机轰炸波及了印刷厂，排好的版全都炸乱了，连原稿都找不着了，第四期等于是重编的，第六集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更是无法预料了。

11月8日得到郭沫若电报，说是政治部第二天要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要我和吕振羽参加。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在撤销了郭沫若的第三厅厅长后成立的。那时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正在上涨，撤销郭沫若的厅长显然是先行措施之一。周副主席针锋相对地向国民党提出，你们不要这些人，我把他们带到北方打游击去好了。国民党无话可答，只好改在政治部下面成立了这个会。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不需要也不允许这个会做什么工作，但这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人一个合法的据点。周副主席把我放了进去（我是文工会的专任委员，吕振羽是兼任委员），使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多一个合法身份，更有利于工作。这样，我和郭沫若主任等党所领导的作家们就能经常见面，加强相互了解和团结。同时，也解决了我离开国际宣传处和复旦大学后的生活问题。几个月后，粮价飞涨，市上的米不好买，我一家人就靠文工会这几十斤军米度日，这时，我才更感到周副主席这一安排对我们是多么重要啊！

我和吕振羽一起过江，但没能赶上船。在等船的时候遇到了巴金和靳以等。巴金是来北碚访友的，曾和靳以来看过我，我也曾到靳以家去看他。他从上海还是香港来，我没有细问，只谈了一些文坛上的情况。第二天早晨，又去约巴金一同搭船，

十一时到重庆。下午二时开文化工作委员会，算是成立会吧。委员们我认识的不多，只有老舍、吕振羽还有姚蓬子是熟人。提姚蓬子当兼任委员，周副主席大约是为了照顾国民党的面子，同时也是统战的意思。把姚放在要求进步的文化人中间，当然也是拉他一把，希望他不要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黑了良心造谣生事。

这天晚饭是郭沫若请客。喝酒，聊天，表现了非常的融洽和亲切。从此，我和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诸位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尤其是在武汉就有较多来往的冯乃超，现在可能是文工会的党的负责人，我遇到和政治有关的个人行动上的问题，就可以问一问他，听听他的意见。但在文化工作的文艺问题上，除了个别的事如文协的工作，我有责任主动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外，我自己编刊物那是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人影响的。

《七月》第五集第四期终于出版了。这期原来排好的版遭到了轰炸，后来补上的稿显得单薄了些，又晚了四、五个月才印出来。本来应该为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选登几篇纪念文，却未能做到，只有欧阳凡海的一篇《鲁迅的幼年期》，算是表示我们对先生的悼念了。

这次在重庆我编好了《七月》六集的一、二期合刊。还参加了文工会文艺研究组的聚餐，大家有机会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当然谈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不过能互相认识联络一下感情也好。

在参加了文协的理事会和文协主办的小说晚会后，正准备回家，又得到华中的通知，《七月》送审的稿件被扣了一篇，只好等回乡家里后再选一篇补上了。

回到石子山后几天内北碚的熟人来访的真不少。邓初民夫妇由重庆来了，我同吕振羽去张定夫家看他，第二天又请他们

来家玩了一整天。

向林冰约了卢于道、曹日昌等来聚谈，并且决定今后每两周会谈一次。

原在“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方白，现在中央研究院设在北碚的一个机构里工作。那里的科学工作者生物学家卢于道和心理学家曹日昌，和向林冰组织了一个不定期无形式的座谈会，有一两次在向林冰处开会，也约我去参加了。谈的是学术思想，未涉及实际政治问题。

曹日昌和方白用信的形式写了一篇文章给《七月》，指出郭沫若在批评我的文章里把“无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解释反了。我觉得，这在《七月》上发表出来，成了和郭沫若的对立形势，影响不好，就退回他们了。他们寄给罗荪编的《文学月报》发表，后来又登了郭先生更正的文章。这样很好，总算澄清了一个学术问题。

这两个月在我可真是青黄不接，稿费不多，文工会的工资还没有发下，所以经济上比较困难。向林冰约卢于道和曹日昌来聚谈，我留他们在家午饭。M很为难地对我说，只有一点肉，做不出什么菜来。幸好彭大娘的儿子从田里捉了两条大黄鳢回来，我们就用清炖黄鳢汤待客了。这次，我们订了每两周座谈一次，并共同读书，我也决定趁此机会好好读些书，要不真要成为鲁迅先生所指责的“空头文学家”了。

在乡下编成了《民族形式讨论集》。华中的唐老板愿意出版，他大概看出了可以有销路吧。我把收集的双方的文章分类编排起来，约有三、四十万字。搞好了我就进城去了，在那里又写了《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前记和《民族形式讨论集》的解題。

关于“民族形式”，我大约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论

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在写的过程中，具体内容没有对向林冰露过一句。写成后分成两篇，上篇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争点》、下篇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实践意义》。吕振羽住在隔壁，只给他一人看过，他看了非常赞成，只提了两个科学用语上的意见。他把向林冰的影响估计得过高，要我在送审通过之前，暂不让向林冰知道。我将上篇给了葛一虹编的《中苏文化》，下篇给了沈志远编的《理论与现实》。送审的稿子上“新民主主义”的“新”字都不写上，是通过后再补写上去的。

送审过后我回到石子山，才把原稿给向林冰看。他原来以为我会肯定他的某些论点，现在看到我对他的论点全部否定，当然非常丧气。他打算回答，但考虑了几天后，终于绝望地放弃了。这一放弃，等于他在文艺问题上丧失了发言权。但有一点他是感激我的，因为我在《后记》上说了一句，他是不自觉地走上了反辩证法的反动的道路，并没有暗示他是奉国民党之命干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一些党员作家、左翼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都作了指名的批评，这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虽然我是为讨论理论问题，但还是有人为此耿耿于怀，甚至到后来我出了问题被举国申讨时，揭发我在当时就骂尽了中国作家，这当然是我的一大罪状！

在重庆时，我忙于开会、会客、访朋友等。曾和曹靖华、沈钧儒一道到银行去存纪念鲁迅捐款。数目虽然不大，但足见各界人士对先生的尊敬和追念。后来又同茅盾、郭沫若、沈钧儒等一起商讨《鲁迅全集》在内地出版的事。

在这一期间，我还参加了文艺杂志编辑人座谈会，出席了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我参加这个委员会是想为左翼的进步作家

多争点名额好安心创作，但是国民党的低级文人都想在此分一杯羹，所以争得很厉害。

向林冰从北碚来，特来看我，带来了M的信。信上没说什么，而向林冰却向我说出一个使我难过的情况。他说，“这一向北碚没有来米船，东阳镇等地不但米不好买，还涨价得很快，因为只能向地主买黑市米。你家可能米不多了，听请的大娘说，天天晚上吃挂面头煮红苕当晚餐。你夫人又不肯要我们帮忙买米。”

这几个月来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因此家里生活得很拮据，这点我是感到的。平日我在家，早晨也常用红苕稀饭当早餐，M只说孩子们爱吃。肉和蛋，只有我和孩子们吃，她自己总是不吃。我因此都生气了，一再说，我在外面常常有人请客，出席宴会，不要顾我。而她可说，这里逢场才买得到荤菜，每次都是自己去买一、二十斤米和几斤菜背回来，所以不得不节省着让我和孩子们多吃点。她的这份好心，常常使我感到不安，现在居然连米都吃不上了，我得赶快回家才是。听说政治部文工会每个专员和工作人员能有一份军米，约三、四十斤。我去问了，果然有。就用一个木箱领了两个月的，托华中图书公司的店员设法帮我带到北碚，自己就去买船票准备回家。

船票没有买到，下午去参加了文化界招待苏联在华友人的茶会。到了近百人，空气显得很热闹和谐，还一同拍了照，这大约是电影界的人摄的。晚上，又参加小说晚会。第二天，12月9日，乘汽车回到北碚。

见到M和孩子们，觉得他们真是面有菜色，就亲自去赶场买了两斤肉，给他们打了一次牙祭，因为我已向出版社预支了一笔稿费。家里只有他们母子三人，女儿还不到两岁，不得不请个大娘帮忙和作伴。彭大娘已经带儿子回去了，现在用的是

一个中年妇女，家离这里不远，丈夫几年前死了，儿子儿媳嫌她没劳力，她觉得与其在家吃受气饭，还不如出来帮人。她一天没什么事，就背着女孩到老乡家去玩。晓谷一早上学没人送，幸好他同对面山头那户人家的大哥哥们很要好，每天早晨他们在路口叫他，我们看着他向大路走去，和他们一道走，这就使我们放心多了。

白天家里是很安静的。我看了吕荧译的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原稿，决定放在第六集一、二期合刊上为第一篇。我在《校完小记》中除了对吕荧翻译的严肃认真加以介绍之外，还对文章说了这样的话：

至于文章底内容本身，一时很难说出什么意见。这里面提出了一些在文艺创作方法上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而且从一些古典作品里面征引了例证。这些原则问题我们的文艺理论还远没有触到这样的程度，虽然在创作实践上问题原是早已严重地存在了的。在苏联，现在正爆发了一个文艺论争，论争底主要内容听说是针对着以卢卡契为首的“潮流派”底理论家们抹煞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理论倾向的。但看看这一篇，与其说是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是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问题也许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底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了世界观底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底作用罢。那么，为了理解这一次论争底具体内容，这一篇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宝贵的文献。

对于这一期的其他内容，我写道：

小说四篇，显示了一些不同型的女性底面貌。在苦难里面反抗的，由黑暗到光明的，寸于不决的，坚决奋斗的，因反抗黑暗而早熟了的孩子，为追求光明而年青了的老人。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面，我们随处都找得出多样的鲜明的对比。

又是这么多的诗，而且又是讨厌的“街头诗”。看近来重庆文坛底舆论，诗要被认为是诗，非得写极长的行子，顶好是不留空白，否则要负浪费战时物资的罪名，一点也不浪费战时物资的公正人士就会出来大喊“救救纸张”了。

……

但凑巧的是又有了一篇关于马耶珂夫斯基的介绍。在我们这里，马耶珂夫斯基是提不得的。你提他，你就准是学他，通人们不是表示深恶痛绝就是不屑地冷笑，一个不懂“诗韵大全”的狂妄的洋鬼子！……

写完《校完小记》，才觉舒了一口气。文坛上有这样的奇谈怪论，不回敬上几句话又不行，太委屈作者了。

这次在家住了半个月，做了不少的事：看完了复旦学生上学期的试卷，算是对学生们也有所交待了；草写了代文协拟的《致苏联作家书》；清理和审阅了许多积稿和来信；还听了卢于道的报告《达尔文主义批判》。最使我高兴和出乎意外的是，《七月》这期居然排好并送来了校样。我和M一起赶着将它校对完，这才收拾东西准备进城。

12月25日早晨，没赶上轮船，就搭了木船，下午五时才到化龙桥。坐人力车到了上清寺，宿于葛一虹处。

第二天，到国泰影院去看宋之的的话剧《鞭》的彩排。剧团请客，并要我发言，我毫不客气地说了些批评的话。后来宋之的又约我去他家再谈《鞭》，并留下午饭。这天下午，出席了文协理事会，晚上和杂志编辑人座谈。

这几天正是1940年的最后几天，我们虽不习惯过元旦（阳历年），但距离旧历年已没多久，也该准备过年了。收到M的来信

说，过年了，无论如何要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哪怕是一张新手帕也好。这是在责怪我对孩子们关心太少了。前几次她要我给晓谷买双套鞋或皮鞋，我先是忘了，后来记起了，可哪里也找不到小孩穿的这种鞋。看到朋友们的孩子有的穿着，一问，说是在委托行碰上的，或是别人从昆明或上海带来的。我哪有这功夫去跑委托行？幸好鞋子问题由金宗武帮我解决了。他说，他那里恩施有一家做皮鞋的作坊，可以给我们做几双皮鞋来。我们很高兴，立即寄了底样去。M想，既是做皮鞋，就将我的皮鞋底样也寄去了。不久，鞋寄来了，原来做的是皮便鞋。M和晓谷的都能穿，只有我的那双，比我的大脚还大了几分，只好望物兴叹了。真可惜，鞋做得很结实，要不倒可以穿个一、二年呢。结果是鞋没穿上，反得了个大脚的名声。

我去新蜀报馆访老舍，被留在那里午饭。报馆老板周钦若邀请我后天在那里过年。说起过年，我才记起M信上有话，要我托人把米送到乡下好过年。我立即去司法院找到李立侠，他是我在日本东京时认识的朋友，虽在政府工作，但是要求进步，对我一直很关心很同情。我这次领了三个月的米一百多斤，因他们常有汽车来往于重庆和歇马场之间，我就托他将米代运到北碚，他一口答应了。

除夕晚上在报馆，还真像个过新年的样儿。到了五十余人，猜拳、叫嚷、劝酒，闹得一塌糊涂。

又是一年了，应该做事了。我开始看吕荧的《人的花朵》，他已来过好几封信问情况，还想听听我的意见。

《七月》一、二期合刊出版了，封面用的是王朝闻的墨画《被囚的民族战士》。选这幅画，我是有意使广大读者知道，敌人是那么凶残，甚至用“老虎凳”拷问我们的民族英雄。最近，从徐冰那里听说国民党又在蠢蠢欲动，经常有很严重的摩擦。想到

国民党只知残害自己人的反动行为，觉得用这幅画做封面很有揭发它阴谋的意义。

吕振羽从北碚来，他是到50号去找董老或徐冰的。他告诉我很快就回去，我打算和他一道回去。

我赶着编完了第三期，这期就用上了吕荧的《人的花朵》。我在《编校后记》中这样写道：

《人的花朵》，论及了两个诗人，艾青和田间。说到田间，我们总是动辄得咎的，那罪名是“乱吹”或者“瞎捧”。虽然批评家总是吝啬地不肯说出他们自己的不“乱”不“瞎”的高见。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这一篇，和目前的不“狂妄”的批评家们并没有一点关系。远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作者就写过一篇关于田间的评论，而且由北平寄到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认识月刊》，但那篇稿子随着《认识月刊》底夭亡和战争底爆发而不知去向了。后来作者几次想补写而未果，到前年看了张振亚先生底批评以后才来信表示了重写的决意。不管对于具体的论点怎样，但读者当可以看到，作者是在研究对象，是想说明对象底真实内容，至少至少也该没有“唬”人底存意。……本来，还选出了田间底三首“小叙事诗”，想一同发表出来供读者参考。因为这和“街头诗”都是田间以及北方敌后的诗创作所开辟的新的方向。可惜没有给读者见到的机会了。

最后这句指的是，被审查官抽去了。我只好另选了三首带着青春气息和独特风格的青年诗人的小诗。至于小说和两篇翻译，我就不做介绍了，眼明心细的读者自会从中体会到它们的内在含义。

我又起草了《文协年会研究部工作报告》，清理了稿件。1月11日一早与吕振羽搭车回北碚。坐人力车去车站时，我被翻了

下来，左肋左股跌伤甚痛，回到家仍是痛得很。M用生姜沾白酒为我揉揉伤处，当时虽感轻松些但过后仍不见轻。只好到北碚江苏医学院去看病了。

抽一个晚上写成了《一个要点备忘录》，它是我在文协小说晚会上的发言要点：

看伟大的尽了战斗任务的作品，那人物是不是现实的呢？不用说是现实的。但能不能够说那绝对没有理想的成分，没有升华到现实以上的成分呢？我以为也不能够说的。所以，我认为，一个取得了艺术力和思想力的的高度的统一的人物，有现实的一面，也有非现实的一面。或者说，应该是现实的一面和非现实的一面的统一体。为什么是现实的呢？因为它是现实内容底反映。为什么又包含有非现实的一面呢？因为它通过作家底主观的能动作用的、现实内容底反映。为什么作家是“人类灵魂底工程师”，我们对于他的人格、思想、立场、战斗精神等提出了那么高的要求，从这里也可以取得理解。为什么我们所要求的现实主义必得把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本质的内容之一，从这里也可以取得理解。

……也只有肯定了这一理论，我们才能够把艺术力和思想力的统一当作现实主义底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说，客观主义是作家对于现实的屈服，抛弃了他的主观作用，使人物底形象成了凡俗的虚伪的东西，那么，相反地，如果主观作用跳出了客观现实底内在生命，也一定会使人物底形象成了空洞的虚伪的东西。标语口号文学，是从这里来的，反动的浪漫主义，是从这里来的，抗战八股，是从这里来的，用人物底哲学表白或政治表白代替他的行动过程的倾向，也是从这里来的。……客观主

义是，生活底现象吞没了本质，吞没了思想，而相反的倾向是，概念压死了生活形象，压死了活的具体生活内容。

反映现实，并不是奴从现实。相反地，是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也并不是把现实生活看作污贱的世界，用不着过问，只应该一纵而过。所谓情绪底饱满，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应的情绪底饱满，所谓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是作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应的主观精神作用底燃烧……。要不然，现实主义也就不能够成为现实主义了，等等。

所以，我们要求思想力与艺术力的统一。

这匆匆总结出来的三千字不到的短文，只能写出几个要点，将来有时间还得生发开去，但它是我这几年来从事编辑工作，看了众多的来稿，和读了不少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家的作品所得出的结果。

1月15日是女儿的两周岁生日。这个生在多灾多难的重庆的孩子，居然也活蹦乱跳地长到两岁了，实在是应该为她庆祝一下的。下午，同M过江在北碚一家点心店买了一个蛋糕，为她祝寿。看到兄妹俩吃得那么高兴，不由得有点心酸。他们的妈妈说：“孩子们还是第一次尝到这种奶油蛋糕呢！”

一天，我去访由重庆归来的范叔衡。他是早期的国会议员，也是湖北人，现在干个闲职，住在我们附近躲警报。他和张定夫、邓初民都是老朋友，我因此与他熟识，他赶场要路过我前面的大道，有时就进来坐坐。这次，我是特地去找他了解时事的。果然，他听到了不少坏消息。我这才知道了皖南事变和17日的《新华日报》事件。

我们这里不但没能看到订的《新华日报》，连《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也没看到。虽然上次进城已从报馆和徐冰那里得到点

预感，但我没有想到蒋介石居然这样大胆，会扯破了脸皮，公开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我以为这要使蒋介石大失人心，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大失败，因为国民党的统治和他自己的地位，只是靠了抗战这面大旗才能维持住的。

这时，又听到了东平、柏山战死的谣传，我的心情更是激动气愤得夜不能寐。在悲愤中写了诗二首：

寒夜怀东平、柏山

(一)

劫灰三载忆江南，地冻天荒又岁寒；
幸有灾黎成劲卒，恨无明镜照西天。
同仇喋血倭奴笑，一榻新眠傀儡闲。
回首京华寻旧梦，石头城内血斑斑。

(二)

书生毛戟非无用，为杀倭奴拾铁枪；
赢得风霜磨壮骨，忍将愤懑对穹苍，
温情不写江南梦，宿恨难忘塞上殇，
“耿耿此心”忧折笔，来今古往一沙场。

和吕振羽商量是否立即去重庆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后来觉得还是等几天吧，有事一定会有人来信通知的。而现在走反而会引起注意，对以后住在这里恐有不便。这种考虑是应该的，吕振羽在这方面比我细心多了。

这样，我们夫妇就和吕振羽夫妇一起去复旦看了所谓艺术品展览会，和复旦的朋友们见了面。张定夫请客吃饭，有我、江一平和张志让等，席上谈的都是一般的话，但一提到抗战前途就不由得对国民党的抗战诚意表示了不信任。

快过年了，我过江到华中唐老板处，得知《民族形式讨论

集》被审查员退回来了，需要修改。唐老板悄悄地告诉我，老舍来了，在×××那里。

第二天，我过江去找了老舍，约他到我家来住两天。我说：“我们那儿有好多老朋友在等你呢。”他高兴地答应了。

这时，忽然接到以群的信（我和他从未通过信），要我进城去看已经排好了的《七月》大样。我猜想，这是党为皖南事变召集文艺方面的紧急聚会。但我不能去，因为我刚和老舍约好了在这儿陪他。我的工作在中协，这时更要和老舍搞好关系，不能对他失约，使他以为我在开他的玩笑。

大年三十晚上，我和M、晓谷到邻居段太太家吃年夜饭。段家是两、三个月前搬到隔壁大院的，是原通俗读物编刊社社长段绳武的遗属。两个太太，一个齐先生是家里的旧式妇女，生了两个女儿，都在学校住读；一个王先生据说是一位师长的妹妹，佩服段军长的为人，自愿和他结婚。这位夫人很有思想，支持段在热河军垦，又支持他参加抗战一直到支持他办通俗读物编刊社。所以向林冰他们对她很是尊敬。她们都是河北省人，很有点燕赵儿女的慷慨之气，对我和吕振羽十分客气。这次，我们就都在她家过除夕，闹到十一时才回家。

初二，我亲自过江去接老舍来家，晚上，陪老舍在隔壁大院打麻将。过去，我只是在一旁观看打麻将，自己没有参加过，这次居然为他们凑数了，当然也是凑兴。因为我动作慢，又要对子、顺子也摆起来就成了他们的笑柄，大家都很高兴。

这几天，我陪着老舍到马宗融、伍蠡甫、梁宗岱等家拜访，也请朋友们到我家来吃饭，过得很愉快。

初五（1月31日），我搭木船去重庆。船慢行江中，忽来诗兴，遂步老舍《北碚辞岁》原韵，得诗三首：

(一)

踏云天外有烽烟，劫里山河又一年。
莫向桃源村外立，长空无恨夜无边。

(二)

几声爆竹一炉烟，无米村翁也过年。
念念有词三叩首，只缘有子戍疆边。

(三)

错将残雪当祥烟，蜀岭偏安到四年。
剩有头颅夸大好，灾黎遍地恨无边。

上岸后就去访沈志远，问他《论民族形式问题》下篇的发表时间，在他那儿吃了晚饭，去文协，见到了叶以群。

三天后的晚上，我被周恩来同志约见。他向我讲述了以下情况，我也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他顶。他如捕人，就会更加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但恩来同志说，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积极意义，那就是向国民党表示抗议。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应该走了。但第一批撤退计划尚未订好，得过些时再说。

2月5日，我搭车回到北碚。我将去重庆了解到的情况和吕振羽说了，他决定一两天内去趟重庆。

这期间，洪深全家因贫病交迫而自杀，幸好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这真是什么世道啊！我立即写了一封慰问信给洪深。

既然要撤退，就决定将手头的工作赶快做完。我编好了孙钊的诗集《旗》，和曹白的散文集《呼吸》，亲自去北碚付邮。又

开始写《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中国新文艺传统》。

吕振羽由重庆回来了，他告诉我，为了对国民党表示抗议，能走的文化人都要离开重庆，一批去延安，另一批去香港或转新四军。这样，我们的走是肯定了的。他决定去香港，但要做得隐蔽，先说是回湖南探亲。

举家出走对我来说不是件小事，我和M商量究竟去哪儿。M赞成去延安，她说，到了那儿，孩子可以进托儿所，她能参加工作，我也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这多年的难民生活，她带着两个幼子，也真苦了她。能到革命的延安去过一种新生活，当然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我总觉得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我就对M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但是从今天起就要开始做些准备工作了，对人你就说在这儿太孤独，想搬回城里去住或者住到文工会的乡下赖家桥去。同时，我又把住在歌马场在最高法院工作的侄女婿找来了，希望在我们行前走后他们能来住一段时间。

几天后听复旦的人说，谭家昆出走了。谭是我教过的进步女生，她的出走当然是有原因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可见人们的敏感。我们为了表示正常，特地和M带着晓谷到东阳镇去散步，或是一同去北碚发信购物。暗中，我就忙着清理稿件。吕振羽又去了趟重庆，他可能快走了。

赶着写完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中国新文艺传统》，算是将自己近几年来对文艺现象的一点看法做个初步的小结。另外，还为外国刊物的约稿写了一篇自传，文稿早已交了，现在将自传赶写出，就行了。

乡下的工作结束，我就在26日赶到重庆。见到了刚从西安来的阿垅，他的牙已修补好了，想在重庆找工作。他说，他还有点同学关系，可能找得到工作的。

在城里时，看了些留下的稿子，编完了《七月》六集四期，并参加了文协和文工会的会议。到50号见到徐冰，知道第一批茅盾等人已去香港，欧阳山、艾青等正分批去延安，我还得等些时候。

《论民族形式问题》已由学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沈志远编的一套学术丛书，学术出版社其实就是生活书店的分支，发行网很宽。我很快就领到了稿费。

回到家中，侄女婿夫妇已来。侄女和孩子留下住，侄女婿则回去上班了。

周颖给我来了封信，我马上回信要她速去信老聂，催他快点来重庆。我估计蒋介石是不会放下抗日的旗帜的，所以我就想把《七月》保存下去，甚至我自己也许还有可能回到重庆来。自1939年到重庆后，我就想出一个《七月》大众版，使一般识字的工农大众都能够看懂。因为在武汉时，聂绀弩就表示愿意帮编《七月》，后来他到金华后还来过信，说想在那里编《七月》南方版，因而想到既然他在新四军里不合适，还不如让他回重庆来做这个工作。当时，我向周副主席提出，周同意了，我还向来重庆的叶挺军长提过，叶也表示可以。但老聂走到金华停下了，走到桂林又停下了，走了一年多还没有来到重庆。这次，我就是催他赶紧来接编《七月》。

这几天里，编成了杂文集《棘源草》，寄给福建改进出版社的黎烈文，他曾来信约我一本稿的。又编成了译文集《人与文学》和战争以来的论文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

3月17日下午五时，我又到了重庆。晚上，宿于50号。12时后，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后来问我：“到延安去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啊！”他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到香港去吧。”

第二天上午警报。我去看了老舍，和他谈文协的工作。晚

上，去访吕振羽，他们夫妇已离开石子山，现正住在重庆他弟弟家，他还得等一些日子才能离开重庆去香港。夜里我就住在他那里谈了个通宵。

我赶着把要做的事做完，要见的人见过，就于20日晨过头塘，坐滑竿到悦来场，再换木船，五时到黄桷镇上岸。用这种方式回乡下我还是第一次，花的钱比汽车、轮船都贵，但最近搭车和赶轮船太无把握了。

我同M步行到北温泉绍隆寺去看望周颖，她刚从湖北京山脱险到重庆，现在就在绍隆寺保育院任职。院长是她姐姐。她一来，姐姐就将整个总务教务都交给她，自己去忙那些外面的应酬、筹款等工作了。

和她自武汉一别已经三年，听她谈说在京山历经艰险的经过，真是不简单，总算母女无恙。但她们的亲戚三妹，可弄得家破人亡了。在轰炸京山时，三妹他们被弹片和大火所伤，丈夫(老聂的表弟)终于因伤势过重而死去，三妹幸免于死，在脸上留下了一条疤痕，不久，唯一的儿子又因传染瘟疫死了。她见到我，叫了一声“张大哥”，就哭了出来。我和M都鼻酸酸的，很是难过。老周倒还是那种豪迈的样，说了那些苦难的情况后，就哈哈大笑了：“老胡呀，我们的命真大呢，在敌人扫荡的缝缝里居然活过来了。”这种乐观的态度，我真愿意M好好向她学习，不要老是对前途发愁。

我们留在那里午饭，见到了小海燕。她比晓谷小一岁，长得倒顶高的，就在保育院上学。老聂正准备来重庆。这样，他们一家总算能在这里团聚了。

下山时路过李公朴家，进去小坐了一会。他夫人给我看他的一根枣木手杖，上面刻有延安的名人签的字，我看到有周扬的签名。李公朴赠给了我一本《华北敌后——晋察冀》。李所住

的地方叫松涛村，坐在屋里不时吹过来一阵风，还真能听到呼呼作响的松涛声。

文协通知我被选为第三届理事，只好又赶到重庆去。3月27日下午出席文协茶会。常务理事还保持了原来的均势。我因为要走了，就建议由阳翰笙来负责研究部，但他说国民党对他比对我更注意，只好仍维持原状。在皖南事变这样的大事件中，文协虽然没有反映出人民的声音，但至少没有被国民党利用，勉强从消极方面保持住了统战团体的面目。

去50号访恩来同志，他正忙着要出去，要我回去前再去找他。

3月30日下午，开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依然被选任研究部主任之职。会后聚餐，喝酒闹得很厉害，后来又一道到郭沫若家喝茶。抽空给老聂去了一信，告诉他我可能快走了。

第二天夜，访恩来同志，并向他汇报了对日本问题的研究报告。他最后说，还是决定让我去香港，要我做好准备，先将家眷搬到重庆来。他们正在办证明文件，要我下次带照片给他。

要先让M带着孩子到这里秘密住下来，这个住处很不好找，太熟的人那里是不好去的。这时，我想起了东大附中时的同学崔祥祺，他是崔宗伟（在复旦大学名牛述祖）的哥哥，曾因为组织同学会来找过我。他住在大田湾，过去鹿地他们住过的地方，那里在高山，很偏僻，倒很适合。我就赶紧去找他，说想让家属在此借住几天。正好他的三楼上有一间小屋，没有窗户，但有一大床可以让她们母子住下。住处问题就这样说定了。

回到家后，同M到北碚区署去打听日本俘虏事，想从他们口中了解日本国内情况及军事情况。但俘虏大概不送北碚了，我们白跑了一趟。在路上，我就和M说起去香港的事，她听后很不高兴，后来说，既然不能去延安，她就想带着孩子到周颖

的慈幼院去教书，等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再团聚。我当然不能同意，并告诉她，这是50号周公馆的决定，不能更改的。她心里还是很不同意。

我忙于工作，没功夫和她多谈。我修改好彭燕郊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编成了《七月》七集一期的稿，又清理了田间的诗稿。而M一直对此表示冷淡。

4月14日，报载苏日签订了中立友好协定，这使我感到迷惑。M更觉得不应该去香港了，就要去绍隆寺找周颖，虽然被我劝阻了，但她由于心情不好，对侄女自然很冷淡，侄女也就很不高兴。她看到我们的争吵，以为是因为她住在这儿的缘故，就负气回去了。

匆忙间，我去到重庆。18日上午到了文工会，与阳翰笙闲谈，隐约知道文艺界已走了不少人，并且多半是去香港。夜晚，去访恩来同志，听他谈对最近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国民党内部两派的斗法有了新的认识。他告诉我证明文件已弄好，并已吩咐戏剧界的戴浩替我找到贵阳去的汽车，要我这次回去就带家属一起出来。最后，叫我临回乡前再去他那儿一次。

我立即去信M，要她往大处着想，做好离开石子山的准备。

4月22日夜，又去50号，恩来同志刚回来。他给了我一张七星岗莫斯科餐厅去香港办货的职员某某的假旅行证明。又给我看一张刊有日共中央被破获的消息的东京报纸，上面有日共中央委员的照片。他要我看一看其中是否有青山和夫。我没认出有像青山和夫的，就把报纸还给了他。（我在武汉时，鹿地亘通过我向周副主席提出见见青山和夫，副主席在我住处见到了他，但他却没有说出什么来，只是一般性的谈话，使我很失望，感到对不起副主席，浪费了他的时间。从这次见面，我认为青山和夫决不会是由日共派到中国来的。）他吩咐我到柳州找何家

槐，以取得沿途上的照应。最后，他叫我到香港后，听从廖承志的领导，由廖布置我到南洋去，在日本侨民中找一找日共的关系。（当时我以为这是恩来同志要我去香港的主要原因，不能推辞的。到香港后，我即向廖承志提出，但他说现在没有去南洋的必要，等以后再说吧。）

我回到北碚后就打电报给侄女婿，要他们速来。

接到老聂的信，他已到了重庆。一两天后，他同周颖一起来看我。这次见面可不同寻常，他们夫妇三、四年没见面了，而我和老聂也同样有三、四年没见了。我们谈别后的一些情况，听他谈浙江和桂林的文坛情况。更重要的是同他商量继续编《七月》的事，向他介绍留下的可以写文章的作家和一些可用的稿件。我们谈到很晚才休息。

第二天吃过午饭，亲自送他们到蚕桑局，眼望着他们往北温泉走去。

侄女婿夫妇来了，我们一起清理杂物。后来，将向林冰请来，告诉他我想带M母子去赖家桥看看，准备迁到那里去住，在这里不大方便，并请他在我们不在时，照顾下我的侄女儿。他很诚恳地答应了。

1941年4月30日清晨，我们只带了一只皮箱、一个大铺盖卷和一网兜零用杂物，离开了住了一年多的石子山。留下的一些书籍和杂物都交给了侄女婿，嘱咐他尽可能为我保存这些书籍和文稿书信等，杂物则由他处理。除侄女婿外，只有我们养了一年多的一只小狗一直送我们到江边，赶了几次它才离去。

为了怕被熟人碰见，我们是乘木船去重庆的。上岸后直接将M母子送到大田湾。

晚上去见恩来同志，带去一包约二十来本我多年收集的日本翻译的有关马恩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意思是想请他代为保

存。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地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一百元美钞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我将那包书交给他，希望他存在重庆或带给别的比我更需要的人。他说，我一定为你保存，等你再回重庆时好用。（这一包书我回到重庆时不好再问，可能是带到延安去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

在重庆等待期间，见到了老聂。我给他介绍了几个朋友，如路翎、阿垅等，并将重庆的存稿交给他，还有一些未清理的就交给了路翎，希望他们能齐心合力将《七月》继续编下去。

M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不熟悉的人家，居多不便，又正值重庆在闹粮荒，她住得更是不安。我就提前于5月4日将她们送到南岸的一家小客栈里，并和汽车主接好了头。这才转身进城去参加张治中当晚为文工会举行的大招待会。

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现在有些文化界人士离开重庆，希望没有走的不要走，走了的快回来，我们是要文化的，是尊重文化人的……。我心里暗自好笑：我明天就要走了。

郭沫若主任在致词中引用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词，当时我觉得，郭主任犯不上为文工会做这样严重的表态。后来一想，他可能正是向国民党表示，不管你们怎样，我们都要全心全意为抗战文化工作的。

会上散发了国民党鲁觉吾编辑的《文艺青年》，主要内容是污蔑和攻击几个人，从郭沫若到我。我认为，国民党在这样的招待会上散发这样的刊物，是一个目的的两种做法，最终非在文化界完全暴露它的无可奈何，失尽人心为止。

会后，我和老舍一道出来。已经十来点钟了，我们到新蜀报馆他的住处，打地铺睡了一晚。这时，我告诉他我要离开重庆走了，到达目的地会写信通知他的，在这以前请他不要告诉

任何人。他很严肃地点点头，我相信他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后来，香港沦陷后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他和朋友谈话中提到我的时候，还掉了眼泪！他很珍视我对他的这种信任。

五 奔赴香港

1941年5月7日晨，全家自南岸海棠溪搭商车离开了住了两年半的重庆。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重庆虽然没能如愿地做些事，但总是为抗战文艺工作尽了力，并出了十几期在读者、尤其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七月》。只是自己的文章写得太少，许多想写应该写的文章都在忙乱和轰炸中一一闷死了。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就是一些已经写出来的，也多半是在匆忙中草草完稿，许多看法本应做更深入的阐述，也都未能做到，这实在使我感到于心不安。希望今后换了环境，我能安心读些书，写些我自己一直想写而未能写出、写好的文章，我将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司机台共坐了五个人，三大二小。由一个浙江人开车，一江北老板坐在另一车门口，M抱着女儿，夹着儿子挤在当中，是够苦的。老板一脸孔的不高兴。女儿又不听话，老哭着要水喝。本来用瓶子装了一瓶水，上车时又打洒了。老板几乎要发脾气了。车走到青木关的一品场，有特务机关设的检查站，这是头一道关卡。我将假证明交出。看过证明和我本人，没有盘问就放行了。那个老板高兴点了，要我拿个杯子给他，原来这车上装的全是冰糖。他装了满满一杯给M，并说：“给小孩吃，不要老哭，叫人心烦。”看来这人脾气坏，但心眼还是好的。

我和司机助手高高坐在货堆上。这样子坐汽车在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如果没抓住摔了下去，可真不堪设想。尤其是，车

越来越往山上爬，那时不弄得粉身碎骨、跌断手脚才怪呢。看那助手却一点也不紧张，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只好一个人看那即将离去的四川山区风景。公路两边和一些山上都种着桐子树，据说桐油是四川的一大出口，可以换外汇。这时正是桐子开花的时候。在四川住了几年，也曾见过桐子花，可从来也没留意它。这次，我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它那肥大的叶片和一簇簇的白花。原来，那花并非纯白，而带有似红非红的淡红色，虽没有香味，但显得很妩媚。初夏时节，梯田里的麦子已长成一片翠绿，即将扬花抽穗了。另外一些水田里的人们正在忙于插秧。这些一晃而过的景象，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抗战四年了，四川人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仅只种粮食和抽壮丁两项就负担够大的了。这里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能写啊！

我就这么地躺在车上观山景，倒也别有情趣。

在车上吟成了《晨渡海棠溪》：

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

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

负辱过关塞，吞声哭蚁虫。

燎原由大地，一志万人同。

对于自己的不能在重庆继续为抗战尽力，我有一种被逐的愤恨。我就是到了香港，到了南洋，也要尽全力揭发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两面派阴谋，并宣传在北方已有一个真正抗日为人民谋幸福的解放区。这三年来，天上有轰炸，地下有看不见的暗礁，但我们还是在斗争中求生存，在苦难中求欢乐，没有被炸弹消灭，没有被国民党击败，我们为民族解放斗争尽了自己的力量。别了，重庆，如果需要，我将再来，因为我不是为逃避轰炸，贪图安逸离你而去的！

汽车停在萧江，吃午饭。饭馆是由司机指定的，他叫我们

快点吃，他们三人就匆匆走了。这种公路旁的小饭馆又脏又乱，我们也只能快点吃完。M要先喂晓风吃，然后才能扒几口饭匆匆吃了。晓谷很乖，不声不响地吃着，吃完了还帮着看护妹妹。我跑到街上去看看，能不能买点点心饼干之类的，实在怕晓风又在车上哭让老板讨厌。末了，还给她灌了一瓶水。这孩子虽然生在艰难困苦中，但脾气却很任性，看来，这一路上她将有不少麻烦。

饭后，我在车上躺着，由太阳晒着，只用帽子遮住眼睛，居然睡着了。等醒来时，太阳已经偏西，汽车在公路上飞跑着。看来他们在赶路。最后，天还没黑，就到了赶水。又是由司机介绍住进了客店。这客店同“鸡鸣早看天”的小店差不多，我们要了一个有两张床的大房间。吃饭，洗脸，洗脚后，倒头就睡着了。不只是由于疲乏，更主要是心放宽了，前面大约不会再遇到什么检查了。

天不亮，那助手就来叫我们。我赶快叫晓谷起来，心想他一定不肯起来会赖在床上的，谁知他一听到叫声就跳了起来。女儿没有醒，就只好抱着她上了车。我问为什么这么早？老板告诉我，前面就是贵州境内了，那里尽是大山，车子要上坡，走不快，所以要早动身。

进到贵州地界，山越来越高，车子几乎总在山上盘旋。公路边的住户人家也很少，显得十分荒凉。中午在一小城停车吃饭。这城叫松坎，建在一个小山坡上，下面还有一条小河，周围都是松树，可能就是因此起的名。

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小青年找来，我认出曾在生活书店见过，名叫曹卣(后名曹辛之)，他是陪送邹韬奋夫人一家去香港的。大家在这里相见都感到很高兴很愉快，因为都已过了一品场那危险关卡！

饭后没开车，助手告诉我说要检查机器，前面还要过大山。他嗬嗬嘴低声地说：“这老爷车，走到才算！”我心里颇有点惴惴然，但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就陪着一家人到街背后走走。那里很安静，在河边房屋的墙上可以看见红军经过时用石灰写下的标语。

车修了两个钟头，好容易发动了。江北老板要开，被浙江老板抢过去了。果然，这车一面爬坡一面“咯吱咯吱”地叫着，真让人担心。天快黑才到了桐梓过夜。天还没亮又将我们叫起了，说是今天要过娄山关。车子夜里检修过了，但是不敢开快车。车仍由浙江老板开，像蜗牛似地在山上爬，螺旋形地向上爬，爬了好半天还没有到山顶。但是往下一看，那来路可不知转了多少弯了。尤其是一个急转弯，路边立着一块画着两根枯骨的石碑，看了可真令人胆战心惊！如果对面正好有车下来，在仅容得下两辆车并排的山路上，我这坐在上面看的人只要稍稍一偏，就会堕入万丈深渊！这次旅行可真是提着脑袋往前闯，吉凶未卜呢！

终于，车子抛锚了。幸好那位浙江老板心细，发现得早，将车停在一处小山头上，由他们三人慢慢地修理。四个钟头后才修好，上了山顶。

该下山了，江北老板可能是看得气闷了，一定要接过车来开。他可和那位大不一样，一直开快车向前冲。常常是车身掠过那种画有枯骨的石碑，有时几乎是一个车轮悬起，只靠三个车轮转弯。就这样地飞冲下去，连那位老板都在旁边叫着，急了就伸手来抓方向盘。但他仍不顾一切地开，终于下了山到一小镇，又要我们快点吃饭，想赶到遵义过夜。就这么拼命地赶路，到万家灯火时总算到了遵义。一黑早就又催我们起床动身，所以这一座革命历史名城，我只在晨曦微露时，看了一眼。离

遵义不久就到了乌江渡口，只见长串的汽车在等着一个大木船摆渡过江。怪不得老板要催我们早起了。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才过江。第四夜住在息烽。第五天的上午，到了目的地贵阳。

两位老板很客气地帮我们找了一家比较好的旅馆，又很客气地和我们告了别。应该说，他们是好人，对我们还是很照顾的，至少没有故意刁难敲诈勒索。

在贵阳没有认识的人可找，就带着家小到处走走，想吃上一顿好饭。进了一家大饭馆，介绍的名菜有活杀娃娃鱼、纸包鸡等。跑堂的提了一条有四只脚的鱼，还用手在它头上拍了一下，它就哇哇地叫了起来，真把我们吓了一跳。M摆着手说：“快拿走，快拿走！”真不敢吃它，也不忍心吃它。我们随便叫了几个鱼肉之类的菜，这四、五天以来总算是好好地享受了一餐午饭。

我忽然想起来，就问晓谷：“怎么每天一叫你就起来，难道你不想再睡会儿吗？”

他说：“我怕你们丢下我走了。”

听到这个回答，我心里隐隐有点难受。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懂得人世有着不幸的事，感到害怕了。生长在乱离中的孩子成熟得早，真可怜！

为了找车，在贵阳住了三、四天。我在贵阳没有熟人可托，只好到公路局去登记。这里只有一条大街还像样，也有几家书店。到商务印书馆去看了一下，没什么书可买。也就只好带着一家人在集市上转转。

当时的贵阳，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就下起了毛毛细雨，感到非常潮湿，尤其是在旅馆里更是霉气扑鼻，连被子都是潮幽幽的，十分不舒服。吃过午饭，雨停了，我们就到处走走。在一处城边，看到

一些从山上下来的，带黑缠头穿黑衣黑短裙的苗家妇女。她们有的身背背兜，有的在大木架上放了很重的东西，有煤，有菜，可能还有粮食。她们从山上下来，很艰难地一步步走着，休息时靠在山边或路旁的墙边，用特制的竹篾编的圆圈刮下脸上的汗水，就又开始一步步的艰难行程，直到目的地。卖了货物后，买上盐巴和镰刀等物品再背回家。据说，贵阳附近山上住的多为苗家及别的少数民族，这里的花溪就是有名的苗家寨子。可惜没有熟识的人，不能带去看看。

第三天才得到答复，可以乘坐公路局编队的运货汽车，直到广西宜山。这次的车可不允许M母子坐在司机合了，而是和我一同坐在货物前面留下的一条地方。那儿安了一排座位，似乎可坐三、四个客人。这一队有好几辆车，同时起程，同时休息。出车也不是一黑早，而是八点之后。我们可以很宽裕地吃完早饭，准备上车。可能因为这是公家的车队，没有赶路的急切心情，这一路就走了五、六天。住夜的小站都记不得了，好像在贵定、都匀、独山、南丹这些地方都停留过。独山的咸酸在吃饭时特买了一碟尝过。和四川的泡菜、咸菜不同，它带有酸味，很辣，很下饭。那儿有一缸缸装好的出卖，我们没有买。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特产了。

到河池（金城江）住了一夜，这已经是广西地段了。本来以为火车已通到了这里，后来才知道还有好大一段未铺轨呢。隔天到达宜山，这才能乘上火车直到柳州。

什么时候上的火车记不清了，只记得似乎在车上住了一夜。早上，车上的服务员来问吃什么，我和M都想到应该让孩子吃好一点，就要了两份牛奶麦片，我们两人则吃带来的干粮。谁知五角一碗的高级食物，两个孩子，尤其是女儿，尝了一口就不要吃了。她是吃红苕、苞谷长大的，根本没吃过牛奶。这麦片

也不是我们过去在上海吃的那种，只是几颗大麦粒。结果只好由我们两人吃了。

到柳州，在旅馆里住了一晚。过江上浮桥到张发奎军部访问周副主席吩咐我去找的何家槐。我在左联时期就认识何，当时他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可能就是秘密党员了。结果受到韩侍桁有意制造的打击，说他偷了徐转蓬(何的同乡同学)的小说署上自己的名发表，说他是“文偷公”。这本来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韩却有意揭出来打击左翼作家。后来大家知道了内情，并没有责怪他。这次看到他，人显得老成多了，是一派能干的公务人员的样子。他对我很热情，介绍了沿途好几个大站的人事关系，嘱咐我有困难时尽管去找他们帮助。

在一个小镇石龙(可能是柳江码头)，坐电船去桂平。所谓电船，其实是一个小火轮。船上很拥挤，想找一块地方安身都很难。忽然，一个青年来到我身边，一看就知道是广西人，穿的是广西一般公务员、知识分子穿的那种灰布中山服。只是口袋是平的，没有盖，还只三个，这就是广西的特色。他低声叫出了我的名字，并说了他的名字，就把他的铺位让给了我们。在船上一直没能交谈。

船到桂平，他帮我们找好了旅馆，还请我们吃饭。他叫胡明树，就是这里本地人。八·一三后，他和田间等从东京回上海，我去看田间时，遇见过他，当时并未介绍认识。以后，他在桂林出了一个油印小刊物《诗》，每期都寄给我，还通过信。但我在《七月》上没有采用过他的诗。

看得出他不是善于用言谈来表白自己的那种诗人，他在船上只同我说了几句话，现在坐在饭馆里话也不多，只谈了一些生活方面的闲话。我才知道离这里不远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地金田村，也是洪秀全的家乡。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那里的

妇女不管老少，都是天脚，这大约是天朝时的遗风吧。

在桂平住了一夜。可能由于是水乡的缘故，这里的旅馆很干净，吃饭也便宜可口。不像贵州地带，尘土飞扬，吃的东西除了辣椒和猪肉外，就没有别的菜可吃。

从桂平坐木拖船去贵县。这种木拖船前面有一个带小马达的小轮船拉着，拖船上运货和载客。虽然不见得快，但比用人工撑篙的木船还是快多了。

当天到贵县住一宿，第二天只好坐轿子到玉林。因我体重都不愿抬我。M虽然瘦小但又带两个孩子。结果是，我们二乘轿子出了三乘的钱才算有人愿去。在玉林住一夜后又换乘牛车。这种用两条大水牛拉的车，上面有篷，除我们一家四口外，还有几个客人。驾车的是两个壮汉。别看这牛车走得慢，却很稳当。一路慢慢行来，看看广西偏僻小村镇的情况，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广西人很勤劳，田种得很精细。我们休息吃饭时，多半是光顾夫妻摆的小饭摊，饭菜做得又干净又快又可口，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

在陆川住了一夜。一早我就出去打听，说是有汽车可以坐到廉江，那里就是广东境内了。我十分高兴地立即买了车票，一心以为现代化的机动车辆总比老牛拉的破车强。谁知适得其反。这车是坐人的客车，我们都有座位，行李放在两边座位间的地上，看上去很宽敞舒服。但车开不久，还没到广东境内，就忽然像发疯似的，一个劲地上跳下蹦颠簸个不停。我们这些坐在里面的客人也就如同皮球一样，随着一会儿蹦到车顶一会儿又跌到地上。那些行李杂物更是在那里滚来滚去，静止不了。我和M唯一耽心的是孩子，就用力搂住他们，护着他们的头，同时听着小女儿“哇哇”的哭声，其他一切就都置之度外了。幸好颠簸了一阵后就渐渐平息了下来，后来再颠簸就没这么厉害了，也

可能是我们习惯了随波起伏吧。直到轻颠小跳至全部平静而一往直前时，我们的浑身骨头都几乎散架了。

司机似乎也不好受，就在一处平地停了车，让我们出来休息一下。这时，我们回头一看来路，见到不远处是一个个三五尺宽的大坑，我们的车就是从它上面跳跃而过的，怎能不颠簸？一问司机，才知为了不让日本鬼子的坦克顺公路而到广西，才挖了这些坑的。看来日本鬼子还不准备长驱直入，所以广东境内的坑已填平了，这样我们总算顺利地直到广东的廉江过夜。第二天下午到了法属广州湾，也就是现在的湛江。

我们住到海边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是楼后面的一间大房。言语不通，一切都只好由店里安排。房间很大，是花砖地，有两张大床，看上去还很干净，我和M都想好好地睡一觉。我们还没睡着，只见孩子们左右翻身睡不安宁。开灯一看，可不得了啦，他们身前身后都有臭虫在爬。吃饱的走了，饿着的又来了，孩子怎能睡得着？我们只好起来将凉席铺在地上，就地而眠。臭虫不来了，还很凉快。

这里是法属殖民地的城市，我们尝过上海法租界洋人们的那份高傲和巡捕们狐假虎威的架势，所以不想进城去看这类怪现象，就只在海边上走走，看看来往船只。去打听开往香港的船，说是还得等三、四天。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还是受到了那些穿白衣戴白帽的女招待的轻蔑。她们半天才来，也不答问话，拿了菜单就走，等算帐时才将帐单往桌上一放。一看帐单可使我们吓了一跳，怎么会算出这多钱？后来去问帐房，才知那菜单上的菜价是用白银算的，要一元多钱才折合一两银子，他们根本不用中国货币。

这里虽是海边，到夜晚反而热闹非凡，旅馆里也不安静。一队队瞎子由人牵着，有的抱琵琶，有的抱着扬琴或胡琴，一间

间客房去问要不要听唱。留下来的就唱上一曲，还不时传来取笑打闹声。后来才知道，这些瞎女子，有的是自幼被主人花钱买来，故意刺瞎双目让学弹唱的，不仅卖唱，还强迫她们卖身。旅馆成了她们的生意场。

我顺着热闹的灯光走去，不觉走进了一家赌场。只见那里人头济济都围着桌子在赌博。各式各样的赌具，除了骰子、牌九我在乡下就见过外，其余的我都没见过。后来在一间大厅里见到了轮盘赌。那里更是人挤人地围了一大群。我想看上一眼，却挤不进去。这种轮盘赌1929年我在上海时，有人曾带我去观光过一次，那里可没这么多人。可见这里的赌风比上海更盛。殖民地人民生活困苦，就想用几个下力挣来的钱在赌场冒险，梦想赢点钱好改变现状，但到头来总是输得精光。

海边一带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就带着他们走到里面的一条街，居然找到了一家电影院。买了票，心想总能打发上几个小时了，谁知M又叫腰疼，疼得直不起腰来，连电影也没看，只扶着椅子捶腰。出了电影院，她连走路都感困难了，后来说到西药房去买一张止痛膏试试，这是过去头痛时贴过的。买了巴掌大的一块贴上，果然不久就止了痛。后来我们研究原因，多半是由于睡在地上受了凉。她睡的那一边，正好在门口，有一条缝，凉风从门缝向腰眼直吹，腰痛就是这么引起的。

到第三天，我们上了“宝石花”大轮船。在上船前还按规定到海关打了防疫针，否则是不能在香港登陆的。我买的统舱票，在船的底层。由于人不太多，倒用不着抢铺位。我们一家在一个一尺大小的圆窗旁占了很大一块地方，心想，总可以很舒适地航海到香港了。

不久，有一个青年来看我，就是在松坎见面的那位，他护送邹韬奋夫人一家正好也搭这条船去香港。过了一会儿，又发

现葛一虹也同船去港，我更感到这次坐在“宝石花”轮船上不会太寂寞太受罪了。

船开不久就是中午了。这时，才发现那一尺大的圆窗不仅进风太少连氧气也不够，坐在这统舱里简直像在蒸笼中，热得难受又胸闷得很。孩子们更可怜，大的还能忍住不吵，小女儿就又哭又叫，她妈妈不停地给她扇风，拿买来的糖果饼干哄她吃，都不见效，只几个小时就满头满脸地长出了一片红红的痱子。看看身旁那些老跑香港的本地人，他们不但不觉得热，有的爱赌钱的已在地铺上赌了起来，也有的安逸地躺着吃鸦片烟。这时，我想起过去曾听说一些被卖去飘洋过海的“猪仔”，连这种统舱都睡不上，而是在更底层的机器间里蹲屈着，真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这漫长的日子的。我和葛一虹聊聊天，又去看邹韬奋的子女们下棋，倒也能把时间打发了。只苦了M不停地扇着扇子，好不容易才把女儿弄睡着。

下午，我们也憋不住了，想走上甲板去喘口气。谁知刚爬上甲板，一股恶臭就使我们不由得倒退了回来。原来，甲板上横卧着几十条大牛，还有大大小小的猪和鸡鸭，它们的粪便被太阳晒着蒸发出的气味简直使人无法忍受。我们其实是花了钱当动物被法国佬关在船底下，所不同的只是不致受太阳炙烤罢了。

夜晚，海面上虽有凉风，但吹进小窗来的却微而又微，我们仍然闷在这蒸笼里。不知什么时候，我昏昏然地睡着了。第二天中午，船靠香港码头，但不准上岸，要等海关检疫人员来查过防疫证才能放行。等了几个钟头，检查完了，我们才提着行李上岸。这时，忽然有人说是被派来接我们的，葛一虹一人先走了，邹家一家也走了，我们和邹家的行李一同被那人领到一处叫美洲饭店的楼下一间没窗户只用厚玻璃隔开的屋中

住下，由我代邹家付了行李车费。第二天早上，邹家的行李被人取走了。我们直等到准备出去吃饭时，孙铤才找到了我们，他说这里不能住，帮我们结了帐，引我们到了九龙弥敦道的新新大旅馆。这才算是在香港安顿了下来，和友人们见了面。时为1941年6月6日，从重庆跋涉到香港行程近万里，历时整一个月。

孙铤，早在武汉时期就向《七月》投过稿。我看了他的诗，知道他是在打游击的革命者。武汉撤退前，他来看过我。在重庆旅馆里，他又来看过我，后来告诉我他要到南方去了。现在意外地在香港见了面，彼此都十分高兴。他在华南局廖承志同志领导下工作，以后我在香港的整个时期，都是由他照料的。这次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百五十元港币，说是零花钱，我很感激他的细心。

我们在新新酒店住的是有套间的大房间，房钱当然很贵。在这里，见到了许多从重庆撤退来的新朋旧友。

夏衍第一天就来了。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都很高兴。但他来时正值小女儿在哭闹，是因为她还想吃金山橙，而妈妈不给。夏衍说，“橙子小孩子吃了好呀，多吃几个没关系。”她妈妈说，“一个要一两角钱，哪能尽她吃呀？”他还是说，“这里水果便宜，应该多给孩子吃点。”这种长辈的关心给了M一个很好的印象。

蔡楚生夫妇是随同夏衍一道来的。我看过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觉得很不同一般，但和他从未见过面。这次见到他，想不到他竟那么年轻。我曾听人说他是工人出身，但坐在我面前的却完全是一个文雅的白面书生。他的夫人看上去是一个能干的、有丰富经验的女同志，不好问她干什么工作，只知道他们都是广东人。我们很友好地谈着天。（这一次见面，对我来说是“一

见如故”的。后来在桂林，几次一道出席戏剧座谈会，我们的看法常有共鸣。开政协会同为文艺界代表，住在一起，也有过欢聚。到了我的事情出来被批判时，他也用了激烈的语言，因为他政治上是很积极的。但我想，他不会揭发什么无中生有的“事实”的。)

早到香港的朋友们来看我的很多，大家见面都显出特别的亲切，真是他乡遇故知。我觉得，在重庆的两年半生活里所感到的那一种重压，都已经消失了似的。在这里，似乎也用不着提防有人要什么手腕，所以心情一直是愉快的。

廖承志亲自来看望我们，并嘱咐以后由孙翎照料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

两天后，我们换了一个小房间，但我觉得房钱仍是太贵，并且餐餐要出去找小饭馆吃饭，拖着两个小孩，也实在太不方便。必须找个更合适的住处，解决吃饭问题。

孙翎领我去看了好几处房子，最后决定租住西洋菜街175号四楼一家姓郑的后楼里间。我们租了几件旧家具：一大床，一书桌，一椅子。另外给晓谷买了一张帆布床和两只方木凳。总算勉强安了家，暂时在房东家搭伙。这房子的结构是，一大间前厅外带骑楼是房主夫妇带两个孩子住。房东有两个女孩，大的十七、八岁，和保姆住在厨房旁的小间，是上下铺。另一十来岁的女儿正在上小学，还有一个三、四岁的男孩，都和父母住在前厅。夫妇俩是广东某县人。男的大约在洋行做小职员，一家五口并不宽裕，所以将后楼租给了我，卫生间后另一更小的后楼租给了一个舞女。我这间其实和上海的亭子间一样，只朝西有一窗户，开在一条只能见到一线天的巷子里，但太阳却可以从这一线天处照满全屋，以致中午十分闷热，无法休息和工

作。晚上躺在大床上又被臭虫围攻，咬得睡不好。在这里看书都不行，更别说做工作(写文章)了。本来，到后第二天胡绳就来看我，约我为他和邹韬奋合编的《大众生活》写稿，还有几处也来约稿，结果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M带着两个孩子在这儿也诸多不便。自己没起伙，但房东家的饭菜份量太少，又淡而无味，孩子们不爱吃。他们吃惯了大盆大碗的乡下饭菜，现在送来的一点虾仁、一点蔬菜和一碗蛋花汤，实在是不够。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又带着小孩，连买菜都不行，更谈不上自己做饭了，只好将就吧。但长此下去可能会影响孩子们的发育生长。再说，这两个孩子都关在屋里没地方去玩，他们在农村乡下野惯了的，怎能过得来？大的还能自己找书看，小女儿就常和妈妈哭闹。后来发现她肚里有蛔虫，给她吃了一种英国制的屈臣氏宝塔糖，打下来几十条虫子，发脾气和吵闹才算好些了。

当初我找房子时，先来的人劝我住好一点。但我想，在国内斗争这么艰苦的时期，在生活上浪费来之不易的党的外汇，这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才决定只租这样的便宜房子。后来知道，有一个重庆来的大编辑夫妇俩就住了二楼前楼一大间(香港的房价是层越高越便宜，最贵的是一、二层)，雇了女工做家务，地板还天天打蜡。

住了大约不到两个月，天气一天天地热了起来，两个孩子关在屋里，没有活动的地方，房东给的伙食又越来越少越来越坏，一定得想个解决的办法了。M提出由她带孩子们回上海。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妹妹，她十分想念她们。尤其是对她的妹妹，虽然已由我托俞鸿模安排到了新知书店当店员，但她一心想将妹妹送到延安或到重庆进大学。她说，“我没能读成大学，二妹也没能进大学。现在的三妹功课很好，应该可以深造的。无论

如何也要让她有个学习的机会，不能酱在沦陷的上海。”这是她在重庆时就一再提起的。

决定后，我就请孙铤向领导上提出。廖承志亲自来劝她不要走，并且一再问她有什么意见，如果仅仅是住房的问题，那可以换个大点的房子安住下来。但M觉得这不是办法，要多花党的钱于心不安，没有接受。

促使我们最后下了决心的是这么一件事：我为了调剂一下生活，特意花了三元多钱买了三张电影票去看当时名噪一时的《乱世佳人》。这家电影院的患者多半是洋人和高级华人。谁知我们还没看多久，我的乡下小姑娘在黑暗中憋闷得受不了，哭闹了起来。我们受到了前后左右人们的嘘声。我让M带她走，但M好几年没看外国电影了，想让我带孩子出去。终究无法，还是我带她出去了。一会儿，M坐不住也出来了，看到我在门外哄孩子，就一把接过孩子回去了，让我和儿子接着看完了终场。事情虽不大，可是促使她最后下定决心带孩子回上海。她说，“在这里我们四个就像关在罐头盒里一样，动弹不得。上午天气凉快些还好受，下午可闷得连出去喘口气的地方都没有。门外的走道里虽说凉快些，但被房东家人和舞女占着，我们不好不识相。附近又没有公园可以去，好不容易想看一次电影都弄得这么不愉快。晓谷过了暑假又要上学了。大家都住在这里是无法安排生活的。我们去了上海，你写点文章只要寄上二、三十元稿费给我，就能使我们在上海过得很好。”她的理由我无法驳倒，只好同意了。

托孙铤的朋友买好船票，我把她们送上船。是房舱的下铺，同房有两个白俄女人，大约是舞女，回上海去的。我吻了吻孩子们的额头，又特地嘱咐大孩子，要听话，招呼好妹妹，就离开了她们。转身下船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晓谷当时只有

七岁，而女孩才三岁，我居然将照顾妹妹的责任交给晓谷，真是荒唐。就是M，她一个女人要带着两个孩子飘洋过海，实在是太难为她了。这多年来，在生活上我一直依靠她，信任她，从来没有想到她担负了多大的责任。这个决定固然是由于她的自信和我对她的信任，我当时只考虑到香港生活的种种不便，为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生活，开始工作，我接受了她的牺牲，让她一个人带孩子去冒险！上海已不是过去的上海了。在码头上会不会有日本兵检查？她会受到什么样的危险？在上海的生活能过得好吗？……我怎么就不能下决心在这里换个住处呢？我真是太自私了！

自责的情绪袭击着我，有好几天我都心神不安，为她们的平安担心。直到接到她平安到家的来信，心里才算放下了这块石头。

我让她们去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周副主席曾吩咐过要我到南洋去找日共关系的问题，那她去上海和母亲同住我能更方便些。到香港后约一个月，我向廖承志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问一问周副主席。M走后，我又向他提了一次，他说周副主席没有答复。本来，我自知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大概，周副主席经过考虑后也这样想，所以取消了。我感到放下了一大负担，心安了。

M母子走了以后，孙铤几乎没有一天不来。他是怕我寂寞，我心里非常感激他。我经常和他一道上街闲走散步，他对我有着真诚的感情，我们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常常有着相同的看法。

剩下的是在香港做点什么的问题了。既然退到香港是对国民党的抗议，那么这个抗议就应该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写些文章。虽然香港政府和国民党是一气的，我们不

能公开揭破国民党破坏“团结、进步、抗战”的反动路线和事实，但可以暗示一点，至少可以批判一些和国民党路线相关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和社会现象，及关于时局的反动观点。

和我有关的香港进步报刊有：

《华商报》——等于党报。似乎有好几个编辑，记不得是谁了。在它的副刊上，我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如《七、七半日记》之类。那第三版是发表时论的，我也写了一两篇。在批判某种反动观点时，为了暗示那和国民党的反动路线是一致的，因而用了“它坐飞机拖一条线飞到我们的抗战首都重庆去了”这样的说法。

《光明日报》——民主党派的报，由萨空了主持。我参加了创刊招待会，记得有梁漱溟讲话。萨空了曾招待我到他家去吃过几次饭。我好像是给副刊写了点小文章。

《笔谈》——茅盾主编。约我写文章，写过好几篇。

《大众生活》——邹韬奋主编。写过一篇纪念鲁迅逝世的文章。

以群办的“文艺通讯社”——只是把在香港发表的文章给他复印了寄到海外各华侨报刊转载。

（这些短文，除个别两三篇外，内容都忘记了。在我，是不能自己地抒写了一点拥护共产党路线，反对国民党路线的心意。客观效果如何，我无从知道。）

这一时期，我曾参加过一些给我学习机会的会。和在重庆时党召集的文艺方面的聚会相似，香港也有一个这样的会。参加者记得有夏衍、杨刚、以群、黄药眠等。大家在一起谈些文艺方面的情况和理论问题。开过几次。

（杨刚，还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她从北方左联来上海，和她见过面。在香港是重逢。到桂林后，她在《大公报》，曾应她的

约请写了一首纪念七七抗战的诗。她对这首诗表示了感谢。在重庆后期，她仍在《大公报》，我又应约给她写过文章。她因而受到王芸生的责备，说不应该让我在《大公报》上进行宣传。解放后，她在外交部工作，我在乔冠华处遇见过她。我受批判时，写信问她的意见。她来看过我一次，只说我写的英雄人物“主观精神太多了一点”云。我感到，她是把我的问题当作思想问题看的。）

还有国际问题讨论会。有乔冠华、张铁生以及黄药眠诸位发言讨论。好像我只参加过一、两次。

（张铁生，这次是第一次见到，以前不知道这个名字；后来在东江游击支队油印报座谈会时再见到，却无个别接触，到桂林后，一次在路上遇见他，邀他到我住处坐坐并请他吃了饭。后来就没再见面。我觉得他为人诚恳，一定是个共产党员。）

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座谈会，来的人较多。只记得乔冠华陪着陈翰笙来了。会上到底谈了一些什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以群的“文艺通讯社”也开过会。有夏衍、宋之的等出席，谈点文艺感想之类。可能以群把会议记录寄到华侨报刊登发表过。

（这些会，除个别例外，我都没有发言。我知道自己没有值得重视的意见。但我也没有认真学习和思索，体会党团结并教育文化人的主要政策精神。）

在到香港后不久，文艺界曾举行庆祝郭沫若主任五十寿辰的盛大集会。讲话时，我举了重庆有的作家用人名拼成似通不通的五言旧诗来解闷，借以说明国民党不让作家们讲真话所造成的苦闷空气。但我倒是应该把离开重庆时张治中那个招待会的内容予以分析和揭露的。

我观看了撤退到香港的剧人们公演的《雾重庆》等，关心它

们在观众中的影响，和作者及演员们有过多地探讨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也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灭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有华侨出资请杜国庠老先生当编辑出书。（杜老是广东人，在华侨中很有声望。左联时期他在文总，领导过我。到武汉时见过一面。在重庆他也是文工会委员，我们是同事，见面机会多了些。）我应约把过去的一些译文集成一本交他出版。排成后，太平洋战争就发生了。这就是后来的《人与文学》。

在香港，人事关系比较单纯，除了原在香港的党的关系人以外，都是从重庆撤退出来的左翼文化人。我去一些人家，都是做一般的友好访问，谈谈闲天，思想感情上交流一下，舒散一下心情。只有和盛家伦交往，却是想从他学习音乐常识取得欣赏音乐的能力（我从来就唱不出一支歌，是十足的音盲）。

和何非光的交往则又是一种情况。他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这时正在香港，大概是盛家伦介绍他与我认识的。当时，他要替邵××的南洋影片公司拍电影，就请我写剧本。

关于电影我原先就有一些想法，这时就没有考虑他是国民党员，只觉得借这个机会把我的想法实践一下，拍一个进步的抗战影片，那也不错。

我拟的片名是《祖国摇篮曲》。故事开头部分是：在北方一

农村，突然敌人袭来，人们纷纷逃出村庄，成流地向山地急走。一个妇女抱着孩子仓皇地跟在后面。跑到山边，敌机临空投弹了！烟雾飞腾，一片混乱和模糊。画面再现时，已是黄昏，四周寂无一人。近处，那个妇女昏倒在山坡下面的洼地，孩子却没有了……。慢慢醒来后，茫然不解。好久，记起了一天的经过。不见孩子，就疯狂地寻找了起来！开始了几天的流浪，终于被敌人逮捕了。夜里，她设法逃出了屋，从敌人在里面欢闹的房子后面的沟里爬出。外面是一个坡，她就从坡上滚了下去，下面是灌木丛生的野地。适逢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到这里来侦察情况，就把她救了出去……。

以上画面只有音乐和音响，没有台词。她到了游击队以后，才回忆过去，接受教育，开始觉悟，参加斗争，……在祖国（游击根据地）的怀抱里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何非光还预定请金焰和王人美主演，也就是想用剧作者和演员的名字来吸引观众。他邀我到金焰夫妇那里去了一次，但他们对我和我并没有表示积极的态度。他还引我到影片公司的老板那里去过一次，记不太清是不是预支了二百元编剧费。（解放后，1950年到嘉定参加二十军军模大会时，又看见了何非光。他挂着一支小手枪来向我打招呼，说他参军当了文工团员。讲了几句应酬话。）

在香港，遵照党的方针，写了一点多少能对国民党起抗议影响的文章，我的动机是很单纯的。此外，由于政治上的无知，我还办了件不大高明的事情。

党在文艺方面的负责人当然是夏衍。但从重庆来的一些人（以群、宋之的、盛家伦、葛一虹等）都对他有所不满，连和夏衍一向接近的茅盾也有意见。原因之一是，以夏衍、杨刚为中心出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这些人参加，他们事先

都不知道。文集中有一个基本论点，大意是说抗战前文艺上有各种流派，但没有主流，抗战起才有了抗战文艺这个主流。这个基本论点，我也是反感的。这还是“国防文学”理论的翻版，它抛弃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

好像连《雾重庆》的上演都受到过夏衍的阻力，因此宋之的对夏衍也有不满。

夏衍支持的是他的接近者于伶的《大明英烈传》。一次，几个人喝茶聊天，廖承志表示对这个剧本不满。但夏衍马上说这是于伶最好的剧本，说廖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我当时觉得，夏衍对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太骄横了。

孙钿和我见面时还谈到一些情况，他也是不满的。以群告诉我乔冠华也觉得夏衍的作法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在我脑子里形成了对夏衍的一些看法。

以群和孙钿告诉我，廖承志决定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批评一下夏衍。开会当天上午，他们两个来给我打气，要我讲话，并说茅盾也准备讲话（孙钿不是文艺界人，不参加会）。

会议由廖承志亲自主持。不可理解的是，大家在背后意见那么多，到会上却只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表面的话。我以为茅盾会有重要发言，但他的话更是无关紧要。我感到会要开不下去，就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意见只有一点：党花了那么大的气力把这些人撤到香港来，但到这里后，不团结鼓励大家多做点工作，反而争个人影响，闹矛盾，怕别人多做事，这是违反党的要求的。夏衍毕竟是老练的，虽然感到意外，红了脸，但只是平静地为自己做些解释。黄药眠却被惹怒了，起来保卫他，反驳我。到我再反驳时，黄却不让我发言。我就以他不是主席不能制止我发言为理由，斥责他。最后，会议是怎样结束的，我就不记得了。

以后，大家再也没有谈过这件事。我也没有问大家为什么不发言，对我的发言有什么意见。

不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在这之前，M在上海过得不错。儿子进了学校，我托人带点港币给她，她能过得很好，而且还替我去看看老朋友。俞鸿模出曹白的《呼吸》，她还帮了忙。曹白那时正好在上海，她将校样拿给他亲自校改，很快就出了书。她又给我收集了不少上海能找到的日文书，加上我原留在上海的日文书，一齐托人带给我。这些，对我对她都是很大的安慰。

她的三妹在她到之前结识了一位进步的哲学研究者。他是为了抗议皖南事变，按党的安排从桂林疏散到上海准备去新四军的。就住在三妹工作的新知书店。认识后不久，他们结了婚。所以，M想把妹妹送出去学习的打算就完全失败了。她母亲见到她们回来当然非常高兴，大家住在一起，很方便。

M常去看许先生(许广平)和在周颖家认识的何封、朱子懿夫妇。还认识了曹白的未婚妻孙铭镛，她就在晓谷念书的那个小小学教书。所以M一点也不寂寞，来信总是表现得很愉快。

开始，晓谷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几乎跟不上班。这家小学是以投考交大附中为目标的名牌小学。他进二年级，算术除课本外，还有测验卡片，还有练习题，并且已在学英语了。幸好孙铭镛同他的级任老师打了招呼，才没有被刷下去。M天天夜晚帮助他补习功课，常到十来点钟。第二个月，功课就赶上了。但到第三个月刚考完期中考试，孩子忽然咳嗽并发烧好几天不退。M着急了，带到红十字医院去看门诊。听诊后照X光片，得到的结果是一张打着英文的病情通知。医生严厉地训斥M，说她让孩子得了肺病。M来信说，“当时我被骂得眼泪汪汪，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大后方重庆来的，那里冬天没有太阳，生活又贵，

一个教书匠哪里有多少钱给孩子讲营养啊！那医生觉得不好意思了，只好说今后多注意吧。开了些鱼肝油之类的药。”她的情绪上充满了自责的话，同时问我今后怎么办？

她的自责，间接也是责备我，我看了信非常之难过。立即去信给她，“不管怎么样，你们仍回香港吧。我感情上也寂寞得很呢。再苦，大家在一起总会好些的。”

后来她又来信说，已将这英文诊断书请她父亲的朋友张教授看过。 he说是肺门水肿，还没有到肺结核。不过孩子小肺弱，很容易转成结核。问他会不会传染。他说，目前不会，不过要看发展，最好同妹妹分开吃。她想到，到了香港，一家四口居住一房，无法分开，结果只会是，大的病好了，小的又传染上。她就自己做了决定，将女孩留在上海。

在此之前，她已将女孩送到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托儿所日托，每天早晨送去，下午接回来，孩子脾气好多了（这个托儿所在上海是件新事物，是几位进步的妇女办的。许广平也是赞助人，何封夫人朱子懿在那里负责教务）。现在，M打算将女儿送全托，自己带儿子来香港。这样，实现了隔离，我们能精心照料好儿子，到开春，她带儿子仍回上海，只和女儿分开三、四个月。女儿大点了，养成了好习惯，以后就可以进小学。她设想得很好，我也认为她考虑得很周到，谁知这一下却使我们在四、五年以后才见到这无意中被遗弃在上海的小女儿！

其实，这时上海和香港都已盛传日本人要进攻的消息了。有人认为香港保险，又有人认为香港危险。我顾不得这么多，只急于想让她们快点来。给她们带去了一百元港币。她付了三个月的托儿费，给老太太买下了粮食，留下了钱。就和曹白的岳母孙老太太结伴，同船回香港了。

到的那天是12月1日。我到码头去接，并将孙老太太送到

她在香港做工程师的三儿子那里。回到西洋菜街，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亲自做饭。我很有滋味地吃着M为我做的红烧鱼和炒青菜等，感到比什么广东酒家的菜都好吃。孩子虽然只有几个月没见面，但觉得长高了些，倒也看不出有什么病，只是显得面色苍白，可能是贫血。我下决心一定要让她们母子俩好好地玩玩，过上几天好日子。朋友们也都知道M带孩子来了，都为我高兴。有的请她去玩，有的送戏票来。我们沉醉在团聚的幸福中，可惜时间太短了！

几天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战火会不会烧到香港来，大家正在猜测中。12月8日清晨，我们被高射炮声惊醒了。这炮声结束了香港政论家们关于日军南进还是北进的争论。我们这一天多半是在楼下过道里避轰炸，兴奋地感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关于自己和家庭，只有信任党，并无忧虑。

到黄昏时，孙钿来了，要我把几十元港币送到高士其处（他住在以群楼上）。因为防空，公共汽车不开灯。摸黑找到时，以群处和高士其处都空无一人了。又摸黑找了回来。

第二天依然在楼下避轰炸，等孙钿。到下午才出门去买香烟，遇到了路过这里的黄药眠。他告诉我早上就叫以群通知我们到尖沙嘴某旅馆集中（以群接受了任务而不来通知我，从此我对他失去了信任）。

只带了换洗衣服和铺盖以及一点特别喜爱的书和自己及朋友们的文稿，我们赶到了尖沙嘴旅馆。幸好负责的乔冠华（当时名乔木）还没有走。黄昏时，他和杨刚引我们上了一条木船，在海上过了一夜。上船时，他什么也没带，只抱了一个大枕头。别人笑他，他说，“对我来说，休息得好睡得好是最重要的。”他还在船上和大家说笑话打谜语，使大家高兴。记得他打了个谜

语，“有只猫，比大猫小，比小猫大，是什么猫？”大家都没作声。只有晓谷很认真地问，“比大猫小比小猫大，到底是多大的猫？没这种猫呀！”大家于是哄笑了起来。船内空气一下子就显得很活跃欢快。他所表现的卓越的组织者的才能和气概，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从那时起到我受“法办”时止，一直都对他信赖的。

第二天黎明，船才开到香港码头。登岸到华商报馆落脚。下午，孙钿给我们找到轩尼诗道415号三楼中间的一间房子。四面无窗，白天也得开电灯。屋里有两张木板床。他还带来了华侨黎氏姐弟，姐姐十六、七岁，弟弟十二、三岁。我们五口人在这黑屋子里住了一天一晚。

11日，M去看孙老太太，她的三儿子住在四楼，正要住到别处楼下去避轰炸。M提出给她们看房子，这正合她们的需要。于是，我们就和黎氏姐弟住了进去（利源街67号四楼）。孙钿也来住在了一起。我们算是隐蔽在无人知道的地方了（孙家并不知道我们的底细）。

白天在飞机声和轰炸声中，晚上在炮战声中度过。一连几天，孙钿白天都出去帮助同志们（多半是文化人）找地方隐蔽。听他说，这并非他的任务，但负责者不管，他不能不管。有时，炮弹几乎打中他的汽车。

附近有防空洞，白天也去躲过一次，但人太多，无法挤进去。轰炸太激烈时，我们只得在二楼走道避一避。习惯了，晚上炮战激烈时也能睡了。屋前小山上落过炮弹，隔几个门的楼上一间房里还飞进了一颗炮弹。夜晚，从窗口可以望得见山上放炮放枪的硝烟。

没有蔬菜，只抢买到一点粮食和一点腐乳、生花生米和罐头等。天天还能看到报馆出的号外，都是一片乐观的梦呓，说

什么港督准备死守三个月等待皇家的援军到来等等。

12月24日，夜间听到了街上有奔跑的声音，起床后听到后街仍有报童叫卖“看报，看报，我军大捷！”赶快跑下楼去买了一份号外。但等我走到前楼准备上楼时，一看门外却站着一个八叉着腿的敌兵。我来不及细看，就飞跑上楼，和孙钿一起到阳台上向下望，只见街上不远处已有敌兵在扫街，还有横持着枪守着门口站岗的敌兵。这一带终于被敌人占领了！

这时，我想到的是怎样处理我带出来的少数中文书和日文书以及好些内地朋友寄来的文稿。看来只有狠狠心丢掉了。我和孙钿研究了之后，将它们捆成几小包，放在二楼的小阁楼上。但第二天去看时，已被人拿走了。幸好事先已将姓名撕掉，大约不会出事的。只是，我心里为之难受了好几天。文稿中有路翎寄来的长篇小说稿《上校的儿子们》，丢失了尤其可惜。

25日，港军正式投降。我们就像关在笼里的小动物，不敢出门，惴惴然等着看敌人的下一步。大约在第三天上午，忽然有人敲门。一个穿短装的本地人，引着一个挂着军刀的敌人下级军官。进来就直向前房走去，眼睛里好像没有我们这些人似的。那位本地人老远就叫我们，“快拿烟仔！烟仔！”孙钿忙将留下的两听香烟拿给了他。那军官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作手枪形状，向我们“啊，啊”了两声，我们赶忙摆手表示没有。他抽开大橱的一个匣子看了看，里面都是家庭用杂物。这样，他才又目中无人地拿着两听烟走了。他大概是来查看有没有武器的。那带路的本地人好像还不是汉奸，因为他并无恶意，连叫“拿烟仔”，当是为了满足那敌军官的欲望，免得出意外之事。他们进来时，黎家姑娘和M都躲进厕所去了。

第二次，一个农民似的敌兵从门外窗户朝里望，推推门。我们只好开了门。他迟迟疑疑地问，“有手表没有？”我们装做听不

懂。他指了指手腕，我们摇摇头。他到处望了望，似乎有点不甘心。孙钿忽然看见桌上的大柚子，就拿了一个给他，我又拿了一个给他。他一手抱着一个柚子，很满意地走了。他大概是擅自出来找财物的。我们两人都穿着整齐的西服，房子也很像样，他就没敢撒泼。

第三次，突然敲门，我们装着在打扑克牌的样子。两个年青学生模样的敌兵进来，把我们面前的花生米抓起闻了闻，做了一个跳舞的滑行姿势，因为我们这房子过去打过蜡的。他们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走了。但他们走到五楼，可就出了事。五楼住的是比较贫苦的居民，这几天自来水上不去，一个小姑娘看他们挺和气，就指着水桶说楼上没水，要他们设法给水。他们立即要小姑娘跟他们去取水。糊涂的小姑娘还真想跟着下楼去，被她妈妈一把抓住了。这两个兵当然很不高兴。居民们都来求他们，说等一会才下去取水。他们悻悻地走了。第二天又找来了，吓得她妈妈只好说孩子病了，他们说可以让他们的医生来看病。那小姑娘从顶层翻到隔壁楼躲了起来，才总算没出事。

居民们传言，敌兵在老百姓家骚扰，找花姑娘，但是受到了上级军官的制止，告诉大家如发生这种事时，就可以敲起铁器，宪兵听到了就会来抓他们。因此，我们有时会忽然听到敲锅或脸盆的声音，也就跑到阳台上敲起了脸盆。一传十，十传百，成了一首抗议的交响曲。所以，这次敌军进占香港，总算没有干出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

三四天后，市面上平静了些。孙钿每天出去一两次去取联系，我只是偶尔到附近转转。有一次走到皇后大道，只见店铺和银行都关了门，车辆都停了。只有平民区的街边仍挤着小日用品摊和赌摊。

被炸的危险过去了，房东搬了回来。我们让出正房，挤在后间里。再过几天，孙钊和黎氏姐弟都搬走了。

孙钊走后好几天没来，我感到像蹲在茫茫大海的小孤岛上面，无依无靠。M出去找食物时遇见了黎氏弟弟，再出去时就写了一张小纸条卷在毛衣袖子里交黎氏弟弟带给了孙钊。

孙钊很快就来联系了。他问我的打算，我当然说要回内地去。过了几天，他就来通知我们，布置我们离开香港。在约定的那天黄昏，负责人小潘（一个穿着唐装的瘦高个广东青年，即后来留在香港的潘静安先生）来找我们，并帮我们分拿行李送到铜锣湾海边，坐上小船到停在海上的大木船。张友渔同志在那里负责照料。船上还有宋之的夫妇和沙蒙等。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换小船冒着被敌兵射击的危险偷渡在九龙上岸。被引到洗衣街某宅的顶层一所简陋的楼房，这大概是党在此设立的联络站，里面住有一些本地的工人，也有女工。负责人来同我们谈话，说要将我们送过封锁线，到东江游击支队去。不过要改穿唐装，片纸只字都不能带，怕遇到敌兵发生麻烦。同时，也嘱咐我们不要到处乱走。

我请人给我买一身唐装，由于我身材高大，只买上一套旧得快磨破了的藏青粗呢衣裤，这倒正好掩护身份。M她们就买了一段灰布请这里的女工临时用缝纫机做。我们到附近街上去看了看，这里比香港看去更热闹，更安全。街边摆摊的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卖的。我看见一个敌军官在选购丝袜，用手量尺寸，量了又量，最后打手势问价钱。可能他的钱不多，没买成就走了。

真想到西洋菜街的“家”里去看看，尤其是M，想到那里去取点日用品。由于受纪律的约束，这只要转几条街就可以走到的家，只好不去了。

我在地摊上买了几件小玩意如剃须刀之类。M买了三、四斤草绿色毛线。这可能是本地人从军用仓库弄出来的，只两、三元港币一斤。她觉得挺便宜，将来没有冬衣时也可以派上用场。回来一看，王苹她们也都买了。

负责人来通知，准备第二天派专人送我们出境，并检查一下我们所带的东西。我们有一口从日本带回的纸板皮箱，很结实也还只有二十寸大。但负责人不同意带，就只好留下它，另外买布做了一块大包袱皮，将衣物包上。又说顶好不要带西服，我就将在香港买的旧西装留了下来，只带了一件风衣。另外一个帆布袋，那是M一定要装上的为晓谷预备的食物。我不好阻拦，只得向负责人说明孩子有病，不能不带点食物。谁知后来重庆就传开了，说我们逃难还带了许多罐头。

1月12日晨，我们一行多人由洗衣街出发，汇入到大批的难民群中。跟着已认识的带路人，步行出九龙进入新界，脱离了敌人的威胁。

总计在香港半年多的工作：

- 1、计划出《七月》港版，因注册问题迁延，未实现。
- 2、推进在上海出版《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但因种种困难，只得曹白的《呼吸》一本。
- 3、出一套《七月丛书》，已成议，因战争爆发而不果。
- 4、出版自己的四本书。《棉花》已付排；译文集《人与文学》已排成；论文集收《七月丛书》内，将付排；杂文集，已成议，将付排。

这四本稿子，战争发生后都失掉了。

5、写杂文约六、七万字，均失掉。在港期间日记也毁掉。

6、写成电影剧本《祖国摇篮曲》纲要。

7、搜得日文书（高尔基全集及苏联文艺理论书籍）约百册，

均丢掉。沪出文艺书刊也均丢掉。

8、国内友人稿件约数十万字，均丢掉。木刻数十幅，均丢掉。

9、读书：《樱桃园》，《愤怒的葡萄》，《时间呀，前进！》，《初恋》，《被束缚的土地》，《西线无战事》，《面包》，《两姐妹》，《1918年》，《新生》，《神曲》之《地狱篇》，《战果》。

六 在东江，在桂林

我们在九龙洗衣街顶楼某宅住了两天，1月12日一黑早，我们一群人(有宋之的夫妇和沙蒙)由住处出发向郊区走去。走近郊外就可以看到大批的和我们一样的难民，都是背着包袱，提着小藤箱，有的孩子背上挂着几把雨伞。我背了一个灰布包，M手提一个旅行袋，晓谷也背了一个书包，里面是盥洗用具。今后，我们将靠身上背的这点东西御寒过冬。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简单，连书都没有一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

过去荒凉的小路，现在已是人头济济。我们夹在当中，忘了走了多久，只感到肚子饿了，孩子也有点走不动了，前面的带路人才将我们领到一所空房子里，随手关上了大门让我们休息。这里可能是过去的祠堂，遭过劫难后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就坐在进门的厅里，有的坐在地下，有的坐在门坎上。这时大约已下午一点来钟，太阳正旺，一点也不感到冷，反倒由于赶路出了汗，口渴得很。我看晓谷简直是软瘫在妈妈身旁了。他本来就身体弱，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当然吃不消。M就叫我扶着 he 坐在包袱上，自己跑去从旅行袋中取出一罐咸牛肉，说孩子不仅是累可能也饿了，早餐他只喝了一碗粥。的确，连我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了，何况这孩子呢。她将罐头一打开，许多双眼睛就都转过来望着它。晓谷刚吃一点，宋之的就走来向M说，“给我也来一点，实在支持不住了。”这时，那穿黑布唐装的带路人过来止住了M，说，“留下糙饭，冒菜呵。”M赶快收起了，她

听懂了他的话，意思是留下来做下饭菜，这里没菜吃。知道还能有饭吃，大家也就安心了。有人给送来了一大钵开水，先解决了口渴问题。快两点时，才吃上饭，果然菜只一小碟咸萝卜干，大家就将那罐牛肉分而食之了。

正吃饭时，交通员跑来告诉我们，不要大声说话，外面常有敌兵走过。到五六点钟天似黑非黑时，我们才离开那空房子。走了几里路转向小路上山。又走了有十来里路吧，到了一处土屋，停下来休息。看到有背枪的游击队员在放哨，我们已进入东江纵队的游击区了。当夜就在那里住下，一式的地铺，下面铺了稻草，上面有草席。我们将随身带的毯子一裹，躺在又软又香的稻草上，一会儿就都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又上路，仍是由穿唐装的交通员带队。走了许久的崎岖山路，到了离大埔镇不远的平地，住进一家祠堂。已有几位带手枪的队员住在那里了。他们在谈去大埔时遇到了日本兵搜查，就把毛巾裹着口袋里的手榴弹抓着举起手来的机智英勇的故事。我们在那儿大概住了几天。

通过日军驻地后，完全是田野。在某处坐木船渡过小河，上岸就是广东省地界，好像属于宝安县。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歇脚住了一夜，再往有山的地方走。半路遇到了穿黑衣戴黄布帽的伪警巡逻队，有两个人端着枪来搜查。我们都停住脚低下头，他们看了看没有叫打开包袱搜，但看到了于伶的新婚夫人，她穿的是花衣服，就不怀好意地在她面前站住，幸好他俩被同伴叫走了。我们算是吃了一场虚惊。

离开平地上山，就是游击区。走若干里，到了一个小村子，歇在一间破旧的空教堂里。这里过去一定是个相当繁荣的市镇，教堂在市中心，但现在可是颓垣残壁满目凄凉，只留下了几间房。傍晚，老乡们都出来走动，孩子们在唱《黄河颂》。路边还

有炸生蚝的小摊，一些人围在那里有吃的有看的，很是热闹。生蚝在香港是很贵的，可在这里一毫子能买两个，真是馋人。可惜我们这群人中谁的钱也不多，没人照顾他的生意。

交通员领我们去到队部。那是一幢小洋楼，我们见到了东江游击纵队的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他们很随便地和我们谈了谈当地的情形，并请我们吃晚餐，主要是一大碗狗肉。曾生很抱歉地说，“没有好菜招待你们。现在想弄一条蛇都很难，只好吃狗肉了。”但我们大家都觉得这碗狗肉比什么肉都好吃，吃得很香。

由于天晚，我们被留在那楼上住了一夜。

第二天转到了一处山间小水沟旁的棚子(本地人叫山寮)住下。这住处正在茂密的树林里，避开了通山的路，很是清静。有专人负责买米买菜做饭。吃得不错，每天总有一大碗青菜或别的什么菜，后来听说我们把物价都吃贵了。

这山寮是一大间，用几根粗竹竿做架子，屋顶是稻草，可能过去是用以堆放收获的各种作物的，除了四面用竹蔑围着外，没有窗户，但有一些缝隙，通风很好，也还光亮。开着几处门，随时关上。一二十人睡在稻草铺上，倒也不觉得冷。

住在这里的人多半是香港的文化人，我大多数都认识，闲时就在附近散步随便聊天，关系很亲密融洽，真是同舟共济的难友。

邹韬奋的铺离我的很近，他常在早晨醒来后先躺着用手按摩头部等处。后来他向我们传授了这套保健操。我对他一向有个印象，认为他一定是财大气粗的老板，这是由于《译文》停刊使鲁迅先生生气而这样想的。在武汉撤退前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在一次集会上，他讲了国民党的退却政策在重庆造成政治空气沉闷的情况。后来在重庆，在香港，好像都没有见到过他。不

过我和他夫人同船到香港。在香港，胡绳特来看我，要我为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写稿，后来我写了一篇。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这次有天夜晚我被派去和他一起放哨，有了随便聊天的机会，才感到他原来是平易近人很容易接近的。

叶籁士也住在这山寨。他做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可能在上海见过。他曾把我译的台湾作家杨逵的小说《送报伕》译成新文字出版。这次住在一起有了谈话的机会，看得出他是很认真地干他的工作的。他曾把瞿秋白一篇关于拉丁化的文稿用分散包各种杂物的方法将它带了出来。有一个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女友，身体不大好，他是那么地关心她，我都记得这情况。当时生活书店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都和我们一起撤退，现在我们在生活方面的事务如办伙食等大部分就依靠他们。

比较熟的有茅盾夫妇、胡绳夫妇、宋之的夫妇、沙蒙和葛一虹。还见到了袁水拍和黎澍。还有些人我就记不起了。记得有一个广东人，似乎是世界语的同人，总在叶籁士和别的年青人身边转。有一个年青人因为没有火石准备将打火机扔了，这人就从小包里拿出几颗火石送他，并且说只要到了大市镇一定帮他再买几颗。看来很热心，又喜欢交际。但等我们再换地方时，他就不见了，听说他来历不明，已调到别的队去了。

一次，我和茅盾夫人孔德沚背靠着大树坐在一起谈闲天。她为人很直爽，和我聊起在上海的往事，还笑话我曾想将第一个孩子人工流产掉。我们谈得很亲切，我就顺便向她解释。我说：“鲁迅先生告诉我你对我有意见，怪我为秦德君给茅盾转过信，并在信中骂了你。”我向她申明：“绝对没有这回事。你们的家庭纠纷，我从不过问。他俩一起回上海，还是秦德君后来写信告诉我的，她在信中说茅盾如何地对不起她。我只给秦回过一封信，劝她不要大闹。这些事情你多半是误会了。”她听了似信非信。最

后，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安慰她说：“现在好了，你胜利了，你是真正的茅盾夫人。”她感到很得意高兴，就散了我一支烟。我们抽完烟就将烟头扔在树下，我记得还按了按，才站起来走了。但还没走到大寮就听到有人喊，“不好了，起火了！”我回头一看，火苗正从我们坐的地方延烧了起来。这时，已有许多青年在游击队员的带动下，拿着毯子和树枝向山火扑去，我也找了根树枝冲去救火。火很快被扑灭了，没有造成灾难，但我还是闯了祸，因为这一来很可能将我们的住处暴露。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通知我们说有情况，敌人可能会经过这里，要我们向更深的丛林中去隐蔽。这时，曾生队长背着军毯带着手电亲自来指挥照料。他的态度自若，神情镇定，看见我拿不动行李，就喊来一位队员帮我拿。我们坐在树下眼看天快亮了，还没动静，忽然听到吹牛角号的声音。队员来叫我们，说：“好了，没情况了，回原地去吧。”原来吹牛角号是卖豆腐的，有卖豆腐的当然就没有敌兵了。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大概由那次失火而加强警惕了吧！

大约是担心这里不安全，我们被转移到了一个更深的山里。有大草棚，也有小茅屋，大家分散开来住。我们和宋之的夫妇等住在一起，正在一条山涧的上面，周围有一些数米高绿叶缤纷的树。后来，队员们告诉我们，这是荔枝树，还是有名的黑叶荔枝。可惜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要不，这里的水果可有得吃呢！

记不清是在大山寮时，还是已搬出那地方后，我曾被邀请参观设在一处树丛里的队部油印处。有好几个青年人在从事油印宣传工作。好像和我们一起开了个座谈会，漫谈国内外形势。到了哪些人我记不清了。似乎有张铁生，因为他谈了国际形势。

还是在大山寨时，有一次，胡绳从队部回来，闲聊中说昨天在队部吃到了獐子狸，等。谁知这下刺激了矛盾。他借此发牢骚说，日军进香港前，文艺方面的党员负责人把C.P.发下的避难费(外币)都分给了自己接近的人，不接近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了)都不给，云。他这一说弄得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我也是相信他这说法的。

我一直在担心着晓谷，怕他小小年纪受不住这劳累和野外生活，怕他的身体会垮下来。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多天来，他的食欲增加了，脸色也不那么苍白了，没有发过烧连感冒咳嗽都没有得，真是大自然的治疗比什么药物都好。我和M的心里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在这里可以买到一样便宜的食物，那就是红糖，它是片糖。大家美其名曰“土巧克力”。我花钱的地方就是抽烟，虽想尽量地少抽可还是不行，越是没事干就越得抽烟。无法，只好买了烟叶，向本地队员学卷纸烟，这样倒也能应付一阵。

林平政委曾说过，等去内地的路线布置好后，就送我们离开游击区。我们也希望能早日离开，因为我们这几十口对他们在财力上和人力上都是一个负担。

在林平政委召集的谈话会上，他谈到支队因护送的从香港出来的文化人多，开支太大，问我们谁如果有外币，是否可以交出来。我以为他指的是党发的避难费，那我没有。只是在离重庆时周副主席给了我120美元，我们一直没舍得用。从香港出来时我交给M，她缝在裤脚边，万一我们走散了她和儿子能用这钱设法回内地去。再说，国统区情况风云莫测，还是留着免得受憋。看看矛盾，他无任何表示。我也就没有将它交出。

不久，要送我们离开游击区了。行前给我们举行了一次送别会餐。非常丰盛，可能用去了中队一两个月的开支吧。

我们一行几十人重编队分散开，我们八九个人一组由几位带手枪的便衣队员(好像都是华侨子弟)护送着在山间小道上运动。多半是晚上赶路，白天住下休息。辗转地走了十来处，每处歇一天。也有的不止一天，大概是为了弄清楚情况决定下一站怎样走才最安全吧。我们的行李有一两个挑夫帮忙挑，基本上还是自己背。那个旅行袋一直由M拎着。夜晚走山路，她还一手拉着儿子，怕他掉队。我径自在前面跟着带队的人走。因此，她对我很有意见，说我不关心她们。后来我才知道她拎的那旅行袋很重，里面放了一罐奶粉一罐乐口福，还有钙片和咳嗽糖浆，都是她为儿子预备的，怕他在路上生病。他倒一直没病，只是有一次出了个问题。这八岁多的孩子跟着大人走着走着却走到叉路上去了。大家还以为他是跟着带路的走的，也就跟在他后面。等带路的队员发现再回头把他们找回来时，他们已经走了一段冤枉路。后来问晓谷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已经困极了，只是下意识地向前走着，后面的人也就下意识地跟着他。这之后，带路的队员就一手拉着他同走，有时看他走不动了，还将他驮在肩上，这样就走得快多了，也没再出什么事故。

我们几乎每天都到一处新村子。有的村子外面用大围墙围住，我们有时只能住在围墙外的学校里。在路上听说，前几天曾护送了几个外国记者从这里经过。

我们都是夜晚行走，有时走五六十里或更多，走到村子时差不多已天亮了。围墙的门紧闭着，我们有时只好在露天下的棚子里歇息。一次，我们进到了这种围墙里的村子住了一两天。那村子像碉堡似的，围墙上有孔可以守卫，是防土匪的。这种村子多半属华侨，他们在海外赚了钱就回来置房子，有的还

盖了大祠堂。但在这兵荒马乱时，很多房屋都被大炮击毁或被敌人烧坏了，已失去了当年那兴盛景象！

有的大村子在围墙里过得很平安，交通员为我们每人拎来一桶热水冲凉。我们已有十多天没有洗身了，又是汗又是泥真是脏得很。就高兴地在一间屋子里站在石头上将热水一面从头上浇去一面搓身上，倒也洗得很痛快。

住在一个学校里时，见到了先我们来那里的张友渔夫妇。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到东江支队的。

有一个大村子，可能是支队的的一个据点。在那里，我看到两位妇女干部，在一面劳动一面打闹嘻笑，性格开朗得很，感到她们是精神解放了的新女性。

我们到了刚转移到这个山口中暂住的队部。他们告诉我们，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一队敌兵从山口外经过，彼此都没有发觉。这一带常有敌兵经过，不很安全，因此我们只在白天休息，睡了一觉，当晚就离开那里到前面一站去了。

在前面这村子里住的是民房，由曾在香港某中学当校长的党员干部负责照料我们。决定让我们在那里住一两天。有人建议请他们代买一只狗，大家都想吃点肉增加营养。第二天买来了狗，下午就吃炖狗肉。许多人从没吃过狗肉，在队部吃的那次对我也是第一次。不过这时候吃起来却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吃过后看见一只小狗在地下啃骨头吃，后来又听队员说我们吃的母狗就是它妈妈，不由得心里一阵反逆，感到不好受。记得小时候在家乡听说过，想吃狗肉得到远离人的空地去炖，要不，村里的群狗就会大哭大叫。又说，吃了狗肉如果身上没有弄干净，路上遇到狗就会被追赶。而在广东由于吃狗肉已成习惯，连狗的嗅觉也都淹灭了！

我们饱餐了一顿狗肉正准备好好休息一夜，忽得通知要我

们连夜转移。这一夜走了很长的路，并且，不准抽烟，不准打手电，完全是摸黑走的。天上又在下着毛毛雨，路非常泥滑，我们都小心地走着。忽听得前面有人声，要我们停下来。大家吓了一跳，以为有情况。后来才知道是茅盾夫人掉下桥了。我们都为她担心，不久又传来话，说没事了。快走。第二天我们见到她，关心地问她，她说开始怕极了，但像腾云驾雾似的，落在一草窝上，一点没受伤。当天走不久就出了山地，在游击区和国统区间行走。天快亮时到了前哨站的村子，村里有几条长枪。让我们住在一个带枪不脱产的队员家里。这一家房子很宽敞，和我们乡下殷实的中农家庭差不多。进门有过道，正屋两旁有两间房。还有后院，两边有厢房，可能住了几房人。主人将我们领到一间厢房，那儿有几张板床可给我们睡。外面还有一小起居间，白天可以围着方桌坐坐。这对我们可是正式的住处，不再睡地铺坐地下了。饭由主人家代做，在一间宽敞的灶房里吃饭。

男主人约三十余岁。他的母亲非常精明能干，掌管家务，他的年轻妻子很能干长得也不错，看来家里的体力活都由她干，所以没有我们家乡媳妇那种低眉顺眼可怜巴巴的样儿。他们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活泼可爱，穿得也蛮齐整，看得出是家里的宠儿。

我发现，在广东，体力活多半由女人干，在家带孩子和做饭倒是男的。我们的饭菜就由男主人做。这里不好买菜，我们吃的都是他家自己种的青菜，有时就给一碗酸菜，味道很好吃。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自己吃的是白薯饭，那是先将白薯切块煮一下，捞起焖在锅里像焖米饭一样。菜也只是一碗酸菜。他们的小女儿看到我们的白米饭有时现出羡慕贪馋的眼光，马上就被阿婆牵走了。这使我们很过意不去，我们要男主人添给她白米饭，

他不同意。我们提出用白米饭换白薯，我们都喜欢吃白薯，想吃白薯。后来，他有时就给我们端来一碗焖得出了糖油的白薯。那可真好吃，我们从来没吃过这样又香又软又甜的白薯。可惜主人家是当饭吃的，我们不能常向他讨来吃，只有偶尔吃一碗，并添上一大碗白米饭给那小姑娘，这样大家才安心。

我们同这一家人的关系很好，可惜言语不通。他们说的是客家话，连会说广东话的王苹都没法和他们交谈，倒是M因小时在赣南住过还能听懂一点客家话。男主人会说勉强能听懂的普通话，他可能出过国，对一些事不像普通农民那样斤斤计较，因此常受到他母亲和妻子的责难。一天，M过厨房时听到他母亲在说饭菜都快吃光了。所以，我们急于想离开这里去惠阳。

但是，在我们到这儿不久后，敌军就占领了惠阳，所以我们只得住在这儿等待。这时已近旧历年关，村里正忙着过年。这个村子很太平，过年的气氛很浓。他们在准备熬酒，将甘蔗渣（轧糖后的下脚料）装在我们外屋的一个大缸里发酵，然后再拿去熬酒。酒房设在村里的一个棚子里，这大约是全村的酒，所以许多人都围着看。酒渣放在一口大锅里熬，上面盖一大木桶，一根竹竿从木桶旁的一个洞中伸出，水蒸气慢慢地由竹竿引出落在一个大钵里。后来，有人将我们房主人的阿婆请了来，要她品尝，好像她是这个村最有威望的妇女。她尝后说，还好，可以再烧下去。晚上，主人给我们送来了一盅甘蔗酒。大家都是初饮，尝过之后赞不绝口。主人问我们打算如何过年，他们这里是吃烤鹅和白切鸡。怪不得在这里常看到有许多鹅在外面踱步。这里的鸡养在过道门厅的悬空的竹圆筒里，脚不沾地，只伸出头来吃拿来的糠菜。据说，这种鸡虽只一两斤重但肉特别鲜嫩，连骨头都可嚼了吃。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没多少钱，想买鹅买鸡是办不到的，只好说，到时候买几斤肉吃吧。

除夕夜的前一天，房主人从队部拎来一个猪肚，说是分给我们过年的，又问我们打算怎样吃。大家一算计，如果炖汤吃每个人几块肉一碗汤，就没有了；想喝酒的就提出炒肚尖卤肚子。但算来算去，都觉得东西太少了。最后还是主人说，拿来炒酸菜吧。我们都同意了。他就拿去洗洗，准备做第二天除夕的好菜。不料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得到通知，惠阳城的敌人已撤退，要我们急速去惠阳，并且还派来了带路人和帮忙挑行李的“挑夫”。我们高兴地上路了，只可惜这碗酸菜炒猪肚没能吃到口。

在为我们挑行李时，房东媳妇争着要挑一担，主人也拦不住。路程不算远，中午时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一个镇上。领我们到住处后，挑东西的人就每人拿两元钱赶忙走了，后来在饭摊上看到他们正在大吃肉片汤和白切鸡，怪不得那媳妇也要抢着挑担了。

在路上，由于热不可耐，我将身上穿的毛线背心脱下，帮我挑行李的人叫我将它挂在他的扁担上，但到了目的地我却忘了取下，等想穿时才知道已人去衣无了。这件事使得M很不高兴，因为这是她特意为我织的第二件毛背心。

在这小镇上过了一夜后，第二天又再赶路，由几个不带武器穿便衣的队员带路。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下午我们想休息住下第二天再走。带路的队员不同意，说这里是国统区，怕出事，要我们连夜赶到惠阳城。

这天是大年初一，不但没有月色，天上还飘着细雨，道路又黑又泥泞。晓谷和带路的队员走在一起，宋之的的女儿由一个挑夫一头挑着她一头挑着行李。我们都很小心地摸黑走在路当中。在夜里十点多钟时进了惠阳城。

大家都平安地离开了游击区，告别了带路的队员，告别了

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我们将永远记得这段生活！

我们一行数十人冒雨进了惠阳城。那里敌人刚撤退不久，老百姓正在陆续返回，到处是断墙残壁，一片凄凉景象。带路的便衣队员将我们领到大街上的一家铺面房。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是倒还干净。我们被安排和宋之的夫妇一起住在楼上。

因为是刚过春节，所以招待我们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一只鸡和几块豆腐，叫我们自己弄来吃。我和宋之的对这种事都是无能为力的，就由M和王苹她俩去操劳了。我们已三月不知肉味，更不要说鸡味了，因此虽然没有任何调料，仅仅是放了盐煮成汤，我们两家六口都吃得十分满意。连一向十分讲究吃的宋之的也说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鸡汤和豆腐。

正是春节前后的四九寒天，这里虽然是南国，但还是冷得很。住处的后门外是一条河，晚上刮着风听着风的呼叫声，将所有的衣服都加盖上还是觉得冷。白天又总是阴雨，我们几乎不敢出门。楼下已经住上了人，由他们照顾我们的生活。看我们觉得冷，有时就送来一瓦盆炭火。晓谷和宋之的女儿宋时英特别高兴，能安静地烤着火。

直到天晴出了大太阳，我们才在城里到处走了走。街上已有点热闹了，人来人往的也不少，只是一些大店面仍关着，有的只开一扇小门进出，没有正式营业。倒是路边的各式小摊不少，卖豆腐卖青菜萝卜的也都从四乡赶来了。劫后的惠阳城在渐渐苏醒。

我们到城里的西湖公园转了一下。那里的花草亭阁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几棵大树带着满身伤痕屹立在那里。听说这里曾被敌人当做刑场，杀了不少人。看去地上点点红色似乎是血迹，再一细看原来是枯红的花瓣。本地人告诉我们这是木棉花，夏

天开放时红得像火一样，我们在广州湾看到的可能就是这种花。敌兵攻打惠阳城时，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坚决抵抗就匆匆撤退了，这样，城里的老百姓多数来不及逃走，遭到了敌人残酷的屠杀。

在悲愤中吟成旧体诗二首：

拾得孩儿骨，殷然见血痕。一夫襁重寄，千命殉孤城。
鸡豕悲同劫，禽虫失秦声。踏云湿欲泣，凄切不成春。

劫后湖山冷，萧然得此游。荒碑七尺石，热血几人头。
木落花犹赤，云低雾不收。荣枯缘底事，厉鬼笑封侯。

在惠阳住了三四天，从东江游击区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都在设法回内地去。负责我们行程的同志安排我们先坐木船到老隆，然后再换乘别的交通工具到桂林。

这是走东江的很大的木船，有三四个舱位。除我们一家、宋之的一家、葛一虹和沙蒙外，还有一个广东青年带着两个姑娘也和我们在一起（在进惠阳城的路上，曾看到过他们）。后来我才知道，这青年姓梁，是华侨，那两个姑娘是姐妹俩，也是华侨。梁就像长兄一般地照顾她们。他们很活泼，无拘无束，同孩子们玩，也同我们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有他们在一起，这个舱里热闹多了，十多天很轻松地就过去了。我们的伙食由船主包了，虽然每顿都是糙米饭和酸菜，但奇怪的是我们的饭量都特好，连晓谷每餐也要吃上一大碗。他的脸色已显出红润来了，看来这次住在山寮里有山有水空气好，对他的病大有好处，这使我和M感到了宽慰。

白天开船，傍晚时就找一处歇下。这次航行很特别。我们只知道目的地是老隆，但中途经过什么地方，每天行程多少，就一无所知了。也没有人去问船老板。他高兴时会告诉我们，前面靠在××镇，可以上去啊。我由于言语不通，更主要是袋中无钱，从不想上岸去。只有那梁姓青年特别高兴，有时还带着

那姐妹俩一道上岸，我就将仅有的几个钱托他买点烟叶，好卷“白兰花”享受。

大约十多天后，我们的船到了老隆。这里大约是最后一个接待站吧。在码头上看到几个曾在香港见到过的人，如连贯。他是和孙钊一起工作的，所以我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但没经人介绍认识过，不能算是熟人。他可能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没去打搅他，只由别人给了我们一笔路费，就让我们自由行动了。

有了钱，就像是一个穷汉忽然发了财，想买点什么。我随大家在老隆城里逛。这个城很热闹，好像没有遭到过日本人的抢劫。在别人的宣传和怂恿下，我买了一盒“铁观音”，其实是一个盒里装着锡制的两小瓶。听他们介绍饮这种茶的方法，要用小壶小杯一口一口地品。这种品茶艺术简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行。

我们决定先坐长途汽车到曲江(或是韶关)，然后乘火车直到桂林。一路同走的仍是宋之的夫妇、葛一虹和沙蒙，还有什么人我就记不起了。

从老隆到曲江走了四天，每晚都住进小客栈，但地名我都忘了。只记得在河源中午停下吃饭时，有时间在街上走了一会儿，遇到一家药店，很多人都在买药，说是有一些内地不好买的西药。我也进去看了看，想到M在四川常患疟疾，就买了一支扑疟母星，我常患腹泻，又买了一支痢特灵，还为儿子买了一瓶鱼肝油精。

我们的车在离曲江不远的一个大寺庙前停了下来。据说，这是广东的大古刹，南华寺。幸好没遭到敌兵多大的破坏，现在已经修缮清扫过，来参拜的人很多。我们一行人中有认识老方丈的，所以方丈亲自出来招待我们，还引我们到小殿堂里去拜谒六祖金身。原来，这金身是六祖趺坐圆寂后，等尸体干枯了

用漆涂抹再贴金的，其实就是木乃伊的另一种制法。不过，我还是初次见识这种金身呢。

到曲江，看到电报局，即打了个电报给老舍，向他报告我已从香港脱险。

坐上火车，一天就到了桂林。记不起是哪位来接我们的，将我们引到了环湖东路东亚旅馆楼下的一间小屋。一会儿，老聂来了，坚决要请我去洗澡，这大约就是洗尘的意思。这一路近一个月，不但不能洗澡，连洗脸都不是经常能办到的。我就随他去了，同时也向他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他只回答我简单的几句话，“复杂，但有干头，要有耐心，”真使我摸不着头脑。出澡堂时天已下起了毛毛雨，他又坚持要送我回旅馆，然后约了M母子一道，请我们到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餐这几个月来最高级的饭菜。

见到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似乎要多住些时等重庆的决定。我们这一批人中只有葛一虹一人很快就回重庆去了。宋之的夫妇、沙蒙及一些戏剧界的人，还有盛家伦和丁聪，似乎都没走，都在找房子。只知道茅盾住进了广西文化供应社的宿舍，那是邵荃麟楼下原先是厨房的一间。可见这里找房之难了。

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一直在找房。熊子民来看我，我就托他。他说，如果是短期，那可以住到他那里，在河那边。但我想，短期长期我无法定，最好还是不住在人家里。但最终还是无奈住进了熟人廖庶谦的家。在重庆时，他与我们都住在北碚石子山。由于他们赶场总要路过我家门前，又由于他和吕振羽是湖南同乡，所以经常到我家坐坐，我和吕家也曾一同到他们那边去躲警报，这样就更熟识了，好像是共过患难的老友。我只知道他是徐特立的学生，生活书店的编辑，主要是搞通俗读物。这次，他邀我们住进他家的后楼，我也就欣然答应了。

这是一间朝西的木板小楼，有十一、二平米。里面原有两张竹床，一并起来正好够我们三人睡觉，还有一张竹子桌，我们几乎不必购置什么家具了。这里是城外的建干路23号，人烟稀少，离七星岩很近，可以躲警报，离熊子民家也很近。看来，在这儿暂且安身住下等消息是很合适的。

我们是在3月16日搬进廖宅的。一开始仍很忙乱，只抽时间读了一些这几个月来没读到的，有：金人译《静静的顿河》全部；耿济之译高尔基《家事》；丁玲的《母亲》；老舍的《赶集》；艾青的《诗论》；赵家璧的《新传统》一部分；伍禾的《箫》；丁西林的《妙峰山》；汪川稻子的《现代文学论》一部分等。后来，就替《山水文艺丛刊》第一期审阅了大部分稿件，并审阅了吕荧译《普希金论》的一部分和冀汭诗集原稿《奔马二十匹》。总算看上了电影《列宁在1918》、《如此天皇》、《妇人心》等和话剧《大雷雨》。

到桂林后，看到了郑学稼在国民党《中央周刊》上攻击我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他一方面大捧茅盾，因为茅盾在《子夜》里使代表封建势力的老太爷一到上海就死了，等于肯定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已经衰亡，不成其为革命的对象，合乎托派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侮蔑鲁迅没有独立思想盲从共产党，我的《论民族形式问题》是遵照共产党的指示写的。这等于是公开地揭露和告发我。我准备有机会时写文章刺破他的嘴脸。

很快，我就收到了各处朋友们的来信，大家都庆幸我的活着回来。有的信上说，有传言说我在香港投海“就义”了，有人还为我哭泣过；有的朋友可相信我“一定活着”，或者“本来就不相信你会死的”。这份情意，我只好心领了。但事实是这类“好死”的传言是不甘心让给我的，不久就来了《良心话》上有“真凭实据”的什么“文化锄奸团”报道“胡风附逆”不是谣言，而有“铁证”，等等。这种花样，我早在上海就亲身经历过了，所以并不

感到奇怪。何况，这个所谓《良心话》就是在香港绰号××将军以造谣为能事的《天文台》的再生。他不能不靠造谣来讨好主子，一开张就选中了我，倒使我有意外。据说，内地已有学生们接到通知，说我已经做了汉奸，禁止阅读我编的刊物或我写的书，有的学生为我写了“挽歌”，又有的表示了愤怒和憎恨。还有朋友写信告诉我说这个谣言是怎样散到他们学校里去的，等等。我这个新闻人物已到了不得不发言的时候。国民党居然造出这种谣言，太卑劣也太可笑了。虽然很难有人相信，但却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写了《死人复活的时候——给几个熟识的以及未见面的人》，公开地答复他们，“既然对于我底附逆‘该团’已获有确证’，那么，现在我回来了，站在这里，而且依旧是手无寸铁，他们就应该提出‘铁证’来请政府把我逮捕；如果不这样做，那无异侮辱我们底政府是存心包庇汉奸‘到处蒙混’的，铁血男儿的他们就应该发出抨击政府的声音。”

这篇文章用在新知书店改名出的《山水文艺丛刊》上，第一本就以它为名：《死人复活的时候》。这本书影响很大，但使得他们的第二本书不能出了，同时，《良心话》也停了刊。

记得我那时曾写过一首诗，后二句是“午夜徘徊闻吠犬，荒原阒寂有行人”。国民党以为战争有英美“代”打，它可以放心地推行特务统治反共反人民，但在看似枯寂的国统区（“荒原”），先进的人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人（“行人”）正在地下进行工作，准备开辟一个伟大的民族独立的新时代。

《大公报》副刊的编辑杨刚向我约稿。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他们的特刊一定要我写一篇。开始，我是想写一篇短短的杂感或散文的，谁知一写开头就动了感情，想到七七事变开始后我们所经受的一切苦难和艰苦卓绝的抗战，我怀念了全心全意奔赴前线的壮士们和他们浴血奋战的壮烈精神，后面我用有一只黑

手从背后抢去我的笔这一形象抗议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化政策。这是一篇散文，但我用的是诗节奏，因此我算它为分行散文体诗。发表后，在读者和朋友中引起了共鸣。

杨刚很高兴地来看我。我和她是在香港时认识的，不过谈话不多，只知道她是北平左联的盟员，曾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外文很好，有过译著。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觉得她有点傲气。这次，她和我很随便地谈了好几个小时，发觉我们对一些文艺问题和作品都有着共同的理解。后来她又约我写过文章，但都因主编先生不敢用，退了回来。

我到后不久，邵荃麟就告诉我，这里的党负责人是李亚群同志，并且约在他家见了面。我住定后，李曾多次来看过我。他是四川人，为人很平和，没有领导的架子。第一次在我家就做了从下午到晚上的恳切的长谈。从国外谈到国内，用具体例子对我进行分析，帮我了解当前的国内外情况。记得那天正刮着风，我住的是木板房，又朝西，风直往屋内灌。我们两人虽在冷风的袭击中，但我心里是暖融融的。又有一次上午，这时已是热天了，房子正被西晒的太阳炙烤，我拉上了窗帘，我们盘腿坐在床上。这次，谈的面更广了，接触到了文艺思想问题和当前桂林文艺界的情况，他表示很尊重我的意见。我们谈得高兴，都忘了时间。M本来是带着孩子在外面堂屋里看书的，这时，她走了进来，问我是不是做饭。这一问提醒了我们，亚群赶快拿出怀表一看，说，“我得走了。”我们坚决留他在这里吃饭，但他说改日再来，又说，“我善钓鱼，改日我钓条鱼来”，就匆匆地走了。事后我很责怪M，说她不该来问我，随便弄点什么给我们吃就行了，我和他正谈得兴趣盎然，你这一来多使我们扫兴！M很不以为然，她说，提醒我是想请他到外面小馆去吃一

顿的，但她哪里知道他是不能公开露面的。后来虽然又见过几次，但他一直也没在我家吃过饭。

这里还来了一个稀客，是在东京就认识了骆剑冰，由杜宣（桂苍凌）带来看我。自从武汉分别后，知道她进了新四军，后来听说她在那里搞得太特殊，呆不住，出来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这次见到她是一副贵夫人派头，衣着华丽时髦，她告诉我党派她到曲江去接从香港逃出来的何香凝。后来知道她和一位英国留学的高级工程师结婚，有两个孩子了。

常到我住处来的是熊子民。他住在我们进城去必经的六合路，离我很近。他到桂林已有一两年了，他告诉我主要是搞经济（替中共办事处）。他和这里的地下党有联系，所以有些情况有时就由他来通知我，如总理的指示和张友渔夫妇的一些话都是由他转达的。我还从他那里了解到一点社会上的复杂情况，所以在桂林我有事都愿和他商量。他忽然有一次向我提出，要我把著作版权都卖掉，和他一起做生意，将来到湖南乡下找一处安静的地方住下来，再写作。他还说，“你看，李鹤鸣（李达）就在湖南家乡搞酿酒事业，不必担惊受怕，逃难躲警报。”这话我没有细想，但我知道他是担心我在人事上总搞不好，不如退下来躲到一处去搞创作。他一直以长兄的态度对我，深知我不懂世故。但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只要能工作，能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从不后退的。

老聂也是常来的，从第一天在旅馆见面后，他就是我们的常客。不过，可能是因为我的住处只有两张竹椅，客来多了就只好坐在床上，加上下午西晒，所以他多半来约我们到七星岩下的茶馆去喝茶，同时可以和许多青年朋友见面。他这时的工作是《力报》副刊的编辑，实际上他并不认真地负责，都是彭燕郊帮他编。他自己总是在中午后就出来到处走走看看朋友。我

想同他认真谈谈，问他为什么从重庆又跑回桂林。我临离开重庆时，曾一再委托老聂要将《七月》继续编下去，并且还留下了够几期用的稿件，但他一期也没编，又到桂林来了。现在，国民党书审处以长期停刊为由吊销了《七月》的登记证。他对我拆的这个烂污可真不小，我回重庆后想再恢复《七月》就不可能了。我想狠狠地批评他，责怪他。但他只是默默不语，像无事人似的，最后说，“没那么严重吧！还可以编别的刊物嘛！”这种态度使我感到同他吵也是多余，他就是这么一种人！他在桂林和青年人的关系却很好，介绍给我不少这里的青年作者。

彭燕郊不知是不是和他一道从新四军出来的，至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一个对诗创作很有才华的青年作者过早地离开了实际斗争生活，令人惋惜。现在，他和老聂一样，浮在这温馨的可以自我陶醉的文化圈里，对写作失却了热情，还才刚二十来岁呢，太危险了。幸好他为人本质好，没有成为当时那么一种浅浮的油滑青年，还有着事业心。他介绍了广东籍青年学生朱振生（朱谷怀）和米军来看我。他们爱好文艺，筹了一点钱想办一个出版社，要我支持，主要是为他们介绍书出版。但是一了解，他们资金并不多，出一本一、二十万字的书就可能周转不过来。因此，我向他们建议，是不是出一套诗丛，先出薄本子的，慢慢地能周转了，再出大型的书。他们完全同意。出版社命名为“南天出版社”，先出一套《七月诗丛》。我是义务编辑。米军在他的住处开始出版社的业务。这样开支少些，全部资金都可以拿来出书。后来知道，米军自己就写诗，朱振生也是诗歌爱好者。我先给他们编好出的是艾青的《向太阳》、我的《为祖国而歌》、孙绍的《旗》、冀访的《跃动的夜》和阿垅的《无弦琴》。封面是请木刻家刻一方寸大小的图案放在左下角，中间用一条界线，倒也别致，省下了制版费。

伍禾是湖北同乡，老聂的朋友。在我到后的第二天就来看我，向我自我介绍。谈了几个小时，话题总离不开诗，看得出他迷恋上新诗了。对诗，他有着很新颖和尖锐的看法，还给我留下了他的一本诗集《箫》。看过后，觉得他写得并不好，但是在诚恳地追求着，如果肯下功夫是能写出点东西的。后来，他和老聂一道来找我聊天，我们一谈就是大半天。他当时在欧阳予倩的广西艺术馆工作，事情不多。没再读到他的诗了，他可能属于说得多而写得少的那类人吧！但他又很有个性，和老聂一样，有许多地方你是奈何他们不得的。

骆宾基也是常来我们家的朋友。他和我们一样，从香港脱险到桂林。还在上海时，就从萧军那里知道他们有友谊关系，是一个追求进步想从事写作的青年。在这儿是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萧红病逝的情况，他最后一个护理她看着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所说的萧红在香港沦陷后的那一段生活，真使我们听了鼻酸，几乎忍不住眼泪。多可惜的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后来，他们要成立萧红纪念会，曾来找过我。我一看发起人的名单，有罗曼·罗兰、珂勒维支、史沫特莱（还有几个外国名人，我记不清了）和他们自己的名字。我感到这样做有点不实在，表示了冷淡，后来就没有过问。似乎这纪念会也没能成立。听说，骆宾基为此对我有意见，说我对萧红太冷淡了。不过，我们对这个误解都没有在意，所以，在桂林他仍是我家的常客。他曾向我谈起他小时候跟着母亲在东北间岛垦荒办农场的事。间岛，在我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但他讲得是那么绘声绘色，那些中、俄、朝鲜人中的亡命徒的故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讲起故事，我们一家人都围着他，尤其是晓谷，听得更出了神。他成了晓谷老念叨着的好叔叔。

这时的桂林，由于从香港脱险来了一大批文化人，加之这

里用纸比较方便，尤其是浏阳的纸，价钱不贵，印厂又多，一下子它就成了大西南的文化城，随时都有冒出来的出版社和各式刊物。因此，我在这儿靠卖文生活就很方便，加上这里生活也便宜，除基本上能解决一家的用度外，还给留在上海的女儿晓风寄去了二百元。只要他们能收到，我再困难也要寄生活费去的。这时，桂林地下党给了我一笔不小的生活补助，我和M一商量，认为我们能应付，就将这款退还了组织，说明应留给更困难的人。此事给熊子民知道了，一次和我谈起，说我这样做是对的，领导人甚至说×××就没有这样做；地下党最近开销较大，过往的人凡有点关系的，差不多都得送点钱。

到了6月，廖庶谦提出要自己用这房子，我们当然得另找房子了。子民同意我搬到就在同路的诗创作社胡危舟家暂住。我们都知道胡的关系复杂，但他不至于害人，住在那里可能还有某些方便呢。

6月14日，迁居建干路17号之九诗创作社楼下。胡家住在楼上。我们住一间，客厅还可以共用。房子仍是木结构，已很旧。房主人只在后面留了一间，大约在乡下还有土地房屋，很少来这儿住。这楼上楼下五六间房，只我们几个人。《诗创作》的社长是本地人李文钊，广西省的一个少将官员，喜爱文艺，所以又是广西抗敌文协的会员。这儿的另一编辑阳太阳（胡拉来壮声势的）也是本地人，可以说是诗人兼画家吧。当时，桂林诗坛很热闹，诗刊销路也好，《诗创作》每期都能赚钱。这是很出我意外的。胡危舟是宁波一带的人，很会做生意，和书店印厂的关系都好，尤其是和书审处关系好，这可真是一大本钱。后来，南天有的书，就通过他拿去送审，通不过也不会被没收原稿。他对我很尊敬，同我谈到他的家庭和抗战初期从家中出走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情形，还和我谈到广东一带的诗人，他和蒲风很熟，

谈了一些蒲风的情况。他诗写不好，但爱诗，也弄一点诗，更大的才能是做生意，但又不甘心成为一个商人。当这种文化商人对人最合适，不过又为一些文化人看不起。我对他客客气气，有时还帮他看看稿，介绍稿给他，自己也给他写点，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

还在5月份吧，由抗敌文协出面，在广西艺术馆召开了一次“保障作家权益会议”。茅盾、田汉等都到了。谈到了目前桂林偷印书籍，不付版税，损害作家权益，应该清查等。有人还举出了用各种名目出鲁迅先生书从中渔利的例子。这样，就决定了先暗中调查清楚，然后再追讨版税。

此事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才有了点眉目。偷印茅盾书的书店查出来后，当场就解决了，封存纸型，补付版税。但鲁迅先生的书，那些书店却迟迟不理，总想躲赖。直到11月，才得以与严某交涉他们私编《鲁迅杂感选集》事。又查出了《鲁迅短篇小说选集》，即约茅盾到科学书店，证明是陆某指示店员所做。后又约茅盾等到文献出版社，查出《鲁迅杂文集》是文献出版社的友人车某的作为。我约了巴金、茅盾和胡仲持等来商定处置偷印鲁迅书的办法，最后决定，都要对方具结清算版税交出纸型。后来，我去找熊子民介绍的张耀南律师，他答应义务帮忙，就托他办理欧阳凡海《鲁迅的书》的版税事和鲁迅著作偷版事。

常常是，当你去查对时，对方就躲着不见。一次，我进城去追究陈某偷印《恶魔》事，他不承认，直拖到警察局，才写了字据。朋友们警告我说，某人准备在渡江的桥头打我。我就弄了一根粗手杖，准备和他对打。当然，他们并没有敢打我，倒是来和律师谈判和解，有的立即付款，有的写了保单。就这样地制止了胡乱“编”“选”鲁迅著作偷印谋利的有害风气。这已是1942年底的事了。

收到的款我都交胡仲持，请他存银行保管。徐伯昕路过桂林时特来看我，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这些私自编印不付版税的小老板，查出来都是你们生活书店出来的店员。”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会去教训他们，一定要严办。”后来，我请他设法将这些款转给许广平，他说如转不出去就买成金子。他到底如何处理这笔好不容易才追来的版税，我就记不清了，只是我在离开桂林时，还造了一份鲁著版税帐目，以后寄给许广平了。

大概在我们到这儿两个月后，广西的李济深、黄旭初开会招待脱险的文化人。我和茅盾、沈志远都去了。当场，主人代表在重庆的刘百闵表示了宣慰之意。两个月后，刘百闵亲自到桂林来了，沈志远通知我说刘百闵要请客。在这之前，熊子民就向我转达了总理的指示：只要不出卖灵魂，送钱可以接受，请吃饭也可以去吃。刘百闵在宴会上表示希望大家不要成为问题中人，应到重庆去插一炷香，自己的意见不妨牺牲，云。意思很明白，是督促我们去重庆了。

8月时，张铁生来，转达程思远特使邀赴重庆之意。留他谈了一些闲天。在香港时我就和他认识，原来他是留德的，并且曾和胡兰畦在一起。他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十分喜欢晓谷。M留他吃晚饭，那天正好炖了牛肉汤，M盛了一大碗汤给他，他吃得很高兴。这是一个厚道重情谊的人，后来我在重庆在上海以至在香港和他见面时，他都十分友好。听说，后来他的处境很孤苦，结了婚，妻子又因故死了。

知道自己是非去重庆不可的，并且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就准备早日将手头的工作做一安排，可以结束的赶快结束。主要是南天出版社的工作。南天只少数钱，一两个热情的青年，先出了几本薄的《七月诗丛》，谁知销路却很好，很快收回了成本，就又出了几本比较厚的。我继续为他们选编，有的被书审处通

过了，有的就不行。我的《密云期风习小纪》，本来已被广西书审处通过（被删去了五篇），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忽然来训令查禁了。鲁藜的《为着未来的日子》没能通过，后来我拿回来改名为《醒来的时候》，给审查官送了礼，才算是通过了。但是，杜谷的《泥土的梦》和何剑薰的一本讽刺小说就不但没通过，连底稿都没收了（那时还不知道可以向书审处的官们打通关节）。为了给田间重编《给战斗者》（原稿在香港沦陷时丢了），我和M去图书馆查旧报刊，好容易才收集到一大部分编成。这次倒通过了。而我找到自己一些文章编成的一本杂文集，却未能通过。值得高兴的是曹白的《呼吸》、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和《青春的祝福》都通过了。

《呼吸》好像是给了远方书店（新知书店），我为丁玲编的一本《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在那里出版了。我将易嘉（瞿秋白）的《解放了的堂·吉珂德》重编交贺尚华办的三户图书出版社出版了，稿费我交给了地下党。三户要我编一套这类的译丛，我给他介绍了周行译的《马丁·伊登》和石民译的《忧郁的裘德》。我将自己的译文集《人与文学》和评论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编好后，交给与书审处关系较好的出版社去送审，但都没能出版。

《文艺笔谈》是司马文森亲自来约的，那时他在国光书局当编辑。但订合同时又多方刁难，书店甚至说不愿出了可以拿回去。说实在话，他于三十年代在左联时，用日本女人的名字“平林杏子”发表诗，就使我感到他太轻薄，现在他长期在桂林，扬言他征服了桂林（文坛），对外来的文化人显得很傲慢，都是使我反感的。这次他亲自来约我的书，可又因印数版税等问题完全站在书店一面，更使我生气。我向张友渔同志反映了这情况并表示对他的做法不满。最后，书店总算屈服了，答应用好纸印五千册。

南天出版社最早的发起人之一米军已因别的工作离开了，换了一个他们的同乡陈志华，后来又请了一个会计廖君。虽然社里资产加多了，但活动资金仍是不够，他们就找了一个正在做生意的同乡李汉霖参加。本来开业时的股金多半由大学生朱振生拿出来，他是从他家给他的生活费中省下的。现在，李汉霖拿出了一笔股金。社里有了一个大股东，气也就粗了，决定出路翎的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青春的祝福》。

关于《饥饿的郭素娥》，有一段插曲我要说明一下。本来是易巩帮什么人办的一家出版社向我要稿，我将这书给了他，他们付排了。易巩亲自担任校对，校得很仔细，我只看了一下清样。排成后出版社没有钱办不下去了，由我出面将纸型卖给了南天社。因此，对于这书的校对和出版，还是应该向易巩表示谢意的。

由于住在胡危舟家，耳朵里听到的多半是谈诗，来访的客人多是诗人，来信的也多半是写诗的，桂林是诗人荟集之地，加之我又在编《七月诗丛》，所以我就起意编一本青年诗人集，取名为《我是初来的》。但送审被打回来了，批的罪名是“不合抗战需要”。后来，我改名《自己的催眠》，再送审，仍没能通过。最后，我还是为它写了序，即《四年读诗小记》，说明是《我是初来的》代序并作为《七月诗丛》的引言，发表了。另外，在这“听诗斋”里，我给青年诗人写过几封长信，还写过几篇关于诗的文章，这些我都收进评论集《在混乱里面》了。

我在桂林期间还为一些大型文艺刊物投过稿，如熊佛西主办的《文学杂志》(?)和张煌主办的《文学创作》(?)等。和熊佛西有过多次的交往。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搞白话剧的。我读过他译的剧本如《少奶奶的扇子》，但一直没有来往过。这次在桂林，田汉约我到他家去，田汉在他那里无拘

无束地闲聊，使我和他也就接近了。他说，有一个商人投资要他编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就向我约稿。我们都知道他和国民党的关系还好，送审文稿有些方便，我就将别处不敢用的在重庆应中苏文协之约苏联刊物写的介绍中国抗战文学的论文交他发表，但发表后一看，被删削得不成样子。当时还以为是上面搞的，其实也可能是他自己先删去的。总之，我就不再给他稿了。但他对我还是很好。不过，他在自己刊物上发表的长篇连载《铁苗》可写得实在不敢恭维。他告诉我，这是以他的朋友晏阳初的经历为根据的。说晏有改革农业的大计划，还在华北小规模实验过，因抗战发生停止了等等。但他只是把这些人物和事迹拿来拼凑成一个小说故事罢了。

一次，我和田汉、安娥在熊佛西家玩。他画了几个石头，安娥在石缝边画了几枝兰草。我即兴凑了几句：“君画兰，我画石，兰有芬芳石有志。啥子志？雨打风吹偏不死。”借以表示在香港受的艰险，再刺一下《良心话》，并透露我对国民党压迫政策的蔑视。他看了没说什么，只好在画旁填写上了。他选了一块好石头要李白凤刻了一个古雅的图章送我，并把他珍藏的好印泥分了一半用上等古磁印泥盒装好送我。李白凤我是认识的，他写过诗，我认为他的诗写得一般，但他对我很尊重。后来才知道他是篆刻专家。可惜我对于这种传统艺术没有任何知识，不过我还是常用这方图章，至今这印泥盒和图章还在。后来，熊佛西又找了一块更大的石头，托人刻了图章送我。我在石头旁看到“羽仪”两个字，可是我连这个人都不知道，熊也没有向我介绍。

我常去邵荃麟家，他当时是地下党负责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左联同事时就认识（那时他就和葛琴在一起了），在武汉他又给我来信并给《七月》投稿。我用了他的稿，我们两

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桂林又见到了，大家都感到高兴，我常去看他，有时就留下吃饭，谈公事谈私事态度都极友好。有一次，他来我家，和我谈到他的家庭，同时也谈了和葛琴的恋爱关系。可能是他知道我和华岗有很深的友谊，特来做点解释。那天，他在我这里吃了晚饭，谈到夜深才回去。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

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希望我在桂林主编一个刊物。和老聂他们谈起时，他们也有这个意思。正好我刚认识不久的陈闲同我说，有个刊物登记证可以给我们用。

陈闲是广西本地人。我到桂林后不久就主动来与我认识。他告诉我，他在某中学教书，还请我到他家去玩过。他家有世界名著的权威译本，可能他到过日本。我是把他当作左倾文化人看的。他告诉我，国民党内部消息顶注意的文艺界两个人就是夏衍和我。这和宋之的的前期在一次会上所说国民党内部通报提到我的情况相符。他曾请我吃饭，席间有广西的头面人物李任仁。我也没有问他这人的经历，为什么让我和他见面。他为人温文尔雅，常来找我闲聊，谈文艺问题或别的问题，都很说得来。还常约我上本地的小馆，但他和别人并不多来往。看来不喜欢赶热闹，也没见他发表过什么文章（可能是用别的名字，我不知道），知道他的人对他都很尊重。我和他就成了可以相谈的朋友。

这次他提出这个登记证的问题，很使我动心，因为由我们自己想弄到一个登记证是不可能的。登记证上写的是《文学报》，我就和陈闲一道去访丝文出版社的莫君，谈出版事。又很快整理出一部分稿子，并交去送审。不久，这些稿子通过发回了，这样，再送审一部分就可以出版了。但是，丝文出版社的何

君忽然来说，他们无力出版《文学报》了。只好另找出版社。后来，到底是哪家出的，就记不清了。总之，在我走之前我编好了第一期，还写了发刊辞《为祖国，为人生》。

算起来，在桂林一年，到我家来得次数最多的可以说是老聂、彭燕郊、骆宾基和伍禾。骆离我近，来的次数更多，高兴时吃过晚饭后还可以谈到深夜。他很喜欢交际。一次，他请巴金吃饭，也请了我，我才知道巴金已到了桂林。巴金介绍了他的爱人(女友)陈女士。她很和气随便，像个无邪的孩子，和我的晓谷玩得顶好，晓谷叫她“大朋友”，后来见面就都这样叫她。我为了办杂志事，曾去看过巴金，一次还约他在茶楼上谈了半天。他没有兴趣和我们合作办杂志，但他对我很友好，一次谈话中他还背出了我到桂林后写的诗句“荣枯缘底事，厉鬼笑封侯”。

骆宾基有时带着他新交的一个女朋友来。这是一位性情豪爽的姑娘，和M及晓谷很谈得来。她来后，M总要想法子弄点菜留她吃饭。后来知道她家在上海，就托她转了一千元给晓风的托儿所。我们给晓风寄去的钱那边都没收到，托别人去付钱也没有回音。这次的一千元，她告诉我已经交到托儿所了。为此，我们才放了心。在元宵节那天我们欢聚，应她的要求，我们几个人(聂、骆、伍等)打了麻将。

老聂常常和彭燕郊一路来。有时，彭先来叫我到七星岩去喝茶，老聂在那儿等着。喝够茶，再到我家吃晚饭。有时，他们自己买了菜来。老聂喜欢吃肉，尤其是猪肘子，而我喜欢吃鱼。反正他们来了M总会给我们做出吃的来，再喝上几杯广西的三花酒，但对老聂的这种生活，我还是看不惯，想和他谈谈。一天，他和小彭来我家，小彭看到我一脸正经的样子，就先溜了。我没让老聂走脱，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力报》的工作都

是小彭在做。你干了些什么呢？老和演员们在一起鬼混。还是回重庆吧！老周和孩子在等着你，你对得起他们吗？……”看着他那一副倒霉相，我也就不往下说了。最后，说了一句，“太为你可惜了。你应该多写点文章。”我虽然批评了他，他对我还很好，我们一谈起文艺问题来还是志同道合的。因此，我将《文学报》第一期编好后，就放心交给他和骆宾基、伍禾了。

胡危舟办《诗创作》赚了钱，自己买了一幢木制新式房子，在六合路北口，仍要我们一起同住。这时，程思远已代表重庆来催我们了。12月，茅盾夫妇动身走了。不久，沈志远夫妇也要走。我大概也不能拖太久。

一次，熊子民出事了。他约好见面的人被捕叛变，正预备到接头地点去捕他时，被他发现逃了出来，不敢回家，就隐蔽起来了。他夫人来告诉我，我当然应尽力帮助。但要我弄钱是没有办法的。她要我为她设法卖去家里的存货钢锯。我托了好几个人，都说没办法，后来还是找到了一个关系卖掉些。不久，知道他已到重庆，我们都放心了。

M在一次去郊外野游的路上给晓谷讲故事，木刻家温涛在一旁听了很感兴趣，甚至说可以编成木偶剧。她大为高兴，回来就写了出来。写到后来，却成了一行行的诗体童话。我觉得很新颖，就帮她修改了一下。这是她为怀念女儿而写的，起名为童话诗《小面人求仙记》寄给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发表后，很得读者的欢迎，听说穆木天就向他的朋友们介绍过。后来，我们又将它自费出版。温涛高兴地封面刻了木刻，书名是晓谷写的。交给三户图书社代售，贺尚华特别帮忙。一个月后结了书款，正好够付印刷费。

一次警报时，我们一家三口干脆到城郊去看艾芜，同时也看看和他们同住的穆木天夫妇。我从离上海后一直没有见到过

他们。大家见面很是高兴。警报一直不解除，结果在艾芜家吃了午饭，直到傍晚才回来。后来M和我说，看来穆木天并不像是多奸诈的坏人。我说，“是呀！只是太糊涂，不知道自己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天回家后发现我们出门时晒出的一条新床单和一件衬衫被偷了，这对我们可是不小的损失。

我到桂林后，和田汉相处比在重庆时更为友好。他在桂林戏剧界极有影响，常约我去参观看演出，参加座谈会。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到离市区十余里的桂岭师范学院参观。这学校原名特种师资训练所，专收少数民族学生。学生们为我们表演了几个节目，唱了侗歌和陇东瑶歌，跳了民族舞蹈。有一项吹树叶，其音律有如客家情歌，在岩间回荡，甚是优美。

还有一次，他约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连主人的姓名我都不知道，共去了一二十人。主人杀了一条狗祝贺他生日，原来他是属狗的。

他本人也好请客。湖南饭馆陶园酒家离我们很近，他常在那里请客。只要是戏上演了，或者别的什么得意事，他就请客，也总要约我们去。他的一些戏剧界的人对我都很友好。我离开桂林前的一两天，他还为我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一起交谈了关于某些具体文艺问题的意见。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以左翼关系互相友好地交谈。

知道我要走了，在香港就认识的演员舒强来看我，谈了很久。第二天，他却带了画夹子来说要为我画张炭画像。不到一两个小时就画好了。我很喜欢，认为画得不错。在这之前，同居一处的阳太阳曾为我画过一张油画像，我觉得画得太正统了，没把我的气质画出来。后来，余所亚也给我画过一张铅笔画。余是搞木刻的，《七月诗丛》的封面设计和木刻常请他义务代劳。他人很热情，虽然腿残废，可喜欢走去看朋友，有时也到我这里来，还

喜欢请客吃饭。知道我要走了，特约我和伍禾去照了一张相。

年底，曾和胡危舟一家到阳太阳乡下的家里去参观他们那里的祭神节。阳家在离城里不远的乡村，位于磨盘山下之相思江边，是一美丽而安静的地方。由于是殷富之家，房子很大，他的母亲和嫂子都出来招待我们。这天是三年一次的祭神节第一天，有“舞神”（演神、跳神）之典。是以双笛、鼓、腰鼓伴奏的神像假面舞，可以称之为最原始的戏剧。此外，还有“唱调子”，比湖北的采茶戏还简单，只两个人对唱，但也已粗具戏剧的色彩了。阳太阳告诉我，其中一个唱调子的，眼睛几乎瞎了，但他表情很有风趣，不说是看不出来的。晚上，我们全都留宿在阳家。第二天上午又玩了半天，天气阴冷，下午就回城了。

文工会给我寄了一千元来。我和M进城到旧衣摊上选购了几件衣服。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在旧衣摊上买的，做新衣做不起，也没这必要。这次还买了一床大红毛毯，另外又买了一本日文的《哲学辞典》。伍禾为我买到一本《辞海》。

我一边托人买去重庆的车票，一边到留在桂林的朋友们家中去辞行，还和南天的同人合照了一张相。3月12日，我们先搬到环湖酒店暂住。14日晨，由伍禾及南天李、廖二君照料，登车离开桂林赴重庆。

从1942年3月6日到1943年3月14日，在桂林住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上也还算顺利。

最后，我要为给南天出版社编的《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做个简单的总结：

1. 东平的小说、《向太阳》、《为祖国而歌》、《跃动的夜》和《呼吸》前半部等——表现了抗战初期广大人民和下级官兵对民族敌人同仇敌忾的气概和壮烈牺牲的英雄主义。那和国民党转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倒退现实情况在纵的方面成了鲜明

的对照。

2.《醒来的时候》、《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队长骑马去了》等——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灯塔(共产党)的伟大影响,在党和八路军领导下广大北方人民抗日和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伟大业绩,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高贵品质和牺牲精神,那和国民党反动路线统治下的黑暗腐败现实在横的方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呼吸》后半、《旗》等——表现了党和新四军领导下的南方广大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正在艰苦条件下争取开展和前进,那和国民党不改欺骗压榨人民政策下的混乱的悲观的现实也犬牙交错地成了鲜明的对照。

4.路翎的小说和国统区诗人们的诗(最可惜的是,何剑薰的一个讽刺国统区落后人物和揭露黑暗的小说被书审处没收了)——表现了国民党统治下广大人民的不满与疾苦,等于是向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路线提出了不指名的控诉。

这些作品大半在以前发表过,但现在由我编了再印出来,不但意义犹新,甚至作用犹新,而且结成了一股合成力量。当然,和时代的巨大内容相比,这点力量是微弱得很的。但在国统区的文艺领域,虽然在具体主题上不是少见的,但在全面性的配合上却是仅见的。这些作品里面自然也会包含有错误内容,但在当时,对“团结、进步、抗战、为人民”的大目标是不会起到什么副作用的。

我自己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一点文章,也都是出自这种心情,但只能曲折折地透露出来。我遵从党的指示,谨慎地不给国民党制造破坏团结抗战事故以任何口实。一方面,应酬敷衍了他们;另一方面,利用出版的有利时机,组织出版了这些书。

这就算是我对桂林的贡献,也是我一年的工作。

七 再返重庆

上 篇

1943年3月14日，我们乘上了从桂林去金城江的火车。1941年是从宜山坐火车到柳州，现在返回时总算前进了一步，可以到金城江了。但时隔两年，铁路线只增加了五、六十公里，说它蜗步也不为过。

金城江是一个新建的城市，旅客居然可以住进铁路饭店了。它是砖瓦结构，比一般小旅馆的房子亮堂干净。我们一家占了一间。为了找去重庆的车子，我跑了一天，第二天下午才搭上了中国运输公司的客车。当晚宿于河池。19日下午二时到贵阳，宿于法院路太平洋饭店。一路来的情况，比两年前好多了，至少坐的是公家的运输公司的车，住的是他们为车子开设的旅馆。

贵阳也比两年前繁华。我特地到大街上走了走。在商务印书馆购得数册书，这都是在桂林时没能买到的。记不起谁给了我一介绍信，就去访问了贵州印刷所经理崔××。他留下吃午饭，同席者有贵大教授陆君，谈到贵州有许多特殊的小民族，他们的风俗很有趣。因此，我又去文通书店购得他们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民歌民俗等书。其中有些都是口头韵语，由专人记录下来的。

购得了隔天赴渝的特约交通车票。

一大早上了车，这是对号有座位的。但走不多久车就坏了，

只好停下来修，几十口人在大路上站着看司机修车。好容易可以开了，上去走不多远又熄火了，又再发动。这车是木炭车，以烧木炭的蒸汽来带动车，所以不仅走得慢，还容易熄火。好不容易走走停停，深夜里才总算赶到了遵义。

遵义有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朱企霞。我们曾一同到北京进北大念书，后来又一起去日本。他在日本只呆了一年就回国了，仍回到北大，是真正的北大文学系学生。他来信说在这里办了一个补习学校，很是兴旺。这次我既然路过这里，又差不多十年没见面了，很想去看看他。正好司机发了话，“车子要检修，上午走不成。大家可以进城去，下午二时前一定要回来。”

旅客们一听这话，一下子就纷纷而散，我也就带着M和晓谷按地址去找朱企霞。很快就找到了，门口有一枚牌“××补习学校”。这是一处旧式的大院子，前面一个大厅做教室，两旁的两间房算办公室，那大厅里放满了课桌，总有四、五十个座位。我正看时，外面走进一人，高个子绸长衫，正是十年不见的企霞。他除了略显苍老外，仍是那么潇洒，一派名士风度。他见到我很吃一惊，问明情况后，就转进了办公室。一会儿出来拉着我们往外走，说，“难得在此重见，我带你们去大街上看看，痛饮一杯。”

这条大街从头到尾，热闹处不过一、二里长。我们先到了我的住处，又随他去到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在楼上雅座坐下后，他告诉我，这学校在县里很有名，因为是北大师大的同学合办的，本地学生慕名而来的不少，他教国文，有时也教英语，收入颇丰。他又感叹说，“现在一家五口，再也不敢想迁到别处去了。这里不但有碗饭吃，还多少有点自由，至少可以不必拍上司的马屁，何况赚钱还不少。”

这位过去的少老板，从来没愁过钱。在北京时喜爱的是周

作人的作品，还和废名是好朋友，虽然不能跻身于京派，可是一个道地的京派作家赞赏者。讲究闲散飘逸，读读中外古今文学书籍，写的散文很美，可又不常写，难得见他发表一两篇作品。和我同学时还写小说，并在北新书局出过一本《孪儿集》。他是能写的，就是懒散，一切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肯下苦功夫，所以作品也就不多。闲来拉拉二胡，照照相，典型的一位讲究舒服生活的阔大学生，费力的事不喜欢的事从不做。而今却吃起粉笔饭谈起教书的生意经来了，真不能不说是抗战带来的改变。

吃饭时，M问他，“你的二胡还在吧？”1934年他来上海时特为我们演奏了二胡曲《良宵》，他曾师事刘天华，所以二胡拉得很好，大开了M的眼界。这时他却说，“二胡早丢了。开始逃难时，我还将琴箱带着的。从江西逃出来，有一次汽车爬山，车几乎翻了。我检点行李时，一生气，就将它丢到山沟里去了。”说到这里不胜感叹，“唉！现在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玩它啊！老婆孩子这一大家就够我忙的了。”

吃完饭，我们分了手，彼此都很惆怅。

汽车修了一上午还没修好，最后说烧炭炉已坏，一时修不好，今天走不成。我带着一家又到了街上，买了一块油布，还买了些点心，来到企霞家。见着他娇小瘦弱的夫人和三个孩子。大的不过七、八岁，他们一排站着，睁着和父亲一样的大眼睛望着我们。他们大概住了三间房，不过家具很多很乱，朱企霞告诉我是去昆明的朋友寄存在这里的。我和他谈了过去的朋友和他目前的生活。原来他已有七、八年不写作品了，甚至说再也没这种心情了。我很难说他这是进步呢还是自暴自弃，总之，他是被家累拖得很苦，再也写不出过去那种散文了。他留我们吃晚饭，实际上，他家基本上不起伙，是在附近一家饭馆包饭。

他去打了个招呼，多添了饭菜。和他们一家人过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他们送我们到门外时，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

自此一别，一直未再见面，谁知这位很重友情的老友在1955年我出事时，可能是怕受我的牵累，居然说我曾写过反共文章，从而给我的“反革命”提供了材料，从背后杀了我一刀。这当然是由于受骗或害怕不得不如此的。到了1957年，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处境甚惨。我一点也不怪他，因他有一大群儿女啊！

在路边上车时，遇见了塔斯社副社长诺米洛次基，他和桂苍凌是昨天到这里的。傍晚，停车于松坎，与诺米洛次基同住一旅馆。我引他到背街看我去香港路过这里时看到的红军标语。

早晨，车又上路了。一路上摇摇晃晃地，常常熄火，司机和助手就得下来敲打一阵子，又再向前走。到了上山时，颠簸得十分厉害，我们直怕它会翻车。伸头向山下望去，一路来山沟里留下了不少汽车残骸。M紧紧地拉着儿子的手，我心里也有点惴惴然。看看全车的乘客，连那个一直在高声喊叫的大兵这时也哑了声，紧张地望着窗外，大家都感到好像大难要临头似的！

一步一退地爬到一座山头，车子再也走不动了。司机跳下车并告诉大家，“不走了。”这倒使大家都放了心，高高兴兴地站在山头观看四周起伏的群山和即将落下的夕阳，有说有笑，心情十分舒畅。那大兵说，武二爷当年打虎若是来到这种山，遇到的老虎一定不止一个。于是，晓谷就在山上大讲起武松过景阳岗打虎的故事来了，同车的人都围着他听。天快黑了，山谷中传出“呼呼”的叫声，真有点让人害怕，可别从哪个山头跳出一只虎来。这时，大家才想到应该赶快离开这里，都慌忙向司机打听车子的情况。总算在天还未全黑时，前面派来了救援。是一辆大卡车，用钢丝绳将我们拉下了山。九时许，才到了四川境

内的最后一站蔡江。

原车再也不能走了，改乘货车。车无缝，围着油布，上面张伞以遮太阳。一时半至海棠溪。往江边走时，路遇从渡船下来的向林冰，他告诉我文协正在开年会。我带家人先到新蜀报馆，让M母子在那里休息，自己去文化会堂开会。赶到会场时，会刚开不久，满屋的人。大家见到我都很高兴，邀我讲了几分钟的话。见到了老舍、乃超和从香港回来的乔冠华等。

散会后，陈白尘陪我出来到石板街扬子江旅馆，那里还有一间小房。我遂回到新蜀报馆引M和晓谷来住下。不久，梅林、以群来。

第二天一早，去到天官府，算是报到和看朋友。遇见茅盾、乃超和郑伯奇等。我与乃超一起去看了郭沫若主任。出来时，我和乃超说，“请你见到周副主席时代我问好，约个日子我去看他。”

乃超却说，周副主席正忙，还是先拜拜客罢。他说我在曲江打电报给老舍说已脱险（而不是通知文工会），这件事做得真好。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商量了一下，确定了“拜客”对象：冯玉祥、邵力子、张道藩、潘公展。好像没有张治中，大概因为我是文工会的委员，算是他的下属，不好用“拜客”的形式去见他罢。

（脱险到桂林后，因为国民党派人来“慰问”，周副主席带话指示，“只要不出卖灵魂，请吃饭可以去吃，送钱可以接受。”当时我的体会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党对国民党的态度更慎重了，避免使它得到制造分裂事端的口实。现在看冯乃超的意思，我还是这样体会的。所谓“拜客”，是对国民党“慰问”的回礼，表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愿意和他们见面交际的意思。这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增加国民党对处境困难的文工会的戒心。我的这一点

体会使我以后在遇到的国民党关系中采取了应付和相机利用的态度。)

去看他们是尽个礼，如果不在，留个名片，那就更好。记得邵力子、张道藩在家，冯玉祥和潘公展没有见到。

第二天或第三天，不知谁帮忙找到一家更好的在夫子池的治荣公寓。阿垅和路翎找来了，随便谈谈别后，就一道出去吃晚饭。向林冰也找来了，告诉我他已结婚，对方是河北老乡，过去曾见过，经人介绍双方都很满意，现在已有了一个小女儿。他一定要请我们哪天到他家去吃饭。

我同M去拜访郭沫若夫妇，又到了文协。外出中，刘百闵派代表熊自明来，留下了蒋介石接见来宾调查表。

老舍向我建议，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如暂时到文协的办公室住下，如何？我想，反正是暂住，那里会客和吃饭都方便，就答应搬去了。当天开常务理事会，简直就像在我家开会似的。会后，蓬子请我们吃饭，有老舍等。

一两天后，潘公展坐轿子爬上张家花园文协来回访。我们因在夜里看杨村彬的《光绪亲政记》睡晚了，这时还没起来。梅林引他到楼梯下的小屋休息，我们起来后才请他进来。M和孩子正在收拾屋子，那狼狈相可想而知了。但难道不是他们这些文化官使得我们生活困难无处安身的吗？

客气了几句后，我请他发还《七月》登记证，但他说，这是照条例规定的，你重新登记一个吧。他这样“屈驾”，当然是怀有黄鼠狼向小鸡拜年的苦心的，当时的情况大家都看见都知道。后来，我为再登记刊物和出书审查通过事受到留难，曾去找他力争。这些情况谁知到了1955年都成了问题，我被捕后，为了追问我和潘公展的关系，审问了不下百余次！

和向林冰约好到了他家去。他在刘百闵主办的中国文化服

务社任编辑，我知道这都是为了糊口。他落到这种地步，也可说是万不得已了！他的夫人是一个善良的北方妇女，还有一岁多的女儿，家庭生活看来是美满的。向林冰亲自为我们做面条吃。可惜他忘了我们是南方人。他那么使劲地揉面，又加上了鸡蛋，应该算得上是很地道的面条。但我们一家只吃了很少的一点点，因为它实在太硬了。这使得他很丧气，说，“我特地为你们显显我的手艺，谁知砸了锅。”他夫人笑他，“你自己爱吃硬面条，就以为别人都同你一样。”我们都哈哈笑了。倒是他夫人做的鸡蛋汤我们还吃了不少。那天在他的新居过得很愉快。

饭后，他很为难地向我提出，“是不是去看看刘百闵？他如知道你来我这儿，不到他那儿去看看不好吧？”我恍然大悟，一口答应了下来。冯乃超向我提出“拜客”时，不知怎么就落掉了他的名字。这可能很使他难堪，也许向林冰吐露过，向林冰就趁这机会向我提及以弥补一下。因此我就由向林冰陪着到文化服务社编辑部，看了刘百闵，稍坐了一会。

下午，我去看沈志远，他们早已在重庆安居。夜晚，是钱纳水父子请吃晚饭。钱住在一处古色古香的高级楼房里，风景甚佳，这当然是国民党为他安排的。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都在身边。大儿子家煊，我在武汉办《七月》时，他曾在印厂帮忙校对。据说他在钱参加大革命失败流落在外时，曾在印厂当学徒。现在他似乎进了中央社当记者，看来钱是被国民党拉过去了。吃饭时，邓初民，潘白山（张定夫的夫人）也在座。钱家还住着一个同乡张（？）太太，是她为我们烧的湖北菜。大家吃得很满意。

饭后出来到广播大厦听育才学校的音乐会。这些在抗战初顶多十来岁的孩子，现在也不过十四、五岁吧。我虽不懂音乐，但觉得演奏得很像样儿，这应该说是贺绿汀培养教育的成绩。后来，我还看过一次育才学校演出的《小主人》。

在国泰戏院看了《金玉满堂》，还看过陈白尘的《石达开》。主要是想对当前的话剧多了解一下。看过巴金的小说《家》后，又找到曹禺改编的《家》看。后来，还找来法国作家巴大叶改编的《复活》仔细地读了，对当前的话剧和改编名著的剧本有了些看法，但要写成文章，还得花大功夫。

刚住进旅馆时，路翎和阿垅来看过我。后来，何剑薰也和他们一道来了。他还是老样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仍在外县的中学里教书，总爱讲他捉弄校长和同事的故事。可惜，他的讽刺小说被桂林书审处没收了。我告诉他时很是抱歉，希望他能有底稿，整理后交给我在重庆送审，争取出版。但他似乎毫不在乎地说，“算了，这不算什么。以后我还要重写，把他们写得更出丑可笑。”说完，他眼睛向上翻着，独自“嘿，嘿”地笑了起来。

在《七月》上发表过长诗《突围令》的庄涌来看我。他已经不像过去了，似乎很老成持重。同时，他写的诗也显得做作和拘谨了。因此，我后来就没再用过他的诗。他住在家里，姐姐要他读大学（姐姐是一个女政客），他反抗，还是一心想搞文艺，可见文艺对青年人有时会像鸦片似地上瘾，但跳不出这个“瘾”字，是写不出好作品的。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成绩上，还是要学习要深入生活。

一次，阿垅陪同一个青年来看我。原来这就是化铁。看去只十七、八岁，显得很聪明腼腆。阿垅对他的诗很欣赏，说他思想敏锐，对诗有特殊的感受。

我到后不久，乃超曾带鹿地到旅馆来看我。虽然几年不见，但他除了对中国的官场更熟悉更能应付之外，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

既然我住在城里，就常到文工会去看看。一天，在文工会

遇见鹿地，请我吃了午饭，又一道回文协谈天，到下午才走，并约定第二天在文工会给他当翻译，他要向文工会的同人报告敌情。几天以后，他又拉我去英大使馆为他讲日本经济问题的报告当翻译。我很奇怪，我这两年不在重庆，他就没有找到人配合他当翻译吗？

去到50号，见到了徐冰和张友渔。后来又特去看了陈家康，还到《新华日报》去看华岗等人。他们对我都很亲切，我和他们谈到香港和桂林的情况，他们告诉我目前重庆的情况，我也就心中有数了。

乃超为我约定了见周副主席的时间，但见到周副主席时，只简单地谈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没有把在香港的工作情况详细向周副主席汇报。我以为，既然我的回重庆和回来后的行动都是在党的指示下做的，不会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几天后，周副主席还请我们全家去吃了一次晚饭。

周副主席在郭沫若主任家召集了一次从香港回来的人们的聚会。在会上，我谈起夏衍在香港的一些作法。虽然没有指名，但谁都听得出来是指他。一直对夏衍有意见的茅盾此时却一声不吭，唯独我才毫无顾忌地将看法都说了出来。周副主席真是大政治家，不动声色地由我说去。

路遇乔木(乔冠华)，一道去喝茶。谈到我在桂林写的文章，他觉得我是在不顾一切，意即，我批评了错误倾向，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谈到整风，我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他表示了同感。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思想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

回重庆后，国民党方面是以张道藩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为主人来招待宴请我们这些从香港脱险的作家，安抚我们，还

以这名义送来了补助旅费三千元。

住在文协无法工作，只是忙于会客。并且，各方面的客，只要是来文协的都有机会见到，并都得应酬，因为这里本来是会议室嘛。能做的只是编了三部稿，我自己的两部，路翎的一部。亲自交潘公展要他通过。此外就只有抽空看看小说，读了方于译的《可怜的人》（即《悲惨世界》），到常和华（冉阿让）逃入修道院为止。

给桂林友人和南天出版社都写了信，还给在延安的友人写了信。这时，收到上海孙铭搏（曹白爱人）的信，告诉我们朱子懿已离开托儿所去了杭州。这可是个坏消息，因为晓风进托儿所就是因为有她在那里。现在她一走，晓风真正成了孤儿，连保护人都失去了。（后来才知道，朱子懿的离开，就是因为她保护了这父母不在身边的五六岁小女孩。想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居然这样干！）

吕荧自鄞都来，他已将普式庚的《欧根·奥涅金》译完，要我从日译本为他校对一次。由于他急于回去，只得赶着译校。第二天他来，当面和他商讨了一些文字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日译本有许多可取之处，解决了他的疑难，很是高兴。

到这里已快两个月，想在城里找一处可以安身的房子看来是无望了。过去重庆邨的房子，又已给隔壁姓张的军人（现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霸占。天热起来了，住在文协办公室终非长久之计。我同M商量，她同意住到乡下去，这样对晓谷的身体也有益。乃超他们一直劝我到赖家桥去住，他们的眷属就一直住在那里。于是，我决定先下乡去找房子。

去赖家桥的长途汽车，一天有好几班。这天下午二时乘车到赖家桥后，先到乃超家，见到同住一处的杜国庠、绿川夫妇、蔡仪、应人等。与乃超一道去访池田幸子，她较两三年前已略

见衰劳之相。又去看了卢鸿基，他仍因肺病卧床不起。晚上宿于乃超家，与他夫妇闲谈至十二时。

第二天，乃超带我去拜访阳翰笙，可巧在路上遇到了，就一起去访郑伯奇。我们一同到永兴场吃午饭。这是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据说每逢赶场还很热闹，老乡拿来卖的东西可以摆满全街以至场口，是这里唯一的集市。我在池田家吃了晚饭，与她闲谈至深夜，留住在她家。

第三天，会同乃超和约好的荆有麟一起去看房子，看了几处都不合用。荆有麟早年在北京曾和鲁迅有过来往，在路上，他和我谈到老头子（鲁迅），又谈到郭沫若，很有点不平之意。我没有理他。（乃超曾告诉我，荆是国民党介绍来的，有人疑心是安排的坐探。他不常回赖家桥，但来了就说一些丧气或恐吓的话，有人骂他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我只同他有这一次交往。后来，姚蓬子出了他的一本色情小说《小红》，被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弄得姚很难堪。）

和乃超又到池田家，鹿地已回来。他们建议我将他家旁边旧反战同盟的房子修整一下住着，由文工会派人来打扫粉刷。此事只好再商量吧。最后，他们送我至车站回城。

我不在家时，周颖正好从北温泉进城来访，就寄居在此。我们谈笑至深夜。她现在负责几百名孤儿（难童）的生活和教育，看去干得挺不错，兴致很高，是一个出色的妇女工作者。

收到雪峰信，得知他已脱险即将来这里。

5月11日，徐霞村来。此人是留法学生，曾译过一部法国小说（书名忘记了），和张道藩是留法时同学，现在文化运动委员会工作。听说他抽上了鸦片，先从家里偷东西卖，被老婆赶出了门，后来发展到偷朋友家的东西，所以别人见到他都敬而远之。他这次来是通知我，最高当局约定星期四下午接见，旋即将张

道藩的书面通知和一张表格留下，就走了。

高兴的是收到了朱子懿从上海寄来的信，并附了晓风照片两张。孩子长大了，看去身体也还健康。朱信上说，青年会很势利，望我即设法寄钱去，顶好能为孩子找到一个保护人。后来因此事我去找过邓初民，因他和托儿所主任的姐姐相熟，想托她去信给妹妹，望对晓风加以照顾。此外，也就没别的办法了。寄过钱，也托人带过钱，但看来他们那里都未收到，只收到过桂林王珩代转交的一笔钱。只好千方百计为孩子找一个可靠的保护人。

5月13日下午三时到中宣部会齐。有茅盾、我、沈志远和钱纳水(有人说共五人，但另一人我记不起来了)。张道藩引我们乘两部汽车到上清寺某巷蒋的住处(?)。是个别接见。张道藩招呼我进去后，轻声地向蒋说了些什么，当是介绍姓名吧。握手后，坐在和蒋隔着小圆桌的单人沙发上。张道藩在靠着蒋的那边长沙发上坐半边屁股，手上还拿着一小本做记录。蒋介石先问是什么地方人，懂哪种外文，在哪里留学，等。我说：“在日本留过学。”他说：“是帝大？”我说：“是庆应。”他“噢”了一声，停了一下，说：“庆应是名牌大学啊！好的，好的。”又问我对日本的想法。我回答的大意是，日本是外强中干的，以体育为例，球赛吸引着青少年像着了魔似的，但那只能使他们不关心政治，达到愚民教育的结果，在愚民教育下的国民，虽能被反动政治玩弄于一时，并不能使反动政治最终达到目的。他听了没有再问什么，接着，轻声地说了一句：“为国家，啊……”点点头。我以为到此就完了，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再握一握手，我转身走了出来。总共不过两三分钟。

这件事其实是无聊的应酬，但因为客观上重视，我想说明几点：

1.我完全当它是无聊的应酬，所以事先既未重视，也毫无准备。

2.我为什么提到体育呢？因为过去曾听说过他的“新生活运动”，被他突然问到日本时，记起了日本的体育风气，一瞬间想借此刺他一下，就脱口而出了。同时，也是为了说明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是脆弱的。

3.张道藩引我进去向他轻声介绍姓名时，我看他的表情似乎有点迷惑，像一个老太婆，气色是灰暗的。这可能是从我自己政治上的无知产生的错觉。

4.沈志远是先我进去的。他出来时，腰一弯，双手一抬，一脸笑容，低声但却兴奋地说，“哈，满脸红光！”但我见了以后，印象却完全相反，可能是由于对沈的反感吧。后来，听茅盾说，他问到茅盾对《中国之命运》的意见，茅盾欠身回答，“委员长主持百年大计……”我听后也有反感：怎么能这样说呢？今天看来，茅盾的回答是聪明的。

我当时的心情是：他是统治者，我只是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在这个原则下，他问什么我答什么。不但没有想到说恭维的话，连谦虚的表情也做作不出来。

愚蠢的是，后来对周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我只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老太婆。”自以为其余的情况和心情可以不说了，其实我是应该向党汇报具体经过的。由于自己的自信和无知，十几年后又成了审问的重点！

5月下旬，这里就开始了空袭警报。由于警报和炎热，促使M下决心早日下乡，不再找房子就在鹿地家偏屋暂住。于是，她要我陪同一起上街购物。幸子进城时，还当面邀请M住到乡下去。几天后，鹿地带他女儿晓晓进城，她已四、五岁了，晓谷陪她玩，在一起倒还和谐安静。第二天，幸子回乡就将晓谷和

晓晓一同带走了。

我在书店里看到刚出版的《文学报》，几天后，忽得伍禾来信，说《文学报》已被桂林书审处吊销了出版登记证。在这之前，严永明就来信说过去谈好的出《文丛》之事已不行了，因为出版社发生了问题。看来，桂林出书出刊将困难起来了。

6月6日，听说雪峰已到此，住韩侍桁家。即去看他，谈了一个通宵。他对《七月诗丛》有不凡的评价。谈起他写的诗稿，要我看了给他提意见。谈到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时，都有同感。这是分别六、七年后的第一次畅谈。这段期间，我和他是有隔阂的，我对他的一些做法不同意，他又无力说服我，所以就很少往来，直到他回乡我到武汉，从老聂和邵荃麟信中知道他对《七月》很欣赏。他被捕出来是荃麟告诉我的，我写了信并寄了一套已出的《诗丛》给他，表示慰问。这次见面从外表上可以看出他在肉体上受了许多苦，苍老多了，但在精神上却比过去显得沉着，没有了过去那种凌厉之势，所以在重庆时期，我们又成了可以相谈的朋友。

决定住赖家桥后，我即去向政治部交涉车子运行李。但要等好几天才有车，M不放心晓谷一人在那里，急着要走，只好买票让她一人先走。

我仍住在客厅里，忙于还信债。写了一封长信给蔡月牧，另抄出一份题名《关于风格——其二》，准备出刊物时用。

6月11日，搭政治部卡车下乡，搬入鹿地住宅的偏房。共三间，只一间可用。看到晓谷和晓晓，幸子和M相处得还好，就决定暂时安住下来再说了。

下 篇

我们在赖家桥住下了，这是政治部第三厅旧时的反战同盟的房子，本来是专给有反战思想的战俘住的，不知何故解散了。现在是，正屋三大间由鹿地一家住着；楼上几大间文工会用来当女职员宿舍，现由白薇住着。我们住的是东面楼梯下的两间小屋，一明一暗，中间有一小间为通道。明的那一间有前后窗，做我的书房，暗的那间只有一面朝西的窗户，就作为卧房。两间各有十二、三平米，在我很觉宽裕了，只是烧饭要用煤灶，M不会，她想以后换个烧柴的炉子。

这时，鹿地家的勤务兵走了，没人做饭，一家四口狼狈不堪。M只好担起了这责任，主持大家的伙食，文工会临时派了一个勤务兵帮忙做点杂务。M对池田的热情，我觉得大可不必，陷进这种家务事里太伤脑筋了，但M说：“我是想帮帮乃超的忙，要不她们大小事都去找冯科长，他太辛苦了。”她去金剛村看望绿川夫妇和乃超夫妇时曾听他们说到一些池田麻烦乃超的情况，的确，乃超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既然她愿意多少尽点力，也就随她去吧。

幸子拿给我看她在听到我“死讯”后写的《纪念胡风》。我们住进后，她对我们表示十分热情，所以我们虽然备办好了厨房用具，也一直没有另起伙。

住了不到一周，冯乃超从城里托何秘书带信来，要我火速进城。下午赶进城住在文工会，原来是第二天晚上张道藩要请客，同时文工会也要为某人举行饯别宴请，是送谁，到哪去，都记不清了。

到文协，遇见洗群，对他的剧本说了些批评意见。此人很

聪明，在武汉时曾创作过一个哑剧，约我去看过，效果不错，后来我在《七月》上发表了。但这多年他没有创作什么，这篇也显得浮些。我不客气地说了，他态度很谦虚，表示了接受。

又去50号访徐冰同志。和他谈到文艺界，谈到仍想出刊物，又谈到张道藩请客事。最后告诉他，社会局有新的规定，新登记刊物得要三万元的保证金。我到哪去找这三万元？他说，可以找胡公（即周副主席），他会有办法的。

这次张道藩的请客不同往常，客人主要是我们几个，似乎是增加了老舍和雪峰，此外就是他们文运会的人了。张道藩应酬了几句后，忽然，陶希圣进来了。张将他一一介绍给我们，当他走到我面前时，张介绍说“胡风先生”，我们两人对视了一下，都没有说话，客气地握握手，就走开了。

我还是在大革命的1927年认识他的。那时，他是邓初民的《武汉评论》的主要撰稿者，我是校对，常去向他要稿。他是湖北某县的土家子弟，书读得多，很有才华，当时是国民党左倾的作家，我相当喜欢他的评论文章。后来我从武汉逃到南昌，他帮我找到工作，使我有了栖身之处。抗战前期，他在北平还表现得很左倾，成为十大进步教授之一。抗战时在重庆，他曾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但后来他飞了，说是到汪精卫那里去了，接着就成了国民党政界的风云人物。现在，他可能是以蒋介石特派员的身份来和我们见面的。因为，他在讲话中以蒋的名义向我们提出了文化上的要求。话虽然说得婉转，但大意不外是要我们听从他的命令，维护他的党国。大家都很冷淡，没表示什么。最后，还是由他们自己人说了一通肉麻的话而收场。让陶希圣出面，可能是希望陶以进步学者的脸孔与大家见面，话更好说些。但他的脸孔的暧昧性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了，连姚蓬子都说他是“第六纵队”，姚应该是了解一些内情的。

从文运会张道藩的宴会出来又到文工会，那里的饯别宴刚散。第二天夜，又在郭家宴别，谈话。回到住处后同乃超谈至凌晨二时。

要着手重新登记刊物，为之取名《朝花》。先去访周恩来同志，和他谈登记刊物事，说到要三万元保证金。他一口答应，开给了我一张支票，并祝我顺利。我立即将钱交到过去复旦的学生现在在交通银行工作的杨敏处，他为我立了一个户头。据说，只要有存款就行，不需要现款的。而这一笔存款，就是国民党想迫使我们办不成刊物的最厉害的一手。

为了示威，我去找潘公展，说明我要登记出刊物，要他发给我登记证。他要我去社会局补办手续，还说了“这是公事，一切都会秉公办理的”一套鬼话。

欧阳凡海要回延安，前几天给我来信告别，很有失意之慨。他这次在重庆，由于发表了小说《金菩萨》不被理解，很苦闷。我回信安慰了他。这次在城里就抽空去看他，和他及华西园一起闲谈。从他那儿出来又到文协与老舍等一起喝不知是谁从云南带回来的“扎”酒。这是一个密封的瓦罐，开封后，用许多麦秆或细竹杆插入罐口吮吸，等酒快完时可加水再吸。一开始味道很浓，酸甜地，散着清醇的酒香，到后来越吃越淡。但我们还是喝得几乎大醉。

城里热不可耐，我赶紧回乡。整理了一下房间，取出准备看的书。这一两个月来一直没能安下心来，总在上来回奔波，忙于开会和会见朋友，时间糟蹋了许多。

回来第二天，M就命令我去乃超家借米。鹿地一家四口加上一个勤务员共有两份军粮，我们三口人来了，米就不够吃了。我的那一份军粮还没领来，就只好由我去借了。但我总感到M当这家务总管终究会出问题的，要她设法将这勤务兵留住，培

训好了，自己早日抽身。

一歇下来就感到身心都疲乏极了，又正值夏热，常常就在晚上与M一起在鹿地家客厅里乘凉和聊闲天。幸子谈起了她过去的苦难生活。我和她在1936年就认识了，抗战初在武汉，后来在重庆，一直都很接近。我听到不少有关她的传言，但我从未向她说过或问过。原来，她有亲属在青岛做买卖或是开什么厂，记得1936年她和鹿地同居后曾去青岛，回来时还送我一把山东大葱。她有母亲和妹妹，没有提到父亲。好像是父亲对她很凶。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推销日共《赤旗报》的组织活动。一次，在卖报时被警察抓去，她爸爸将她保释出来，从此就将她软禁在家，并逼她与一个小资本家结了婚。她不愿意，终于吵架直至离婚。她跑到上海来，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北四川路一个日本人开的酒吧间里当了舞女，因此认识不少中国人。她告诉我，袁殊常去那儿并常找她伴舞。这当然是一个很特殊的易被人猜疑的情况。有一次她还谈到，当年滞留在上海的日共党员宫木菊夫她也认识，并且还请他到家中吃过一次饭。这事宫木菊夫曾经告诉过我，但没有提她的名字。

她虽然只上过中学，但读了不少书，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修养，和她谈到一些十九世纪的作家，她也有独到的见解。M在一旁听我们谈话，我翻译给她听，有时幸子也用中国话说上几句。

一天晚上，孩子们都睡了。那天特别闷热，我们仍在院里坐着，忽然想到喝几杯。我去拿了一瓶别人送我的大麴酒，池田开了一个罐头，我们边喝边谈。说起鹿地的散文诗，我觉得不怎么好，批评了几句，池田同我的看法一样，但她话说得比较重，使鹿地很不好意思。他谈了对日本文艺界的看法，后来又谈到反战同盟解散的情形和对日本革命的回忆以及一般思想问

题，越说越动感情，对过去和现在都有着一种沉痛的无法摆脱的悲伤情绪。也可能是酒喝多了，最后，他抱着我痛哭失声。

在乡下，我参加了文工会召开的业务会议，共三天。似乎也正是在这时候，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那时，这著作已传到了重庆，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他人就不清楚了。好像是，一开头就涉及到了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要我说话，我就提出了毛主席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蔡仪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举出的例子是：文工会会有一个勤务兵就被提升为少尉副官（他的家庭出身是破落地主，念过几年书，就让他当了文书）。他的意思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培养工农兵作家是做得到的。问题讨论不下去了，大家只好随便谈了谈，不了了之。以后没有再为此开过会。

这个会当然是要看看大家对这部著作的认识和态度的。相比之下，我的态度就差多了。连蔡仪都还能举出勤务兵提升为副官的例子，我却用“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条说明了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的困难性，一点也不懂得应该对此采取完全的拥护态度。我实话实说，结果，乡下的会不再开了，后来城里的文工会或曾家岩也许为此开过会，也没邀请我参加。我自以为理解了主席对国统区特殊情况的原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忽略了其他几个原则问题，如思想改造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虽然在当时，我认为在国统区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的，但我至少应该从我对党的态度和关系出发表态吧。我

却没这样做，依然停在旧知识分子独行其“是”的老路上。这样，解放后就正式判定我为反对《讲话》了。

这些天，我看了手头有的关于普希金的书。读了他的小说《射击》、《暴风雪》、《驿站长》、《杜勃洛夫斯基》等，将他的短篇小说集全部读完。然后看卢波尔论普希金和吉尔波丁的《普希金传》。重看了吕荧译的《欧根·奥涅金》。他请我替他译日译本中的三节，我和幸子一道研究，听她的讲解。将这三节译出后，又将吕译和日译对照校读了一遍。看看无多大出入，吕译还是好的。另外，读了莫洛亚的《服尔泰传》（傅雷译），摘录服尔泰的时代特点和他的思想要点。还读了《汉文学史纲》和一些杂志。

幸子和白薇吵架，还波及了我们。原因是，幸子说白薇在楼上蹦跳吓了她和孩子。白薇说，难道我挂帐子都不行吗？白薇能说日语，她俩就针锋相对地吵开了。幸子又说白薇对晓谷好，却常常骂她的孩子，太坏了。白薇却说，你不让孩子理我，你的孩子把我种的花摘了，把我晾的衣服弄脏，你们欺负我，简直像日本法西斯，不讲理！这下可不好了，幸子大发雷霆，差点打起来。我将两人劝开了。后来，鹿地和幸子吵架时，我没去劝。

我进城去，在车站却遇到了幸子，她正气冲冲地要进城去。在茶馆等车时，我劝了劝她，她却说了一通蛮不讲理的话，我无法和她说清。没想到她竟变得如此骄横。

到了城里，先到文协问了一下这一个月来的情况，即到文工会。下午四时，文工会开委员会，六时聚餐，餐后是游艺会，搞得十分热闹。方然来看我，一起宿于文工会。

第二天又到文协，见到梅林、章泯、葛一虹等，听他们谈最近的文艺界情况。回去后和郭沫若、乃超一起闲谈。晚上是生活书店请客。

城里酷热，白天不能出门，就在宿舍里翻阅《人间词话》。晚上，到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做了讲演《论对于文艺的二、三流行见解》。

到新知书店拿到了《文学报》的一部分稿费。又去看阿垅，一道回文工会小坐，就托他代发稿费给各作者。在桂林时我做的这一份工作就此告一结束。

大家去孙夫人家开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有雪峰、曹靖华、沈钧儒等，茅盾似乎没有来。主要谈我们收到的鲁迅著作版税款怎样交给许广平以及在重庆继续出版鲁迅著作的问题。版税已托了沈钧儒保存。会后再在孙夫人家午餐。出来后与雪峰一道去看徐冰，闲谈了一些国内外形势。

钟宪民在书审处工作，我去找他打听一下我早已送去的几本书的命运。从他得知，《看云人手记》和《棉花》被禁，《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得删改后再送审，云。看来潘公展对我是决不放松，不会让我喘口气的。只好托雪峰送审吕荧译的《欧根·奥涅金》了，我不敢出面，真怕它反因我而遭禁闭不得见世面。

这几天看完了吕吟声译的《奥勃洛莫夫》第二部，并为其校字。我已为他与新知书店交涉好了分册出版。从钟宪民处拿回了《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一看，被删改得一塌糊涂！照他们的删改，这书就无法给读者了，因为我要写的主要论点都被删去。我不能依他们，要亲自找潘公展力争。

此处天热，无法工作，决定赶快回乡，遂搭政治部交通车回去了。家里已积了一堆信，检必要的写了回信。

一天，路翎和阿垅来访，留住在这儿，我们一起去看望卢鸿基。卢因患肺结核在这里租了一间民房养病，由文工会照料，并将他的弟弟从海南岛找来管理他的生活。但他很感寂寞，希望常有人去看他，和他聊聊闲天。我在乡下时总抽点时间去看

他，他对艺术很有一些看法，尤其是对木刻。只是，他说话声音很低，又是海南口音，我听起来很吃力。他爱发牢骚，甚至骂人，同事们都不大敢去亲近他。这次我带路翎和阿垅去看他，他很高兴，因为他一直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看法，阿垅很受感动，往后他们就一直保持了通信来往。我也要他将看法和心得等写成文章，帮他找地方发表，这样能使他的精神有所寄托。

梁文若从桂林到重庆后，分配在文工会工作，现在乡下管图书馆和文娱工作。她要我为乡下的同事们讲点什么，我去讲了《论文艺上的几个基本观念》。几天后，她又来找我，希望我再讲一次。这次讲的是《论创作底过程》。同时，听了郭沫若主任讲的《墨子的思想》。这几个月，郭沫若一家都住在文工会前厅的几大间住房里，因此，显得很热闹，工作也紧张多了。郭主任在这里做了多次学术讲演，对工作人员的学习和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每次都应邀去听。听过《建安文学》（正好我在看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可以对照来理解），还有《楚汉之间的儒者》和《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等。

校改了一篇刘君译的鹿地散文《什么叫做交易》，这种校改比我自己译更为烦难。

在这儿住了快两个月，一直和鹿地家在一起吃饭。M除管家务外，还要帮幸子带孩子，主要是他们的儿子。这是他们的宝贝，但池田常说工作忙，不管孩子，很多事都是M在照料。M累了受了委屈就向我诉苦，而且晓谷处处要让着他们的孩子，性格上受到压抑，同时我们在经济上也无法和他们相比。伙食费是两家分摊的，一家一半，但他家是两个设计委员，收入比我多一倍，生活富余，我们可就吃不消了。M的胃病复发了，想单独弄点吃，也很不方便。这样，就在月终时，向他们交了账，

提出分伙。池田大发雷霆，和我们吵翻了。我们开始在另一间厨房里的煤灶上做饭。不料，鹿地夫妇又跳出来说，这将有碍他的勤务兵的健康，不准我们用这灶。最后，我们只得在自己窗外，借用白薇搭的露天泥灶做饭。

自鹿地流浪到上海，是我帮助他翻译鲁迅先生的杂文，才得以在中国生活下来。抗战时，他作为反战的日本友人，我又曾多方面地帮助他，一向都是将他们当朋友看待的。现在这种强横不讲理的行为真使我感到寒心。同时，觉得这样也好，从此他不会来麻烦我了。现在，他在文学活动上已不再需要我，才这样对待我。我对他们完全是站在“团结、进步、抗战、为人民”这一政治立场上，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鼓励他们和日本革命人民相呼应，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

M送晓谷去政治部办的子弟小学上学。第一次去的是分校，几个教师据说是政治部职员太太，M说她们一点也不像教员，问什么也不知道，似乎也不欢迎新进学生。后来又送到三圣宫的本校，叫“四维小学”的，司徒乔的夫人在那里当校长。M和司徒夫人冯伊湄谈得很融洽。晓谷被分在三年级。拿回书来，语文从头到尾他都自己能读，只有算术有些不懂的地方。于是，上课不久就换到四年级去了。晓谷认识了同学傅小石，是傅抱石的儿子。这孩子不愿在学校上课，情愿自己看书学画，常来找晓谷借书看，两人挺谈得来。

几天后，又坐车进城。半路下车去看周副主席，与徐冰一道午饭。然后，坐马车到李子坝去访邓胖老（邓初民），并一道到章伯钧家闲谈时事。邓初民认识上海女青年会托儿所所长的姐姐，我想通过邓请这位女士去信上海，希望不要因为我无法交晓风的生活费而对她的不好。当然，如果这位女士能在这里接收我该交的款，由她设法转去，就更好了。后来，我见到了她。她

在重庆女青年会工作，十分和气，一口答应帮忙，使我们感到一点安慰。

向林冰特来找我，他准备去三台东北大学教书。我对于他能摆脱刘百闵，很是高兴。因为，把他放在刘百闵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实在是可惜了。他要我问50号，他保藏的日译《马恩全集》等书是不是可以转让给他们。他不好意思地补了一句，“我手头实在拮据”。我找了徐冰同志，他们答应了。约他去谈过话，似乎是董老和他谈的。事后，他告诉了我，心情很舒畅，一扫过去的忧郁情绪。他将书送到我这儿，除《马恩全集》外，还有《唯物研究》五十期，这对延安的同志们研究马列主义和翻译马恩著作都是十分宝贵的。他又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两本书留给了我，因为在石子山时我曾向他借过，看后又同他讨论过。他这是表示和我的友谊，我只好收了下來。第二天，50号徐冰请他吃饭，由我作陪。晚上，我又到徐府与数友人闲谈文艺界情形。

抽空去到社会局查问《朝花》登记的情形，还没回音。又去到黄洛峰家商议出版家及著作人请愿的事，因为书审处多方留难出版家和著作人简直到了无法出书刊的地步。谈完后与乃超一道搭车回乡。

10月1日是文工会成立的三周年。大聚餐，摆了十来桌，连家属都请到了。会里的厨子做了几大碗四川菜，很实惠可口，算是给全体同人打了一次牙祭。大家闹酒，酒后又约了十来人去茶馆喝茶，再一道回会里谈天。

得钟宪民信，《朝花》登记被批缓出，云。心情很不愉快，只有看书来压下气愤。看了托尔斯泰的《哥萨克人》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些小说和报告文学。又开始看马克思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

鹿地来找我麻烦，和我谈什么生活问题、厨房问题等。第二天上午，池田又为厨房事捣乱，在院子里哇哇乱叫。幸好 M 听不懂，那是存心说给我听的。我没有理她，决心立即找房子搬走。他们的本意也是如此。这房子是公家的，他们不能赶我走，就无理取闹想把我挤走。现在是，勤务兵的一家都来了，他的妻子可以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生活完全有人侍候了。

我去访中学同学王治安（他在政治部工作），托他找房子。他来约我去看了一处，但离文工会太远不方便。

听了郭沫若讲《吕不韦与秦始皇》两讲。又继续看《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读完后记下了要点。接着又看早川三郎的《古代社会史》。

10月19日下午，文工会同人开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会，我讲了四十分钟的话。晚上，读全集中的旧诗及《两地书》。准备写《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这是乔冠华（乔木）的约稿，他来信说今年纪念鲁翁城里很冷清，想在《群众》上发几篇文章以示纪念之意。我写完后即冒雨送到三圣宫托程君带进城里。

我忙着找房子，可又被鹿地硬拉去编审室为他关于日本现状的讲话当翻译。当夜，他的男孩得了急病，他将我叫醒打着马灯去三圣宫请医生，又送医生回去，再取药。都办完时天已大亮。鹿地告我：“孩子打了一针后已睡了，没危险了，大概是由于吃了不卫生的食品和受凉。”我没说什么，更下决心要赶快搬走。

又看了几处房子，最后决定搬入陈家祠堂（又名花朝门），与郭劳为副官为邻。住房仅一间，地甚潮湿。但乃超告诉我，房对面郑伯奇住过的三间房可能空出来，因郑已回陕西，不见得再回重庆，

11月2日上午搬家。M和晓谷先走，我怕池田又兴风作浪，我不能让M受欺负，所以最后走。谁知她大约也感到做得过分了，一直躲在屋里没出来，只鹿地出来不好意思地搭讪了几句，看我将房子打扫干净，脸上现出难堪之状。而我却感到一身轻松。

将住处安排好，复了几封信，又得进城去了。

在城里两路口遇到了周颖和姚楚琦，姚在路口开了一家裁缝店。她引我到店里，见到绀弩。他刚刚从桂林来，略谈了桂林的情形，他的工作自会由50号安排，没有多问。第二天到作家书屋，见到老舍的三个孩子，果然他的夫人千里迢迢从沦陷的北平到重庆来团聚了。

专为禁书及出刊物事去找潘公展，他对我要滑头。禁书事，他说是书审员的意见，他不好作主，要我修改后再送审。至于刊物，他又推给了社会局，说他管不了。于是，我只好到社会局去调查刊物登记的事。不得要领。又到书审处找印维廉，仍是不得结果。他们用这种推来推去的拳击法，倒使我奈何他们不得！

张道藩请吃饭，饭后被拉去参加他们的国民月会及所谓民族文化建设座谈会。当场分发《民族文化运动纲领》，潘公展等作反共演说。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撕去假面，越来越猖狂了，我们之不能出刊出书是必然的。但我决不放弃斗争。

访沈钧儒，谈鲁迅著作版税事。并问他我在桂林收来的版税款他能否设法转给许广平，她们母子一定很需要。他说目前尚无法办到，但这里印的鲁迅著作，一定要书店付版税，款仍交他保管。

路翎从南温泉来，我在阿垅处见到他。他带来了《财主的儿女们》上部及舒芜驳郭沫若论墨子文。当夜看舒芜文至三时多。

不久，由路翎的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事舒芜(方管)。

城里文工会为郭沫若五十二岁生日做寿，即席赋打油诗一首：

城有天官府，乡有赖家桥，画地作天堂，休道老渔樵。
有天何必问？屈子枉行吟，不见伽蓝殿，肉身佛几尊。当年拜印度，今日拜谁来？蓝衣虽易色，依照老希裁。沿街飞马面，租界暂安然，铁剪横天下，抽屈当名山。寿筵不用草，稗子也还稀，且尽今朝酒，金风剪破衣。

大家吃祝寿酒，闹到夜二时才睡。

我和路翎、阿垅一道去弹子石看何剑薰的病。他一直自夸身体好，抽烟喝酒都不怕过量，这次病倒在床，连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只好安慰他劝他安心养病，不能逞强。他向我苦笑笑。

要干的事毫无结果，也无办法可想，只好回乡再说。

到家后先复信。给南天出版社陈志华回信，并为之设计了诗丛的封面，写了广告文。给齐蜀夫(吕吟声)信，告诉他《奥勃洛莫夫》第三部收到，我正在校看，第一、二部新知书店已付排，可能快出了。又为杨刚选出她想介绍到美国去的诗(《七月诗丛》内的)。写成了《人民三相》。

抽空陪M去赶场，帮她买了一些蔬菜杂物等。下午与她们一道去永兴场饭馆吃面，在这里，这就算是最高的享受了。

已是1943年的最后一个月了，我收到各方面的来信约稿，要为新年元旦写点文章。为《大公报》副刊写了短文，题为《由现在到将来》。又为《时事新报》的元旦特刊写成了《现实主义在今天》。《时事新报》约稿，大概是崔万秋(崔现为《时事新报》《青光》编辑)感到将我“赶”出国际宣传处有点不好意思，特来表示拉拢安慰之意吧。我故意将此文写得很尖锐，将他一军，看他敢不敢用？

年底，我收到了桂林南天出版社寄来新出的诗集《我是初来的》和艾青的诗集《北方》，算是这几个月来令人高兴的事。路翎寄来了修改过的小说《蜗牛在荆棘上》。他吸收我的意见修改后的这篇作品可说是少见的杰作。

收到许季葑（许寿裳）的信，有些事需找他面谈，就同M、晓谷徒步翻过冷水沟到歌乐山去。山路大约有十来里，由于是冬天，一路上连可歇脚的茶摊都少见，只能和一些挑担的农民一起在向阳处的石块上坐歇一会。约走了两个小时才到，找到教育部编审处（？）见到许老先生，在会客室里谈了有关鲁迅先生全集的事。他一人住宿舍，无法招待我们，又硬要请我们吃饭。他带我们到一家北方饭馆，要了几个炒菜和家常饼。他说，他一人常在这里吃，不是专为请我们。这长者的亲切和关心使我很感动。他说，要帮我找他认识的人，打听刊物登记的事。因他下午要开会，我们就匆匆告辞了。

顺便到中央卫生院实验院去访王泽民和秦林纾。他们都是向林冰的好友，在石子山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为“民族形式问题”参加过论战。他们都是肯用功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们参观了院部，临走他们送了我们几张宣传营养和卫生的招贴画。从那儿出来，在街上走了走。歌乐山名气虽大，但也只一条街，可能不是赶场的日子，显得十分冷落。我们走原路回家，到家天已全黑了。

开始写《论“大国之风”种种》，三天才写成。看能不能发表。田间的诗集《给战斗者》也寄到了。这书可花了我不少力气，完全是从报刊上重抄整理成的（原稿在香港时被遗失了）。为了让读者了解田间诗的战斗内容和形式上的美感，我介绍了它。我是准备再次挨骂的。书出来了，我感到快慰。

翻阅《群众》上关于墨子的论争文，读舒芜修改的评郭沫若

的墨子论说。在乡下时，我总要抽点时间读读俄文。乡下文工会的几个同人凑在一起，由亚克指导学习刘泽荣著的《俄文文法》，我和M都参加了。我常常要进城，没空学，学得不好，而M是不用心，也学得不好。不过我们都愿意坚持学下去，我只要回乡，就总要去听课，念念。

进城，住入文工会。特去访乔冠华、龚澎这对新夫妇，他们留我喝酒，吃面，闲谈。我对龚澎很有好感，她不但是一个党内得力的外交人才，还对文艺有很深的理解，而且不带任何成见，尤其是她为人正派，没有丝毫的虚伪做作，因此我很愿意听取她的意见。

舒芜从南泉来。我曾向家康和乔木谈起过，有一个青年写了关于墨子的文章，与郭沫若的论点不同。他们很感兴趣，尤其是家康，正在研究墨子，就要我领他去见面谈谈。这次我就领舒芜一道去访家康和乔木，除了讨论墨子外，又谈到学术界的一些情况。舒芜不像我们那些青年朋友，他很能谈，能迎合对方，博得对方的好感。

又到社会局去查《朝花》登记证的情况。他们终于找出那张批了“缓出”的登记证给我看了，不过最后说了一句，你可以重新申请登记。我第二天就去登记《希望》杂志。“希望”二字本是去年准备出版刊物时曾提出过的名字，后来觉得还是“朝花”好，因为当时对前途还是抱有乐观的，愿意从此能有一种新气象。现在，碰了多次壁，就只剩下了希望。记得希腊神话中说，潘多拉的盒子揭开后，各种祸害都飞出来了，赶快盖上时，只有“希望”还来不及飞走，还有那胆小的“幻想”躲在角落里。现在决定用“希望”为名，表示我们只留下了“希望”和“幻想”。

潘公展召集“中国著作人协会”发起人开会。我被邀为发起人之一。这个协会我是一定要参加的，这可以给我一个公开向

国民党为著作人争权利的机会。

李辰冬和梅林曾来找我商量文协新年晚会的事。12月30日，上午到文协布置晚会节目，晚上，参加文协的辞年恳谈晚会，并主持讨论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1943年的最后一天，上午与路翎、阿垅、何剑薰闲谈。何病已好，虽显得瘦弱了些，但精神很旺。一道去吃饭，我和路翎、剑薰仍喝了不少酒，阿垅只喝了一两口。他几乎是滴酒不沾的，但大量抽烟。晚上，在文工会聚餐，参加辞年晚会热闹到一时多。虽然没有过旧历年的声声爆竹，但也过得很热闹。就这样，告别了1943年。

1944年的元旦，上午参加文工会的所谓“团拜”，热闹了一番。晚上，郭府为董老做寿，聚餐、闹酒，又是一番热闹。

到3日，我去访五十年代出版社的老板金长佑。听说这个出版社愿出各方面进步作家的书，想约我介绍些稿子给他们。见了面，他很客气，表示愿意为文化事业出力，欢迎介绍稿子，将来还要出文艺刊物，云云。

见到乔木(乔冠华)时，他告诉我他们不愿发表舒芜的论文。

文工会大家都在传阅田汉寄郭沫若的诗，我也步原韵和了一首：

世事而今各是非，此间乐又何须归。

愁深怕听三冬雨，雾重难寻一线晖。

天下几多黔首死，川中不见羽书飞。

漓江荒漠应如昔，醉后休教野狗围。

我知道田汉不愿回重庆，但他在桂林也并不是十分安全，故写此诗，聊表心意。

5日搭车回乡。郭副官通知我们，郑伯奇已决定不回重庆，

对面的房子可以让我们搬进去住了。房东没有意见。我们搬来后已代郑伯奇交了半年的租金，现在只要把今年的租金给他就行了。他想涨价，被郭副官制止了。这位房东，我们叫他李老板。收三百担租子，外面的大院子两边各有四、五间房（现在住着他的佃户一家十余口，是一个富农家庭，佃他百多担租）。大儿子在南岸做生意，小儿子只七、八岁，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一个孙子已有七、八岁了，但看上去身体很孱弱，说话还说不清。今后我们就将和他们生活在一个门楼里了。

对面的房共有六间：两边前后两间，当中是客厅，厅后是灶间。后房我们只用来堆放些零碎东西。好在厅堂里有房东的大方桌和几把椅子，郑伯奇的书房里又留下了一木床及一书架（我作价请郭副官寄钱给他），我们的住处就算像样了。结束了住在潮湿的东房与猪为邻的生活，这该是1944年的第一件大喜事。

这些天去文工会看看同事，读读报纸，又去拜会了金刚村的各家。在家就安心地工作。除了答复几处来信外，主要是看路翎的《财主的儿子们》。由于我在香港丢失了他的初稿，现在是他重写的。花了七、八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五十万字的小说，还记下了一些准备和他商讨的意见。我看，它将是一部传世之作，只是还须精细的加工。我非常高兴，给路翎写了信，说了些意见，约好见面时再谈谈。

离春节没几天了，M忙着准备过年。这是我们回重庆后的第一个春节，但是一想起小女儿独自在上海的托儿所里过年，心里就很不好过。尤其是M，由于想念母亲和女儿，连觉都睡不好。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到处设法托人想将孩子带来这里，但总是不行。已两年多了，也没能办到，只好盼望今年了！

幸好有子民兄的女儿秀珠在我们这里过年（M介绍她在四

维小学教书，常来我家玩），增加了一些热闹，晓谷更是特别高兴。1942年的春节是在惠阳过的，1943年春节是在桂林客居，虽然有朋友来往，但都是大人，对晓谷来说是太寂寞了。今年住进了这个大院，虽然我们不大讲究过旧历年，但看看房东老板请客放爆竹的架势，相形之下，总有一种落寞之感。除夕夜晚，与郭副官、他的小姨及秀珠打麻将打到深夜。M在临睡时不由得叹息地说出了她的愿望：“希望明年在上海过年！”

初一，阿垅从重庆来了。我们闲谈着，晓谷则缠着他讲希腊神话和天上星座的故事。吃完午饭后送他到车站。等车时，路翎从重庆来的车上跳了下来。我就和路翎一道回到家。我们讨论着他的长篇小说，我详细说了自己的意见，路翎考虑进一步修改它。最后，决定改名为《财主的儿女们》。初三，送路翎回城后，我就和M到各同事家去拜年。

由于过年，这次在乡下住了一、二十天，直到正月十五过后。这其间看了一些书，主要是《十九世纪文艺新潮》。路翎将修改好的第一章寄来了，我将《财主的儿女们》装订好，准备带进城去，争取早日出版。

在城里收到了齐蜀夫寄赠的《奥勃洛莫夫》第一册，这本书新知书店倒出得很快。两天后，齐蜀夫自己来了。他在航空公司工作，就托他将杜谷的《泥土的梦》原稿由飞机带给桂林南天出版社，编进《七月诗丛》内。

我又重看了一遍修改后的《儿女们》第一章，决定去找金长佑，试谈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谈完回到住处不久，金长佑及其编辑梁纯夫就来找我，商谈《儿女们》的出版条件。看来，他们是有意了。当即将稿子交他们送审。

这天傍晚，舒芜来访。应他的要求，带他到50号去访家康和乔木，杂谈至十一时才回来。

这次进城主要是查问《希望》登记证的下落。总算查明已由书审处通过了，算是过了第一关。锺宪民还给我拿来《看云人手记》稿，它已顺利通过。我就又去找金长佑谈出版丛书事，他答应可以商量，就将《看云人手记》交给了他。但第二天去他那里继续谈时，他又不愿出了，只好将《看云人手记》拿回来。正好华中图书公司的店员刘一村来找我，他早就同我谈过，想自己开书店，先出点小本子的书，曾向我约稿。这时，我就将《看云人手记》给了他。他还陪我到上清寺一家旧书店，那里有一些日文书，我选了四本。

《棘源草》也被通过发下了，但被删下了四篇。可恶得很。就又托齐蜀夫由飞机带到桂林，因这书只十来万字，我又可以不要版税，对南天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去访沈钧儒，主要是谈鲁迅先生版税事并请他设法给许广平转去所收的钱款。现在寄到上海是不可能的，但他那里可以有便人带去或换成金子放着。

城里的事基本已办完，即搭车还乡。

不久，舒芜到乡下来看我，当天谈到夜里一时。第二天又和他闲谈了一整天，看他带来的三篇论文稿。我对哲学问题没有深的研究，无能对他的稿子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只是稍为提了点自己的看法。第三天下午，送他坐车回城了。

几天后，绿原来，留宿在我家。他身体看上去还不错，穿上在训练班时发的制服，显得很精神，不像在复旦时总是蜡黄的脸色。由于学生的救济金跟不上飞涨的物价，他们这些没有别的收入的学生，几乎都在过着半饥饿的日子。所以，政府一号召参加远征军，他就报了名。现在，他告诉我们可能分配在远征军中当翻译员。这样，他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还能进一步学习英语，因此他一改过去的那种忧郁心情，活泼多了。在

M 给他拖鞋要他换下那双大皮鞋时，他还高兴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这时，我才发现他很有口才，说话还很风趣。

进城后方知张道藩为开年会事请吃饭。席间，他忽然提议在年会上宣读一篇论文。学术团体宣读论文，是有了研究成果后再由研究者们来宣读(当然不止一篇)。现在却是为了宣读论文而要临时赶出一篇来，他显然是别有用心，但又不好反对他。最后决定由四人起草：茅盾、我、王平陵和李辰冬(李辰冬不是文协理事，他完全是代表张道藩的)。

李辰冬在文运会餐厅请吃饭，讨论论文内容。他宣称，今天的讨论打破头都可以，但出门以后意见要一致。讨论中，我除了抗战和民主的内容外，竭力避开政治问题。讨论下来，决定了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如，文艺应该坚持反映抗战内容，应该和人民结合，应该展开文艺批评等等。由谁执笔呢？推茅盾，我极力赞成(我希望他接受下来，再约人帮他忙也好)，但他坚决不干。推我，茅盾不表态，好像他怕我得了这一份“荣誉”似的。但如果我再推掉，主动权就将落到国民党手里了。我是研究部主任，只好用这作口实接受了吧。但有一条，写完后要给张道藩看过，得到他的同意才行。国民党人以为只要把住这最后一关，别人执笔也没什么关系。

真写起来还是很难的。如不放进若干内容，就等于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统治，和要求进步的抗日民主。但放得太明显了，就有被否定的危险，甚至会被删改成国民党的宣传品。考虑后，我决定了两点：一定要放进一些要紧的内容，但要用所谓学术性的晦涩写法；开会前一天才给张道藩看，宁可全部被否定也不给他删改的时间。

决定回乡下去写这篇论文。看看还有十多天的时间，我就先着手将早已酝酿好的一篇小评论《人生·文艺·文艺批评》写

出。另外，又写了一篇《写在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纪念》，这是打算在庆祝老舍创作二十年的纪念日朗读或发表的。我与他共事五、六年，他的为人行事有许多地方值得我敬佩，我很乐意写这篇短文。只是，对他的创作，我没有通读，不能做过细的分析和评论。

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才写完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虽只几千字，但写得很苦，许多意见不能展开来谈，也不能多加解释，只能在字里行间尽可能地透出我的目的来。为了不刺激张道藩们，我在用词上也煞费了苦心，许多问题不但不能深说，还不得不含糊其词。

写成后给乃超看，他表示同意。我以为他能理解我的用意，并且，我还以为他表示同意就等于党审阅通过了。

我到文工会请那里的文书誊写两份，准备到城里后请朋友们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开会前一天，我才带着誊写好的稿子进城去。先到作家书屋给雪峰看，他也表示同意，我就更放心了。于是，去参加有老舍、茅盾、姚蓬子等组成的年会筹备会。论文由老舍读了一遍。姚蓬子马上提出，像这样不加进“三民主义”的内容，一定通不过。我也马上严正申明：如要加进“三民主义”，就不要这篇论文了。最后决定将原文交张道藩审查，由老舍、茅盾和我晚上去找他。

晚上，文化会堂有什么会，我们三个说定在会后去找张道藩（他住在楼上）。但临时茅盾没来，老舍来了在会堂里坐了一会儿就说头昏先走了。只好我一个人等在那里，会后拿着稿子去找张道藩。我请他看，他推说疲乏，要我留下第二天早晨看。我说，今晚要赶着油印的。他勉强看了一页，就说看不下去，还是明天早晨再看吧。我只好辞出了。

第二天开会前，李辰冬把稿子还给了我，说了两句不得已的客气话，表示可以宣读。打开一看，上面有不少处用铅笔打了问号，当然这些都是使他不同意的，但又无法说出反对的理由来。

张道藩没有出席年会，论文由我自己宣读了。

会后，我回到天官府文工会时，冯乃超正和郭主任谈论这件事。我听到了一句：“由他自己读，那里面的主要含义都被强调出来了……。”

因为是文协的论文，不但重庆各报都刊载了，还有不少外地报纸也转载了。在文艺圈子里传出了是我执笔的消息。黄药眠写了篇反对的文章（即《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由于重庆的刊物没有发表它，他在地发表时就加了一句，说是重庆的编辑们怕得罪“某权威”。

这篇论文虽然在文艺界不能使大家都满意，但在张道藩这面，他本想用一篇论文在文艺问题上为国民党捞取某种资本，这从姚蓬子脱口而出的“不加进三民主义就通不过”那一句就可想而知。由于论文的内容和写法都是首尾相联有机构成的，如果张道藩提出这个要求来，那非全部改写不可，也就是只有全部否定它。而这样做，是要负破坏年计划团结的责任，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的。他只好吞下了这个苦果。所以，我不但使得他没达到目的，反而用抗战和进步的要求透露出了对现状的不满，在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上划破了一些缺口。国民党是完全失败了。

在此期间，曾收到一封未具名的信，看得出是一位女士写的，说是找了我好几年，云云。我猜不出是谁，后来想到可能是秦德君。复信一问，果然是她。年会开过后，遂约她在中苏文协茶室见面。我与她已十几年未见了，但她还是那么年轻，

穿着很时髦，一副贵夫人模样。记得1929年在去日本的船上遇到她，知道她当时正和茅盾同居。后来她与我通信，我也和茅盾通过信。1931年他们回上海后发生家庭纠纷，茅盾给我来信，我似乎还去信劝过她。她最后的信上说要回四川去弄钱开书店，从此就断了消息。这次听她说到这十几年来的经历，真是既艰苦又浪漫。现在，她从那军阀家中逃出，和郭春涛在一起，郭管得她很严，几乎不能行动自由。她对茅盾的无情无义又表示了一些怨恨。我不好说什么，只说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并叫她以后不要再约我见面，以免引起麻烦。

一直在为《希望》登记证事找人查问，已快半年了，它还不知在哪个角落里卡着呢！5月时，绿原来乡下看我。原来做译员做不成，吃饭马上成了问题。还不仅如此，他又告诉我他们要将他改派到中美合作所去当翻译，他上午已写了封信问我的意见，想想后觉得不放心，就又亲自来找我。我一听吓了一跳，马上说：“这地方可去不得。”绿原说，如不去他们要他退回培训费和伙食费。这显然是强制了，不去也得去。他为此苦恼得很。我说，只有逃离重庆这一个办法了。我要他去找何剑薰，让何介绍他在外县教书，那是不成问题的。我立即写了一封恳切的信，要他拿着去找何。他当天住在这里，第二天一早送他乘车走了（后来，他由何介绍，一道在岳池某中学教英文）。由于那天他给我来信提到了此事，到1955年时就被一口咬定是“中美合作所特务”，直到1980年平反才恢复名誉。这自是后话。

5月25日得到中宣部洪昉来信，告诉我《希望》已准送审出版。登记证没问题了！高兴地得诗一首：

又向荒崖寻火粒，荆蕪凝露不胜寒。

大千孽浪连方寸，极目云天夜未阑。

几天后，即进城，宿于天官府文工会。收到了刚从延安转

来的丁玲、萧军、艾青的信及萧军赠的鲁迅石膏浮雕。专程去找原先出版《七月》的唐性天，他同意了出版《希望》。晚，到50号去看徐冰，正好听刚从延安来此的何其芳、刘白羽谈根据地情况，直到深夜。当晚就留宿在徐府。

他俩来重庆，当是帮助徐冰领导文艺的。在我的地位上（文协研究部主任），有责任创造些条件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工作。我用文协研究部的名义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他们报告的内容是延安整风、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这是根本原则问题，但他们的报告却引起了反感。梅林在会后发牢骚说：“好快！他们已经改造好了，现在来改造我们了！”我也觉得他们没有注意“环境与任务的区别”，但又没机会再开会了。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杜源华来看我了。他是泰国华侨，我们在桂林住廖庶谦家时和他是邻居。他那时可能在华侨中学读书，后来离开了。在重庆再见到他时，他已是新知书店的店员，我去买书时常一起谈论对当前文艺作品的看法，才知他是一位爱好文艺的革命青年。目前，他在重庆办华侨书店渝分店，表示愿出《希望》。

又去社会局查询，说是登记证还没发下来。几天后，《儿女们》又由书审会退回，说得修改，云。

6月6日，报载“第二战场已于今晨开辟”，立即为文协拟《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致敬电》。

6月底，又到中宣部去找洪昉打听《希望》登记证的下落。据他说，关于《希望》的会核复函已送内政部。看来，我早些时候听说可以送审的话是太乐观了，真正到登记证拿到手，还不知道得多少时日呢？他们当然不愿意我再编刊物，就总拖着。我还是不断地去催问，看他们能把我怎样！

这一段住在乡下时，看了舒芜短论十八篇和《论中庸》，总觉得文章内容有些不妥，尤其是《论中庸》，有着个人的不健康

情绪，那十几篇短文，文字是写得好的，但深度不够，还多卖弄处。见面时再谈吧。又看了何剑薰的小说稿《艺术家》，弄得疲乏不堪。即复何剑薰信，对他的《艺术家》及他的创作态度写了意见。他很能写，并且有自己的风格。我在桂林时曾为他编过一个小说集，但被书审处扣下了。这是最狠的一手，意思是没有修改的余地，绝不能出版。他本人又没留下底稿。为此我难受了好久，因为那里面写到的人物有的很使我感动，只是他的用语有时太露骨甚至到了刻薄的程度，这是写小说不应有的。现在这篇《艺术家》又是在许多地方用了过度的嘲讽。我认为，即使写反面人物，在揭露他的丑恶时，也应给以一定的同情，因为其中有着社会的根源。只有更深刻地暴露社会上的种种劣根，才不会仅仅是一篇讽刺嘲笑的小说。我感到他写得太阴暗，有的地方也显得太轻薄，没有尊重他的人物，只是一味地丑化他们，这样不能使读者受到教育。

路翎将修改好的《儿女们》带来看我，和他细谈《儿女们》的人物创造。他已不在南温泉工作，调到了他继父那里，所以能有更多的时间写作了。

刘白羽、何其芳等来到文工会，我被约去闲谈。隔一天，又到文工会听刘等讲边区文化情况。第二天，郭沫若、阳翰笙等邀请刘等参加，开了个文艺座谈会，由我主持。会后聚餐。

7月15日上午，文工会召开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我做了讲演。下午，刘白羽、何其芳、以群来看我，我尽可能地谈了一些文艺工作的一般情况。

郭主任希望我将关于契诃夫的讲演稿写成文章，交给他编的《中原》发表。我当即答应了。我将家里和文工会图书馆中所有的契诃夫作品和其他材料都找来通读。《樱桃园》和《三姐妹》，我读了两遍，很受感动。又看了弗理采的《契诃夫评传》。这才

开始着手写《A·P·契诃夫断片》。

路翎在北碚举行婚礼，我赶去参加，见到了他的父母。他的继父是一个很能干的政府职员，母亲则显得很年青，有风度，对也很热情。路翎的相貌和性格似乎都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晚上，与路翎夫妇、冀访、白鲁等在江边散步。夜宿于兼善公寓。

回家第二天，M给了我三张纸的条子，判决我“横暴”。我自知有些地方做得太不合适。最近将她的小说稿给“枪毙”了，又不帮她做家务，使她感到自己没什么出路，常常抱怨我。但是家庭中的不愉快可影响了孩子，晓谷在喝粥时走了神，把热粥泼在了身上，烫伤了。我们两人急得要命，赶紧送他到永兴场卫生站洗裹。虽然烫伤的面积不小，多在大腿上，不过很浅，只伤了表皮。讨厌的是热天，容易发炎。这时，M也顾不上和我生气了，我们忙着照料孩子。我找来了药，说是美国新出的盘尼西林药片，有特效。

就在这天下午，东北青年徐放从沙坪坝步行来访，赠在伪满出的画报一份、小说《绿色的谷》一本，还带来了他的诗稿《明日的旅程》请我看。坐谈了二小时就匆匆地走了。

《A·P·契诃夫断片》写到一半时，我又进城了一次。《儿女们》曾托黄芝岗送审（黄是过去上海左翼的老人，为人厚道正派，现在中央社工作），这次找到他一问，方知书稿已通过发回了。高兴地取回了原稿，又到社会局拿到了《希望》登记证。这时已是八月底了，虽然拖了我八、九个月，但终究还得让我编刊物，这次对我来说应算是双喜临门了。

因为唐性天曾向我说过愿出《希望》，所以我又去找他。他却表现了犹豫，说要再考虑一下。我立即走了。正好，金长佑知道《希望》登记证已下来，来对我表示愿出版。和他商量的关

于出版的一些具体情况，由他们拟一合同。又去请了余所亚设计封面，就赶回乡下去准备稿件。

阿垅夫妇和路翎来看我。阿垅的这位夫人张瑞比他年少十来岁吧，是一位单纯的喜爱文学的姑娘。这次他们来，我正好和他们商量《希望》的编辑计划。路翎正在写一个中篇，可以用上。我建议阿垅将一些关于诗的想法写出，那将是很好的诗论。另外，加上一组小杂文可以使刊物显得有生气。《希望》不同于《七月》的是篇幅加多了，二十万字甚至可以更多，出版社没加限制，所以可以放手地编，只要有好稿子都可以容纳下，长的论文也可以用。

送他们走后，清理积压的来稿，不能用的都回信答复了。再重看舒芜的《论主观》。这稿放在我这里已有半年了，想给介绍出去，可找不到地方。

终于，将《希望》第一期编成了。采用的多半是年青人甚至新人的作品，这在一般的编辑是不肯干的。如果它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恐怕出版社会不干的，但我还是要走这条路，文艺界实在太需要新鲜血液了。它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约路翎来，就他的中篇小说《罗大斗的一生》提了些意见，他拿回去再修改。我进城去将稿交给五十年代出版社的金长佑。后来，他将稿送了上去审查。

10月19日，去参加在百龄餐厅用茶话会形式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这次仍处在不能公开纪念的情况下面，人到得很少。除了文艺界人士外，只有孙夫人、沈钧儒和几个外国记者参加。不料这里已混进了国民党特务。在沈钧儒主席致了开幕词后，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说是刚从沦陷后的上海来，知道许广平投了敌，所以不应开会纪念鲁迅（大意），云。这使我制不住发火了，我绝不相信许广平会投敌，立即就他的话站起

来驳斥道：“我不相信许广平会投敌！但即使如此，也不应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卫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大信徒吗？他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纪念孙中山先生了呢？……”

这时，好几个特务纷纷站了起来斥责我：“污辱总理……”特务发言时，孙夫人起身退席。我正准备再站起来反击特务时，看到有十几个特务聚在一起要向我进攻。有人把我拉住，推我离开会场。到门口时我回头望了望，冯雪峰正站起来讲着什么。

回到文工会，和衣躺了一会儿。乔冠华可能听到了消息，赶来看我，从他的表情上我感到了安慰。晚上，五十年代出版社请客，到了十几位作家。大家都谈到这件事，有人说应该叫宪兵把他们抓起来，我心想还不知是抓谁呢。他们的捣乱是有计划的，目的是想使我们难堪。结果不但没使他们的目的得逞，反暴露了他们的愚蠢。

第三天，曾家岩举行了几桌人的会餐。王若飞同志（当时他是代替周恩来同志为办事处的负责人）特来给我倒了一杯酒（好像他也出席了纪念会），表示敬意吧，使我很感动。

在中苏文协图书室为《希望》封面选得《麦哲伦通过海峡》版面一幅。这是彩色的，这里无法制版。又找来余所亚，商定封面设计。

停顿了一些时的日军开始向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进犯，国内形势紧张不安。特去文协访问刚从桂林撤退来的艾芜夫妇，得悉桂林的文化人基本上都已撤走。但伍禾不知是否平安撤离桂林，非常挂念。起先，桂林南天社由于负责的一青年谈恋爱，将正事耽误了，没能出新书，连老本都将吃光。我让伍禾去了解情况，那青年离职走后，我只好请伍禾负责先将存书寄重庆，收回书款即续排新书。我在这里收到的书款，也将用于排新书。

只是款实在太少，无法开展下去。想拉人投资，又从来没有结交过阔人、有钱人。骆剑冰看来还能帮点忙，就找她商量。拉股，她没办法。她说有几十副进口扑克牌，如能卖掉，现款可投入南天。于是，我为了南天出版社，就当上了推销员。还去请电影明星和话剧演员帮我代销，真是可笑之至。后来，骆又出主意，说可以托人做生意，她丈夫是某钢铁厂的厂长，需要一些物资。如我们找人代买到物资，赚了钱就给南天。我想，这不花本钱的事倒可以一试。舒芜介绍了一个朋友本地人×××，人很能干，还有多种社会关系。先托他代购几百斤桐油，结果，钱是赚了，可分文没有给南天出版社。骆的丈夫还向我抱怨说桐油价贵质量也不好。我算是白费了一番心。现在，就只盼着伍禾能平安到渝，由他来重振出版社了。不久，他经过艰苦跋涉，总算平安到了，只带来南天唯一剩下的财产十几副纸型。一切都要在这里从头做起。

托人找到一座小楼，只一人多高的两间。伍禾他们的住处解决了，决定先出我的《棘源草》和《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另外再选几本书再版。幸亏我早已将能弄到的钱买了纸，出这点书问题还不大。暂时间，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会很艰苦，但靠我一个人来筹款也实在困难。我从未拿过南天一分钱，连版税都没拿，朋友们也没拿到过版税，都只是为了使读者们能看到健康的有影响的好书。

11月下旬，M 忽发症疾。这病，她从抗战初在湖北时就患过，一直没断，不时会发作一次，但一服奎宁片就能好。这次可不同了，烧不易退，冷得也特别厉害，发冷后又接着发烧。搞得她身体虚弱得很，服了药也不见效。M 怕是伤寒。我请来了政治部医务所的内科医生，让吃大量的奎宁，后来改服扑疟母星，但烧仍不退。医生说不是伤寒，是一种恶性疟疾，很不

好用药，因为它全然没有间歇的时间。最后，还是给M打了一针奎宁。她从下午七时余直睡到天亮，第三天烧才全退，只是衰弱得不能起床了。我和她共同生活十年了，她从未得过大病，这次可算是唯一的一次。

郭副官通知我，何成湘秘书从城里来，要我去听他谈时局问题。原来，城里已在准备疏散，日本人可能进攻重庆，蒋介石不是投降就是逃到山里去。周副主席的计划是，一部分人去延安，一部分人留在山区打游击，有四川本地人关系的最好留下。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M，和她商量我们该怎么办。她却很自信地说，哪儿也别去，日本人不会打来的，这不过是恐吓蒋介石要他投降。我也觉得日军要进攻云贵川可不是容易的。于是，我仍留在乡下看护M，没有进城。《希望》的校样寄来了，等我校看完，M也已能起床活动，她就催我快进城看看。

进城一看，仍是一派升平景象，大街小巷热闹得很。住在天官府文工会，见到了乃超，听他谈最近的情况。果然，日军已按兵不动，并无力量入川，同时，第二战场开辟后，欧洲战线捷报频传。看来，法西斯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到了南天出版社，《棘源草》已出书，《性格》的校样也已到。

看了《希望》的最后清样，就和金长佑一道到印刷厂安排封面制版。因为加了红色的灯，这封面成了三色版。又修改了石怀池的书评和绿原的诗集《破坏》。

年终事较多，参加文协理事会会议；主持文协辞年晚会；又拟就文协结束贫病作家捐款的公启。除夕，在郭主任家开文艺座谈会，得知《希望》已出版。

新的一年到了。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不但结束了为办登记证奔波的苦役，也结束了为出版到处求人的难堪，终于如愿以

偿，看到了我所希望的《希望》了。望着除夕取回的样书，封面上的《麦哲伦通过海峡》，对我诉说着麦哲伦的艰辛，也使我回味着我通过的重重难关。感谢所亚兄在设计封面时将那盏灯套了红颜色，希望这盏灯也能给我们带来前途的光明。

1945年的第一天，文工会同人相约到百龄餐厅吃早点。之后，我去看望郭主任，表示祝贺新年，并随便谈谈今年可能发生的变化，猜测而已。后又到作家书屋去看雪峰，到文化生活社去看巴金。

被邀参加李××的结婚宴。一个并无什么事业的小青年能够搞这样大的排场，摆好些桌酒筵，是不容易的。可见他的能干和交际广了。但我可不愿和他再合作搞什么生意了。

第二天去50号看徐冰，被留下看秧歌表演。这种陕北的民间舞蹈，充分表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单纯朴实。据说在陕北，每逢春节跳起大秧歌舞，往往是数百男女老少一起载歌载舞，场面甚为壮观。

交出《希望》第二期一部分稿后，即搭郭车回乡。几天后，收到梅林的信和王亚平的信，告知骆宾基、丰村在酆都被捕的消息。即复梅林，并为此事给乃超去信，希望他在城里就近商量设法营救。

前不久曾收到昆明王士菁寄来的《鲁迅传论纲》稿，在城里时看了第一部分，回乡后继续看第二部分。我的想法是，有人写鲁迅先生总是应该支持的，何况又是年青人，所以看完后就回信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修改意见。

收到侯唯动、鲁黎、公木等人的稿子。在家二十来天，除了看书就是看稿。看了数十篇稿子，能用的很少。

从报上得知罗曼·罗兰于去年十二月三十日逝世。重看有关他的书籍和材料。

1月25日下午，搭车进城。下车后即到文工会，正好参加冯乃超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后半截。茅盾、以群带头，矛头集中到《论主观》上面。我认为他批评《论主观》不过是借口，实际上是不满意有的文章批评了他所赏识的姚雪垠，并且以为我批评客观主义是针对他的。他虽然对《论主观》骂了一通，但又说不出道理，这使我很不满意。

几天后，冯乃超请侯外庐来文工会做了一次批评谈话。我参加听了，仍然没有被说服。因而，再三请他写文章。一方面是希望能将他的论点公开，与读者见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我发表《论主观》的真意，即我在《希望》编后记中所说的，希望用“无情的批判”来分析《论主观》，用论争的形式冲破国民党的审查，把毛主席关于整风的伟大教导（反对主观主义）带到国统区的文化领域里来，获得一些实践的效果，但他不肯写。

问题提到了周副主席那里。他召集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会前我在乔冠华房里坐着，他给我看了他所写关于《论主观》的要点，我觉得他是基本上肯定，主张慎重讨论的。在会上，只是开始时提了提《论主观》，我说明了自己只对其中个别论点有同感。周副主席马上把问题移到了“客观主义”，问我它指的是什么。显然，“客观主义”才是闯祸的直接原因。我解释说，那是指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和创作对象的关系，并用演员的创造过程作为例子。周副主席马上指出，是有这种情况的，不过提“客观主义”容易招误解，也许用“旁观主义”要好些。茅盾说了几句什么，周副主席就用他的《子夜》作为例子，指出那里面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暂时解决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形势缓和了些。

我留在陈家康房里到第二天下午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和我作了一次单独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凭记忆中的

感觉，可以归为（不是用直接语句提到的）两点：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但我当时对这两点不但没有理解，反而以为昨晚的会和现在的谈话等于对我的工作做了肯定。我在第二期上又发表了舒芜的《论中庸》。这本来是不打算发表的，现在我把我看到的“错处”删去了一些，还是刊出了。

我为什么会破例地在刊物上用起关于哲学的论文？这有一个原因：当时，郭沫若办的《中原》是综合性的刊物，同时，乔冠华等办的《群众》也登了不少探讨哲学的文章。如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曾在《群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几篇文章。我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我同意他们的做法，准备也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表示支持，还特意为我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我计划在《希望》上出《费尔巴哈论纲》百年纪念特辑，从理论实质上批判教条主义。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也谈政治人事情况，多半是国民党的内部新闻。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他办《群众》时，常约我写稿。由于引起不快的争论，我没兴趣搞《费尔巴哈论纲》纪念特辑了。他们几位受到董老的批评，那已是后来的事了。

我编《希望》，除了错发了《论主观》惹出一些是非之外，我认为其他都没有什么错。我的一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在书审处被删去了好几处，总算没有被禁。“反帝反封建”这个点题的主词就被删掉了，我只好用几个虚点“……”向读者暗示。国民党对我的文章限制到连“反帝反封建”都不准说，可见我办刊物有多困难。

我用作品的编排反映了“一个时代两个中国”这个大时代的特点。几篇写农村的小说(响应党所提出的面向农村的口号)从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农村,经过抗日游击战中的农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翻身做主的根据地的农村,反映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改造过程。两种诗集,反映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不同的人民的精神状态和战斗品格。另外,我通过作品批评和社会批评,揭发了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个主题断语响应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概括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共同道路。

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仅重庆市第一天就卖出几百份,不几天就卖光了。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外埠发得很少,后来听说在昆明竟出现了排队买《希望》,甚至用比定价高十多倍的黑市价来买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品总倾向适应了苦闷的读者层的进步要求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情绪,但同时也是由于在思想理论上引起了有关文化界的注意。当然也有不赞成的文章,那是针对舒芜《论主观》的,即黄药眠的《论约瑟夫的外套》。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刊物这样受读者欢迎,而金长佑却迟疑着不肯再版,好像感到为难似的。这不是做买卖人的习惯,我真不明白。他曾向我提出过要我约郭沫若和茅盾等写稿,我拒绝了。这是我多年来办刊物的宗旨。如果我用名人的文章做广告,就不至于在出杂志时受到这多的阻力,在个人经济方面遭受这多的剥削。我的目的就是愿在众多的读者来稿中选出有新的思想新的活力的新人的作品。其实,他也不理解,我之所以受诋毁并不仅仅是因为约这些作家写稿。从第二期起,他就表现出对刊物的冷淡态度,迟迟不付印弄得脱了期。到编第三期时,他提出不愿出下去了,同时把出版《财主的儿女们》的

合约也毁了，这是出版界少见的情况。我当时仅仅把这看作是“宗派主义的谋害”，更增加了抵触情绪。

吕荧从江津来，说骆宾基被打断了两根肋骨。遂到作家书屋，商量由文协派人赴鄞都营救骆等的事。老舍不在重庆，只好由我出面奔走。我找到华林，他是文运会的人，是张道藩在法国时的同学，为人正派，还肯仗义干点好事。我想通过他去请张道藩帮忙。几天来，我奔走于作家书屋（同冯雪峰商量）、文协和华林处。后来还为此在文协召开了一个会，准备向国民党提抗议。2月1日再访华林，他告我骆宾基等的事已解决。但我不知他们是否已被释放，实在不放心。第三天晚上，到文协商量设法使他们早日出来，最好是出来过春节。又去访华林，再一次催促他。

这时，我还为杜君慧主编的《职业妇女》座谈会讲了话，又到南山为流亡学生们演讲。城里的事基本上都办好了，就淋着飞雪搭乘卡车回了乡。

2月12日为旧历除夕，我们全家与郭副官家合吃年夜饭，显得很热闹。但我可能是由于淋了雨雪，又多喝了几杯酒，引起了痔疮发作，还咳嗽，很是痛苦。

初二去到文工会，给同人们拜年之意。收到梅林、王亚平的信，告诉我骆宾基已被释出，这使我很高兴。

2月23日，骆宾基、丰村来。正好周颖于前一天来看我们，留宿在这里。老朋友相聚，非常高兴。第二天他们一同离去。

看完漠青底《悲歌》和刘北汜的《机场上》，都很不错，可用。开始写《答文艺问题上的几个质疑》，两天写完。即着手编《希望》第三期。

春节后正是重庆的黄金时节，所谓雾重庆。决定带M和晓谷一同进城。我们步行到歌乐山，搭十二时的客车进了城。将

她们送到骆剑冰家后，我即到文工会。骆剑冰曾一再邀请她们去重庆玩，她有一间小屋可以留宿。同时，M曾将邻居老太太的寡媳介绍给骆帮忙料理家务，这次也想看看是否互相满意。

M母子在乡下的生活实在太闭塞太苦了，我特意带她们进城来享受一些文化娱乐。她们虽住在骆家，我每天都去陪同她们出来，在街上吃饭，看电影等。还看了川剧、卡通片《浮游仙境》和阳翰笙的话剧《槿花之歌》。我们一同去看了巴金太太，她们是在桂林认识的，晓谷叫巴金太太为“大朋友”。现在，她自己有了“小朋友”——一个小女儿了。两位太太谈喂孩子的事，我和老巴谈我们自己的。

在M参加了三八妇女节晚会后，我送她们上车回乡。这些天我基本上什么事也不能干，这时才开始工作，校对《在混乱里面》。

文协召开常委会，为此拟成《向罗曼·罗兰致敬电》，几天后又参加了罗曼·罗兰追悼会。

改正了《希望》第二期的版式，并写第二期的编后记。我将化铁的《暴雨两岸然表衰而至》这诗放在首篇，是因为它表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是暴雨雨似的人民革命的进发。国民党的旧中国在衰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兴起，在胜利前进。

在我准备回乡之前，五十年代出版社来人说，第三期以后的《希望》不一定能出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除了气愤之外，并没有气馁，决心一定要将它继续出下去。

主持了文协的罗曼·罗兰纪念会后，即乘政治部的车回乡。月底时得知，国民政府已有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这样，我又将面临到完全的失业了！

文工会聚了一次餐，这大概是散伙席吧。大家虽兴致不高，但仍是喝了几杯酒。一同共事两三年的同人们即将做鸟兽散，

心情怎会好受得了！

开始写《悼A·托尔斯泰》，写成后，题名为《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路》。

再次进城，主要是了解南天出版社出书的情形。骆剑冰将她的剧本《海燕》交给我看，意思是想在南天出版。我抽时间看了，写得还不错，但南天出版社无能力出这种书。我不想插手戏剧界，只好将剧本送还她说了我对剧本的看法并说明不能出的原因，建议她去找夏衍、阳翰笙这些老戏剧界的人士。如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推荐，别说出书，连上演都不成问题的。我知道，她和他们的交情都不错。

回乡后重看罗曼·罗兰写的传记和剧本，以及有关他的论著。我想为他编一特辑，如文章多就出一附册，以纪念这位在文艺思想以及创作实践方面非凡的老人。

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下部已写出了不少，我看完了第十三章。

专程搭车去北碚看老舍。由于他夫人来后他长期住在乡下写作很少进城，一些会务方面的事，我应去告诉他并同他商量今后的工作。这天，留宿于他家。第二天又同冀访、石怀池等一同过江到黄桷镇路翎家，大家闲谈，宿于路翎家，第三天才回到赖家桥。

在城里旅馆里见到朱子敬。他是河南安阳的文艺青年，《七月丛书》和《希望》的读者。和我通过不少信，批了一些南天的书去推销，并寄了一笔钱加入出版社。南天在重庆能重新经营是和他的帮助分不开的。这次他来到重庆我们才第一次见面。看得出他十分朴实热情，并有着北方人的气质。听我谈了出版社的情况和面临的困难后，他决定把带来的钱（一万余元）交给出版社、自己到李子坝一个什么工厂去当工人。这样坚决，对南

天这样信任，不能不使我感动。我后来在南天还遇见过他三两次。他沉默寡言，问一句说一句。我只知道他在工厂处境很困难，看书都要受到监视，只好装作没有文化。大约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就回安阳去了。后来，我们结束南天转办希望社时曾与他联系。我回上海后，他还从老家给我来过信。我出的书每次都寄给他，不知什么时候就断了通信来往。希望他没有因我的缘故受到任何牵连，我一直为此放心不下。

文协开年会，我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及研究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即主席）仍是老舍。

文工会解散，今后的工作只能在城里了，想找一个固定的住处将M她们搬来。乡下的生活开始不便，挑水、买菜和送报都没有人了，只好求外院的富农家帮忙，给钱他们还要拿架子。在家除了看稿看书外，我就开始清理杂物，准备找到房子随时搬家。

但进城后问了几个人，都说暂时没有合适的房子。在城里时参加了文工会送郭沫若赴苏访问的会、中苏文协欢迎苏联大使鸡尾酒会和文协欢送郭沫若的茶会。

在乡下的时间主要用在看书上。文工会那里除了拿报纸很少再去。人员都走散，连这留守处也将留不住，过去的热闹再也见不到了。我们的邻居郭副官讲起各人自找门路的情况，更是感慨得很，这一群文人连最后一个窝都被国民党端了，可见他们的狠毒。

看了些法国作家和旧俄作家的小说。写成《关于善意的“第三人”》，对某种知识分子的善意观点进行善意的分析和批评。

路翎和阿垅来。和路翎谈他的《财主的儿女们》下部，和阿垅谈他的诗论。几天后写成《财主的儿女们》序。整理完《罗曼·罗兰》小册子稿件，开始写《罗曼·罗兰断片》，三天写完。金长

佑终于正式来信说他们决定不出《希望》了，我得另谋出路。

搭便车进了城。到五十年代出版社没有见到人。与伍禾谈南天的事，这些日子共收到信件稿件近百封。

第二天上午，参加邹韬奋和杜重远的追悼会。邹是因脑病从新四军回到上海，医治无效终于死去。我在东江游击队曾和他同一个大铺，谈过话，方知他为人很平和，能理解别人。死得太可惜了！我和杜没有接触过，死因也不太知道。只知他为了救亡和营救张学良，曾艰苦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忽然，传来了石怀池淹死的消息。石怀池，原名束衣人，复旦的学生。我去北碚时，冀访曾领来见过一次。后来寄给我他写的批评文章，有清新的见解，在《希望》上发表过一篇。他正准备进中原解放区。这次，在过江时遇到了风暴，按理是应该派船去营救的，但船被控制在岸上的船主手中不准去救。那船主是复旦的体育教师陈丙德。后来才知道他是特务，安插在那里监视学生的行动，对这些要去解放区的学生当然不会去营救。知道这消息后，我的心情很是沉痛，立即给复旦学生会去信，表示悼念。

冀访带来了他自己的和石怀池的稿件，两人都相对凄然！

与李哲民谈南天出版社的前途问题。他和伍禾有矛盾，但现在谁也没办法拿出力量来支持南天的发展。

8月8日，得知美国的原子弹于前一天炸了广岛。第二天，苏联宣布对日宣战。大家都在兴奋和对未来的猜测中。

10日夜，消息传来，日本投降了。当时，我和宋之的正在文协楼下会议室下象棋，王莘激动地跑来告诉我们。我兴奋地跑上观音岩去看了一会，只见市民非常激动，很多人在放鞭炮，街上挤满了人，美军的吉普车流水似地向城里闹市开去。全市在狂欢中。

后来，到文协楼上各家串门，谈话充满了从心里发出的喜悦。到处都在举杯庆贺，我几乎喝醉。一连两三天都安静不下来，好像八年亡国之痛的沉重压力，一下子都卸了下来似的。

到曾家岩，看到了党印发的延安总部的受降命令和进军命令。民主党派人士在兴奋地交谈。

蒋介石见“军令”攻势引起了反击，改取了和平攻势，连在政治上无知的我都觉得那是很厉害的一手。他想把和平大旗抢去，欺骗人民，做内战的舆论动员。形势紧迫。有人劝我打个电报给周副主席，希望他马上回重庆，争取主动。但我觉得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明若观火，还用得着我提意见么？

我认为文协应该发一个庆祝胜利的宣言，冲击下蒋介石的舆论动员。和乃超、以群他们谈后，都很同意，就要我起草，写成后给老舍寄去。但不知为什么，他回信说不同意。于是，乃超他们决定要我和阳翰笙一同去北碚看老舍，和他面谈。我觉得，这是作为进步作家对国家前途应取的态度，必须争取发出来。回乡修改好宣言后，就和阳翰笙一同去了北碚（记得在宣言中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进步”这四点要求，八月底九月初的重庆报上都有的。目的是迎接胜利，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动阴谋，予以揭露）。在老舍家晚餐，和他谈近日来的国内外情况。他很兴奋，对宣言表示了完全同意。夜宿于兼善公寓，得知毛主席已于前一天到了重庆。

回家后，即修改抄出了21日步王白与《喜降》诗原韵二首：

(一)

已教欢乐霎时倾，且忆哀声与杀声。
我有创伤君有泪，弹余庐舍火余林。
冤沉旧鬼兼新鬼，耻印南京又北京。

莽莽苍生憔悴甚，人间坎坷待谁平。

(二)

漫拈秃笔且题诗，后乐先忧记此时。

怯将贪官无数计，封功受土几人宜。

权谋惯见奸欺正，海口空夸夏变夷。

魔影憧憧须烛照，男儿何事急归期。

在乡下坐不住了。清理了书籍，收拾好行李，准备随时搬进城去。

搭车进了城。晚上，和雪峰同到50号。徐冰陪我们到红岩山上去，说主席晚上在那里，可以见见面。那里正在举行舞会，徐冰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将我和雪峰引到主席身边。主席很客气地握了手，正在谈着话，一位从延安来的女记者跑来拉着主席撒娇地说：“我就是不让你们谈话，”就拉去跳舞了。后来虽然又有机会站在一起，但和主席也只谈了几句话就又被人拉走了。当夜宿于50号。

参加所谓文化界复员谈话会。中心问题是交通工具。现在已有人飞沪，但飞机票可不是随便能买到的。有人介绍我认识郑璟君，他即将飞沪，托他带信和一万元现款给M的母亲。

为鲁迅著作版税事访沈钧儒，希望他将我交他的帐单和现款(本来说是买成金子的)设法托人交给许广平。

梅林建议我住在天井里新添盖的小屋，我觉得这样也好，就向50号借了卡车回赖家桥将家搬进城，暂时住下再说。

住下后正逢中秋节。我们都知道这该是我们在这里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无论如何明年总可以全家团聚了。心里很高兴，想好好过个节，就买了一些月饼和水果。在桂林认识的三户图书公司经理贺尚华请我们吃午饭。收到了许广平的来信，告诉

我们晓风无恙。我们放了心，也为此高兴。

住到文协后，接待城里的客人比较方便，对文协的工作也能及时处理。主持了文协常会，为文协执笔给上海作家的慰问信，交即将去上海的夏衍带去。我还请他带给许广平一封信。

应胡乔木之约特去看他，谈话约三小时。我向他汇报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情况，详细内容记不起了。

收到美国华侨空军李行素的信，并代其友人(也是参加盟军的华侨)寄来为贫病作家捐款二万元。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甚令我感动，即交秘书处保存作专款用。

9月27日下午，周恩来同志招待文艺界报告谈判情况。这次毛主席来渝，真是一场唇枪舌剑，斗智慧斗魄力的斗争。谁站在人民一边，谁定取得胜利，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只是胜利了一半，现在主要的是争取和平和民主，不能再让蒋介石搞独裁。而我们就应设法复员回乡，回去开展工作。

为文协全体会员复员事，与姚蓬子访中宣部部长吴国桢。他的回答是得慢慢来。后来，又与巴金、姚蓬子再去访吴国桢，仍然答说要想办法，一时恐怕还办不到。

被邀参加了张治中欢送毛泽东主席的酒会。11日晨赴九龙坡机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主席正要上飞机时，我虽然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看到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握别，又知道张治中陪主席一起去延安。飞机起飞了，这才感到沉重的担心消失了。

胡乔木、何其芳来闲谈，大家都有一种胜利的轻松的感觉。

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是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的。这次的政治气氛最好(没有国民党人参加)。周副主席出席讲了话，冯玉祥先生也讲了话，老舍朗诵鲁迅先生一段小品，

很精彩，我也讲了话。胡乔木、乔冠华都参加了。许寿裳也进城来参加会。两天前，记起多年来尤其是前一年纪念会上特务捣乱的例子，就在给舒芜的信中说“但这照例对我是灾难”。我以为国民党甚至特务又要“合伙”捣乱了，这真是“无聊之至”。而“那些诸公”当然也不是指周副主席、党的领导干部以及进步作家的。

晚上，在郭主任家开文艺座谈会。主要是漫谈过去的文艺活动，总结经验并讨论今后的工作怎样开展。还提到了文协的名称问题。第二天，文协召开了理事会，决定将“抗敌”二字取消，改名为“中华文艺界协会”。

为文协复员事，又与老舍、王平陵到行政院去访蒋梦麟。为鲁迅版税事，与曹靖华再访沈钧儒，请他无论如何将我以前交他的帐单和钱找出来，好设法带给许广平。

邹荻帆来看我，说他即将到上海去工作。就托他将《希望》一、二期纸型交俞鸿模，并将计划在上海重版的《希望》封面也交他，希望俞能在上海再版发行。这可算是我离上海八年后给上海读者的见面礼。

11月7日上午，带M和晓谷去参加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一年一度，进步的文化人都要到大使馆来表示对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祝贺。费德林出来招待我们到小客室，随便谈了谈。他问我将来到哪儿去，我回答说即将到上海去。而他可能是去南京。

我遵照胡乔木的意思，去信约舒芜进城来和他谈话。8日下午，胡乔木到我的小屋来与舒芜长谈。M和晓谷都到外面去了，我在一旁坐着，并没参加谈话。问题没谈完，约定第二天早晨在胡乔木住地再谈。舒芜恳请我，要我陪他去（解放后，我才懂得他当时是有点胆怯了，因为那里是邓颖超同志也住在那里的党的机关），而他又是我约来的，我只好陪同前往。实际上，我

坐在一旁，一言未发，因为这种哲学方面的专门性问题，我并不感兴趣，自己也觉得是惹了麻烦。我昏昏沉沉地听着，几乎要睡着。大约谈了两、三小时，双方争论得很激烈，舒芜简直是脸红耳赤了。最后，不欢而散。我和他回到住处时，他愤愤地对我说：“他设了一个个陷阱，要我跳下去！”我也以为真是如此，所以就同情了他。后来在给他的信中将党的领导人说成是“权贵”，经他一上纲，倒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了。

文工会同仁为郭沫若主任做寿在特园聚餐，摆了五、六桌。可能是难得聚会的缘故吧，大家都很兴奋，郭主任喝多了，说了一些醉话。

最近情况很紧张，看来蒋介石将挑起一场内战。我曾参加群众团体主持的反对内战大会。

《财主的儿女们》出版了，我高兴地吁了一口气，亲自到各书店去推销。因为南天出版社已宣告结束，此书由希望社出版。不管南天的工作对新文艺是否加进了一些什么，但它对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是尽了一份力的。由于它的先天就不健壮，仅仅是靠几个热情的青年省下自己的学杂费投资创办的。当时连想也没想到，它居然支持了四、五年，出了十来本书，好容易在重庆站住了脚，由伍禾负责经营，还请了一位会计，一切都走上了正轨。谁知胜利的爆竹声一响，土纸印的抗战作品就很难发行了。两个工作人员不但工资，连生活费都将付不出。只好将存书分摊寄给了几位出资者，正式宣布结束。我在宣告结束的通知中表示了对出资者和工作人员的感谢（其实不应该由我，因为我和作者们没有谁领取过一分报酬）。

我开始筹办“希望社”，为它募股。我觉得，无论时局的发展如何，都应该遵照主席的往最坏方面打算的教导，设想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打几年“疲劳战”。过去编印的那些作品在抗战胜利

的兴奋过后，还会在抗战历史的教育中发生作用，对沦陷区的读者尤其如此。而和我接近的正在成长中的一些作者今后的作品，我不去编选出版，也将是放弃了责任。但这一切是不能依靠商业性书店的，于是，和南天出版社的结束同时，我开始用希望社的名义进行募股。

当时，我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进行募股，是因为还有一股力量在支持我。参加美国空军的华侨读者李行素来信问我好，并转来另一华侨读者曹凤集的信，向我问候，信中还附有数元美金。我回信后，曹说担心我的生活，又寄了钱来。我去信告诉他，我个人的生活不成问题，可否请他们募点款给我办出版社。他回信同意了。

就这样，在通信中认识了李行素、曹凤集，还有他们的朋友路斯。后来在上海，他们的朋友也参加了美国空军的周志竹和我见了面。他们都在为我募股。我只见到过李行素、周志竹二位，知道他们都是广东潮汕一带农村出去的青年，是在美国打工的。曹凤集曾在美国当洗衣工人。他们对我的工作表示的热情支持，很使我感动，我相信他们是爱国华侨，而且是左倾的。他们对鲁迅先生很崇敬。从曹凤集的信中我还得知路斯是美共党员。董必武副主席参加联合国大会回到重庆后对我说，他回国前华侨某某来送行，说我寄去的募股本子如果早些到时，就可以托他带些钱来。这位华侨不是共产党员也一定是拥护共产党的。可见曹凤集等和党在美国的组织是有联系的。

我从来没有结交过什么权贵和资本家。有几位进步的老朋友，经济条件稍好些，我请他们代为募股，结果他们自己都出了一股（一万元，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一百元）。未能代募。

影剧界的赵丹、秦怡等很乐意表示赞助，都认了一股。进步的读者如青年学生们，有的两人或三人合认一股。王士菁、

倪斐君出的都在一股以上。还有一些是别人代募的。这样，我在重庆时共募得股金十多万元，我就是用这些钱开始了希望社的工作。

我在桂林追回的鲁迅书籍版税和重庆再印的版税，都托史东山带给许广平，另外又给她去信说明情况，详帐等沈老交给我后再寄她。

毛主席为了争取和平，冒着生命危险来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事实证明，蒋介石和谈是假，布置反人民的内战才是他的真正目的。重庆街头，出现了流血的斗争。党的优秀干部李墨农在开着的汽车内被国民党的士兵和警察从背后射击，头部受伤，牺牲了！我参加了周副主席亲自主持的告别式，周恩来同志沉痛的悼词，大义凛然地指责了国民党反人民反和平的罪行，使我很受感动。

《希望》出版三期后，同五十年代出版社结束了出版关系。本来预定是出四期为一集的。现在，剩下的第四期只好自己设法出版，以完成这一集的计划。有人介绍说《大公报》可以承印，并且能够很快地印出来。遂去李子坝访王芸生。他过去曾责备杨刚不该发表我的文章，这次他却很客气地答应了这笔小生意，同意卖纸给我还可以先垫纸，等我收到书款时再付钱，这可真是很大的照顾了。

又去托生活书店发行，他们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开始编《希望》第四期。这期主要是庆祝胜利，庆祝这个八年来全国人民斗争目标的实现。要透露出这个胜利的性质，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转折点，从以民族解放为主流转到以保卫胜利成果和人民解放为主流的历史新阶段上去；要透露出国统区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一定会在政治斗争的影响下向前发展。

这一期果然很快就印了出来。字数不多，仅十来万字，但内容很丰富。第一篇是绿原的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总结了八年抗战人民的苦难和英勇的献身，它为胜利的未来呼唤着一个新中国的出现。路翎的一组小说《胜利小景》，及时描绘了人们当胜利来到时各式各样的情景。杂文《青面圣人》等，抗议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迫害。所有这些，都宣扬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为完成民族解放和进行革命的一场新的斗争的起点。

由于书刊检查取消了，我所要透露的是多少实现了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通过文协宣言和这一期《希望》，在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舆论攻势下面，和当时文艺工作者对党的关系问题上，我是做了一些努力的。

12月22日，我在纪念萧红的会上讲了话。意思是，纪念一个作家朋友，应该说真话。我说，萧红后来走向了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道路，这是毁灭自己创作的道路，我们应该把这当作沉痛的教训。后来听说骆宾基很生气，认为我贬低了萧红。他为开成这个会奔走筹划，花了不少气力，但我认为评价一个作家只能根据他的作品和他所走过的道路，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来一味美化。他要把萧红美化成为理想的人物，我这样说他当然受不了。

老舍和曹禺将应邀到美国去讲学。文协为他们举办欢送晚会，第二天，60号又为他们饯行。我都参加了。同时，为了回上海的飞机票，几次去找吴国桢，都没有确切的答复。心情很焦急。

与老舍谈文协事，他虽是要走了，但对即将改组的文协还是有些想法的。我们回忆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对文协迁上海后将怎样干感到有些渺茫。看得出，他虽去美国，但并不觉多

么得意，而是对刚胜利的祖国很是依恋。他和我们闲谈，还用扑克牌做游戏，聊以排遣。后来，就回家过春节去了。

我们这些住在文协的人在一起共聚除夕夜。饭后一起打扑克，心情都是轻松愉快的，至少没有了轰炸的恐怖。

张治中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鸡尾酒会。最近，重庆的民主党派很活跃，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新党派。也有人暗示我或试探我，问我准备参加哪个党派。连郭老都说愿作民盟的尾巴的尾巴。我的态度很鲜明，我是无党无派者，除非参加共产党。

几天后，在校场口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特务假冒群众，殴打了参加大会的人。郭沫若被打了，我即赶到他家去慰问。

文协同人包水饺为老舍饯行，他的夫人也来了，晚上并一起玩扑克。第二天，送老舍乘飞机去上海，转美国。

为文协起草了慰问郭沫若的公开信。

牧青(鲁煤)来陪同到盘溪国立艺专去讲演。讲演后，与林风眠、李可染教授及学生等闲谈。在李可染家小坐后即回城。

到行政院打听机位，总算批下来了，大约是2月24日。吕荧从涪陵来，谈得很欢快。

又到社会大学去讲课。已讲了四、五次，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学生多半是陶行知育才学校的年长的学生，也有些要求进步的青年。

吕荧突然发作盲肠炎，叫人拿了一个条子找我，要我到医院去为他签字办手续住院。第二天下午去医院看他，知已动手术，情况良好。回来后他又托人送条子来说太冷，希望给他送一条棉被去。梅林说没有，M就将自己的毛毯交来人带了去。

到行政院取得通知，可以去机场买票了。上午去没能买到。

这时，新华日报门市部被捣坏，工作人员被打伤。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的罪行越来越猖狂了。我到市民医院去看望受伤的同志，他们的昏迷状态更激起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

在这斗争形势如此紧张的繁重工作中，周副主席还关心着我们。怕我们旅费不够和到上海后生活窘迫，特让何其芳送给茅盾和我同样数目的一笔钱。当天晚上，又在周公馆(50号)设晚宴为我们饯行。记得他一边为我们劝酒，一边大骂国民党。他说，下面的人听着(下面住的是特务，专门监视50号的工作。所以我在信上曾说过，在重庆期间，到党机关去好像冒着炮火一样。这是指党机关处在敌人的监视中，并非强调我自己的危险处境。炮火只是象征。)，共产党是不怕暴行的，我们将较量到底，看谁最后胜利。

最后，还是托电影界的朋友去为我买了机票。临行前一天，到中央代表团去看望周恩来同志，向他请示如果被人问到内战危机时该如何解释。陈家康在座。周副主席对我作了国内外形势分析，说明共产党是要和平的，国民党挑起内战是自绝于人民(大意)。后来，他提到思想问题，说延安反对主观主义时，我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愚不可及的我依然没有理会，没有重视，只觉得我的观点是针对文艺创作来谈的，与哲学和政治无关。而我这种看人看事的思想方法，恰恰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它害得我可不浅……。

2月24日下午，送行李去过磅。雪峰来了，他大约两天后也将乘飞机回上海。

25日凌晨，我和M母子在珊瑚坝机场坐上了民航机。这种飞机，机身不过一节电车大小，对排的座位，可以坐十多个人。我们一行还不到十人，所以座位上还可以放小件行李。起飞时

感到一阵震动，后来就平稳了。一直飞得不太高，可以望见下面的梯田。我贪恋地透过云层望着这抗战八年居住过的山城，再见了！

八 重返上海

上 篇

从1937年9月25日离开上海，到1946年2月25日下午一时回到上海，历时八年有余。当时匆匆离开上海告别岳母和妻妹时的凄凉情景，和在车站艰难地挤上火车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一晃八年的时光就这么地在炮火、轰炸、逃难……中过去了。只是，这一段血腥的艰苦的岁月是永远忘怀不了啦！

我们三个人总算完整地回到我们的“家”了，但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杂乱。不是劫后的荒凉，而是沦陷区上海的畸形的拥挤的丑陋。过去是我们卧室的二楼，近二十平米的房间里，书桌上上下下堆放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周围是堆起的满是尘土的家具。仅有靠门的一张床和中间一张方桌上的情形，才辨得出这房是住得有人。

我们推门进去，老岳母正独坐桌边，一见到我们先是吃惊，后来就高兴得哭了起来。看得出这八年的生活对她真大不易，不仅人老多了，精神上似乎也变得迟钝麻木了！

吃了岳母做的饭菜。虽然十分简单，但M却吃得有滋有味，这点我能理解。多年来，她总念叨着母亲做的饭菜，今天才总算又吃到了。另外，我们乘机回来途经南京曾下飞机几分钟想吸口新鲜空气，但她和晓谷被冷风一激，却将刚吃下去的冷餐吐得一千二净，这会儿正是饿的时候。我从没看到过晓谷有这

么好的胃口，他几乎将外婆做的饭菜全吃光。

现在，我们将在这里住下来，我还得在这里像过去一样地工作、学习。

我向老太太详细了解这房子的现状。三楼原先就已出租，现在连两个小亭子间也都租出去了，楼下又让早住进的房客堆放了杂物。那么，我们能栖身的地方，就只有这一层了。岳母说着说着，忍不住伤心地流下了泪，因为她只能靠这些微薄的房钱来维持生活。三个女儿陆续离开她到大后方去了。前房的儿子对她很少照应，但是到敌伪军占驻上海时，他却到这里来将我留下的书籍全部烧尽。老太太请求并想加以阻挡，还遭到了他一顿痛骂，说这些书是替共产党宣传的，日本人如果查到了他就得受连累吃官司坐班房。她对我表示了没能保全这些书的惭愧，终于哭出了声。看着她本来就很瘦小的身材，由于这几年沦陷区的半饥饿的生活，显得更瘦小了，我哪能责备她啊。我反而十分佩服她居然能有在这样困苦的环境中挣扎着活过来的勇气。

在屋内草草清理了一下，安排好床铺，我们躺下休息了一会儿。晚饭后，天还未黑，就和M一起去看望许广平。走在这过去熟悉而又热闹的霞飞路上，我们感到非常陌生。二十年代我曾在这条路上走过，三十年代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多，但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行人不少，店铺布置得仍然花团锦簇，但很少人进去购物，连在门口停留观看橱窗的人都很少；没有霓虹灯，连电灯都不亮。一派萧条景象，这很出我意外。霞飞坊过去是高级住宅区，现在也成了又脏又乱，并且人声嘈杂。

到了许先生家，她住在二楼（楼下已出租，连二楼亭子间也租出去了，留下了三楼堆放鲁迅先生的书）。相见之下，都感到激动和欣慰。她曾被敌人逮捕吃过苦头，在敌伪统治下过了四

年艰苦生活，但看来身体无衰象，精神仍旺盛，仅只头发白多了。听她谈起留在上海的文化人的情况，知道我托人带给她的钱早已收到，并将用以为鲁迅先生修葺墓地。因为那里早已是荒草一堆，想去看看祭奠祭奠都不可能。说到这里，大家都很感凄然。我在桂林时曾将要到的鲁迅著作版税款交给徐伯昕，他说拿去换成金条后交给许广平，但这次一问许先生却是并未见到这笔钱或金子。真奇怪！

告辞出来都十时许了，M说引我走近道，谁知小路上连路灯都没有，结果在小弄堂中转了半天，才找到她熟悉的小菜场，总算回到了家。

从许先生那里了解到一些从重庆返沪友人的情况。即去访姚蓬子，他新开张的作家书屋地处威海卫路和福熙路之间的两间大门面，三层楼的店房，可称得上富丽堂皇了。当前的上海除劫收大员外，谁有本事有金条搞到这么大的房子？他说是同乡借给他的。这位同乡放着有利可图的整幢楼和好店面不自己用而借给他？不用说，他的国民党身份和内部关系起了作用。不过，我们还是对他能在上海打开局面表示了祝贺，希望他今后能多出好书卖好书。

一同去访老舍，未遇。后来，又去农商银行访殷维汉。这是我们在桂林时结交的王珩女士的丈夫，他曾代我转过款给晓风付学费，夫妇俩常去看望晓风带她玩。这次才见到殷，是一位很诚恳正派的青年。第二天，夫妇俩来看我们。M见到王珩十分高兴，除了感谢她之外，她俩有着说不完的话。这位王阿姨在桂林时也是晓谷的好朋友，现在晓谷虽然长大了，可还是对她很亲热。

到后第三天才见到了老舍，并和他一起去逛新城隍庙。这种地方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上海人对他们的老祖宗、老

守护神的一点怀念和尊重，真实目的还是为了做生意。里面和老城隍庙一样，有着各种摊头，但太小了，转一个圈就逛完了，来烧香的人倒不少。

抓紧时间做了《鲁迅先生版税收付情况报告》。这是我在重庆向一些书店追回来的版税，一直存在沈钧儒先生处，抗日战争后才托人带上海交许先生。现在需要将情况汇总一下，列一清单，再交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

到俞鸿模家去看他，原来他的住处离我很近。他从延安出来曾到武汉找过我，后来回上海来办海燕书店，出版过几本《七月丛书》，这次我又托他在上海代为翻印《希望》。我和他已八年没见面了，过去的小青年，现在可苍老得几乎使我认不出来。原来，他在敌伪时，由于新知书店被破获，不但新知出的书，连同他自己经营的海燕出的书，都被卡车拉走，他作为主管人被拘捕，关了三个多月，受尽了种种酷刑，肺病重发，吐血不止，这才被放出来。后来，只好在中学教书以维持生活。

谈过这些遭遇后，又说到他一生所热爱的出版业。他仍认定要出文艺书籍，哪怕是不赚钱。这应是我和他的共同点吧。他告诉我《希望》已全部再版发行，开始销数还好，印三千也只有几百本存书，后来几期销数就差了，可能是读者对大后方的刊物已不感兴趣了，再加上没有介绍的文章。现在还存千余册，仍在设法推销出去。我没好意思说想先结下帐（我曾陆续托人带给他好几十万元，这都是希望社的股金和我私人的积蓄），我计划买下些纸用以希望社出新书用。

雪峰曾来看过我，他仍寄居在作家书屋二楼上一间小屋内。

找到三楼亭子间的房客倪君，商谈退房的事。原来，他早已不住在这里，过去是为他的情妇租下的，后来情妇弃他而去，

他就没再来住过，只留下点杂物（床和桌椅都是我们原来的）。开始，他还想敲我一笔退房费，被我严词申斥了几句，他老实了，答应设法搬走。

全家到女青年会托儿所去接晓风。我本想找个所长的熟人同去，好说话些，但没找到。果然，在听说我们来接孩子后，她虽出来接见了我们，却是满脸冰霜，一再责怪我们不寄钱来，也不早点把孩子接走。可能是看到我们的穷酸打扮后，才这么骄横的吧。她说得M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们实在也无力补交这笔款。

她进去把晓风领了出来。见到的是怯生生的神色和瘦弱的孩子，心里真难受，M终于哭出声来了。所长还塞给我一个捐款本。这样，我们不但对她没有任何感激之情，反觉得在物质和人情上并没有欠她。孩子显然没有得到按上帝嘱咐的照顾，而她的托儿所是得到过各方面的资助，并不是她个人的慈善施舍。她对共同生活了四年的孩子没表示出一点热情，最后连和我们招呼都不打就离开我们进去了。我们牵着孩子出了铁门，我抱起她在她脑门上吻着，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解放后，妇联曾向M了解这位所长在任期内对托儿所的孩子，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照料的情况。M不愿说什么。只说，我们没办法按时交钱，受点歧视也应该，不过，使孩子受苦，是不符合基督精神的。）

孩子虽然接回来了，但她对我们，我们对她，都感到陌生。她总是望着我们，和我们话都不说，问一句回答一句，同外婆才有话说。让她总在这间堆满杂物的房里是不合适的，M就去弄堂里的粹光小学交涉，说好了插班进二年级。她已七岁多了，字识得不少，看去还聪明，但对功课不适应，对学校也不适应。M给她买了小学生应有的全新的所有学习用品，可等放学回来

一看，铅笔和铅笔刀都没有了，原来是别人借去了不还她，她也不知道要回。看来，她还需有个熟悉家庭生活和学校学习的过程呢。

到作家书屋会同蓬子、以群、雪峰等到汇山码头去欢送老舍等，但码头已不是过去的了，我们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那大轮船，只好算了。于是，同到虹口公园、北四川路一带看了看。过去常来的北四川路，也一点不是过去那样了。店面大多关着门，招牌多半是日本名字，只是，现在日本人已不多见，换了一批刚从大后方来的劫收大员，所以过去这里是广东人的世界，现在却充塞着各式方言土语了。马路旁的地摊很多，卖日本人剩下的衣物和书籍。看了一下，没什么好书，大家就都各自走散了。

在北四川路一带看了以后，倒了解了一个情况。那里空房仍很多，听说是，只要能设法住进去（抢住进去），再设法得到国民党房屋管理处的同意，那房产主就非出租不可了。骆剑冰夫妇就住进了一幢西式洋房，还占了一处店房。她来看我时曾劝我也去弄一幢，并告诉我她的朋友×××都搞到了。我当然很想在北四川路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将来希望社办事也方便。但仔细一查询，那里的空房多为捷足者“劫收”了。再说，就是占了房子，还得去向官方求情，这在我也是难以办到的。虽说，抗战时期我做对敌宣传工作，曾认识一些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官员，可都没和他们有任何私人交往。因此，我终于没有下决心去“抢”房子。

不过，住处实在成问题。三楼亭子间的房客仍在拖着不搬。只好找来M的哥哥，要他将二楼亭子间的门打开，因为这间房是他给锁上的。其实他对这房并没有主权，这只是欺负老太太罢了。我又让雪峰请他的同乡孟太太向楼下存放东西的房客疏

通，望早日将杂物搬走，这样，我就可以在楼下有一间客厅，将来也可做希望社办公用。最难办的是三楼，那家住了五口人。交涉过几次，非要我给他金条找到房子才能搬出。我哪里去找金条？我到房屋租赁管理委员会，请求他们协助，又写了份关于房子纠纷的申请书。不过，据说这管委会是空衙门，办不成事的。但是，三楼这家房客不搬走，我实在不能心安。他的社会关系复杂，对我工作很不方便，尤其是办出版社，我担心将来会出事。

从重庆来的人已很多了，他们多半都住上了房子。有的是机关早已占下的，如宋之的住在过去日本人的万岁馆；有的是出钱顶的，如叶以群在派克路为他的办公处顶的。只有我纠缠在请房客退房之中，搞得麻烦得很，没有进展，而又花去了我不少的时间。

中国文化投资公司请吃晚饭。许先生也参加了，还有一些文化人。这公司在威海卫路有一个大门面，是三层楼，还有印刷厂。他们曾代卖过《希望》和希望社的书。主人胡国城很年轻，有魄力、很想干一番事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后来，许先生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是进步人士。公司楼上有很大的会议室，我曾在那里为他们主办的文艺晚会讲演。胡经理向我表示愿意出《希望》杂志，我和他谈了我的出刊计划和条件，他初步同意了，要我拟定一个出版合同。他的印厂也表示愿翻印希望社的书。

回沪快一个月，什么事都没做成。除去为之江大学部分学生讲话，到青年读书会，对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讲话外，只补写了几节离渝日记。别的事再也做不成，连坐下来看看书都不可能。收到各处朋友们来信不少，尤其是舒芜的信特多，但我也无法一一作答。

3月27日，贾植芳夫妇从徐州来。他是看了我为希望社在上海登的广告后和我通信取得了联系。留他们在家午饭，饭后一道去杜美电影院看电影《莱茵河的守卫》，闲谈至晚饭后辞去。植芳，我还是在重庆时才初次见面，现在一别五、六年了。他在徐州沦陷区做策反工作。夫妇俩都很热情，很健谈，还都能饮酒，使得我们家里也热闹了起来。他们常来，总是留下吃饭谈到晚上十来点钟才走。我们还一道去看过影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晓风在他们面前显得活泼多了。他们在徐州比较寂寞，可能看不上这类电影。五天后他们回徐州去了，我送他们到卡德路上电车，说好回去后仍要继续写作，下次再来上海玩。

收到阿垅来信，告诉我张瑞已自杀身亡。信中话不多，但字字都是血泪。他为人诚实而又重感情，这对他的打击真太大了！要安慰他减轻他的痛苦，不是去信能做到的，只盼望他重视自己的工作（写作），保重身体，振作起来。

抽空和M一道去北四川路，想买点旧书和旧衣物。这次回上海后，发现从重庆来的“文化人”都一改过去的穷酸穿着，破衣烂衫大多换了西装，很有绅士气派。当然，这也是为了适应上海人的势利眼。因此，M一再向我提出也应该去买一套西装，不能再穿灰布大褂了。她想找弄堂里的小裁缝为我正正经经做一套，那样比买旧衣服好。可我觉得钱应该投资在希望社，为将来出书用，还是买旧衣省钱。但看了北四川路沿街的地摊，就是找不到我合身的衣服。日本人的西装不仅短小，料子还不好，都是人造纤维的。从这也可以看出这多年的战争对日本普通人也不是好过的。听说，日本人清放回去时只能带自己带得动的东西，所以，各式各样的杂物丢弃的很多，被人抬来或偷来卖掉，而这些都是劫收者不要的。我挑了几本书，买了一个大烟灰缸，它可以放下我每日二、三十支烟的烟头和烟灰。M是

反对我多抽烟的，她看了很不满意。她自己买了一件绸的女和服，说是可以改做棉袄面。

路遇陈烟桥，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坐坐。他已在某弄占了一间大楼面，可能还有一小间。一家四五十口（他的老母已从广东来此），住得还算宽裕，在他那里碰见过去三十年代时的漫画家张鐸，他后来常为老爰的副刊画漫画，因此我认识他。M也认识他，那是因为他曾和M的干娘同住一幢楼。M向他询问她表妹在延安的情况，他说她们夫妇可能会调到这边来（M的表妹陈素是我介绍她去延安的，后来在鲁艺进了音乐系，何其芳到重庆时曾告诉过她的情况，似乎学习工作都还不错）。我们又去到熊佛西家。他现在是上海剧校的校长（？），所以住了一幢日本式的房子，堂屋里仍铺着踢踢米。他一个人带着小儿子住，请了一个奶妈。叶子已回北平老家，并且和他离了婚。我不好问他详情。他仍像在桂林时一样，对我们非常热情，硬留我们吃了午饭。

由于众多烦杂之事，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起床时晓风已上学去了，我回来时，她不是睡了就是躲在一边一个人坐着，或同外婆谈话。她同哥哥也不大能在一起玩，尽管哥哥给她看书和她讲故事，他们总不能像一般兄妹一样有笑语也有争吵。因此，我们决定带他们到兆丰公园（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去玩一次。坐车到静安寺路再转直达兆丰公园的车。谁知这趟车却空前地拥挤，等了几部车，旁人一拥而上，我们被推到一边上不去。最后，我硬把M和晓谷从后面推上车，再从窗口将晓风塞了进去，但等我再要上车时，车已开走了。我们只好在公园门口会齐。

公园里也已不像过去那样有碧绿的草坪和各式鲜花，现在只见到处是人，连找个椅子休息都不可能，只得带他们去看动

物。那里人也不少，动物却不多，只有一些常见的猴子、熊、狐狸等。晓风却看得很带劲，妈妈告诉她这些动物的生活情况，她听得很有味，简直高兴极了。这四年多来，她几乎没接近过任何动物，听外婆说那时接她回家来住一两天时，她连猫都怕，哭着闹着非回托儿所不可。几年来，她在生活方面的常识是多么贫乏啊！后来，我们又去到湖边玩。我一直在想着给孩子们买点食物吃，但卖食品的地方人太挤了，有的地方除了香烟外什么食品饮料都卖完了。晓风倒不说一句要吃的，却用手舀起湖里的水往口里送。她妈妈惊叫了起来，一把将她拉开，“这水脏，你怎么能喝？”看来她可能是口干得不得了。我只好带着他们到处去找卖水果或汽水的地方，最后通过竹篱笆的缝隙处买到几根冰棍，才算解决问题。本想在外面吃上一顿的，现在这计划很难实现了，只好赶着回到家。不过，这次的游玩使我对劫后的上海又了解了一些情况。

去文化投资公司见到了胡国城经理。他对我拟的合同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他给的稿费不高。我没有争，就同意了。说定了每期给编辑费，这是我从办刊物起没有过的。过去，我总是将老板给的钱全部分摊在稿费上，就这样，稿费还比大书店的少呢。这次，我才算是正式得到编辑的待遇。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五月份就能出版发行第一期。时间是急了些，不过我手头的稿子倒不少，我不打算请客约稿，想和过去一样从存稿中清理一些可用的，编出一期。但我自己总应该写一篇文章向上海的读者致意，说点我对上海文艺方面的看法和希望才好。在这方面我还来不及多了解，连出版的书刊都看得很少。只在书摊上看到一些豆腐干刊物，这是在上海最吃香销数最好的刊物，内容不大健康。但我对这些也来不及详细了解，这篇文章写起来很困难。

我倒是看了两出上海名演员的戏，一出是周信芳的《徽钦二帝》。据说在沦陷的上海演出时很使观众得到鼓舞，同时也受到敌人的刁难。剧里表现的错综复杂的内容在当时是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还有一出是袁雪芬的越剧《祥林嫂》。这是一个尝试，但看来是可行的，由越剧演《祥林嫂》，在方言方面就令人感到生动亲切。

从许广平那里得知鹿地夫妇来了，不久又听说他们的儿子从旅馆的三楼阳台上跌下来死了。这使我们很难过，尤其是M。她说，如果他们夫妇来看我们，我会留他们姐弟在家玩，那就不必因大人出去办事而将两个孩子锁在房里产生意外了。十几天后，许先生请吃饭，原来是请鹿地夫妇，还有内山完造、雪峰和我。内山还和过去一样地健朗。鹿地夫妇带着女儿晓晓来，显得很痛苦，已没有过去那种得意而自信的样儿。儿子的死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日本人是十分重视男孩的。后来听说孩子的骨灰葬在静安公墓内山夫人墓旁。有内山夫人作伴，池田还稍感宽慰些。我和他们没能多谈什么，临告别时我请他们到家中来，他们终于没来就回国了。

整理存稿，找出了好几篇可用的。路翎的小说《王兴发夫妇》比《罗大斗的一生》更积极地写出了农民对暴力迫害的反抗和要求民主的斗争。阿垅的诗论，我想诗人和爱诗的读者是会重视的，我要精选几组诗与它配合。又去找余所亚，商量封面设计，重庆出的《希望》就是请他设计封面的。

开始写《上海是一个海》，但也只能写点观感式的评论。在这海里游泳还要能驾驭它不至于被它淹没，谈何容易！最后，我只能这样说：“今天的上海，革命的新文艺所占的比重是太小了，然而，大海总是由细流汇成，开发有抗毒素的清洁的细流，扩大有抗毒素的清洁的细流，将是我们的任务。”

大部份的稿子都编好付排了。这期为了和另一篇民间故事配合，发了M的《张天师的同学和水鬼》。这是她在重庆就写好了的，我一直不愿将它介绍出去，这次才稍加修改用了。《希望》的校样，尤其是清样，我还是和过去一样地仔细看过，并在空余地方加上短小的补白，不使它因空白而显得难看。这补白很难选，因要使它和整体协调一致。又写了几百字的《编后记》。除说明本刊的性质和自己的愿望外，对刊出的三个诗辑，我说它们“里面所写的战斗理想和战斗情绪，这哪里是做着力统一梦的内战发动者所能够了解的？”对两篇民间故事，我也提了一句，“在我们文坛也不见得不会遇见的。只不过，现在还不到他们冻死或者还原成一堆泥土的时候。”

（可能这几句会使人感到刺痛。陈家康见到我就说：“老兄，你何必把那水鬼弄得这么难堪呢？于人为善嘛。”我说给M听时，她直摇头，说：“没法子，传说就是这样的嘛！”）

5月4日，参加文艺节纪念会。夜，文协聚餐，上海和大后方的共聚一堂，但没有在重庆时那么热闹。大概是因为老舍不在吧。第二天下午，参加文协理事会，随便谈了谈今后的工作。目前的情况是，重庆总会还没迁来，无法开展工作，到底怎样继续下去，谁心里也没底。但这个民间文艺团体，必须支持它让它生存下去，那是大家一致的意见。

5月7日下午，我和冯雪峰、M、晓谷冒雨谒鲁迅先生墓。从善钟路底下电车，沿虹桥路一直走到万国公墓。一路上行人不多，两边多是菜地。进到公墓里只见杂草丛生，很少有整洁的墓地。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还是因为前不久将那磁像立了起来才辨认出的。比别家的墓整齐多了，杂草也刈去了，可能有人来整理过。我和雪峰都是自1937年后就没能再来，站在先生像前，只是默默无言。他哪里能想象我们是怎样地度过了这惊

天动地考验人锻炼人的抗战八年！

8日下午去文化投资公司，得知《希望》已装订好，并且门市部开始发售。拿了几本新刊，就急急回家与M 同享这份喜悦。

这期《希望》的封面，用的是鲁迅先生十分喜爱和推崇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铜刻《织工》第四幅。画面是被吮吸了血液的劳工，手里只拿着可怜的武器，还有女人和伏在肩上睡去的孩子。作者是一位强有力地抒写了劳苦和斗争的巨匠，她受尽了纳粹的压迫和战争的痛苦，听说，去年她在终于挣脱了纳粹锁链的德国去世了。为了纪念她对劳动人民的献身，和给中国人民艺术的感奋，我特选这一幅做封面，虽然我们不能公开哀悼她，但有心的读者是会理解的。

听到一些读者的反映，似乎对《希望》还能接受。但我自己可感到没有像在重庆办刊物时那么自信了，因为，上海的潜势力不是我们几本刊物能攻破的，上海的读者群很复杂，我们能生存下去就已不错了。出版和印刷条件都比重庆为好，但发行，尤其是争取进步的读者，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连一个助编都没有，全靠过去《七月》的投稿者和今后的投稿者，要编出一本像样的，有血有肉的，而又掌握住大方向的刊物，实非易事。幸好重庆的朋友们都陆续来了。文工会的同事杜国庠和冯乃超来看我，告诉我50号的人员都已动身即将到上海。见到冯乃超使我十分高兴，在重庆时他可以说是我的上级，抗敌文协的事，我多半都同他商量，听取他的看法。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办事虽然魄力不大，但态度好，肯负责。现在他来了，我如果仍由他领导，今后的事就好做多了。

杨潮(羊枣)夫人来访，谈了杨潮在福建被国民党杀害的情况。杨潮是杨刚的哥哥，1934年在上海，我曾在他家开过会。那时他已参加左联，似乎在铁路局工作。不久，我离开了左联，

所以未及深交。但读到过他的文章，很有才华，外文也很好。抗战时从事抗日工作，与反动的国民党进行斗争，终于被害。

杨潮夫人希望上海文化界能为他开个追悼会。这是应该的，义不容辞的。可惜文协还没有迁来正式工作，只好由个别的同人组织召开了。她要我为杨潮写公祭的祭文。在熟悉他了解他的人还没来到的情况下，这祭文只好由我写了。可惜，对他的生平知道得太少，写不出好文章。花一夜功夫写成，第二天便交给杨潮夫人。

5月19日上午，杨潮追悼会举行了。

在上海出书出刊物，只要有内政部的登记证和邮政特准认可为第一类新闻纸的许可证就行。这两个证，我在重庆时就已有了。这次出刊物最感顺手的是，没有了图书审查。在桂林和重庆时，这类衙门总要扣你的稿，使你一再改写，弄得面目皆非。我吃够了这类苦头。现在，书审的头目潘公展不能管我们了，只能仍去当他过去当过的教育局长，该有点不得意吧！

要办出版社就得到社会局去登记，这是姚蓬子告诉我的。特去社会局了解了一下，果然如此。拿了几张表来填，在发行人方面填了M的另一个名字“屠棘”，我是编辑人。我暂时先不交表，看看能否躲过去。

生活书店已回上海复业，在霞飞路附近成立了编辑部。胡绳、柳湜都到了上海，就在那里办公。他们来看过我。我去看他们时在那里见到了在万县帮我们挤上轮船的史枚，他现在是书店的编辑。相见之下，大家都很高兴。和他谈过几次，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编辑人才。

办事处（现在大概叫“中共办事处”）在思南路租了一幢小洋楼办公并当宿舍。乔冠华、陈家康他们都来了，就住在那里。我又能和在重庆时一样地见到他们，很愉快。从他们那里，我

能够了解到国内外的一些情况，有些问题和看法能事先向他们请教，尤其使我高兴。他们也来过我家看我。

听说郭沫若也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狄思威路，特同M一道去拜访他。他住的是一幢带花园草坪的英国式三层楼房（听说是办事处花了金条为他顶下的）。见面时大家都很兴奋，于立群也很亲热地引我们到楼上去坐了一会儿。见着了他们的孩子们。重庆的长袍已脱下，穿上了合身的洋式服装，显得活泼健康。

他住处附近是何非光家，就顺便同M去看看他。他正在调理一条洋狗，还穿着猎装。原来他是随电影制片厂先行到上海来劫收的。他的年青的夫人也出来见我们，穿着绸的长睡袍，有点妖形怪状。何非光略觉尴尬，忙说她肚子大了，用长袍遮丑。走出门时M说，我看他们这生活就够丑的了。

许广平和我谈，她认识楼下杨家的姐夫，他们在一起开过会，是要求进步的。她可以找他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将房间让出。商量的结果是，杨家先将杂物搬到亭子间，以后再说。这也算是初步胜利。他们来人处理了一些杂物，还留下许多仍在堂屋里。我只得又再归到一边或放到外面。总算有了一块地方，我可以放书桌。将方桌搬了下来，我们可以在楼下吃饭了。最重要的是，大门可以出入，来客人也就方便多了。

赶着要编出《希望》第二期来，自己又觉得非写点什么不可。我总是在急切地赶写，所以常常是不能如自己意地写出周密的文章。这期又只能写几千字杂感式的文字了，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写这个疯狂的时代，希望它能给广大人民“产生大的理想和大的斗争，大的理想和大的斗争产生大变动——震荡着整个社会的大变动。这变动底果实，是民主力量底成长和民主运动底高扬”。在四篇小说方面，我感到现在的中国，一切都现出激烈的变动，有着鲜明的对照。这些小说中有抗战前的东

北农村黑暗的情况，和抗战时期后方农民受牺牲的形象，和在走向工人阶级底集体生活道路上克服悲剧的命运。到了最后一篇《凤仙花》，使我们接触到了解放底过程和解放以后的景象。两个诗辑也是在非常鲜明的对照中包含了多少的痛苦，多少的斗争，我们更能明白这对照对于中国底前途将有什么意义了吧。这期还介绍了绿原译的美国作家卡尔·桑德堡的一首诗。打内战用美国武器，喂害虫用美国物资，……文化上最吃香的是美国大腿电影和发松小品。我们当然不是为了追求时尚，只不过想借此暗示美国也有和大腿电影、发松小品之类截然不同的东西。据译者来信说：“作者在美国，除了惠特曼之外，没有人比他更受崇拜，也没有人像他这样颂扬过美国人民的坚固的乐观同尖锐的怀疑。”是否如此，只有等了解美国文学的人来告诉我们的了。

端午节时，特请雪峰来过节，吃午饭。不久，适夷也来了。大家随便谈谈，没多坐，因为晚上还要去某饭馆参加文协的聚餐会。聚餐很热闹，有两三桌，许多都是熟人。上海的文化人到的不多，也可能是我认不得。除了闹酒闲聊，主要是大家见面，联络感情。

几天后，才约在葛一虹家里开了一次座谈会。主要是重庆来的人和在沪主持文化工作的作家们。大家交谈了一些上海最近的动态和出书的情况。葛一虹自费顶了一层楼房，约有三、四间吧，有很大的客厅，还有大卫生间，很气派。二、三十人开会没问题。他留下我在那里晚餐。

路翎从南京来。他是随余明英的机关复原回南京的。老家的房子已破烂不堪，还住着别人，自己只好另找住处。他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想找工作。他和我谈论想修改《财主的儿女们》下部。这次，他带来了中篇小说《嘉陵江畔的传奇》。我觉得很

不错，后来介绍到《联合晚报》连载了。

当晚，和他一起去看李桦的作品展览，并参加座谈。我很喜欢李桦的作品，对它们评价很高，当即选了一幅《野火》，准备给下期《希望》做封面。

路翎对上海不熟，好像是初次到上海。因此，我们除了晚上谈他准备修改的《儿女们》和他计划写的作品外，在白天，我和M就主要陪他上街走走。我和M、晓谷陪他到了外滩公园，看了长江的尽头，后来沿大马路走到永安公司大东茶楼喝茶。他要赶回去写作，在上海只住了四天。

6月18日，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要我讲话，但我实在没有准备，只得就过去的体会说了几句。回上海后最苦的是没有读书的环境和时间，杂务太多。第二期《希望》本应有几篇介绍高尔基的译作的，但都没能做到。只是在目录后的扉页上引用了高尔基的一段话，以表示我们对他的纪念。我摘录的这段话，反映了他底那个痛苦的时代。精神巨人所给予我们的力量，犹如他在他的那个时代苦斗了过来一样，是要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也坚强地苦斗下去。

晚上去工业学校讲演，主要讲抗战时的文艺和目前的斗争。为春风文艺社题了词。

有人向我建议去找内山，他在未遣返的日本人中仍很有威信，可以通过他找到即将离去的日本人的房子，先住后办手续。有人就是这么干的。我对找日本人的房子已没兴趣，但去看看内山倒是应该的。在许先生家曾见到过他，他告诉了我他的地址，还说已收集到不少日文书，邀我去看看。从许先生口中得知，在她受敌人迫害的时候，他曾出力保释过她，所以和他一直有来往。这也可能是他能留下的原因吧。他现在的住处是过去日本人不住的东洋式的弄堂房，天井很小，地上都是踞踞米，

在屋檐下放了几个大酱缸。我一叫“邬其山”，他就由楼上下来了。这是双开间，他引我到厢房去。那里立了好几个简易的木板钉的书架，上面果然放满了各门各类的书，还有许多全集选集之类。我稍为浏览了一下。他告诉我：“差不多都是从我书店买去的，他们带不走又送给我了。现在我们本土也很难找到这些书了，因为长崎、东京几次轰炸，都被毁掉了。”他又向我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他自己想补过的心情，念了他正在写的自传内的几节给我听。关于这方面我不好说什么，他想怎样补过，也无从估计。很友好地谈了谈日本的最近情况和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告别时，他将他多余的几本书送我，我又花钱向他买了几本书。后来，他曾到我家来过一次，给我送来收集到的画册。

内山介绍日本记者岛田政雄和另一个青年来采访我对于抗战文艺的看法。我谈的主要是，抗战文艺的主流是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抵抗国民党的反动逆流，是为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们办了一个日文刊物《改造》，后来译载了我的《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他们和我谈话时说藤枝丈夫是日共中委，我说这是决不会有的事。他回去写的访问记中提到了这一点，说我把藤枝看透了，藤枝的堕落，出乎他意外，云。）

与M同访司徒乔，参观他即将拿到海外去展览的作品，主要反映我国遭受日本侵略时的苦难景象。这里有荒芜的田园，有沦为饿殍的人民，尤其是瘦得像骷髅似的儿童，看了真令人鼻酸，这是最好的揭发和控诉，司徒乔用他朴素的笔法，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在国际上一定能引起震惊的吧。

陈家康和乔冠华来访，了解到一些谈判的情况。

梅林来，文协已全部迁到上海来了。房子是叶以群代文协花钱顶到的一幢普通三层楼房子。三层是假三层，低矮，只一

扇窗，还说要给以群办的雅典书屋经管人住。这使梅林很不高兴，就向我唠叨。我问了问他们一路的情形和今后准备怎样开展工作。几天后，在文协新址的客厅里开了在上海的第一次理事会。

得通知，陶行知忽然得脑溢血逝世，即到上海殡仪馆去向家属表示悼念。第二天是入殓告别式，他的学生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当夜写成了《对陶行知二三理解》。

看完了东平的《茅山下》，又找出东平给我的几封信，想写一篇纪念东平，但由此想到同样为了抗日而被敌人杀害的左联青年作家蒋弼，写成了《蒋弼一斑》。《忆东平》反倒迟迟难以完成。写了三、四天，总算写就，有数千字。即到文化投资公司去交第三期的稿。内中有我修改过的绿原的长诗《哦，美国！》，我只是在文字上稍加润饰，对诗人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我没有改动一丝一毫。

报载闻一多被刺，很使我震惊。无疑地，这是特务所为。居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真令人愤慨！见到的朋友们无不为一多的死表示愤慨。第二天，梅林来，商谈用文协名义拟一电文悼念闻一多，并要我执笔。

（关于闻一多，我在给舒芜的信中提了那么一句，是因为舒芜自己在信中对他有不好的看法而引起的，贬词是他自己早已加上的，我只是附和了一句。我自己，对闻一多还是有好感的。青年时，曾喜爱他的爱国诗《红烛》。我为田间的诗挨了几年的骂，他却肯定了田间，称他为擂鼓诗人，这使我很钦佩，同时，别人也不再骂我了。由于舒芜的栽赃问罪，对信件内容截头去尾、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地运用，使我成了人民公敌，几乎性命难保。舒芜的巨大功绩，但愿勿传之后世！）

今年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又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

作家们都想隆重地开个纪念会。因此，由文协出面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除了我们几个老人外，还增加了几个上海新涌现的研究者和知名人士。

隔壁邻居《联合晚报》总编介绍郑效洵来访。他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想出我的一本书。他的文艺水平很高，是一个有见识的人，我答应编一本评论集给他。

郭府设宴，到了不少人。办事处也来了人，冯乃超、杜国庠、胡绳等都来了。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时局形势和当前文艺界的工作。

七月底，才校完《希望》第三期，这次看来要脱期了。这期的封面，就用的是李桦的《野火》。从四个抗日战士的形象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战斗之后，守着一堆野火，正在烤暖身体和准备下次的战斗。我的意思是，这种野火正遍布全国，随时都能粉碎敢于掀起内战的战争狂人。

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人提议在抗战胜利的今年七·七，开一个大规模的抗战中死难作家的追悼会。但由于近日来的“打”风正炽，由于大家忙于招架生活问题，这个提议没能实现。但是，在吃了“胜利”果实以后回头来回忆一下那些牺牲者，他们的牺牲精神所包含的民族解放战争底神圣的目标和痛苦的历程，那意义是庄严的，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决不仅是向着过去的追悼而已！

这次的《希望》第三期，发了一组悼念为抗日救亡用血祭奠了祖国大地的文化工作者的文章。可惜，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写了东平、蒋弼这两个作家，这是由于人的感情认识总是比较容易写出自己了解的具体对象的。同时，我们怀着悲愤悼念两位不是死在战争中的文化工作者。一位是写《东平小论》的石怀池，仅只二十二岁的青年。他是在胜利前一两个月牺牲的。他

没死于日本人手里，而是死于学校里特务的阴谋杀害。他们在大风浪中，特务见死不救，致使葬身江底。原因是他们即将奔赴中原革命根据地。我用在第一页的一首小诗《碑》，是年轻人朱谷怀寄来的。他当时在昆明，亲历了闻一多被无声手枪暗害的阴谋和人民的悼念活动，怀着悲愤写下了这首诗：“为伟大的死者／我们造碑……”我谨用以悼念所有伟大的死者。

周扬来访，才知他被党派到美国去讲学，从延安来到上海。特地来看我。从1934年后我们就很少见面，已经一别十年了。他和我谈到延安的一些老朋友和作家们的情况，如对赵树理作品的推崇等。还告诉我孔厥在私生活上的行为不端等。又肯定了我对文艺工作的坚持。我没有专程去看过他，只在思南路办事处又见过面。

在葛一虹家举办的茶话会上，周扬讲了话。几天后，他又来看我。这次主要是向我了解国外的文艺界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希望我给他介绍熟人。这方面，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老舍和曹禺在美国，去了当然能见面的。其他人，我告诉他，只认识几个参加盟军的华侨青年，也没见过面，所以不能给他什么帮助。后来参加郭沫若主任家的晚宴，那是为周扬回解放区饯行，他的美国之行没能成功。

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他现在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是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从优。他还发誓说，“我绝不是为了赚钞票。”我先和雪峰商量，觉得给他出一次也行。因为，进步的书店都受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阻碍，外地已开始禁卖进步书刊，这些书店很可能被迫停业，所以不好去向他们提出全集的事，姚蓬子有国民党的关系，停业是不至于的。

同时，雪峰也说，我们应该帮助他进步，不要让他跟着国民党危害人民。于是，我们就去看许广平。商量的结果是要求版税百分之二十，贴印花（这和过去北新书局一样），纸型要付纸型费，因为纸型翻版一次就要受一次损耗。许广平提出要我和雪峰做担保人，我们觉得也有必要。姚蓬子要赖帐，许广平是应付不了他的。最后商定了由他出一版。他在十月份时将全集印出了，是蓝土布封面，印了二千册，后面印上了“作家书屋发行”的字眼。说实在的，我和雪峰看了心里都不舒服，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由于三楼女人同老太太争吵，我跑上去申斥了她，她就撒泼扑向我要拚命，引起了纠纷。这样，使得房子问题更难解决了。他们开口就说，要给金条才搬。我们从未要过他的顶房子费，后来又不收他们的房钱，总想双方让步早日解决才好。现在，我连睡在二楼都不行了，成天是嘈杂的脚步声，无法入睡，更不要说写文章。

植芳夫妇从徐州来，带来了不少行李。说是已结束了在徐州的工作，想在上海定居。但一时并无住处，只好留他在这里先住下再说。这样，我就天天和植芳架临时铺睡在楼下，任敏和M她们睡一房。为了解决三楼房客事，我到处奔走托人帮忙。老太太告诉我，三楼的客人，忠义救国军的老×已回来，这对我将构成一大威胁，弄得不好，我将有弃家出走的危险。所以，一定要在国民党还未撕破假面的时候，将房子问题解决。

记不得是谁告诉我的，可以找金山，他有帮会关系。有次见到金山就托他，他给了我一字条，介绍我去找他的哥哥赵班斧，赵正好在社会局管劳资方面的工作，但他说不知道三楼此人，要查查看。后来我又去找他，他告诉我：“已找到了，他过

去是在写字间工作。正好他来找我们想恢复工作，我叫下面的人和他说说。”这方面算是有了一线希望。

冀沅陪芦甸夫妇来。这之前，收到芦甸的信，知道他从中原突围出来，住在复旦大学，想让我为他们设法找关系回到解放区去。我曾去办事处探问过，说是找胡绳就可以。这次他们来，我就介绍他们去见胡绳。大概时间不久，芦甸夫妇亲自来看我，告诉我即将离上海回到自己愿去的地方。说时，芦甸很激动，他爱人倒很平静。我们谈了一些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我鼓励他以后有机会寄文章给我。

9月29日，是植芳的生日，M为他做了面条，以示长寿之意。另外还弄了几个菜，我们畅饮一番，十分高兴。

崔宗玮是在重庆复旦大学的学生，我没教过他，但他那时常来找我，因为他是我东大附中同学崔宗琪的弟弟，所以关系很密切。现在他在美国时代画报社当翻译，和美国文化界有来往。一天，他来看我，说有一美国出版社，想出版中国抗战时的小说。又说这人在美国和老舍认识，正准备出老舍的小说，还要我介绍作品。我想介绍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给他。似乎崔已和他们谈得差不多了，后特来车接我到那出版者Frank Taylor办事处去，谈了有关出版的情况。

回来后即去信路翎要他赶快到上海来，与美国商人面谈，如果条件合适就可签约。第三天，路翎来了，我陪同他去访Taylor，谈得很好。并且说，一切事务由宗玮经手，将来也可能由他翻译。

已近十月了，代文协拟了纪念鲁迅通告，又召开鲁迅纪念会筹备会。为了开好纪念会，除了租会场等请上海方面的人设法外，另外一些事务，我们就分工干。梅林在上海是吃不开了，只能干干内部的收发信之类事务。说是要到社会局取得许可证

才能开会，这任务就分给我了。到社会局找到李剑华副局长，是三十年代就认识的。那时他在社联，同左联有联系，所以常去找他。现在他当了官，拿着官架子，一副冷脸，爱理不理的样子。他将我指到什么处去交涉，又由别处批回来再找他，几经周折，才取得许可证。

开会地点定在辣斐大戏院，似乎是由我主持。有哪些人发言我记不清了。我写了一首纪念歌，由谁谱的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会上唱了的。当我去邀请周副主席时，他说上午有个会恐怕来不了。但在开会中途，记得是在李健吾朗诵鲁迅散文《聪明人和傻子》时，他来了。我对李健吾朗诵的不满情绪就一下子消失了（我觉得李将这首散文漫画化了，没有能突出其内在的悲剧性）。副主席的发言，除了谈到纪念鲁迅先生的重大意义外，接着就谈到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形势已十分严重，全面内战已爆发了三个月，临近最后决裂阶段。副主席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决定奉陪到底，直到把他们消灭为止。

第二天上午，到万国公墓鲁迅墓地参加扫墓。到的人不多，多半是鲁迅先生生前认识的，有研究者和进步人士。我就这十年来的情况和对鲁迅著作应更深入地理解等发了言，心情很沉痛。

这期《希望》算是赶上了纪念日出版，但内容是不够充实的。我自己除了那首歌词外，没能写出一篇文章来。主要是心情太坏。

歌词是：你向黑暗的社会复仇，举起了战士的投枪，你为痛苦的人民伸冤，敞开了仁者的怀抱，在遍地荆棘的祖国，你开辟了革命的血路一条。由于你，新中国在成长，由于你，旧中国在动摇。啊，先生，中国人民高举起你的大旗，中国人民响遍了你的战号。

由于国民党对文化投资公司一再明里暗里捣乱，使得《希望》的印刷和发行都困难，本期就脱期了。胡国城找我谈，不再继续出版了。这样，只得暂时停刊。

柳湜他们编的政治性刊物《民主》，已得到通知停止出版。他一直都向我约稿，这次非为它的停刊号写点什么不可，以表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抗议。

乃超来辞行，不言而喻，这是办事处在疏散了。乃超是广东人，去香港在语言方面是方便的，对工作有利。祝他工作顺利。他转告我副主席的嘱咐，“为房子的事，千万不要惹出麻烦。”我听后觉得十分感动，但也觉得处境十分危险。国共显然很快就要破裂，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一定会大暴露，对我们这些他早已恨之入骨的不合作者一定会报复的，我如不解决房客问题当更危险了。

得周颖信，知道她已平安出狱。抗战胜利后，她没有离开重庆，转到了朱学范主持的劳动协会(?)工作，组织了一些失业工人，据说做得很有成绩，当然是受地下党领导的。后来她就被国民党逮捕了。我们在上海得知这情况后，曾为她奔走营救。接信十多天后，她到了上海，特来看我，双方见面十分高兴。她说：“老胡呀，这次可比在日本时险多了！他们不讲道理，会杀人的。”问她老聂的情况，她说：“我被捕后，老聂倒是各处奔走营救的。出来后，我说是不是一同去上海，他没有肯定，可能来，也可能去别的地方。我们是各走各的。”说着，很是凄然。我要留她住在这里，她说：“劳协会为我安排住处的。三妹和海燕也将来，那时她们没有住处，我就让她们住你这里。行吧？”我说，完全可以。后来，她还来过一两次。12月初，她来向我辞行，说即去香港。三妹和海燕已先在那里不来上海了，可能是和老聂一路走的。

《希望》不出了，对我也有好处：生活不致那么紧张，总是忙于编校和赶写文章了。今后我将把全部精力放在“希望社”上面。目前是将过去的纸型尽可能地修订，浇版重印。另外，我又答应俞鸿模为他再编一套《七月文丛》，手头已有好几部稿子。他重振旗鼓，在北四川路恒丰里顶了房子，海燕书店重新开业了。他似乎想大干一场，还向郭沫若约稿，准备出他的全集呢。其实，郭沫若自己主办的群益出版社也在北四川路弄到一幢房子，在出重庆已排好的郭沫若的书。

我和俞鸿模的关系，由于这次的合作，加上他的住处离我不远，我们时常来往，已经不是作者和出版者的简单关系了。可以说，我们成了朋友，虽然孩子们见到他还是叫俞老板，“老板来哉！”这套丛书共十二册，封面是选自艾青、江丰托人从解放区带来送我的《古元木刻集》及《民间剪纸》。书名是我用燃过的火柴杆写的，很别致，他也同意。在校对方面，直到最后一校，都由我亲自看，这本来应是他的工作的。他最令我满意的是，尊重我的意见，在出书方面不打小算盘。我提出要衬页，他也答应了。

我办出版社是门外汉，又没钱请专人，要从门外走到门里，许多事还得向俞鸿模请教。他很热情地指点我，有时还向我提出好的建议。在工作开始，首先是他结清我托他再版《希望》的帐。结下来，不但没有余款，还赔了一点，算是两清了。我和别人说起时，他们都笑我为了《希望》，放着赚便宜钱的事不干，如果当时用这款买上金子或别的东西，我早已一本万利了，现在倒好，捡来一堆还未销出的书。M也说我：“你呀，永远是书生，不是商人。”这话很对，我也不想做商人。但现在，我得用极少的钱多出书出好书，怎么办呢？我只得同M商量，正式聘请她任希望社的总务兼会计。她问我报酬多少。我说，“和我

一样呗，也就是一文没有。怎么样？干吧！我想，运用你管理家政的本领是可以干好的。”她叹了一口气，就算答应了。

没有房子怎么办？这住房是不能用的，还不知将来会出什么事呢。M 向我提议租一个信箱，我们到邮局一问，租信箱也不简单，要一笔押金，还要保证人，指明是商号。好在这两点我们还能办到，于是就租下了马斯南路邮局的信箱4176号。

《诗丛》的错别字得改过，没法从纸型挖改的，就列个正误表。有几本，当初南天出版社实在太粗心了，错处很多，今天不应该这样与上海读者见面的。这《诗丛》的封面，右边角放了一个小木刻，但要和诗的内容多少有点联系，这很费了一番心思。文化投资公司的胡国城经理，由于出《希望》的关系吧，对“希望社”很支持，他答应代为付印出书，还不必立即付款。这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就可以在陆续收到书款后陆续付给他们。

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要避免为房子惹麻烦。准备几样酒菜，将三楼房客请下来喝酒，缓和一下关系。同时，也向他说明：“双方都有困难，那是事实。但我是穷人，不是劫收大员，也不是投机商人，所以金条是没有的，但我可以想办法补你一笔搬家费。”这样，就客客气气地讲定了。今后，我只须准备一笔钱并催他找房子搬走。

《联合晚报》来要《元旦祝愿》。这篇文章很不好写，我们能向新的一年，1947年，祝愿什么呢？

《时事新报》请客。由于胡南湖的关系，他们要我推荐一人编副刊《青光》。我知道，这报属孔祥熙的，《青光》前一向编的很出色，不知为什么又要换人。能有一个阵地发表些有关反内战等的文章也是好事，我就将正闲住在这里的贾植芳介绍给他们。大概编了一段时间，就不让他编了。

一次，我去办事处，正好碰上一位女同志在向以群敲竹杠，

要他请客看梅兰芳的戏。现在，以群是既有钱又有本事，所以不但买到了票，还给我送了两张来。

这次看的是《凤还巢》。全部客满。我们坐的是前排，要以群买票的张晓梅没来，来了华岗夫人，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这前排是甲级票，但还没有我过去坐后排看得舒服，演员形象看得太真切，反倒缺少了那种朦胧的错觉，视觉效果不佳。剧情很简单，但却一演再演至今不衰，可能是由于叙述了战乱中的悲欢离合，最后是弱女子的胜利，这点很符合战后人民的心理要求。

12月29日，和在重庆时一样，文协举行辞年晚会，仍由我主持。今年没有老舍和一些在重庆时常见面的朋友，但增加了一些新朋友。能借这机会相聚一堂，还是很高兴的。大家畅谈文艺界的情况，主要是诉说出书难写文章也不易，比在重庆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气愤得很，对创作也抱悲观态度，认为没有好作品产生。我没有说什么，但想想还是很感慨的。

第二天夜晚，写成《冬夜短想》，里面这样写道：

……战争胜利了，或者说结束了，但人民底痛苦并没有减轻，人民依然处在屈辱的状况里面，人民在战争里面所忍受的痛苦，所付出的牺牲，所怀抱的愿望并没有得到酬报。由于这，……紧紧地接着战争结束之后，就出现了反内战、争民主的痛苦的然而却是伟大的历史时期。

……卑微而劳苦的小民底求解放的愿望，不甘于物质底贫苦和精神底屈辱的愿望，不是暴力可以压下，枪炮可以轰毁的。……人民底流血抗战，解脱掉做日本人底奴隶的命运，决不是为了还原到做本国人底奴隶的命运的。

……在昨晚举行的文艺晚会里面，有一位提出了意见，说我们还没有产生像雷马克在第一次大战后所写的《西线

无战事》那样的作品，……《西线无战事》写了反动战争底残酷性，本质上并没有超过消极的限界，而我们是神圣的人民战争，我们底作家所写的是人民底艰苦的奋斗，英勇的气魄，以及创造的精神。……

……我们底文艺一定要争取更高的成就，使现实斗争深入，向未来理想突进。

写完了这几千字，我噍了一口气。这算是向1947年的文艺界的祝愿。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午与M去植芳家小坐。他们已在上个月找到房子搬出去了，我们特去看看并约他们来晚餐。晚饭时，我们一家和植芳夫妇热热闹闹地，喝了不少酒，辞别了1946年。

下 篇

上海，仍然是古老的上海，历来对阳历新年是不重视的。倒是那圣诞节，由于洋人隆重庆祝，许多洋行的买办和职员也就学时髦，竞相仿效。但现在，大多数洋人还没回来，连圣诞节都冷冷清清，更别提阳历新年了。

我带着一家四口从西往北走，去拜访王珩夫妇。他们家刚从六口之家挤住的小房子里乔迁到了三层楼的新居。这房是大陆银行向国民党劫收房产的机关出钱买下的，银行的高级职员可以分到一幢刚盖不久的新房。谁知当他父亲高高兴兴地跑去看时，大门却被封条贴上，好像是又被什么机关占领了。他老人家急得要命，跑来找我，大概是认为我在找房子方面碰过钉子有点经验吧。我陪他去一看，果然两张封条十字交叉地贴着。经细看，上面虽有机关名，却没有机关的红图章。我心里就明

白了，说，“没关系。撕下来，我们进去看看。”这是东洋式的小洋房，所以很低矮，顶层还是假三层，但给他们一家住是足够的了。日本人走时留下的杯盏碗碟等都还在。我们下楼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气势汹汹的男人，质问我们为什么撕他们的封条。我说是因为要看房子。他说，这房是他们的。我要他拿出证明来，他迟迟疑疑地拿不出来。殷老先生将银行分房子的证件给他看了，他仍很凶地说，“我要去问他们，你们……”不得不走了。后来，老先生老太太都说要请我们到他们的新居去玩玩。今天是元旦，他们父子都休息在家，M就说带孩子们去看看，也算是拜年和祝贺乔迁新居。在他家午饭后，我有事先走了，因为晚上还要去郭家参加新年聚会。说好了，由王珩送她们回去。

郭家的大客厅里坐满了人，摆了有两三桌。都是熟人，绝大部分是由重庆来的。有的已在这里找到工作扎下了根，有的还在寻找出路。但不管是有工作的还是在找工作的，心情都是又兴奋又茫然。这和最近的时局有关。听党内的朋友讲，现在已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将转为向国民党进攻，时间多长要看仗打得如何，我们已经打了很多胜仗，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这些人要很好地配合解放军的攻势。大家谈到，国民党也可能狗急跳墙，更加反动，加紧迫害进步人士，所以必须多加小心。

回家后，与M谈到目前的时局和可能发生的情况。最使她担心的是生活问题。现在我没有职业，完全靠卖文为生，担负着这五口之家，随便走动是不行的。但她还是很支持我，说，“必要时你就离开上海，我不阻止你，我留下总有办法生活，能找到工作的。只要希望社不被查封，我就继续办下去。”她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老太太看到，过去常到三楼来的忠义救国军老×回来了。这人可能会帮三楼房客出什么坏主意，我们越

发不能同住一幢房子了。她要我忍痛出笔钱将他们“请”出去。

至于希望社，只有尽快出书。有钱就抓紧排印，以打下基础，好在对重版书，文化投资公司可以给以优待，不必立即付现款。同时，过去在桂林时认识的出版家贺尚华也来了，他在四马路弄堂里搞到一间房，开始搞发行。我们的书，除了给生活书店外，可以托他发行代销，收款方便些。

可能是由于赶着看校样和写《逆流的日子》序，我的眼睛忽然布满了血丝，还有点肿，很不好受。我认识一位眼科刘医生，邵荃麟初到上海来就借住在他家。我去看邵时，刘医生主动看过我的眼睛，说沙眼很严重，要及早治疗。还说，为了革命的缘故，你不能眼睛不好。后来，邵告诉我，他是三方面军的医官，到上海后弄到两处房子，一处住家，一处开诊所。他还是我的湖北同乡，邻县阳新人，对我很友好。他给许多进步人士看病，我很信任他。

这次，他诊断的结果，说是角膜溃疡，如果角膜坏死了，就会瞎的。他给我上了药，要我天天去。他不但不肯收费，还留我吃了晚饭。他有四、五个孩子，妻子离他而去了，现在是乡下的亲戚在为他料理家务。

上了几天药后，眼睛的红肿消了，我就不常去看了。同时，旧历年快到，我要为希望社收帐，还要应付印刷厂，不但得付清帐，还要催他们快印，这样才周转得过来。由于物价不稳，办事很困难，我算是钻进了死胡同，进不去又出不来。本来以为不编刊物，可以安下心来写点东西。结果是，我的时间几乎全部都用在希望社上了，仍然没时间写作。

旧历年前，特请赵班斧(金山的哥哥)介绍的楼上房客的朋友吃饭，除表示感谢他调停之外，同时也暗示可以多出点钱给三楼房客，帮助他找房子搬家，无非是希望他能尽快搬走。

除夕夜，特请平旦(潘守谦)及植芳夫妇来吃年夜饭。他们都是客居上海的。我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很是热闹。

今年是俄国诗人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由塔斯社、时代社为主组成纪念筹备会，邀我也参加。谈到出《普希金文集》等计划时，我想到，这时应该将吕荧译的《欧根·奥涅金》再版才好。回来后即将旧纸型取出，检查初版错字。特为此事去访问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希望能找到几幅插图。他很支持这工作，答应一定帮忙。

孙铤的《旗》和田间的《给战斗者》再版了。比起桂林版来，这报纸本拿在手里都觉得舒服，封面也漂亮。我感到了喜悦和安慰。又改正了我自己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中的错字，校对阿垅的《第一击》及我的《为祖国而歌》，这都是能很快出书的。

陪晓谷到位育中学去报名。据说这学校很严，考取很难。因晓谷刚上了半年的学校停办了，需要插中学一年级的班。问了一下情况，知道该校重视英语，就怕他英语跟不上。那里的学生有的是读了三、四年英语才考上的。晓谷考的结果虽被录取，不过老师仍说以后要看英语能否跟上。

晓风也从弄堂小学换到了一所较好的小学。她看去一切都正常，功课也跟得上，就是数学总出差错。最近她迷上了看书，什么书都看，连有人编的《戏剧资本论》，都看。问她，看得懂吗？她只是点点头，不大愿意说出自己的意见。

忽得大侄张恩来信，说大哥被方姓来人杀害丧命。这突然的事故，使我震惊，但白纸黑字又不由我不信。痛哭一场后，即写信向家里询问详情。

第二天就收到家中数信，有兄弟们的和族人的。原来，方姓百余人闯到家里杀死了大哥，还要把尸体拖到堤上去，经家人和乡人哀求才罢休。同时，家中遭洗劫，门窗被打烂。主要

是因方、张两姓争湖塘利益而引起的，但是我大哥怎么会成了被害对象，我就弄不懂了。方姓仗着他们有在湖北当省党部主任的族人方觉慧（子樵），才敢这样行凶杀人！我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方觉慧，说明大哥被害的经过和原因，要求他主持公道帮助捉拿凶手。

本来，我回到上海后就给大哥去信，希望他能到上海来玩玩。我是想劝他不要太重视产业，不要管众家的事，苦了一辈子，可以放手让儿子去当家了。他来信说过了月半就带孙子来看我，还准备留下孙子在上海读书，谁知这成了一个愿望，我们兄弟连这最后一面都未能见着！

我家住在恒丰堤已有六、七十年了。每逢发大水，堤就被冲垮。我在家二十年，屋子曾被冲垮过两、三次。为了维修这堤，是有一笔公产的，而管堤的又总是方姓的人，因此就常常发生不满甚至冲突。这次居然持刀杀人，从我知事至今天，那还是第一次。难道就因为方觉慧做了省里的党官吗？心里实在气愤不过。我写了一篇大哥惨死的经过消息发到武汉各报社，希望他们主持正义，不能让党官族人仗势欺压乡邻。我还访问了在上海的有名望的同乡，他们对方家争公产杀人都很愤慨，对我大哥的死深表同情。这样的舆论压力，使得方觉慧不敢包庇凶犯。那三个人在汉口被捕了。

帮忙说服楼上搬家的邵某来通知我，他们准备迁走，要我出××万元。我立即托银行里的朋友打了一张支票。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十多两黄金，在我，只好算是去财免灾吧。将此事解决了，我感到很轻松，但一时无法做事。总算将《逆流的日子》的后记写成，并在扉页上题写上纪念大哥的话。校改了舒芜的《挂剑集》和鲁藜的《锻炼》付排，为《论民族形式问题》写了题记。又开始跑印刷厂、书店门市部收款、看稿、交款、付排……等

一系列的工作，完全成了事务人了！

孙钊突然来访，我真高兴。从1941年香港一别之后，我们一直没再见面，这次看到他，话都不知从何说起。我问了他后来在香港的情况，他似乎一直到送走了应送走的人之后才离开香港。他告诉我，领我们离开香港去九龙的小潘也在上海。我决定请他们来家吃顿饭。

孙钊来时交给我一个信封。抽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些诗稿。我惊奇地望着他，他仍像过去那样和缓平静地说，“这是我在忙过一阵之后，闪电似地出现的诗情，赶快随手抓着什么纸就把它记了下来。这是为你写的，我只想给你看。”我看着这一些各式的小纸片，心里很感动。这才是战斗中的诗。

参加文协为营救骆宾基召开的会。原来，他到上海后不久又回东北，说是去参加抗联打游击，走在半路给国民党抓去了。现在关在南京，从狱中带出了信。文协除了写呈文向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还得私下找人帮忙。我们给邵力子去了信，另外又在上海托些关系。他没有亲人在这里，一些事只好靠朋友们了。恐怕不会像在鄞都那样快地释放，这次国民党是撕破了脸皮的。

原文工会同事杜国庠、石啸冲、高启傑住得离我很近，我常去看他们，和董冰如（高启傑的丈夫）也成了朋友。后来杜老去了香港，我们仍常来往。董是老聂的同乡和朋友，老聂在南洋编报就是他介绍的。他和我谈到五卅惨案的情况，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党的早期革命家。现在他在办一个经济方面的小报纸，人很憨厚，对我很好。解放后，我代他转过信给党中央领导人，不久他调到北京在劳动部工作。那时，他夫妇俩来看过我。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后，他也受到牵累，被调出劳动部，分配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死。这位我在上海新结识的老同志，想不到竟因我而丧命早死！

由在重庆时就开始通信并见过面的美国侨胞李行素及其友人曹凤集(侨居美国的洗衣工人)的介绍,我又认识了参加美国空军的年青华侨周志竹。他到上海来看过我两次,第二次是他出勤到日本回上海时来的。我曾托他买了一些日本左翼的和进步的刊物。他向希望社出了股,回美国后还给我私人寄过赠品。

曹凤集、路斯他们的朋友回国来省亲路过上海(他们大都是广州潮汕一带的人),请许广平一家和我们一家吃饭。华侨记者冰冰来,为我们摄影数幅。他们将曹凤集托带的手表和水笔送给我和许广平。他们说,我在老隆路上认识后来在桂林又见面的华侨梁发叶现在金门当中学教员。这些华侨青年都爱好新文艺,后来他们出了一个纯洁的文艺刊物《青苗》,还没有一个门市部。记得许广平送了他们一套《鲁迅全集》精装本,我送了他们全部的《希望》和我自己已出的书。他们在金门开过一个“中国文艺节文艺小展”,曾寄给我照片,上写着“美洲中国华侨青年文艺社”的主办团体名称,展出的都是进步书刊,除希望社的书外如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的书都有,许广平送的《全集》放在正当中。

这时,贺尚华办的“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已扩充到三间门面,虽然是在四马路的弄堂里,但生意兴隆,常常挤满了看书的和买书的人。在发行方面,他的办法也多,与各地都有联系。他不仅为发行打下了基础,还准备有更大的发展,所以,又用“新新出版社”的名义出书。他来向我要稿。我考虑到他刚开始创业,应该先出小本,就是赔也不会多,就把我译的《棉花》、路翎的《蜗牛在荆棘上》和吕荧译的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给了他。结果,很受读者欢迎,销得很好。后来,他又将我过去介绍给他的周行译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这一厚本书出版了。可惜,我同时介绍的石民译的哈代的《忧郁的裘德》,他却不愿意

出。我向他提过。他推说纸型在湖南路上丢失了，再版成本大，何况上海已有了别人的译本。石民这本花了几年时间认真译出的书，就始终未能和读者见面，我作为老友，是很难过的。

得阿垅信，他已仓皇地从成都出走了。他陆军大学毕业后，由于张瑞的死，只好留在成都照料小儿子和岳母一家，在成都军校找了一个教官的工作。一些进步的大学生常去访问他，后来还共同编刊物，如《荒鸡小集》和《呼吸》等，对当时华西坝的大学生们起了一些影响。这样，他就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上了，要逮捕他，幸好有人透露了消息，他便星夜逃出成都，现正在通缉之中。逃出了魔掌，就是万幸！十几天后，收到他由杭州寄来的信，这就更使我安心了。不料，几天后又得到方然在重庆被捕的消息。

我的眼疾时好时坏，刘医生坚决主张要动手术，说是，这样下去，不但眼角膜常会溃疡，还会因为沙眼使眼睫毛倒翻，摩擦眼睛玻璃体，最后导致完全的失明。他这话并不是夸大的恐吓，就在我们乡下，因重沙眼而成瞎子的人是很多的。过去并不知道怎样医治，只得剪去睫毛或将睫毛粘住，最后还是逐渐失明。我决定听他的忠告，在约定的日子到了他那里。他先为我做右眼手术，取出一片软骨和浮肉，然后缝合包上。做得很快，也不痛苦。一周后去拆线，拆线的结果很好，成了时髦的睫毛稍向上翻的双眼皮。他说，很快就会完全复原的。几天后，又做了左眼的手术。

一天，M去邮局寄书并取信回来，上了楼就倒在床上。原来她在路上就昏倒过，好不容易才挣扎着走了回来。看着她煞白的脸色，我发慌了。详细一问，才知她可能是怀孕了，由于没什么反应，她只以为是累着了，并没有在意。刘医生介绍她到光沪医院去检查身体。验血的结果是高度贫血，血压和血色

素也低。还说，不能生产，那样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云云。只好去做人工流产。这次是去找内山介绍的古川医生，检查后说是月份已多，不宜做手术，要注意今后的情况，特别是要多休息和增加营养。

这多年她一直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硬撑着。我本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会好起来，她也可以过上松心安逸的日子。谁知，加给她的担子却更重。我对她实在是太不关心，使她受苦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增加她的营养。

我从印厂拿回新再版的M的《小面人求仙记》。封面和里面的几张插图，是丁聪请米谷画的。那个狡猾的狐狸画得维妙维肖，M看了非常高兴。这本书也算是对她多年来的辛劳的一点补偿吧。

五四文艺节快到了，文协准备借这机会使大家聚在一起庆祝一下。我草拟了《文艺节公告》。三日，与梅林去访从南京来的邵力子，谈文协的工作情况。梅林向他诉说没有钱又受压制的种种困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并请他参加下午的年会和文艺节招待会。他都答应了。下午开文协年会，到的人不少，但气氛并不热烈。照例举行了理事和监事的投票选举。第二天上午的文艺节招待会就不同了，有一些即兴的节目，气氛很活泼愉快。

招待会后，我应邀到三区百货业职工文艺展会上讲了话，下午又为三学生团体讲话。百货业的职工，文化水平较差，可很多人都喜欢文艺，追求进步。我除了讲述五四文化运动的起源和推动全民族的进步外，还抨击了当前的反民主的反动统治。几天后，又到青年文艺研究会去讲话。这里的人员成份比较复杂，但还都是要求进步的青年。是谁主持的，谁来邀请的，现在都记不得了。

文协的理、监事选举结果出来了，5月19日开理事会。公选的结果，我仍被推为常务理事兼研究组组长。

我虽然自己不办刊物了，但和我有联系的一些朋友，陆续地出了几种刊物。我认为，它们首先是被反对国民党统治、向往共产党政治路线的群众要求所推动，是那种要求的一种反映。他们向我要文章，我没有专为他们写稿，可是介绍过一些文稿给他们，如孙铤、牛汉的诗，阿垅的诗论，和路翎的小说等。他们把刊物寄给我，我都仔细地看了。我感到，有的文章虽有些幼稚或过激，但他们都是一些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青年，他们的作品反对了旧社会和国民党统治的现状，有的还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其中有歌颂翻身农民的诗，甚至有直接欢呼革命，宣传解放区新颁布的《土地法》的诗。由于我在思想上过于重视他们的进步方面，就没有去信批评其中出现的问题。结果，他们的过激文字，往往产生了不利于团结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方然对陈白尘《升官图》的批评和对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的反批评，都使文艺界吃惊，有些恼火。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1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宝贵材料！

《升官图》这个戏，我和雪峰一起去看的。记得夏衍当时也在场，他恳切地对我说：“说来一定会使你失望。不要看有这么多观众，他们许多人是做投机生意赚了钱，一买就是二、三十张戏票，送给亲戚朋友，男女老少都来开开心。”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况。在争取观众方面它是成功的，但这事也使我对中国的话剧开始了思索和研究。早在我写《契诃夫断片》时就想到，中国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契诃夫式的剧本，严肃地写出真正的人物来？后来，曾和路翎谈过这想法，但没有鼓励他去写。现在，他可能是由于住在南京，常和戏剧界的朋友有来往，萌发了写剧本

的心情。他寄来了四幕剧《云雀》，当天就读了。隔一天重读，对人物的性格有所理解，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写信对他说了。十数天后，《云雀》修改稿寄来，还有黄若海的来信。黄若海他们的剧团准备上演它。我一面在看《云雀》稿，一面在看苏联丹钦科写的《文艺·戏剧·生活》，又重读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在此期间，我看了好几个电影，有苏联的和美国的，还同M、晓谷一起看了《北京人》预演，我在思索着喜剧与滑稽剧的区别，喜剧与悲剧的区别，为了多卖票，就不需要悲剧了吗？……

黄若海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剧团任团长，大概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争取到这次实验性质的演出。大家都很珍视这次上演。路翎来信希望我为此写一文，他们预备出一次小特辑，在报纸上发表或自己印。我只能就剧本内容说很少的一点感想，对于“戏剧和舞台实践”这门学问我还正在探索。

我的短文，第一句话就是，“《云雀》，是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我说，“《云雀》，虽然有四个人物，四种不同的代表的性格，但真正的主角却是通过这四个人物所宣示出来的，冷酷而磅礴的，轰轰烈烈前进的现实历史自己。”“性格矛盾，是历史内容底矛盾成分底反映。所以，《云雀》，没有正面写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更没有解答一个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然而，它所显示的这些矛盾的性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搏斗，是照明了包含着这一类的性格斗争在内的每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那么，面对着在伟大革命过程的历史舞台上演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底苦痛和搏斗，他们底善良和卑怯，他们底复杂和单纯，他们底执着和虚浮，他们底死亡和越过死尸更坚强地前进，我们不是能够真切地感到人民力量底雄大，人民斗争底庄严，以及一切为了完成这个斗争的实际工作所要求的那种高贵的情操么？”“悲剧，不应该是用死亡来压迫观众，不应该是用流血来恐吓观众，

……”“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性格矛盾的悲剧，它是为了提出知识分子在灰色战场上面的奋斗节操，它是为了证明悲剧应该能够达到乐观主义的战斗要求的。”

重新阅读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

6月21日晨，我到北站坐九时的特快去南京，观看《云雀》的演出，并会会朋友们。

南京，自我于抗战逃难路过时以来，并无多大变化。下午五时许，找到剧专剧团，见到了黄若海和洗群等。饭后坐剧团卡车到了演出地点文化剧院，路翎也已到了。

八点半演出开始。布景很简单，人物也简单，但慢慢地，剧中的人物都活了起来，看来观众是被感动了。晚上，住在剧团黄若海处。第二天，路翎、化铁、冀沅来看我（化铁在南京气象台工作，冀沅在邮电局系统的子弟小学教书）。午饭后召开演出座谈会，我谈了看演出后的感想。当晚，又看了一遍演出，住到路翎家。在与路翎的闲谈中，由《云雀》谈到了戏剧人物的创造等。

专程去访杨玉清。他那时在司法部(?)工作，因为大哥的事，我曾托他帮忙。他到上海来时还特来看望我，对我深表同情。这次，除了向他表示谢意之外，也想了解一下国民党内部的情况。

路翎和若海陪我游后湖。我对游玩并不感兴趣，也看不出现在的南京与我上中学时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倒是趁此机会和若海又讨论起他的剧本稿《兄弟》。我对他谈了自己的意见，肯定了这剧本，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第三次观看《云雀》的演出。后来，与若海、孙坚白、路曦、洗群等交换意见。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观众已开始对这剧本感到亲切能接受，演员也已深入角色领会人物的性格感到创

造人物的愉快心情了。这一点是很可贵的。我最怕的就是用漂亮话去强迫演员和观众接受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方然突然来访，我十分惊喜。原来，他家托人将他保释了出来，刚到南京。他谈到他被捕的情况。那是由于特务在撤退后的《新华日报》住地找到半页烧剩的残片，是他写给张友渔的信，因此被捕。在审讯中，他没有说什么。这次路过南京将回安庆老家。回到安庆后，他的伯父，一个旧军人，也就是他的保人，对他严加管束，等于是软禁在家。他从安庆来信不得不用“国军”、“匪军”这样的反话，“听天由命”也是等待解放军来解放的意思。记得在解放军进到桐城以后，为了祝贺舒芜被解放（他以为舒芜会随解放军去的），他还写了旧诗寄贺舒芜。1955年后，他不但受我牵连，被定为“分子”，还遭到种种迫害，最后，绝望自尽，这也是我起初想不到的。

又看了一次演出，并与演员一起合影。听说，这戏惊动了张道藩，他大发雷霆，说什么“我们自己的剧院，怎么能演宣传共产党的戏？一定要查办！”好在他们也不打算继续演下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我这次去南京，还有一件事。我想再编一个刊物。过去在重庆发的《希望》登记证，早就无效了，现在必须在国民党内政部重新登记。我去内政部拿了登记证，又跑到警察总署，想找个人负责谈谈。但没人接见，只好留下登记证走了。

第二天晚饭后，化铁、方然、若海、路翎等送我到车站，坐夜车于次日中午回到家，又开始了上海的忙乱生活。

回来后看完书桌上这几天的来信，立刻回了几封。首先是给重庆钱方仁的。方然在重庆时曾来信向我提到，重庆的印刷厂没生意，排印的价格很便宜，由于还留有一些老排字工，所

以质量也较好，可以在那儿排印书。我正在为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下册三、四十万字排不出来着急，在上海排需要一大笔现款，希望松实在付不出，所以就委托方然帮忙在重庆排，可以慢慢付款。不料，方然突然被捕，这工作只好请方然的夫人钱瑛和妻弟钱方仁帮忙了。只是，他们对这方面没有方然熟悉，我就常去信嘱托，不敢大意。

几天后，蒋天佐来访。自从办事处撤走后，许多老朋友都到南方去了，改由他和我联系，是我的上级。他似乎是北方左联的，外文还好，曾送我一本他译的《萨尔蒂珂夫寓言》，也搞文艺理论。说是肺有病，因此一直在上海，现在留下做文艺界的工作，对我很关心。这次来是告诉国民党有黑名单，可能近日会抓人，要我留心，最好去外面住几天。

当夜，我就和刚从杭州来的阿垅（他住我这里）一起去植芳家。他新近搬到虹口去了，和几个青年同住一层楼，有空床铺可以留宿。我和阿垅在那里住了两夜，第三天送阿垅回了杭州。黑名单虽有传闻，但没听到抓了人的消息，我对家里老小实在放心不下，还是回家去了。

这一阵稍闲，晓谷也放暑假在家，特带他去访问雕塑家刘开渠。他是卢鸿基的老师，不知是谁介绍我们认识的，是一个朴实的带有泥土气息的艺术家。把他安排在上海市园林局（？），说是请他塑中山先生像，其实并不想让他工作。因此，他很有闲暇，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晓谷在桂林时曾看过罗丹的《美术论》，很有兴趣（我想主要是对雕塑中的一些故事），所以带他来看看真正的雕塑和雕塑家。他的工作室是花圃深处的一间大屋，里面到处是泥巴，不见有成形的人像，似乎是他的助手在练习塑什么动物之类。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简单地向晓谷讲了一下雕塑的过程等。后来，又带我们到他家里去坐，见到他的夫

人程丽娜。我曾从卢鸿基那里听说过他们的恋爱故事。程是他的学生，广东人，家境很好，开始家里反对他们，但最后还是结婚了，生活很美满。有三个女儿，可惜大女儿患先天性的疾病，行走不方便。他很想塑鲁迅先生的像，他过去在北京时见到过鲁迅先生，后来试塑过像，不满意。现在想重塑。我曾陪他去见许先生，并给他收集了一些画像及照片。但他感到不够，这件事就冷下来了。想起来，真是很惋惜。

参加文协招待律师的茶话会。主要是希望律师为保障作家的权益和人身安全主持正义。最近，发现许多书商偷印著作或私自编印选集。由于他们有四马路的老关系，发行网多，作家在经济上受的损失就更大。我们希望今后如发现这类情况，可请律师提出诉讼，以保障作家权益。

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发了警告信。倒还有点作用。最大的偷印书商来请求协商和解，有的也愿意按规定支付版税。

植芳陪舒芜和黄若海来我家。舒芜是去北平相亲后来上海亲迎未婚妻再同去老家结婚，本想住我处，我将这里恶劣的政治情况告诉了他，他就住到植芳处去了。黄若海可能是路上遇见的，他带来了洗群的信。在此晚饭后才散去。

这一阵子，国民党越来越猖狂，对进步文化人多方刁难，出刊印书都很困难。物价上涨飞速，收回的书款买纸都不够，再印书就更困难了。我无固定收入，靠卖文又无时间写，只靠一点版税实在难以应付，常常弄得只好向俞老板预支版税过日子。眼看我肩上又将增加新的负担了。由此就想到一定得找个职业才好，我能做的也只有在大学里教几点钟的课。但是，发了几封信，得到的回答都是“不可能！”

开始给晓谷补习英文，自己也乘机温习一下早已丢生了的英文。我想，最后无法生活时，还可以靠翻译度日。

重新细读《欧根·奥涅金》。正好吕荧从台湾归来，我告诉他趁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在上海重印一版。他很同意，并且全权委托我。我要他再找几张照片，无论如何，要印得比重庆的土纸本好得多。几天后，他又来看我，一起到善钟路静安寺路一带外文旧书店去买旧书。俄文原文的很少，他只买到两本莎士比亚的原著，他当时在台湾大学里正教莎著呢。而我可一无所获，什么合用的都没买到。后来我又陪他去见新新出版社的贺老板，谈妥了出《人的花朵》。不久，他就回了台湾。

黄若海来，谈他的剧本和他在戏剧创作人物方面的体会。结合我看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是一个对事业兢兢业业而又真诚的追求者，他所谈的都是自己费了心血探索得到的真实体会，是很宝贵的。只可惜他陷在那样的剧团无法施展他的才华！谈至夜深，留宿于此。

舒芜住在植芳处已好些天了。我到那里去看望时，常遇见很多客人，十分热闹嘈杂。舒芜无所事事很无聊的样子。他说未婚妻不会来了，准备回去。带他回家住了一夜后，他就回桐城去了。

苏联人司徒劳(Stetlov)，好像是文化参赞，约我和适夷在咖啡馆见面。他即将回国，我就和他谈些“七月”诗人及当前的文艺现状。出来后，适夷请吃俄国大菜。适夷在编《中国作家》，曾多次向我约稿，我一直没心绪写。这《中国作家》主要是团结沦陷区一大批作家，当初选适夷主编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希望他多约上海作家。

到沪江大学为他们的暑期进修班讲话。见到曾在《七月》上发表过文章的徐中玉，他已毕业，在沪江大学教书。

俞鸿模交来鲁藜《锻炼》的清样，望我赶快校出。为了早出书，只得赶校出来。又自己设计好《密云期风习小纪》的封面。

二哥忽从乡下来，说是和我商量大哥的官司。近十年不见，显得苍老多了。体格看去还是很健朗，这些年仍然在大田劳动。我从他的谈话中看出，他这次来的目的不只是谈大哥被杀和打官司的情况。他告诉我四弟的一些使他反感的行为。大哥曾多次同我谈起过四弟的为人，我以为他经过这多年该改了一些吧。上次他曾介绍中原散失的部队来找我帮他们接上了关系。我想，他既然和游击队方面有交往，能受到些好的教育，对他是好事。但听二哥这一说，他似乎积习甚多，尤其在金钱方面。个人生活嗜好又多，不务正业。但现在家里没有比他更能的人了，大侄子是个老实人，忙于教书，只有他能说会道，交游广，还能在场面上说个话，等等。说了半天，我才明白了二哥这次来的主要意思。原来是，分在我名下的那份田产我当初没要，大哥说自己人口多，就交给了他。这时，二哥说，如我不要的话，就应该分为三份给其他三房，不能再给大房。我听后心里一阵酸楚，我怎么能提出这方案呢？大哥刚死，还有大嫂和两个未成年的侄女需要抚养。我没有答应。二哥家里生活是富裕的，还要打这几担谷的主意，令我很反感。

第二天陪他去看眼睛。刘医生说是一般的老沙眼，还结痴了，不发炎是没什么问题的，只替他上了点眼药。M领他在大马路一带买了点衣物。我手头紧，只能给他买点小礼品，几天后，就买好船票送他上了船。临行时我说，希望以后再来上海，好好玩玩。谁知这次竟成最后一面。并且，他对我也很不满意，回去不久，就叫他儿子代他写信大骂了我一通。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从小在地里劳动，一心想的就是勤劳致富，为子女多置田产，他怎么能对我的想法满意呢？

心情很坏，除了在外面跑书店，印厂，到作家书屋找雪峰等谈谈外，就尽可能地坐下来看书和看稿。看完了《战后苏联文

学之路》、曹禺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歌德的《亲和力》和高尔基的《夏天》。看了黄若海的剧稿《祖父》，觉得写得很好，有深厚的感情，不晓得在演出时演员能否表达出来。M在我书桌上放了一份稿子，是她写的小说。我匆匆看了一遍，但可能是因为放的时间久了，她不高兴了，不等我再看一遍并告诉她我的意见，稿子就不见了。我问她，她说已寄走了。后来，它在凤子编的《人世间》上发表了，那封面似乎就是用的小说中的题材，一个生病的瘦女人。这算是对我的抗议和莫大的讽刺吧！

记不得是哪个刊物向我约的稿，我终于写成了《先从冲破气氛和惰性开始》。当时的心情实在有一种被惰性包围的感觉。我是这样分析惰性的：

很久很久以来，有一种压抑着我们的东西：便宜上，就把它叫做惰性罢。享受着既成的秩序，陶醉于现成的秩序，这就是一切。然而却又毫无自信，极力耽心着这个既成的秩序。所以，任何生疏的东西，愿意而且能够作为加入这个既成秩序的成份，不使它受到扰乱，那是可以的；任何伟大的东西，愿意而且能够作为这个既成秩序底冠冕，不使它实质上有什么改变，那更是欢迎的。而造成我们所身受的那种气氛的各种现象，不但在既成秩序里面有着正式的家系，而且正是顶着既成秩序所欢迎的冠冕，又矢志成为既成秩序底顺民的。对于它们的批判或反击，就不能不被看做那个庞大的可爱的惰性底叛逆了。

.....

到这里，惰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惰性，被惰性所助成的气氛也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气氛了。压抑着腐蚀着新的生命，而又没有力量向袭来的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性的文化攻势相抗，这就终于造成了一片麻痹的现象。

历史在前进，人民在前进，继承着革命传统的我们底文艺，为了更大的奋发，首先就得冲破这样的气氛和这样的惰性。

一直在想着继续编杂志的事。曾去信南京内政部的闻钧天，过去重庆《希望》的登记证就曾托过他查询。他回信说，登记证还没到他们那里，看来不知被扣押在哪个办公桌上呢！

黄若海夫人带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从香港来。留宿在这里。第三天，他们回南京。

《第七连》和《密云期风习小纪》于早几天出版了。这时，俞老板又将《锻炼》带来了。我为《七月文丛》拟了广告，准备做些宣传。

在查春明书店偷印书时，梅林同书店老板成了朋友，前不久答应为他们编一套丛书，主要是进步的知名作家。内有我一本，我答应了。编选和抄文稿，花了我几天时间。又花了一天时间写成了《胡风文集》的序。

植芳夫妇来，临行时任敏说，过两天给我们带月饼来。我们送他们到门口，晓风还叫着“贾阿姨再见！”谁知四五天后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带来一纸条，上写贾植芳夫妇在家被捕，原因没有说。当天晚上，我去找梅林商量，是不是可以通过文协去调查将他们保出来。当夜住在文协。

回家后金××来。他是贾植芳在徐州时的下级，到上海后由植芳介绍的工作，在上海安了家。此人很讲义气，对老上司很尊敬，常去看望。这次他们被捕就是他先知道，后又托人来通知我。从他那里知道，植芳夫妇是因为刚搬走的同住学生们被盯上了，而他又用着学生们的信箱。这样，就被抓走了。

同时，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已改名为富通印刷厂）也被抄被查封，原因是小学教师联谊会在那里开过会。幸好胡国城

不在，未被捕。从这些情况看来，植芳夫妇如因学生们的地下活动受牵连，问题就将很严重。近日来风闻中统军统对被捕的人很严厉，金又告诉我植芳是中统捕去的，关在亚尔培路二号。这使我很不安，怕越来越麻烦，应早设法将他保释出来才好。我给阿垅写了封信，希望他能找到贾植芳曾同我谈起过的北平上中学时的教师陈卓，陈后来当了警察局长，现在南京可能还干这行。我想，以师生之谊请他帮忙将植芳保释出来，该是可以的吧。（此信被选入《第三批材料》，且注释为“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当然，我哪里会想到这封信竟会派上这大的用场！）

金××来信告诉我，任敏已放出来（她也被关了十来天！），现住在他家。特去看她，从她那里得知了详情。果然，他们和小教联的一些教员关在一起，不过，植芳还没有受刑。我要她赶快设法营救，哪怕是向家里要些钱赎他出来。我担心，国民党在节节败退时会狗急跳墙不顾一切的。我看那住所很简陋又很小，就要任敏住到我家去。她说这里方便，就没有勉强她。

贾植芳到上海来安家已一年。家是安下了，新旧朋友也真不少，但时间可就在聊天访友中度过了。我曾多次和他谈，希望他能安下心来从事创作，这几年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见识的也多，不写下来太可惜了。他自己也一再向我许诺好好写。但最后，还只是将在我这里发表的小说编了一本，定名《人生赋》，我把它放在海燕书店出的那套《七月文丛》中。之后，没见他拿出什么新作。如果他一时出不来，甚至有什么意外的话，那是太可惜了！

忽然收到东平妻子吴笑从广东乡下寄来的信，看后真令人心酸。她原是东平的五嫂，五哥参加澎湃的海陆丰暴动牺牲了。抗战前，东平回家后对寡嫂产生了爱情，一同到上海，后来有

了一个男孩。东平对她很好，上海战事发生后送她回乡下。东平参加新四军后一直无法照顾她，我在武汉时曾替他寄过钱。到重庆后就音讯全无了。这次收到信，才知道她现在乡下种田，孩子已死，女儿没钱上学，生活十分困难。我立即筹了点钱给她寄去，别的就帮不上忙了。

带晓谷去许先生家，陪她一道到万国公墓。许先生准备重新修整鲁迅先生的墓地。抗战胜利后，曾草草修理了一下，许先生觉得，现在的经济情况好多了，想修整得更堂皇些。我对修整设计提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意思是，不要搞得富丽堂皇，树也不必太多，只要庄重。站在墓前能使人感到亲切而又庄严，就最理想不过了。几天后，又和许先生、雪峰一道再去，查看种树的情况和别的布置。我们都认为，在今天也就只能这样了。真正的理想的先生墓地，只有如雪峰在先生安葬时所许诺的，革命成功后重新设计安葬！

金××来，告诉我植芳仍在亚尔培路二号，他不同意家里找关系出钱赎他出来，说是要抗议国民党的乱抓人。他的愤怒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权在杀人不眨眼的特务手中，夜长梦多，万一被屈死就太不值得了！我还是要金××转告任敏多方设法营救。

舒芜偕他的新婚妻子来，说要住在我家。这次主要是向在上海做寓公的父亲要钱，同时在上海玩玩度蜜月。我只好将三楼的书房让出来，将日记本拿下来，与M及晓谷住在一起。当天，M为招待他们做了几个菜。

10月19日上午到万国公墓，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无法租借电影院或礼堂，隆重地开纪念会。就不拘形式，大家围着新修整好的墓地凭吊，并自由发言，寄托哀思。到了有一百来人，除家属外，都是至亲和友人，及一些崇拜者，其中青年

人很不少。下午，到梅龙镇饭店出席苏州一文艺团体的谈话会，内容也是纪念鲁迅先生的。后来去文协，与梅林、适夷等一起吃晚饭。

舒芜已从他父亲那里拿到一部分股票，马上换成了现款。M和他们夫妇尤其是他夫人没什么话可交谈，他们这几天总是吃了早点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来。我就抓空子写些信，别的事是无法干的。

最初，M还尽量为他们买上海的早点，后来，也只好让他们和我们家人一样吃泡饭和用救济粉摊的面饼了。这救济粉是孙夫人宋庆龄向联合国救济总署要来救济我国难民，连麦麸都在内的粗粉。文协也分到一些，由梅林分送驻沪的会员，大概愿要的人不多吧，梅林给我送了两袋来。它虽是粗粉，却能解决我家五口人的吃粮问题。那时买平价米很难，还不是经常有。黑市米又贵得吓人，我这点稿费还不够买米呢！M的母亲吃过敌伪时的配给面，说那比这更黑更粗更难吃，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从此，油摊软饼就成了我们一家的早餐。后来，M又学着做黄梅酱，甜酸味，抹在饼上孩子们都很爱吃，就连舒芜也表示欣赏，这使M很高兴。

顺便说一下，救济总署还分给文协一些衣服，都是各国捐赠的，有呢子的和羊毛衫等，但都破旧了。梅林给我拣了一包衣服说是给孩子们穿，后来又拿来两件救济难童的灰布棉大衣，那个冬天孩子们冷时就穿它。可见当时作家的生活是多么困苦，反饥饿反内战正是人民的切身利益。

舒芜夫妇住了九天后才回桐城。幸好他们走了，因为当天晚上M就见了红。第二天一早将她送到医院。但到下午三时我去时，她仍躺在手术台上，还没生。医生准备动手术，我说再等一等。我去时带了一包饼干和两个苹果，这苹果是乔冠华（或

周而复)托人从香港带来送我的,还有一听炮台烟。我选了两个大苹果就跑来看她。她连午饭都没有吃,只早晨吃了两个鸡蛋。她吃了我带去的食品后,终于在下午五时,生了一个男孩,重七磅半。她后来总说是那两个苹果给了她力量,如果是女孩她就要给她取名“苹苹”。

我天天都要到医院去看望妻儿。没想到现在的医院和抗战前的大不相同,伙食很坏,护理也不好。那位中年的护士长却管理认真并十分严厉,第一次见到我就训了我一通,要我给产妇带有营养的排骨、猪肝等来。我想也是,M的身体不太好,这次无论如何也要使她壮实起来,就一天两次给她送饭,肉汤猪肝面之类的。幸好伤口长得很好,三四天后就拆了线。她能下床了,我就只须送一次饭,晚上她自己设法热热吃。住了十天后,将母子接回家。由于住的是三等病房,又是教会办的,钱要的还不算多。

这年适逢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周年纪念。苏联方面准备重建一纪念碑(百年祭时上海侨民曾集资立了一个铜像,1944年为日军所毁),立一铜像,同时出一本纪念文集。这在开筹备会时已决定了的。我被选为顾问,还得写一篇纪念文章。一直因为忙乱未能动笔,后来,姜椿芳和戈宝权一再催问,说是已到最后集稿期了,只得全力以赴,写了《普式庚与中国》。

为重印吕荧译的《欧根·奥涅金》,我将纸型上的错字一一校出。想出得漂亮大方,就决定用大二十四开本,但在用纸和印数方面,我犹豫了。好纸买不起,多印又没钱。不知是葛一虹还是姜椿芳提醒我,可以向塔斯社的罗果夫提出请求帮助。我去找罗果夫,他答应平价卖给我几十令木造纸,并给我一张提单,先提纸后付钱。于是,我用这纸印了三千多本书,还从葛一虹出版的纪念画册中将那张彩色普希金肖像画多印了三千

张。这样，这本书不但纸好印得漂亮，还附有两张彩色画像。记得印好后送到上海联合发行公司，贺老板看后一下子就要了一千本，还提前付了款。这使我很快就还了罗果夫的纸款。

到邮局去取回《财主的儿女们》及《洋鬼》的纸型。为了省钱，听从方然的建议，在重庆排版，已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打开纸型，还未细看，已发现好几处不合格和错字，这就需要我慢慢地一行行地来更正。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少花钱多办事，结果却是我得多花力气。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是我自讨苦吃，要想摔手不管也不行了，也实在舍不得就此罢休，只得耐心地咬着牙干。

收到黄若海的信及小说稿《苦汉崔长星》，立即抽时间读了，觉得很好。他对文艺的执着精神很使我感动，可惜没有好的条件，他两个剧本都没能上演，这次我决定帮他找个地方出版这本小说。

编校完我的《出西土记》，这是离重庆前最后几天的纪实。

到黄水（顾征南）家，找到任敏，她目前住在那里。我要她立即去看植芳，都快年终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保他出来。我对她很不满意，她似乎还没我着急呢。我让她先去我家，M准备做点菜交她带去。

编好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字句略有改正。又编《苦汉崔长星》，也略有校改。本来想都交《七月文丛》，后来觉得不妥，但别处恐怕也都不愿要，看来只好由希望社出了。最终，黄若海的这本书还是未能出版，真是抱憾！

《财主的儿女们》的错别字，我已经校订好了，还列了一张勘误表。剩下的事就是找印厂和准备纸。俞老板给我介绍与他有来往的一家印厂，说是价钱便宜，还可以暂时不付现款。但纸就难办了，黑市价贵得吓人，平价又买不着。本来，书业公

会向国家要到一批外汇能买配给纸，我曾和生活书店及其他几家进步书店向他们争取过，结果是一令也不给。意思很明白，就是不让我们生存。姚蓬子得到的纸最多，他已成了书业公会的主要角色。我只好去向他借纸，同时也向俞鸿模借。俞答应可以暂借点，姚却只空泛地说帮我去弄配给纸。

12月28日，梅林来，同去买了一个花篮参加普希金铜像的揭幕礼。散会后被邀到苏联体育会参加俄侨的酒会。这可能是从鲁迅先生1907年介绍普希金以后最隆重的一次介绍了。当然，关于他今后还有许多事要做，他的许多作品都应该介绍过来。

直到1947年的最后一天，我还在为纸事满街奔走。

1948年元旦，路翎、化铁和阿垅从南京来此，住在我家。第三天，大家一道校改《财主的儿女们》下部纸型上的错字。一天基本校完。由于这本有近八十万字，我准备分上下两部出版。上部已交印厂。这次只要能弄到纸，就尽可能上下部同时出。拟定了封面及头尾设计，力求庄重、大方、美观。

曾被邀请观看电影《松花江上》。它由金山编导，张瑞芳主演，在东北利用日寇的电影厂的机器拍成的。虽然条件不能和内地的电影厂相比，但它却感动了我。开座谈会时我发了言，并且肯定了它。这次，影片公司又请我重看一次，意思是希望我写一篇介绍文。对电影艺术我本来有些看法，但从没有写出来过。趁此机会，我将对《松花江上》的观感甚至对整个电影界的一些看法都做了一个尝试性的评价。因此，我这篇文的副标题是《从金山编导的〈松花江上〉看电影艺术》。我这样写道：

……我们看到了东北人民底受难，但并没有任何观念上的感伤的放纵，而是在中国式的善良和忍受里面生成的中国人民，他们底无助和安命主义是悲痛的中国现代史底供状。我们看到了东北人民底觉醒和反抗，但不是从架空

的爱国主义”的概念里面来的，而是由于实实在在的痛苦和仇恨，平平常常的作为中国人的气节底受到蹂躏，因而那觉醒、反抗底过程和反抗者底形象就取得了一种没有虚饰性的力量。而这一切，又都融合在一个总的创造要求所产生的大的旋律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使得《松花江上》取得了超过过去作品的意义。

……用创作的大交响曲来伴奏，这在中国电影艺术上还是第一次，但重要的是，这个创作的交响曲能够对应了甚至加强了整部作品所要组成的，几个不同的主调逐渐交错又互相斗争的总的旋律。

我在《附记》里说明：“本文只是把我从这个作品感受到的，对于说明今天的创作要求上有代表意义的东西勾画出来，希望能够成为艰难的电影艺术运动底参考，不能算是一篇具体的‘影评’。”

《时代日报》用大篇幅，分两期将它登了出来，在电影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见到史东山老编导，他对这篇文章甚为赞赏，说想不到我懂得这么多，对电影有这么深的理解。其实，我只是关心电影的一个普通观众，在重庆时就常和他谈论对电影艺术的一些看法。他是一个对电影艺术十分严肃认真的老编导，对庸俗的虚伪的讨好观众的电影十分反感，我们谈得十分融洽。不幸，他在1954年突然去世，我参加了追悼会，但那时我已没有可能为他写悼念文章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遗憾。

仍在为纸事到处奔走。眼看《财主的儿女们》就可上架开印了，但纸还缺很多。找锦章书局（官价纸都在那里）、光明书局（老板是书业公会的主要人物）和作家书屋（姚蓬子也是主要人物），希望他们帮忙，卖给我一部分官价纸。光明书局老板要我去向社会局提出申请购买官价纸，批下来他们就能卖给我。只好又去找

社会局李剑华副局长，他要我写说明书的内容等等。又到书业公会要了是会员的证明。再到社会局，总算批了几十令官价纸。

请贺尚华店里的一位小伙计帮忙去纸厂拉纸，第一次未运来，第二次才算运来了。还得换纸（因是卷筒纸，要送纸厂换对开纸），最后才送到印厂。书可以开印了，老板决定春节前后印刷装订出一部分。果然，几天后，勘误表的校样就送到了，还催我快校，印厂来人亲自取去。不出一周，老板亲自送来了样书。油墨颜色很好，看得出很卖力。客气地送他走后，M提醒我，“他是赶年夜交货，好向你收账的，我们可付不出这多钱啊。”我才领会到，高兴之余，还得再去奔跑找钱。能收账的地方只有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及作家书屋等几处。上联的贺老板很客气，将全部代销的书款结清，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还向我要了五百册《财主的儿女们》。作家书屋姚老板却向下一推，下面是他老婆把关。她对店员说，点点数看销了多少。然后开了张支票。我没说什么，拿了就走。

不过，我还是发了一笔小财，梅林送来了春明书店出版的《胡风文集》三千本的版税。正好吕荧从台湾回来，给我买来了日文本的《文艺大辞典》（抗战前我曾按期买它，只最后一期没买到，这次是全部的），立即将书款还给他。还有不少余钱，除夕傍晚领晓谷晓风到霞飞路地摊上转了转。给晓谷买了一件人造毛冲华达呢的短夹克衫，现在学生都时兴穿它，他一直只穿着他妈妈用毛线织的夹克，显得很寒伧，孩子倒从来也不计较，今年考试是全校第一名，可以免学费，我无论如何也得表示一下奖励。给晓风买了一个眼睛会动的一尺高的洋娃娃，她高兴得很，这多年来她从未有过自己的玩具，接回来后我们也没给她买过玩具。还为M买了一条羊毛方围巾，她向来不打扮自己，身上穿的还是重庆时的旧布衣，也该让她高兴高兴。

除夕夜七时,《财主的儿女们》送到25部,果然是想结账的意思。我要老板在全部书送到后才结账,他不干,于是争吵了起来。仔细一看账单,还开了许多花账,我更火了。这时,作为发行人的M出来打圆场,客客气气地和他算账,使他无话好说。最后,给了他一部分,还是现款。他高兴了,说其余部分一定很快送到。后来,我想趁此机会装订几本精装,又没钱去买布,就从家里找出了一些零头布,由我直接送装订作,做书面子用。

这年春节,要拜年的人家已不多。郭,茅年前就去了香港。知名人士走了不少,没走的也都隐居起来,很少见到。我就只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和M去许先生家,她约请我们初二去吃晚饭。那天有雪峰在座,听她谈了一些民主党派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已受到国民党的注意和干扰。

在作家书屋,姚蓬子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听刘百闵(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公司的老板)说香港在发动批胡风。这消息很使我感到诧异,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這個時候对我进行批判?当时,我猜测是刘百闵造谣中伤。雪峰也说,恐怕是他瞎编在搞分裂。

满涛、王元化和范康来,送来他们编的丛刊《横眉小辑》。满涛、王元化是邻居冯宾符介绍认识的,后来知道他们在时代社工作。满涛主要翻译别林斯基和别的几位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及文艺理论家的作品,我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些十九世纪俄国民主革命作家的情况。他读书认真,善于思索,他的思想比我更解放,我们谈话时常引起争论,不过,对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的看法我们还是一致的。《横眉小辑》是他们的同人刊物。解放后我在给满涛的信中提到“要遵守组织原则”这么一句话,《第二批材料》引用时注释为“指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原则”。实际上是由

于他在工作上受到批评，我希望他要遵守集体讨论的原则检查，争取，不能违反纪律，以致犯众怒，使这个工作被否定，即“不必要的伤亡”。我和任何人只是友谊的联系，完全是无组织的；和他，更只是思想上的联系，活动上的联系是完全没有的。

看来，刘百闵的消息还真灵通。不久，我收到冯乃超从香港寄来的信，提到他们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很客气地希望我看后提意见。第二天，刊物寄到了，是香港生活书店赠阅的。没看内容，只看目录就明白了八九。《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是对我而来的，但很多地方误解了甚至歪曲了我的原意。更使我难以接受的是胡绳对路翎小说的批评。我感到这样的歪曲，一开始就给路翎定了调子，自然成了一无是处的小资产阶级作者。我不好说什么，也无法给乃超写回信。

这一向看了一些马恩的经典著作，有《费尔巴哈论纲》（日译，重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德国农民战争》。重看《辩证法唯物论》日译中“认识论”部分，及《哲学笔记》中的片断。

将路翎新编的小说集《在铁链中》交俞鸿模拿去付排。开始写《以〈狂人日记〉为起点》，并拟文协《五四特刊》征文公告。文章由于用了对话体，写起来轻松多了，我想，读的人不会再说我诘屈聱牙了。只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六、七千字就完成了。M就喜欢我这种写法，当然，写得快多换稿费也是她喜欢的。但她不知道，我的文章可不是通俗读物，不可能不挨骂。

几天后又赶了一篇仍是谈五四运动的，那是为《时代日报·新文艺》五四特刊所写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批评了胡适们的改良主义，歌颂了“对着铁蒺藜大步向前”的鲁迅和李大钊那样的革命战士。

四弟学仁从家乡来。从宜都分别到现在已十年了。他与二

哥不同，是个不务正业的人，我一直很讨厌他。因为要和我商量大哥的官司，我才让他来的。听他谈家乡情况。家乡不久前被中原解放军暂时解放过，家里被当作地主抄过家，二哥还来信抱怨过。四弟对此倒没说什么，只告诉我他和大哥都与地下党有来往，地下党的负责人常常深夜来我家，大哥还帮助他们钱和粮食。听到这些，我更难过了，大哥如早来看我，是能躲过这场杀身之祸的。

学仁来耽搁了我不少时间。晚上又听他谈天，他很能聊，使我了解到不少乡下的情况。白天陪他去找律师，看眼病。我知道他曾学过生意开过小铺，所以想给他找点生意门路，以帮助维持他和大哥一家十来口人的生活。但在这方面，我路子太窄，问了几个人都不行。每天早晨我就出去跑，他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晚上精神比我足，总同我谈到深夜。我又只能同他住一房，因此无法看书、思索和工作。他一直不提回家的话。还是M看出来，说是他在等我的钱。我总算筹到一笔在我是巨款的钱，交他去买点什么贩卖。他马上喜形于色，出去采购了一些汗背心、胶鞋、镜子之类。我说赚了钱再来跑几趟，要大家分用。后来，M又拿出一些旧衣服和我们用不着的帐子等，分成三份交他。我买好船票送他上船，只买到统舱票，找到了铺位，还不放心，第二天又去看他。眼望着船开，才算了了一件事。这次他来，占了我半个月的时间，我只希望帮他使家里有几个活钱以补助家用。谁知后来大侄儿来信将我这梦想打破了。原来，所有的东西都由他一人独占了，侄儿还得自己出钱向他买背心。他给我来信当然不说这些。对他我是彻底失望了，我对老家的温情主义的幻想也破灭了。

看到《大众文艺丛刊》第二期《人民与文艺》，里面有乔木（乔冠华）直接批评我的文章。使我不解的是，许多他自己（于潮）曾

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却一起批判，但又不和自己联系起来。他能不负责任地忘了过去，我可要向读者负责，不能今是昨非地乱说一通，我必须慎重严肃地想想。

送走自己的弟弟后不久，M的二妹瑶华夫妇新婚旅游来到上海。抗战前，她给我们帮了不少忙，她又是M家最得力最有孝心的女儿，母亲和姐姐住在这里，这里就是她的娘家了，我热诚地欢迎他们。作为娘家人，M请了一桌客邀请几位亲戚，又陪他们到各处玩玩。这些我都不一定参加，只是妹夫同我住一房，晚上总要谈谈，我就很少时间看书写作了。到了端午节，因为有客人，M母子就全按上海式过节，除包粽子外，还做了一些上海菜，尤其是二妹在南昌多年没吃到的大黄鱼。他们住了十来天后要赶回去上班，老太太只好含泪送走了这一对新婚夫妇。

这期间，只参加了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文艺研究班的座谈会。学员都是青年职工，对文艺很有兴趣，还常开晚会，朗诵诗歌。特别喜爱绿原的诗和一些七月派诗人的短诗，朗诵的效果也好。那位张老师的朗诵很有气势，使人振奋。

一年多未见面的小孙(孙钿)来畅谈了一个下午，主要是谈诗，他对诗总也不能忘情。我说想为他再编一本诗集，他说，“今后恐怕写诗不方便了，现有的诗一切由你处理。总有一天可以坐下来尽情地写的。”两人充满信心地握手告别。

看完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修改牛汉诗稿《彩色的生活》，并给他写了信。校绿原诗集《集合》。编好鲁藜的《星的歌》。这些都是准备收入《七月诗丛》二集的。但还得有纸才行，于是又开始为纸事到处奔走。在书业公会开会时，我们这些小出版社提出了抗议。几天后，参加出版业聚餐，主要还是讨论配给纸的问题。我亲自到光明书局找老板商量，还冒着暴风雨去到外滩

(管配纸外汇之处),又和葛一虹一道去找社会局副局长赵班斧。赵说要提出申请,将经济来源、出版社负责人等一一写清楚。其实就是为了限制我们出书,情愿将纸配给不出书的出版商去倒卖赚钱。姚蓬子就靠此买了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后来还想买汽车呢。最后,可能怕我们这些小出版社闹起来,才不得不由社会局批给了我们一些纸。希望社算是可以买两吨配给纸,还不知什么时候有,有了这些也只能印几本书。

北京出版的《泥土》第六期寄到。这刊物是朱谷怀参与和北京大学一些同学搞的,要我帮他拉稿。里面的编辑人员我一个也不认识,只介绍过一些诗给他们。前面几期我都看过,里面充满青年人追求光明向往解放的热情,听说在学生群中很有影响。这期登了好几篇对香港批评的意见。内有余林一篇,那是路翎写的,我看过。其余几篇事前我并没有看到。(由于《泥土》发表了这些文章,1955年时,所有的编辑一律受株连被关押,听说主编已死在劳改队。)

我收到不少新老朋友的来信,都同我提到香港的文章,问我的意见。更多的是同情我,甚至认为我如不写文答辩是不负责任。冯雪峰看到第二辑后就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旧伎?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我不好说什么。我想,这些作者这样写自有他们的用意吧,所以一直不想写文章回答。但现在出现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有的说得不清楚,可能对我造成更大的误解。因此,我就决定自己写了。不仅仅是答辩,而是就想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写成本系统的小册子,然后就现实主义美学问题再写一个小册子。我已经收集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从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到马列主义关于文艺方面的经典著作。我实在一心想踏踏实实地完成这个计划,所以虽然香港方面一再捎信要我去,我都迟疑着没走。他们的好意我是领情

的，意思是让我尽早脱离虎口，因为国民党在上海对我们的迫害越来越厉害了。但我实在是想安心在此完成我的写作计划。

我一面看资料，一面写，进度很慢。

俞老板带女儿从香港来，住在我这里。他是今年春天带孩子去香港的。他的在印尼做生意的叔叔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印尼解放后，重新恢复了营业；并且生意做得比以前更大，全家迁住在香港，邀俞老板前去。他这次回沪说是因为发现女儿肺部有病，同时也为了照料书店的事。但看他早出晚归的忙乎劲儿，也不急于为女儿治病，又不像是专为这些事。晚上闲聊时，才知他还帮他叔叔做生意，在和上海银行界来往。一天，他谈起，常和中央信托局的副局长见面，还知道他常和中统局的人在一起打牌。我心中一亮，忙问他是否可以通过这些人营救贾植芳（贾被捕的情况他完全知道）。他答应去试试。几天后，他告诉我已有办法。我立即去找任敏，要她去找中央信托局那位副局长，然后拿他的信直接送中统局局长，问题就解决了。

贾植芳于8月21日从中统局被释放出来。第二天就来看我。俞鸿模去香港前，植芳夫妇特在爱多亚路北京菜馆厚德福请客，算是向俞老板致谢之意吧。我们夫妇也参加了。

俞老板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天，带着身体复原了的女儿回香港去了。

我总算能安下心来写评港刊的文章了。就这样，时停时写地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到中秋节那天才写成。这仅是第一部分，题为《论现实主义的路》。后面部分我还打算接下去写。

为《论现实主义的路》写了后记，叙述我对港刊的意见并指出乔木的不妥处。当时，完全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以平等的身份来讨论的，没有想到从此招来的是“不接受批评”的责难。

整理重看过后，将文章交给了文协会刊《中国作家》，感到减轻了负担。又将手头的一些工作做了清理。

路翎夫妇从南京来，住在我这里。几天后，化铁借来汽车，载路翎夫妇和我们一家到龙华寺和冠生园农场郊游，玩了一天。第二天(10月2日)，我和路翎夫妇搭西湖号到杭州。之所以想到杭州去，是因为方然在那里办安徽中学，冀沬、罗洛、朱谷怀等都在那里教书，他们一直来信希望我们去游西湖。

我们住在他们的学校里。他们教课都很忙，课余时间才能陪我们玩。贾植芳夫妇一两天后也来了。我事先没有通知他，因为他刚被保释出狱，离开上海到外地怕不安全。但既然来了，就要他多加小心。我们一起游西湖，在苏堤白堤上散步，在三潭印月喝过茶。到过岳王坟、秋瑾墓，还到了灵隐寺，在寺前溪边喝过茶。正逢上海某影片公司来拍外景，认出了我，很高兴地给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有在大石佛前照的和正在爬山时照的，算是这次游杭州的纪念。7日晨，搭金陵号回沪。

有一件事需要提一下。许先生曾来看我，谈起鲁迅全集出版社和王宝良停止合作的事。王是过去内山书店的店员，起先找许先生商量，愿意合作出全集。当时他说完全是帮忙性质的，但许先生同意后，他却一反诺言，不但介绍了会计进来，并且大小事不让许先生过问。许先生觉得鲁迅先生遗著不应该成为商人牟利的买卖，王对鲁迅先生不理解，只想靠此发财。许先生很是反感，于是就提出要散伙。王宝良大失所望，要我和雪峰支持他，甚至说出对许先生不敬的话。我们驳斥了他。最后，多分了一些书给他，才算将他“请”了出去。许先生现在要谈的是，读者买不到全集，自己没钱没纸印不出来，是否可以采用出租纸型的办法，和姚蓬子商量，他出纸和印刷费、支付给她一半书做版税。我和雪峰商量后，觉得这办法可行，不必担心

姚蓬子赖版税和偷版。几经磋商，姚算是完全按我们的条件答应了。他手头有纸，老卖高价纸和倒卖外汇也怕有人揭发，他想用出全集来抵消这方面的恶行。在我离开上海后不久书就出来了，许先生送我和雪峰每人二十套。这批书，解放后我分送给了朋友们。

姚蓬子可能是为生意曾到香港去了一趟，回来后说见到潘汉年，并要雪峰去港。姚代买的船票。雪峰回来后告诉我，潘汉年的意思是，目前应该团结国民党区的作家，香港的批评过急了。还说希望我去香港有不同意见可以当面谈。我估计，第三期的转变可能与潘的意见有关，但既然自己已写了文章，并且交了出去，那还是发表的好，理论问题应是越谈越清楚。

蒋天佐特来看我，闲谈甚久，主要是试探我的意思。楼适夷走后由几个编委负责《中国作家》，蒋说有几个编委对我的文章有意见，尤其是×××不同意发表，等等。发稿拖了下来，我又不主动取回文章，出版者开明书局本来就不愿赔钱出此刊，趁机提出停刊。由于我这篇文章停了一个会刊，我是有责任的。为了补偿书店的损失，就自己付了这篇文章的排字费，将纸型买下。在我离开上海后由M负责希望社的营业，她印了三千册，很快就卖完了。

10月19日，我和M到万国公墓去扫墓。这次到的人更少，许多熟人都离开了上海，或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没有任何形式，大家凭吊一下以表悼念之情。夜，参加职业学校文艺研究班的小座谈会，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和韧战等。

绿原《又是一个起点》送到，已发卖十来天了，销路不坏。整理好《云雀》的样本。整理牛汉的长诗《血的流域》。画好曹白《呼吸》的版样。

晓山周岁。按M的提议，全家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个

合影。化铁、逯登泰来午饭。植芳夫妇在此晚饭，算是庆贺吧。

11月1日限价取消，物价狂涨。我们今后的生活将是难以想象的困难。我一直对生活问题不太关心，几天前去看许先生，她告诉我这消息，叫我赶快去买东西，据说四大公司的东西已抢购一空。我无余钱，对此无动于衷。她立即取出几百万元钞票要我速去采购，我不肯收。她说，“帮我花了吧，否则将贬值成为废纸。海婴只抢购到一张三人沙发，腿还是坏的。想买一个衣柜，早就买不到了，只好买了一个能挂衣服的旅行皮箱。快去大马路看看吧。”

我和M到几条繁华大街去看了看，四大公司真的几乎空柜，据说，越大的东西越早被人买走。我们在一家电器店买了一个电钟，这东西还没人抢购。M想买点布存着，但布店差不多都空了。最后，在我住处附近一家小店买到几丈颜色不好看的布。M说可以用来做衬里。就这样，我们代许先生花了几百万元，并亲身体会到了可怕的经济崩溃。国民党在经济方面和在战场上一样，一败涂地，这一切都将促使它早日灭亡。只是，目前可苦了平民老百姓，赚的钱怎能跟得上物价的飞涨！

和M讨论今后的生活问题。决定只要收到书款，就赶快买进纸，将要印的书印出，发行还不能多，要月月结帐。家用钱，只要有余，就赶快买米和食物，准备应付这段艰苦的生活。我又将自己回上海后发表的一些文章收成一集，定名为《为了明天》，说好由姚蓬子出版，他答应预支版税。

将路翎的《燃烧的荒地》交作家书屋出版。校编化铁诗集《暴雨两岸然轰轰而至》和田间的《戎冠秀》。编好牛汉诗集《彩色的生活》和孙钿诗集《望远镜》。开始剪贴《论现实主义的路》的枝样。

发行金圆券并不能稳定物价，物价飞涨造成人民生活的更

大困难，很多工厂罢工。我在职教补习学校，后又在商业专科学校，教几点钟的课(都是尽义务的)。这些学生大都是要求进步、对文艺有兴趣的职工，可能都在厂里或店里从事革命活动。我常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消息，如，有黑名单，和某人被捕等，要我躲几天。最近听说有我熟悉的青年被抓了进去。其中一个女工，热心服务，极受同厂姐妹们的爱戴，她在文艺研究班里学习成绩很好，在晚会上还显示出优秀的表演才能。我真为她的安全担心。

好心的朋友们催促我，香港的友人也来信要我去。我倒不是不想弃“暗”投“明”，只是觉得自己在这里占着一席地，还能干点事，加之惦记着写完自己的文章，就这么拖延下来了。

我不在家时蒋天佐来看我，和M开玩笑说：“这次我要来拆散你们恩爱夫妻了，让老胡去香港。”M说：“这是什么话！他去香港可是好事。”马上打电话叫我回来。蒋天佐正式通知我，香港方面决定要我立即动身离开上海去香港。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能说什么呢？完全同意。只是要求缓几天让我对家小和未了的工作做些安排。他说：“离开上海和到香港旅途，组织上会安排的，如你广州有人帮忙当更好。”最后决定了，几天后再派人来联系。

我开始做准备工作。首先将希望社一些未了的事办好，这样才便于M继续经营下去。我交给她的任务是，排印我已编好的诗集，一时不忙出书，但我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最好能印出，算是表示我对读者的负责态度。生活要过得好些，不可太苦，健康第一。

从那天起我停止了写日记，以免走后被搜，给M造成麻烦。1948年12月9日清晨，我离开家，由金山来车接我并送我上船。我在上海的这段生活算是告一结束。

附录

我的小传

胡风，湖北蕲春人，本名张光人。笔名还有谷非、高荒等，做职业翻译时用过张果。1902年生。父亲初为做豆腐的手工小贩，母亲是雇农孤女，童养媳。幼年从事过牧牛和拾柴草一类劳动，与穷苦儿童为伍。十一岁才上村学，1920年到武昌进中学，被新文学所吸引。1923年改进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接受了革命思想和革命者为人品德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后，到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理想主义的追求得不到满足，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也仅数月即退。回本县参加革命后，受过一些波折。1929年秋到日本东京。接受了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普罗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加深了对新文学中以鲁迅精神为主导的革命传统的理解，虽然进了庆应大学英文科，但主要精力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运动的学习和革命活动，参加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学研究会，与日本普罗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普罗诗人等发生了友谊交往。在普罗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革命文学的情况。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春，因在留学生中组织左翼抗日文化团体被捕。七月初，被驱逐回上海。即在左翼作家联盟任宣传部长，数月后改任书记。在鲁迅精神的激励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辅助青年盟员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实践与文学学习上面。1934年冬初，因某某自首后的造谣，在政治责

任感上愤而离职。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这以前，在东京时已用谷非笔名译过苏联初期革命浪漫主义故事《洋鬼》（《在彼得格勒的美国人》），还用这个笔名写了一些评论，如挣脱不掉机械论影响的《论主题积极性和对第三种人的批判》等。这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学问题的几封信的发现，和苏联清算“拉普”的斗争，对中国革命新文学传统精神和厄运有了稍稍进一步的体会，只有在民族危机和阶级压迫双重灾难下的劳动人民和动荡的中间层的生活实践中继承即开拓现实主义道路，才能吸收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影响，并加以发扬，散播开去。对政治内容上的人民性和美学内容上的形象性的具体感受和综合分析，在教条机械论的包围中开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求，对鲁迅的斗争起一点配合作用，1935年的评论集为《文艺笔谈》。编了一本地下丛刊《木屑文丛》，介绍了反映苏区斗争的小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等。无别人参加。1936年初，在鲁迅的倡议和全力支持下，编辑了《海燕》，参加者有聂绀弩、萧军、吴奚如等。与在左联时辅助出版的半地下刊物不同，《海燕》冲出了地面，在文化读者中间引起了轰动。但出了两期被禁止了。翻译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和《棉花》（写日共工人共产党员斗争的中篇，当时日本优秀普罗作家须井一著）。诗集《野花与箭》，只记录了一点找路中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感情，其中通过苦痛的爱国主义到人民性的爱国主义，以至对集体主义同志爱的向往；后者还是借译出的日本女工的诗表现出来的。

1936年四月下旬，参加了长征的冯雪峰被党中央派回上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在他的倡议之下，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得到了鲁迅的同意，在短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反映了出去。马上受到了想用“国防文学”口号统一文坛的，违反了统战政策和思想运动要求的作者

们的攻击，引起了争论。思想分歧及其社会根源的大要，见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个问题，近两年来又被“国防文学”派及其追随者重新提出，更把思想扰乱了。我已写成《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作了全面的说明和分析。）。鲁迅逝世前后，为日译《大鲁迅全集》不懂中文的译者做了大量的逐句解释和校正工作，为日本刊物《改造》等写过文章。鲁迅逝世后，在冯雪峰的授意和茅盾等的参加下，编辑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刊登了鲁迅遗作，出了《二三事》、《原野》、《收获》、《黎明》四本，全被禁止了。到抗战开始止的评论合为第二集《密云期风习小记》。抗战起，“血誓”的喊声集为《为祖国而歌》。自筹经费编辑出版了《七月》（小周刊），坚持通过生活实际反映人民性的真实和历史动向的现实主义道路，抵制了所谓标语口号的教条公式主义的浮嚣文风。当年十月，移到武汉改出《七月》半月刊。这时起，一直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注和指导。1938年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四个常委之一，任研究股主任，一直到抗日胜利。《七月》上从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和地区中）来的作者，主要地以诗和报告文学冲破了文坛上热烈但却浮嚣的，正统的但却陈腐的文风，为现实主义开拓了道路，得到了读者的接受。武汉撤退后到重庆，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后任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专任委员。虽然在武汉起意的《七月》大众版更没有可能实现，又在国民党的言论统制之下，但还是把《七月》改为月刊艰难地继续出版了，对公式教条主义和加紧发展起来的客观主义这两个倾向进行了抵抗，同时，在抗敌文协内，团结有正义感的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总务股主任，等于总负责人），抵制了国民党任何分裂或利用的阴谋企图；在自己主持的一些活动（研究股）中传播了一些国际国内的进步革命的现实主义思潮；并监

督会刊《抗战文艺》不致有反共反人民的作品或言论出现。到皖南事变止的评论合为第三集《剑·文艺·人民》(原题为《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另有列为第四集的《论民族形式问题》，对向林冰阉割新文学传统的民粹主义理论从历史性上和逻辑性上做了具体的说理斗争，打退了对新文学解除武装的一场有害的理论攻势。

皖南事变后撤退到香港。编成了译文集《人与文学》。从香港脱险到桂林(1942)，由读者出资组织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和国统区的起过精神突破影响的诗人。出版了《七月文丛》，介绍了为现实主义增加了新的质量的小说散文。对抗战和进步文学中一时间泛滥成灾的颓废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抵制。1943年回重庆后，读到了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整风文件，空前地加强了在人民解放目标引导下的，从实际出发的，为现实主义开路的信心。1942—1943年的评论合为第五集《在混乱里面》。对国民党企图利用抗敌文协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受击转成了反击。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中出来后，和老舍合计压服姚蓬子，由他接编了《抗战文艺》，在工作和稿件上积极支持了他，使《抗战文艺》从瘫痪状态中得到了更生，加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总阵势。国民党因皖南事变禁止了《七月》，经过了一年多的面对面的斗争和一些间接援助，才准登记了《希望》，迟到1945年才得出版。在又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接受之下，同时招到了文坛上颇大的阻力。由于失察并想引起论争扩大整风影响，我发表了舒芜的带唯心论倾向并寄寓反党情绪的哲学论文《论主观》等。反教条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一向引起的对我的不满，借这个问题发泄了出来，给我构成了一个流传了三十多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罪名。以至弄到《希望》都不能出版。

反映抗战胜利和斗争前途的第四期，还是自己设法排印出来的。到抗战胜利止的评论合为第六集《逆流的日子》。抗战后回上海，又出版了四期《希望》，重印并新加了共约四十来种作品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也成为两个中国前途激烈斗争的一些反映。到离开上海进解放区止的评论合为第七集《为了明天》。又因为受到了在香港的作家乔冠华邵荃麟诸位对抗战期间的某些观点的批判，写了回答列为第八集的《论现实主义的路》。这是综合评述抗战起十年间关于文艺思想某些争点的，但仅写成原定十章左右的首两章。还写了记事散文《人环二记》。

进解放区到北平，经过全国解放，只想摆脱文坛上人事纠纷，在党性引导下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作为文艺界代表之一，参加了开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在燃烧的激情中写了《时间开始了！》，题为英雄史诗五部曲。但受到了宗派教条主义者的攻击，不能继续出版。写了记录新生活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在抗美援朝开始时写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又因为过去的文艺观点问题受到了有些人们的批判。但不愿（也不可能）在群众面前进行反批评，积压了两年多以后，在七届四中全会公报的启示之下，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关于文艺实践问题的分四部分的报告。也就是一般说的“三十万言书”。以自己们的问题和有关的其他情况为例，提出了对开国后文艺实践情况的看法及其思想根源与历史根源，并提出了仅仅供中央参考的，克服困难并开拓实践道路的建议。《红楼梦》和《文艺报》问题发生后，把周扬、沙汀、乔冠华诸位党员劝催我发言误会是党的决定，作了“攻击”文艺“领导”的“爆炸性”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了全国性的不但是文艺思想上而且是“政治行为”上的“大批判”。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后，就完全和社会隔离了。将近二十五年。

1979年1月才被解放出来，并被决定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在这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生活中，精神世界经过了身外的天崩地陷，也经过了身内的火烧冰冻，但总是在被对党的原则的信心引导下的感情劳动拯救了过来。明确举得出的有：

一、《求真歌》——古风长短句十四章。

二、《怀春曲》——二百二十余篇，共约三千来首。（是自创的“连环对诗体曲”，以下皆同。）

《红楼梦·人物悲剧情思大交响曲》——分“反集”

“正集”“合集”三十余曲。

《采世巨灵狂想大交响曲》——共十二曲。

《创世巨人理想大交响曲》——共十二曲。

《女性悲剧情思大交响曲》——共十二曲。

《创世英烈悲壮大交响曲》——共十二曲。等……。

《过冬草》——律诗、词，约三百来首。

《报春草》——律诗、词，约百来首。

三、关于过去争论的问题和写呈中央的报告（三十万言书）所引起的问题，关于历史有关的文艺运动情况，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了约有七、八十万字。需待整理。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

编写后记

梅 志

胡风的回忆录，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了三、四年后，现在由女儿晓风整理编辑成书。面对这部书稿，我想就其中的一些情况说上几句。

这部回忆，开始是从左联前后写起的，胡风本人在正文的前面有一段解说：“关于左联，大家提供的情况需要补充和互相校正。我是一段时间的当事人，得提供我所经历的情况。要叙述我和左联的关系，非从东京说起不可。……因我在病中，只能提供一个扼要的叙述。”^①按他当时的情绪和精力，是只想把他在左联工作这一段的前因后果及一些具体情况写出，以供参考，并没有想写更多的情况。但是，回忆一发表就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兴趣，因此，编辑部恳请他继续写了下去。当写到抗战期间撤离武汉时，天不假年，笔从他的手中落下，再不能继续写下去了！

这项工作本应就此结束，但由于读者的要求，编辑同志又约请我们根据他的日记、书信、回忆初稿和在狱中写的一些交代材料继续写下去。这些材料有的比较简单，我只得尽记忆所及，来对一些具体事件和工作情况加以补充。为使读者了解我们在旧中国的困苦生活，我又补充了一些生活细节。我就这样勉为

① 见《新文学史料》1984第一期。成书时已删去。——编者

其难地努力完成这项任务。

在他本人写的那一部分回忆里，不但把事隔半个世纪之多的史实写了出来，还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思想认识和文学道路。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反思，将自己的失误和不当，都坦率地写了出来，做了自我批评。这对于了解他的文艺思想和做人的态度，该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吧！

我接着完成的那一部分，相形之下就差得太远了。我只能尽力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亲身经历的、没有根据的、不了解不清楚的，就不写进去，并且尽可能用他的原始材料。对一些被人们夸大失实或以讹传讹之处，尽我所知做了一些纠正。看来，我的力量也就仅止于此了。我不禁又一次哀叹他未能完成他的事业！

由于原来是陆续写陆续发表的，缺乏统一规划，也有叙述不清或重复之处。这次重编时，重分了章节，加了小标题，体例上力求一致，文字上做了些修订，内容方面也有少量增删。只是，为了保持胡风原作风貌，对他亲自写就的前三章中一些写错的地方或没搞清的史实，我们就不作改动，而用编者注另行说明。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我们多方核对了一些材料，但毕竟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还望有识之士不吝指教，共同丰富史料宝库！

1991年11月